

毛澤東的遺產

《新史記》編輯部

政治大學圖書館



D1848084

毛澤東並非僅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帝王。他的遺產和形象成為了要力爭在中共十八大躋身最高政治地位的精英們的有力武器。

毛澤東是對現實強烈不滿的中國的一面旗幟，現今中國固然是拉大旗作虎皮，遵從這面旗幟，但是真槍去，讓他們不由得不大事。如何應對，是極具難度的考試。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的遺產

毛澤東

的遺產

毛澤東

毛澤東的遺產

內容簡介

韶山沖鄉下的“十三伢子”，如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心中的紅太陽？回顧空前絕後的造神運動，除了毛澤東自己推動外，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現在，通過互聯網、文章和書籍，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爭論日益高漲。自由主義者和親市場力量站在一邊；左派和毛派站在另一邊。

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个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

茅于軾發表文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歷數毛澤東的罪惡，包括心理陰暗、搞階級鬥爭、害死五千萬人、將國家領至崩潰邊緣等，指這個“禍國殃民總後台”至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中國的滑稽劇還沒有真正謝幕”。茅坦言，要將毛“徹底趕下神壇”。

辛子陵則指黨史二卷的先天不足，是沒有突破1981年“歷史決議”的框框，沒有執行鄧小平重新評毛的指示，繼續為毛澤東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為尊者諱，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這個指導思想注定了這在歷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紀念建黨90週年的一件壽袍，過後就被束之高閣了。

被茅于軾辛子陵發出討毛檄文激怒的左派人士，採取所謂法律手段“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通過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其行為無疑觸犯了《刑法》第105條的規定，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理應受到刑法的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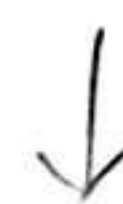
中國官方媒體對“擁毛派”與“反毛派”之爭鮮有報導，當局公開也無正式表態。

毛澤東並非僅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帝王。在最近，他的遺產和形象成為了要力爭在中共十八大躋身最高政治地位的精英們的有力武器。

982.888

039

576



1782.887

8747

8484



毛澤東的遺產

《新史記》編輯部



外參出版社



1848084

目錄

CONTENTS

書名：毛澤東的遺產

編者：《新史記》編輯部

封面設計：李石

出版：外參出版社

電郵：waicanmagazine@yahoo.com

國際書號(ISBN): 978-1-936895-04-5

定價：109 港元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未經書面許可，不得擅自轉登該書內容

本書內容和觀點不代表本出版社

“唱紅走黑”煽動革命，起訴“茅辛”公審毛澤東 /1

他們訴諸司法訴訟，要求法律追究茅、辛的所謂誹謗毛澤東等等“犯罪行爲”，認爲茅、辛許多敘述並不符合事實，這些也還沒有偏離正確的方式。若能通過審判，雙方通過舉證、法庭辯論，不難分辨真假。通過這一個案，不是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對於毛澤東功罪、毛澤東時代優劣等等問題的公開討論麼——而這種公開討論，過去從來沒有准許老百姓在公開的媒體平台上進行，都是中共自己通過決議來做出評價，也可以看得更清楚，當今領導人，是繼承了毛澤東，還是背離了毛澤東？繼承得對不對，背離得對不對？

毛澤東影響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 /13

毛澤東並非僅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帝王。在最近，他的遺產和形象成為了要力爭在 2012 年 10 月躋身最高政治地位的精英們的有力武器。“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一位大學教授和網絡評論員萬軍說。“這種思想意識上的激烈碰撞揭示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危機。”

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有著深刻的分歧 /20

在中國，通過互聯網、文章和書籍，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爭論日益高漲。自由主義者和親市場力量站在一邊；左派和毛派站在另一邊。

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是如何形成的？ /24

中國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鄉下的“十三伢子”，如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心中的紅太陽？回顧空前絕後的造神運動，除了毛澤東自己推動外，中共許多領袖級人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毛澤東熱”席捲全中國的來龍去脈 /30

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

毛澤東是清官還是貪官？ /46

中國官方媒體對“擁毛派”與“反毛派”之爭鮮有報導，當局也無正式表態。章立凡評論說：“官方對這個事很頭疼。這個是他們自己種的，現在他們自己在吃這個苦果。你們當初不能夠把毛澤東的罪惡說清楚，把歷史給徹底糾正，所以，才有今日之思想的混亂，以及極左思潮的氾濫。”

海南毛像被毀，兩派爭說毛澤東 /50

中國海南省文昌市一座毛澤東漢白玉像在樹立不足一年半之後不久前被開發商推倒，斷裂，在網上引發了比較大的反響。

禍國殃民總後台還掛在天安門 /54

北京異見學者茅于軾發表文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歷數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的罪惡，包括心理陰暗、搞階級鬥爭、害死五千萬人、將國家領至崩潰邊緣等，指這個“禍國殃民總後台”至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中國的滑稽劇還沒有真正謝幕”。文章引起轟動。茅對坦言，發文目的是要將毛“徹底趕下神壇”

對毛澤東的再認識 /65

讓我們通過冷靜的思考，尋找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不要為謊言和虛假的宣傳所迷惑，延誤我們向前進。

只有和毛澤東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榮 /69

辛子陵：黨史二卷的先天不足，是沒有突破 1981 年“歷史決議”的框框，沒有執行鄧小平重新評毛的指示，繼續為毛澤東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為尊者諱，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這個指導思想注定了這在歷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紀念建黨 90 週年的一件壽袍，過後就被束之高閣了

共產主義理想付諸實踐就一定天下大亂 /88

應該承認，30 年來我們的經濟成就確實很大，很了不起。這個成績怎麼來的？我們得搞清楚，得保持清醒頭腦。領導人說，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是黨的英明領導的結果。我說，不對，這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了修正主義道路，或者乾脆說，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

PK 茅于軾：我也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 /114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命題，因為毛澤東所居

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為毛澤東究竟是神還是魔爭論不休

何新發出歌頌毛澤東的最強音 /129

“僅僅因為毛澤東的出現，歷史在 20 世紀一度改道而行。”“毛澤東雄姿英發，文韜武略，倜儻風流，膽識過人……個人魅力是無窮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在他面前，巨人顯得渺小”，其“業績令當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後世之人難以置信”；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高無上的聖人、教父和領袖”、“超級巨人”“凡軀之神”，甚至，“毛澤東是一個神話”！

毛澤東是孤獨的大失敗者 /143

毛澤東的理想、烏托邦幻想徹底破滅，他的精神世界崩潰，從 1970 年代初閱讀《笑林廣記》的大字本，到死亡叩門之前反復聆聽《恨賦》、《別賦》、《枯樹賦》，毛澤東這棵孤單無依的枯樹正在頹然倒下。失去親人、戰友、朋友和理想、真情的毛澤東，連個人生活上最後也成了孤獨絕望的大失敗者

毛澤東到底是暴君還是偉人？ /158

當有人宣揚用毛澤東思想治國的時候，我們就要保持高度的懷疑和警戒，因為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本質和實質不過是權力鬥爭 + 個人獨裁。

阿拉法特：認識毛澤東的一面鏡子 /162

你看了這歷史，就知道為什麼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們那麼誠懇地促膝談心，為什麼江青在文革時對美國作家那麼殷勤——要

出口轉內銷地騙中國人民和自己的幹部。

基辛格把毛澤東稱為“哲學家之王” /168

基辛格認為，相比之下，中國例外主義則體現在文化上：中國不會試圖改變他人的信仰，也不會聲稱其制度“適用於中國之外的世界”，但往往會“根據其他國家與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的相似性，來將它們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附庸國”。

毛澤東精心策劃“陽謀”的步驟 /174

先是毛澤東一再鼓吹鳴放，解除人們顧慮，而後提出中共要整風，最後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一套連環計顯得非常完整，合情合理。這時毛澤東從前台退到後台，他就像一個漁夫布了網，放長線，然後等待時機，等待魚兒上鉤，隨時收網

毛看歷史大視野和歷史大視野看毛 /186

是不是當時中國的信息閉塞或者毛澤東的聰悟不夠，象洪秀全那樣只知道三綱五常和什麼名堂也搞不清的“上帝”？他知道不知道哪怕一點點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時代的社會真相？知道不知道斯大林的獨裁的恐怖？知道不知道他的家鄉韶山的農民跟他父母兄弟一樣，有生存和求溫飽求平安的權利與要求？知道不知道畝產不可能萬斤？知道不知道如果韶山的村民知道他當年出來鬧革命，就是要將全鄉人都搞成水腫病甚至活活餓死，把山林砍光燒鐵疙瘩，那些愚昧的村民不用鋤頭把他挖死，也會把他扭送官府？

誰需要吸食“毛澤東精神鴉片”？ /192

毛澤東已經不在乎別人再給他抖落出多少罪名。他已經是一種存在。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可以等同於“神”或者“亞神”。從語言、思維

方式到行為模式，他已經成功地附體於每個中國人的身上。

胡錦濤的部下不聽胡錦濤的話 /202

黨的領導人擔心亡黨的危險，辛子陵因此提出“救黨三策”，自稱“救黨派”，受到極左派和極右派兩方面的夾擊。他一心為了救黨，卻失去了發表救黨言論的自由

左派舞劍，意在鄧公——“公訴茅辛”鬧劇的深層動機 /206
批判、審查辛子陵是第一幕，大批判、網上公訴辛、茅是第二幕，下一幕將對著鄧二代及三、四代開炮了！劍頭指向，意在鄧公，以擁毛為名，否定改革，這是十八大之前的一場硬戰。

劉思齊究竟是什麼身份？ /209

要找回劉思齊當然可以，改名就成。要做回毛岸英遺孀，恐怕要離婚才行吧。

“公訴”背後的政治格鬥 /211

被茅于軾發出討毛檄文激怒的左派人士，採取所謂法律手段“公訴”。熟知中共運作的人士認為，毛澤東畢竟是對現實強烈不滿的民衆心目中的一面旗幟，現今中共執政者固然是拉大旗作虎皮，並不真正遵從這面旗幟，但是真要被別人搶去，讓他們不由得不擔心會出大事。如何應對，是極具難度的考試

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 /244

結合茅于軾和辛子陵一貫的漢奸言論和反人民言論，其通過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其行為無疑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105條的規定，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理應受到刑法的制裁。人民公訴團敦促國家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將茅于軾、辛子陵繩之以法！

防止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台！ /271

為什麼縱容烏有之鄉在二十多個省市發起簽名運動，起訴公審兩位在意識形態上撥亂反正，對改革開放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知識份子呢？黨政軍各界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不要幻想利用文革潮流升到更高的位置，真要是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台，你們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

毛澤東描繪的“天堂”，分明就是“煉獄” /274

大躍進年代的一首“民歌”唱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杜斌說：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這種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中共描繪的“天堂”，帶領他們通向天堂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文革是“紅色恐怖”時代 /294

嚴家祺感嘆，今天的人看45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看45年前的清朝慈禧太后時的政治一樣，“年輕一代沒有實際感覺，以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是民主。”

中國社會左轉，兩者首當其衝 /303

由於中共十八大人事初步已定，許多觀察家都分析中國社會未來風向可能向左轉。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雖然是左派代表性人物，但未來左派的核心性人物卻是新貴習近平。與前任胡不同，胡經常是在小心翼翼的走左右政治平衡的鋼絲，通常忽左忽右，令人琢磨不定

神州大地真神奇，大唱紅歌治百病 /306

30年後，今天那些紅歌道具、服裝、乃至照片、錄音、錄像都將成為寶貴的歷史文物，人們將用和今天完全不同的評語來述說今天發生的這件可謂千古奇觀的怪事。

吹捧唱紅回報豐厚的李希光陰溝翻船 /312

李希光和作家張一一這次的運籌帷幄，百分之百是“中國特色”，以為偌大的世界就是中國情形的簡單放大呢。

方濱興，不要墮落為艾希曼 /317

希望每個人都能守住作為一個“人”的底線，改變自己，或者說別讓專制改變你，固然不代表就能改變這個國家，但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國家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

胡錦濤經常畢恭畢敬向蒯大富請示 /320

有人問過蒯大富：“你認識不認識胡錦濤？”他直言不諱地回答：“認識，清華時他就是個宣傳隊的隊長，經常畢恭畢敬向我請示問題。”

“唱紅走黑”煽動革命， 起訴“茅辛”公審毛澤東（代序）

2010年12月出版的《明鏡月刊》最突出的封面要目，是“中國形勢大逆轉”，我們主要是披露了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內容，分析了整個中國形勢都會左轉。

2011年以來的中國局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明鏡月刊》的預測：抓捕、壓制異議人士，是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厲，連藝術家艾未未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採取的手段既低劣也卑鄙：不僅剝奪他的人身自由，而且通過官方控制的媒體，進行人格上的侮辱和摧毀，這與“文革”時期有什麼差別？全國各地暴亂四起，“唱紅”唱得“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濟上國進民退，當局拼命印鈔票，讓軍人、老幹部、在職官員和國企職工都得到補

助，民營企業就更加艱難，這就是持續性地打壓私有企業，普通百姓更是飽受通貨膨脹之苦，平均收入是美國的三十四分之一，物價比美國還貴；而中共為慶祝九十週年推出的文藝作品，左得離譜，《建黨偉業》雖然有多名明星爭先恐後地湧來在銀幕上一閃而過，但整個影片，不客氣地說，就是乾嚎鬧劇。

中共不敢真的全面左轉

在這種氣氛下，很多人為中國的前途擔憂就不奇怪了。不過，我希望我的一些觀察和看法，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信心，不致於如此悲觀。如果形勢真的出現向左“大逆轉”，對中國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以中國現在百姓的水準，反彈的幾率會大大提升。逆轉越大，反彈越大，變革的可能性會提早、速度會加快。

在我看來，中共是得了晚年絕症的老人，眼下既想根治絕症，病急亂投醫；更想長命百歲，四處尋覓靈丹妙藥，這兩者同時進行，但都並非激進方式，下藥不會太狠，而是微調、亂調，過頭了再調回來……口頭叫得兇，紅歌唱得響，私底下的資本主義行為一點也沒有放棄。

按照胡錦濤的性格，實際上就是拖，他繼承了鄧小平的一個核心思路：把問題、麻煩，交給下一任、下一代（鄧小平說，後代比我們更聰明），讓自己能夠避過去、活下去。這樣，哪怕胡錦濤自己左得要命，他也不敢真正左轉！

胡錦濤其實不是左或右的問題，是他腦子里空空如也，能記得的只是空話、套話、大話。人們總是喜歡神化獨裁者，其實多數豐功偉績是胡編、想象的，因為沒有一個標準。但你看看毛澤東、鄧小平選的接班人是些什麼人？鄧小平選了胡這樣的人，說明他鄧小平並不神奇，胡當政看來是對中共體制的報應。

有兩點很清楚：第一，中共一黨獨裁是絕症，無藥可醫；第二，如果中共膽敢全面左轉，中國政治變革必將大大加速。這兩點不管從哪一點來看，都讓人覺得對中國的形勢不應該那麼悲觀——當然也沒有理由樂觀，不過，過份悲觀，會讓我們無所作爲，對中國的前途反而不利。

我想再討論一下最近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幾個問題。

唱紅走黑煽動窮人再鬧革命

第一個我想討論一下大家擔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唱紅歌、演紅劇、刷紅標語、發紅短信……一時間，毛式語言又彌漫了全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就反對強制且用納稅人的錢唱紅，他說：“重慶累計唱紅 10.4 萬次場，參與人數 8000 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 150 元，共計 2.1 億元，每人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 2700 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不用來搞醫保？！”

“唱紅”，大家都知道是政治上很有野心的薄熙來為了突破自己仕途困境而搞出來的。但是，為什麼會在全國全面鋪開呢？是不是中央的決定？

根據我們現在得到的信息，並不是：中央並沒有發文推動全國“唱紅”。薄熙來帶著“唱紅”大隊到北京去，並沒有得到最高層的熱烈回應。這就說明，最高層並不願意貿然支持——雖然口頭上說些不要錢的漂亮話鼓勵一番，作為個人，也不妨與民同樂跟著唱幾聲，但是並沒有發出中央號令。

那麼為什麼各地會紛紛仿效呢？我認為有幾個觀察的角度：我在一些講話中說過，老權威離去，中國未來必將群雄並

起，要想爭取自己的權力，就得通過自己的努力，表現獨特的個性，而不能坐等、服從中央的安排——除非對中央的安排自己覺得很滿意；如果不滿意，就得自己想辦法爭取更好的前途。薄熙來就這樣做了，雖然有人有時為他捏一把汗，覺得他做得太過頭，但是他確實通過“唱紅打黑”，塑造了自己的獨特形象，贏得了口碑。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信號，鼓勵更多官員來推出自己的個性舉措。但是，中國大部分官員畢竟都是從崇尚平庸、泯滅個性的官場文化中逆勢淘汰出來的，很多官員並不具備這樣的眼光、素質和膽略，就只能跟著薄熙來鬧一鬧、唱一唱了，即便沒有中央的令箭。這就反映了中國官員的思想基礎——他們感知到：若向左，輸的幾率小，贏的幾率大，而中共黨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大部分時候都是左得了好處。所以他們就押寶，東施效顰、寧左勿右。

這就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和官員的真實心態，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們人格分裂：口頭上“唱紅”，行動上“走黑”。

“唱紅”的荒唐，有目共睹。但是在我看來，“唱紅”有正面作用。不管人們怎麼指責其“荒唐可笑”，是回到“文革”時期，它畢竟反映了人們內心深處對公平、正義的向往；而對中國現實政治，“唱紅”則既是諷刺，也是反抗。它讓人們回想起中共聲稱追求的公平、正義，並與中共九十年來實際作為進行對比。前三十年，奪命：中共既殺敵人，更殺自己人；中間三十年，奪魂：是掏空人們的靈魂；後三十年，奪錢：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和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大家不僅要“唱紅”，而且要品味紅歌的內涵。共產黨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為標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而今卻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紅歌的內涵，是對權力者的警告，對官

僚資本家的警告，喚醒老百姓的追求公平的願望，起來造反，奮臂革命，抗爭不合理的現實。

就連賺了大錢的資本家，也紛紛要拿着錢逃跑到國外去。他們已經從“唱紅”聞到了味道：這麼唱下去，不就要重新清算他們、打倒他們、瓜分他們的財產嗎？中國現在有幾個不是官僚資本家？不靠向官員行賄、不跟權力勾結，在中國豈能成為大資本家？從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層的鄉長、村長，哪一個層次的官員不是自己、子女親屬都大肆斂財，為霸一方？

光是講中共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國民黨合法政權，將社會各階層的精英殺、關、管，摧毀了傳統民間社會……等等，我看不公平。應該承認，中共中有一批人是有追求公平合理社會的理想。那麼，通過“唱紅”，通過中共紀念九十年活動，我們應該看一看，這些人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沒有？如果沒有實現，是被誰玷污、被誰篡改、被誰阻攔？

唱紅歌，想涵義，看現實，以紅歌為標準，若不是人格分裂，就是良心覺醒：對比一下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四大家族與十大、百大家族，想想共產黨比國民黨是更清廉了，還是更腐敗了？是更民主了，還是更獨裁了？難道不應該學習紅歌所頌揚的共產黨員不怕流血犧牲、不畏艱難險阻、暴動革命，前赴後繼，去推翻獨裁腐敗政權，建立合理美好社會的理想和精神嗎？難道今天的人民，反而沒有九十年之前人們擁有的權利了？

《建黨偉業》告訴人們，中共是為了讓中國更公平而建立的，那麼，今天人們不也可以建黨嗎？中共當年既然可以在這一名義下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那麼今天人們為何不能起來推翻比國民黨更腐敗的政府？

共產黨為什麼不能下台？“因為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按照這個邏輯，我問你，你是不是說搶來的就是合理的？這一種強盜

邏輯到今天還在講，你不等於在鼓勵天下人造反嗎？

還有人說，中共還在台上是因為它不是個人獨裁，是集體領導。其實，剝奪人民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就是獨裁，而且集團獨裁對人民傷害更大，非法侵佔人民的財產更多。

其實，共產黨在台上對老百姓靠的是兩點，野蠻、不講理。野蠻，就是槍杆子，抓你、殺你！不講理，就是中宣部，只讓你接受宣傳，不讓你新聞自由，碰上這樣的黨，你能做什麼？只能編段子，諷刺挖苦！

紅歌也是一種段子，一種冷幽默，一種諷刺挖苦，看起來好像是麻醉劑，實際上是興奮劑。我敢打賭：紅歌是唱不下去的。每天的央視“新聞聯播”節目之前放一段紅歌才好呢，讓民衆品味歌詞，再直觀地看看領導人如何跟資本家把盞言歡。

各地當局跟風推動“唱紅”，那都是假唱，紅歌唱下去，人格更分裂；紅歌唱下去，更鼓動暴動；紅歌唱下去，社會更不穩定——弄得不好，薄熙來自己都危險了，被紅海洋的驚濤駭浪所吞沒。

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公審的是毛澤東

人們還擔心毛派分子復活。

現在毛派分子聲勢最大的網站，是“烏有之鄉”，看的人超過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網站，毛派分子以“烏有之鄉”為平台，對經濟學家茅于軾、黨史專家辛子陵發起所謂“公訴”。人們擔心，薄熙來大搞“唱紅”，而胡錦濤總書記又是政治輔導員出身，那麼毛派是否會以此為支點，不僅在政治理論領域，而且在政治操作領域也捲土重來？

但我觀察，毛派分子的言行，還是在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

的限度以內，他們的思想還不像德國納粹那樣必須通過法律斷然制止。我更注意到，在毛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的主張，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對目前的社會不公的憤怒反彈。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應該包容他們這樣的思潮，應該保留其存在的空間。對於中國逐漸形成健康、多元的社會，有正面的作用。

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很多人提出法理方面的批評，我沒有仔細從法理上推敲其依據，我覺得，他們訴諸司法訴訟，要求法律追究茅、辛的所謂誹謗毛澤東等等“犯罪行爲”，認為茅、辛許多敘述並不符合事實，這些也還沒有偏離正確的方式。若能通過審判，雙方通過舉證、法庭辯論，不難分辨真假。通過這一個案，不是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對於毛澤東功罪、毛澤東時代優劣等等問題的公開討論麼——而這種公開討論，過去從來沒有准許老百姓在公開的媒體平台上進行，都是中共自己通過決議來做出評價，也可以看得更清楚，當今領導人，是繼承了毛澤東，還是背離了毛澤東？繼承得對不對，背離得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法院受理他們的“公訴”，將對中國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我倒是擔心，可能中共並不敢真正受理，失去一個對中共過去的歷程、未來的道路大辯論的極好機會！

腐敗不是新聞，反腐敗也不是新聞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一種現象，對於揭露貪官污吏，現在民衆興趣缺缺。開始我很奇怪，慢慢明白了一些原因：

首先，腐敗已經不再是新聞了，上下無不腐敗，“無官不貪”，這個說法前幾年還有點限制詞、修飾詞，現在看，非常準確。只是貪多貪少、腐大腐小的區別而已。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即便是什麼都不貪，都是合法的待遇：政府分給你的房子、配給你的福利，按你的貢獻和社會分配機制來說，實際上也是一種多吃多佔，也是貪污腐敗，因為這種分配不是通過公平機制來進行，而是黨和政府恩賜給你的——黨和政府完全就是一體的，我曾創造了一個詞，就叫“黨府”。這種貪污腐敗，看來冠冕堂皇，實際上也是對人民應得利益的侵佔。

不過，反腐敗也不再是新聞了：人民已經非常麻木了！

其次，老百姓明白了，既然“無官不貪”，為什麼抓一些貪官出來呢？其實多數情況都是“狗咬狗”的結果，是權力傾軋的體現。大家對反腐敗怎麼還會有任何信心？

最搞笑的就是，如此腐敗的中共，反腐敗的機構竟然越來越多，紀委，監察部，最高檢察院又成立反貪局，後來又成立預防腐敗局……我看，所有疊床架屋的名稱都可以拿掉，就直接叫“腐敗局”就好了！

有人說，一個單位的紀委書記，往往是一個單位比較閑、比較缺少能力、又“愛管閑事”的人來擔任。後來是一群心理變態的人來擔任紀委幹部。現在則純粹成為政治打手機構了。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我認為是最近五年來關於中國最重要的一本書《中共“黑匣子”》，最詳盡地揭露了中共內部怎麼貪污腐敗、怎麼權力鬥爭的戲碼。

例如所謂“雙規”，人們過去最多只是認識到，它是對領導幹部的公民權利的非法剝奪，是非法拘禁行為；這當然是不錯的，一個政黨，怎麼能夠超越法律之上？這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看了這本書，我才明白，“雙規”更重要的奧妙還不在這裏：“雙規”實際上是“雙保”：保護和保障。

第一是保護：最大限度地保護涉嫌犯罪官員與其上級官員

的關係！哪一級官員跟上級官員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僅他受上級官員的拔擢，而且他要向上級官員奉送好處。哪有幾個貪官就只是個人貪腐？這是一個集體生存系統，一個貪腐官員的生物群落。“雙規”是“雙保”，首先就是保護了他的社會關係，避免了“一鍋端”“幾鍋端”。本來中國的司法體制就打下了黨的鮮明烙印，即使這樣，他們還不放心的，還要用“雙規”這種方式來把貪官的證詞、口供，控制在他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雙規”還有第二個效果，越來越表現出“黨性色彩”和“人性色彩”，對這些貪官成為保障。即使上面沒有保護人，也給貪官一個討價還價的廣闊天地：只要你達到我們紀委的要求，服從我們權力鬥爭的需要，成為我們昇官發財的砒碼，交代出一些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就給你回報——明明其罪行應判死刑，允諾判死緩，過幾年減為無期，在監獄中的待遇，與普通囚犯當然相差懸殊；再過幾年保釋、保外就醫……

人們不是說許宗衡先哭後笑嗎？就是這麼來的。被判的貪官當然要感謝黨，感謝紀委了！

對於最近數年大張旗鼓宣揚的懲治貪官的案例，中共媒體能否追蹤一下，有幾個人還在監獄之中，還沒有悄悄走出牢門，享受榮華富貴？

中共唯一沒有的是未來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沒有腐敗就沒有中共”：中共已經喪失了理想，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用利益來維繫黨員了。對利益，本來需要建立一種公平的分配機制，你沒有、你又不肯建立，那就只能靠腐敗了！所以，我認為，腐敗，現在是中共賴以生存的生命線。中共不可能解決腐敗，只會愈演愈烈。不腐敗，

就垮了！

這樣說，共產黨靠三子養老，對百姓，用槍杆子、用筆杆子；對自己人，用的是票子。

這就是為什麼過去老百姓看到抓住一個貪官還高興一下，鼓一鼓掌；現在，都覺得無能為力。

話說回來，我倒是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民衆能做的事情還是有的。

中共現在有槍桿子、有筆桿子，還有印把子和票子……唯一沒有的就是未來。我跟中共體制內任何一方面的人士交談，他們對今天的現狀，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但是談到中共體制的前景，沒有一個官員抱有信心。這就說明，他們有今天，但沒有明天。明天是什麼？就是不管道路多麼曲折，中間出現多少反覆和逆流，時間是需要三年五年還是十年二十年……民主化必定是中共的死路，是中國的生路！

我曾經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說2021年中國民主化來臨，開始根本的政治轉型。最近見到一些大陸來的商人和官員朋友，都認為我太悲觀了，他們認為，變化比我預測的要來得快得多，早得多。但不管時間遲早，民主化是中國能夠真正崛起、能夠有尊嚴地成為世界文明社會成員的必由之路。

有人說，過去對中國前途從來沒有預測準確過，所以現在對民主化的預測，也不會準確。對這些議論，我不想辯解和反駁。我只想說，當民主化來臨的時候，我們不要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我們能做什麼呢？

人人都來記“變天賬”

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努力爭取民主化早點到來。我覺得，即

使是比較消極的人，也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工作：如實記錄你能夠掌握的各級官員和商人勾結的事例，越確定越好，越詳細越好：是誰，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用什麼方式，侵奪人民的財產，侵佔人民的土地，欺壓人們的反抗？

多少官員和房地產商行賄受賄、獲得不義之財，才得以成為暴發戶？沒有幾個大商人，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勞動成長壯大；沒有幾個官員，完全靠自己的服務和能力而節節高升。他們做得如此隱秘，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每個貪官奸商的周圍，都有無數老百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掌握細節，有人掌握概貌，有人掌握局部……或許一個人掌握的情況並不翔實、並不完整，但是這些碎片，能夠拼出全圖，接近原貌，所以大家都應該很細心地保留相關證據！

我們不希望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過程是革命，我也不呼喚再來一次就像中共推翻國民黨那樣血腥的革命。但是我堅信：通過法律進行審判，是必要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接受評判、裁決——好在時間也沒有過去那麼久，最多也就是三十來年。保留這些證據，就能夠冤有頭債有主，追究真正的罪人。希望大家心裡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式，為未來的審判做一個最基礎的工作。

如果屆時涉案的官員商人在世，他們應該被押上審判台；如果屆時他們不在世了，他們的受益者應該吐出非法獲得的財產；受益者如果也參與了非法侵占行為，他們也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即使他們到了國外，也可以通過國際合作緝拿歸案。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念頭？“唱紅”“演紅”的“紅劇”裡有“變天賬”的說法，給我啓發：我們人人都應該有一本“變天賬”，眼下無法對他們犯下的罪行索償，也要留下來，將來條件成熟時進行追討。

毛澤東仍在影響著今天的政
策走向和人事格局。



毛澤東影響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

在中國共產黨帝國的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正中那座威嚴的紀念堂中，毛澤東的屍體在他去世後 35 年之後仍然躺在水晶棺中。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訪客來一睹這位曾經驅逐了外國侵略者、建立了當代中國的奠基人的蠟質容顏。也是他，發起了若干政治運動和清洗，造成了數千萬同胞的死亡。

在廣場的北邊，這位已故領袖的巨幅畫像還懸掛在紫禁城的入口——天安門之上。他的頭像也印在每一張鈔票上。

但是，毛澤東並非僅僅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帝王。在最近的幾個月裡，他的遺產和形象成為了要力爭在 2012 年 10 月躋身最高政治地位的精英們的有力武器——那時大部分的最高層中共官員們將被新一代的領導人替換。

2011 年的 7 月 1 日是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在準備這一慶

台灣民主化雖然有很多問題，被反對民主化的人士抓住作為藉口，但是民主化的涵義，不僅是人民推舉和監督官員，而且政治人物彼此也進行權力之爭，互相監督。這種彼此制約，是防止貪腐的有效舉措。台灣前有陳水扁被判刑，最近又有起訴李登輝。如果說這是“狗咬狗”，其得益者也畢竟是老百姓。再如紅色高棉，中共的好朋友喬森潘等人，也被審判。這些都給了我們巨大的鼓舞。

民主化之後的審判，將不是像中共審判所謂“四人幫”、林彪反革命集團那種內部不同派別人士。未來的審判，是公開的、專業的、嚴格按照司法程序、排除政治因素干預的審判，很多人今天可能面對貪腐什麼都做不了，但到那時，你就可以成為證人、可以提供證詞，將他們繩之以法。

在中共的“紅色影片”《小兵張嘎》中，八路軍曾經這麼威脅與敵偽合作者：“小心將來拉清單”；而在中共建政之後，不論土改還是“公私合營”，中共都特別警惕被整肅者悄悄記下“變天賬”。這些都說明，對倒行逆施者記帳，是在他們頭上懸了一柄達摩克利斯劍。（根據何頻 2011 年 7 月 3 日談話記錄整理）

祝時，黨內派別之間的鬥爭劃出了一條意識形態的紅線。這場鬥爭將決出影響力的大小，並決定黨的未來方向。外交官們和商業領袖們都在密切關注著這場鬥爭，想要找到跡象表明中國是否會淡化市場化改革、甚至重新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正是市場化才讓中國成為了經濟大國。

薄熙來是有望登上中國的政治巔峰、躋身政治局九人常委中。他也是第一個為毛澤東招魂的人。薄熙來在西部重鎮重慶任黨委書記，他通過毛式口號和宣傳手腕進行治理。在節日裡，重慶居民們會收到“紅段子”——發送到手機上的毛語錄節選。當地的電視台將所有的商業節目都換成了“紅色節目”——演繹革命歷史的肥皂劇。公務員、國有企業員工和學生們被組織起來唱“紅歌”——紅歌是歌頌先烈和共產黨的讚歌。其中一首唱道：“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當薄先生把這種宣傳運動和若干很受歡迎的政策結合起來的時候，當地居民沒有發出什麼抱怨。這些政策包括：更為禮貌、更少腐敗的警察；城市中種植更多的樹木；更容易負擔的住房等等。“人們不應該把所謂的‘紅’玩意兒看得太嚴肅——它沒有怎麼影響我們的生活。”26歲的當地設計師 Isabelle 羅這麼說。

但是象羅小姐這樣的人其實並不是薄先生的受眾。當這位61歲的政客在講話中不時引用毛的語錄時，他是在向中共的領導們發話——至少是對部分領導。

薄熙來是已故的黨的最高層革命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兒子。這讓薄熙來躋身於中國有影響力的“太子黨”一族——和習近平一樣。習近平是最高職務的繼承人，這顯而易見。習現在是國家副主席，他的父親習仲勛曾是黨的宣傳部門負責人。他基本肯定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接過胡錦濤的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一職。對最重要的高層職務——主席和總理——的任命在很大程

度上已是定數，副總理李克強會接任總理一職。不過政治局常委裡還有七個職位尚待填補，它們已成為競爭者們極力爭奪的熱門之選。

“更多的是一種姿態，而非立場”

“重提毛澤東，只不過是那些聲稱堅持黨的傳統的人所採用的一種標榜手段而已。”肖建生（音）這麼說道。他是毛的故鄉——湖南省的一名省報編輯和歷史學家。

改革的倡導者們則對此反擊。一位教授在化名為“喋喋不休”的博客中認為，可以替代薄先生的“危險宣傳”的是“浙江模式”——浙江是私人企業部門最發達的省份，這種模式以此命名。他預計這會引向公民社會和民主的崛起。

習近平的表現說明他已經明白薄熙來的意思。在12月，一次引人注目的重慶之旅中，他說薄的方法“深入人心，值得表彰”。最近，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在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一篇文章中說：“薄習之間的聯合表明這位副主席可能正在組建他自己的政治團隊。”

另一位“太子黨”的代表人物也因為重提毛澤東而掀起了波瀾：毛澤東早年的戰友劉少奇之子——劉源將軍在一本書的發佈會上作出了晦澀但令人興奮的呼籲。這本書是由一名保守派作家所作，呼喚回到“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是比強硬的共產主義更偏向自由的概念。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曾經宣揚過它，不過後來被毛摒棄了。

劉源將軍高深莫測的文章還呼籲中國應強調軍事高於文化。他讚揚戰爭是立國之基，對2001年恐怖分子攻擊世貿大廈表達了敬慕之情。劉將軍是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政委，他預計會

進入控制軍隊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軍委。

對於象薄先生和劉將軍這樣的人來說，以毛語錄來支持他們的觀點顯得尤為諷刺。由於這位已故的主席幾乎迫害了他的所有前戰友，大部分太子黨出身的政客——包括薄、劉、習——都眼睜睜地看到過他們的父輩在他們現在所倡導的意識形態下備受折磨。因此觀察者們相信，他們的這種借用更多的是一種姿態，而非立場——想要在毛主席的復興中懷舊，而不是要恢復與毛主席相關的災難性政策。

“的確是出現了毛主席的某種復甦，但只是在那些沒有經歷過那種恐怖時期的年輕人中間才有，”湖南的肖先生這麼說。在毛的故鄉韶山，當地政府官員說遊客的數量在迅速增長，包括一些進香的青年崇拜者。

肖先生補充說，但談到政客們，“他們想找的是黨最強有力的象徵，而毛澤東是唯一可堪借用的象徵。”他認為太子黨的成員們認為政治權力是代代相傳的，而意識形態只是因為可以幫助他們獲得和保持控制權才會利用到，僅此而已。

但是，由毛主席的復甦引起的回響卻傳得很廣泛。一些保守團體很長時間以來就對 30 多年經濟改革所推進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不滿了，他們轉向了“重慶模式”。

“這些飽含革命先烈鮮血的紅歌，正是人們精神上排毒解毒（西方資產階級精神鴉片之毒）的特效良藥。”寧雲華在毛派的大本營“烏有之鄉”上的一篇新近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使得這場辯論更加升級。經濟學家茅于軾（和毛澤東沒有任何關係）在一篇文章中說，那位已故的領袖應當從神壇上下來，“還原成人”。

他呼籲結束對毛的神化和個人崇拜，這讓毛派教徒們義憤填膺。在烏有之鄉和其他的保守論壇上，茅先生被稱為“資本家



茅于軾被毛派“公訴”。

的走狗”。他被譏諷為“牛鬼蛇神”，這是在文革最黑暗的那些日子裡用來侮辱和誹謗他人的稱呼，這些人的結局經常是被折磨或痛毆致死。一個組織收集了萬個簽名來支持他們要求公訴這位經濟學家的呼籲，控訴他犯了顛覆罪和誹謗罪。

這些公開的爭執反映了黨內最高層的分歧：擁毛與否毛的派別都想要推進他們自己的政治進程。在北京一直有傳言說，高層領導中更為開化的成員想要在未來的官方文件中完全放棄“毛澤東思想”，這一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舉動將打破數十年來的傳統。

“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

這種意識形態之爭甚至已經擴散到了被嚴密控制的官方媒體上。中共的喉舌報紙《人民日報》一貫是被用來讓幹部們跟上形勢，统一到正確思想上的。但上個月它卻令公眾吃驚地發表了由五篇文章組成的一系列社論，看起來是在呼籲政治改革。

就在官員們在對國外的外交官和記者們高談被關押的藝術家艾未未是一位麻煩製造者，不值得他們關注的時候，《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則警告說，需要包容“異質思維”。這一系列社論的最後一篇中說，在中國，想要獲得穩定，就需要讓人民的聲音被聽到，而不是壓制他們。

按照一家官方報紙的高級編輯的說法，這一系列社論是編輯們在得到了高層的默許支持之後所做出的舉動。但是反撲幾乎立刻就出現了。上個星期，《人民日報》上的又一篇社論則強調了政治紀律，並批評某些幹部在意識形態領域發表了“不負責任”的評論。

除了高層的權力之爭外，圍繞著毛澤東遺產的鬥爭還象徵著更為深刻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倡導走向更為開放、更多參與的政治體系的領導者們和拒絕西方式民主的強硬派們之間的分歧。

代表更開放一派的是總理溫家寶。他經常隱晦地談到需要更多的民主和包容。在一些人看來，這說明他支持實質性政治改革。雖然一些分析家相信溫先生得到了胡主席的一些支持，但現在反對這種自由化的派系顯然方興未艾。“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一位大學教授和網絡評論員萬軍（音）說。“這種思想意識上的激烈碰撞揭示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危機。”

對於鄧小平的改革來說，這是直接的一刀。鄧是毛的繼任者，他想要抹去毛這位獨裁者大部分的所作所為。在超過30年的時間裡，鄧先生的模式是有效的。逐漸增長的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讓人們變得比以前富裕多了，讓多數的人即使沒有政治改革也覺得滿意。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精英們的信用受損的情況下，一些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套可以與西方匹敵的價值觀。

但是在內部，許多參與了黨內意識形態之爭的人同意，鄧小平模式帶來的紅利正在枯竭。他們所舉的例子有日益增長的腐敗、社會動蕩和收入不均，還有嚴重的經濟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和黨的權威日漸消失。

如果有人能夠在新的領導層中坐穩位置的話，他們就要面對這一系列讓人望而生畏的問題。毛的幽靈對薄先生和其他競爭者能起到的幫助畢竟有限。

角逐下一屆政治局常委的政客（9席，可能被減至7席）：薄熙來，重慶市黨委書記；戴秉國，國務委員；李克強，第一副總理；李源潮，黨的中組部部長；劉延東，國務委員；王剛，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岐山，副總理；汪洋，廣東省黨委書記；習近平，國家副主席；俞正聲，上海市黨委書記；張德江，副總理（《金融時報》席佳琳、吉密歐、何黎譯）



毛澤東紀念堂。

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 有著深刻的分歧

毛澤東的遺產

“在中國中央的中心躺著一具屍體，無人敢動。”——這是1985年出版的《紫禁門的背後》一書中著名的開篇語，作者是意大利記者 Tiziano Terzani。

現在，毛澤東雖然去世已有35年，他的遺體仍然躺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宏偉的毛主席紀念堂裡（那片由花崗岩鋪成的廣場是這個13億人口國家的象徵）。每年有幾十萬人在這裡排幾個小時的隊，就是為了看幾秒鐘仍然還被許多中國人崇拜的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

然而在45年前的1966年5月16號，正是這個人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動亂奪去了200萬中國人的生命。

毛的傑出成就是他在1949年建立了共和國。但是他飽受爭議的政治遺產——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隨著時間推移，質疑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按某些中國事務評論家和退休的共產黨官員說，這些質疑關係到長期停滯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今後的命運。

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說：“用誠實、認真、嚴肅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是非常必要的。”

毛澤東的政治遺產，現在仍在影響著中國的發展。劉亞偉說，因此“如果沒有一個完全徹底的評價，對中國來說，推行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將十分困難。”

在中國，通過互聯網、文章和書籍，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爭論日益高漲。

大致而言，自由主義者和親市場力量站在一邊；左派和毛派站在另一邊。左派們組織得似乎更好，他們開辦了一系列網站，包括受歡迎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

這種火藥味十足的爭論背後，根源在於數十年來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與從毛時代以來基本沒有改變過的僵化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作為應對措施，政府已試圖協調社會衝突並且加強了鎮壓。

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觀點分佈很廣。一些人認為毛澤東雖然有缺陷但成就也不容忽視；一些人把毛澤東看作是一個權力狂，甚至是一個不擇手段的殺人惡魔。

左派把毛澤東看作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那時，人們更加平等，許多東西，包括基本社會服務項目，都是免費的或者是有補貼。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從過去數十年政治改革停滯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的富商也站在這一邊。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茅于軾近期的一篇文章《把毛澤東還原

成人》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茅于軾(和毛澤東沒有關係)嚴厲地指出了毛澤東虛偽和異乎尋常的殘暴。

茅于軾寫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陰謀,只不過是要除掉許多批評大躍進的人(大躍進導致了 3000 萬人死亡)。

這位經濟學家寫道,暴行的證據包括毛澤東對被他逼迫到自殺的朋友們的命運漠然置之。他先打擊劉少奇主席,然後又假裝挽救他,僅僅是為了在劉少奇 70 歲生日那一天將他驅逐出黨。後來,劉少奇於 1969 年在無人照顧地情況下死於獄中。

一份網上传播的文件也引起了激烈爭論。這份文件不厭其詳地敘述了一位共產黨高官建議把毛澤東思想從所有黨內工作、文件和政策中刪除。這份據稱編號為 179 的政治局文件,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 28 日。據說提議者是即將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

即便這只是一個惡作劇——政治局的內部工作差不多是完全不透明的,也不可能確認這份文件的真假——它還是重新引起了評論家和黨內官員對毛澤東政治遺產的關注。

據網上的一段採訪中報導,中國國防大學的退休官員辛子陵把這份文件稱為中國政治的“轉折點”。我們沒能聯繫到辛子陵對此發表評論。

“這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在中國政治正統中是多麼重要。”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說,“只有通過一個明確的評價與毛決裂,才能為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鋪平道路。”

左派們對茅于軾的文章以及明顯要在官方意識形態中刪除毛澤東反映非常強烈。一些人要求經濟學家茅于軾應該為他的主張提供證據,否則法庭上見。其他人則回顧了毛對黨的政治價值。

一個叫李林的評論者在毛澤東旗幟網的帖子中說,“如果去掉毛澤東,共產黨就沒有任何光輝可言了。”

在天安門廣場上,50 歲的王艷娟是緩緩地向毛澤東紀念堂移動的數千人隊伍中的一個。

“對我們來說,毛澤東是中國的締造者。我們深深地熱愛他。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王女士說,她來自東北的瀋陽市。“在他的時代,教育是免費的。”她又加了一句。

她 76 歲的母親第一次來北京,唯一的要求就是看看毛澤東的遺體。“她別無所求,”王女士說,“等我們完成了這個心願,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在紀念堂裡,突然之間就可以看到 he 平躺在厚厚的水晶棺中。他的臉在明亮的燈光下發出橘紅色。

他那有彈性的灰白頭髮整齊地向後梳著。身著灰布上衣,黨旗——紅色背景下金色錘子和鐮刀圖案——蓋在他的胸部以下的身體上。兩名儀仗隊的士兵面無表情地望著前方。

出來後,第二次來此訪問的王女士看起來十分滿意,“真的是太好了。”她說。

她母親怎麼想的呢?

“她也是這麼想的,很好。”王女士說。但是,她指著前方自己 20 歲的女兒說,“我的女兒很年輕,並不十分關心這些。我想,年輕一代不會像我們這樣能夠接受毛澤東時代的。”(《紐約時報》,譯者)



官方發布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這張「中央領導群體」照片，體現的是衆星拱月。

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是如何形成的？

據瞭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撰寫之所以耗時16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存在分歧。而要評價毛，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他為什麼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在中共黨內享有無與倫比的權力？國家和黨的體制為何沒能對他一個接一個的錯誤進行約束？

黨史：個人崇拜主要是歷史造成

在分析黨內為何形成個人專斷現象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迴避了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和毛澤東的人格問題和權力欲望，而將其歸咎於歷史原因：

“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不是很容易肅清的。……同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也對我們黨產生了消極影響。”

體制、愚民政策和毛的人格

中西方獨立學者認為，毛澤東之所能夠在中共黨內享有極權長達幾十年，有幾個原因：

第一，制度缺陷。中共的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其核心實際上是集中制，是一種以最高領袖為核心的體制。

第二，中國的傳統價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國歷史上歷來都需要一個皇帝來維持統一和秩序。

第三，共產黨掌握權力以後不斷掀起殘酷的政治運動打倒異見人士，同時把國門關起來，把信息封鎖起來，採取愚民政策。

第四是毛澤東的人格。毛澤東具有雄才大略，但同時也非常善於玩權謀，而且領袖欲、帝王欲非常強烈。他掀起的一場又一場運動，都有私欲的成分在內。

從湖南鄉下伢子到全國人民的紅太陽

生於1893年的毛澤東，從中國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鄉下的“十三伢子”，是如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心中的紅太陽？回顧這場登峰造極、空前絕後的造神運動，除了毛自己的推動外，中共許多領袖級人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21年，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是與會十幾個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毛澤東才第一次進入中共的最高決策核心，成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不過，當時小組的負責人是周恩來。

1936年年底，在周恩來的謙讓之下，毛澤東成為中共軍方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1938年9月，從蘇聯回到中國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統一的領導。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被正式公認為黨的領袖。從此，對他的個人崇拜也開始了。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一封邊區黨政群眾團體及全體人民給毛澤東的致敬信，說毛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且是全中國人民所愛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領袖”。

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舉行中國女子大學的開學典禮。毛澤東講演完畢後，全場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到了1942年以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經成為中共各種集會和報刊的重要口號。

1940年12月25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在一篇文章中稱毛澤東為“英明的領袖”。

從1940年年底開始，周恩來作為當時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在許多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都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把毛澤東擺在中央書記處前邊。

在1941年9月到10月間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推舉毛澤東為主席。從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並且被賦予中共日常事務的決定權。

1943年8月2日，周恩來在一次演說中說：“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間，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弼時曾經說：“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

毛澤東對中共對他的個人崇拜不僅欣然接受，而且還積極推動。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紀念口號時第一次喊出“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毛澤東不僅與共產黨並列，而且還排在共產黨之前。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歸中央宣傳委員會領導。而這個委員會的書記就是毛澤東。

1945年5月14日，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黨章的報告，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七大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發佈40條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其中第38條是：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連原來口號中的共產黨都去掉了。

1950年3月，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三人共同擬定了五一節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拿給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和“人民勝利萬歲”兩個口號。

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面對毛澤東的“大躍進”已經出現種種嚴重的問題，劉少奇表示：“有人要反對毛澤東

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毛澤東的第二個接班人林彪更是把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了極致。1964年，林彪決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語錄》，並且親自撰寫了再版前言，說“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說：“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林彪還說：“像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人物，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顯然，共產黨人的祖師爺馬恩列斯都已經不在話下了。

林彪還把軍隊中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擴大到全國。於是，中國展開了全民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動，並且評選積極分子，召開代表大會和講用會。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

在那之後，中國媒體不斷頌揚毛澤東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報》“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10月4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時，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當時有一首流行的紅歌就叫作《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於是，僅僅幾年前還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而吃不飽飯

的中國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還在受苦受難的人民，把紅旗插遍全球”了。

在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顛峰的1970年前後，中國人講的是“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如果毛澤東晚上講了什麼話，人們就會連夜上街慶祝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這叫“貫徹最高最新指示不過夜”。

1968年8月5日，非洲客人送給毛澤東一些芒果。毛澤東轉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於是，北京舉行了“熱烈慶祝毛主席贈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珍貴禮物大會”，再把芒果分給全國各地的工宣隊，芒果不夠就做芒果模型分發下去，讓全國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澤東的關懷。

當時，和毛澤東握過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後都會在大會上介紹自己幸福的經歷，並且讓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沒有洗過的手，也感受一下偉大領袖的溫暖。

當時，大街上幾乎每個人都佩戴著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沒有這個資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為時尚。

當時，人們對話之前先要引用毛主席語錄，每天要對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街頭、單位，隨處可見人們在跳“忠字舞”。

至此，“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歌聲響徹神州大地，毛的造神運動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程度超過了歷代封建王朝的個人崇拜，成為歷史和世界的笑柄。（美國之音李肅、寧馨）



凌志軍。

譽——威廉·曼徹斯特是寫出洋洋四大冊《光榮與夢想》、記錄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社會變化全貌的美國作家。

在 2011 年關於毛澤東的全社會白熱化爭論中，凌志軍百萬言文字裡，卻有八千字，被有心人重新發現，被挑選出來放在互聯網上，然後被到處轉載，並標以《“毛澤東熱”何時開始席捲全中國？》之題。

這段文字，出自《變化——1990—2002 年中國實錄》的第一章“活著的祖宗”，講述的，是在毛澤東時代受到控訴、毛澤東走下神壇十來年之後，從 1990 年開始了“發現毛澤東”，毛澤東的身後聲名從最低潮掙扎出來，重新回升，乃至形成了席捲全中國的“毛澤東熱”。

凌志軍並沒有打算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去從理論上分析“毛澤東熱”的政治、社會、心理成因和根源，但是他用記者之眼的敏銳、用作家之筆的靈動，記錄了一個個涉及不同社會階層、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事例，既是社會橫切面，又有歷史縱深感，雖係掃描，難免有浮光掠影之失，卻對幫助人們用最短時間知悉‘毛澤東熱’的大致脈絡，頗有裨益。

凌志軍說：“憑空出來這麼一個（毛澤東）熱潮，讓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而今天比凌志軍所寫的時代又推移了十來年，這個“毛澤東熱”溫度更高，乃至巴山蜀水唱紅歌，五湖四海皆呼應，很多人看了不免更奇怪：毛澤東個體的生命結束在上個世紀

“毛澤東熱”席捲全中國的來龍去脈

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

尚琮

2003 年元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凌志軍將近 40 萬字的《變化——1990—2002 年中國實錄》。這是這位人民日報社主任編輯、主任記者的第六本暢銷書。此前五本暢銷書，尤其是他與馬立誠合著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使他一夜之間聲名鵲起。

後來的凌志軍，又出版了《成長》《中國的新革命》和《聯想風雲》等多種著作，使他贏得了“中國的威廉·曼徹斯特”這樣的美

的四分之三處，但為什麼他的政治影響，卻不僅延伸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來甚至還要再延續兩代、三代？

凌志軍給出的解答思路是：“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

文中的這句話可圈可點：當今的“毛澤東熱”，“同毛澤東時代的萬眾一心不一樣，現在每個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繼承那逝去的時代”。

附：“毛澤東熱”從何開始席捲全中國？

1990年元旦剛過，北京大學一個可以熟練使用毛澤東詩詞的研究生，辛鳴，成了一次座談會的中心人物。這是北京《大學生》雜誌召開的小型會議。有人問他：“你怎麼看正在興起的‘毛澤東熱’？”他回答：“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又有人問：“你怎麼看東歐正在發生的逆轉？”他又回答：“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後來《中流》雜誌記者把這件事告訴一位曾在宣傳崗位上擔任領導的大人物，他大加讚賞。他讚歎這位

年輕人的思想深刻：“的確，‘妖霧重來’，即國際範圍修正主義思潮的空前泛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濫的事實，恰恰就是‘毛澤東熱’產生和發展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根據。”這種論述問題的方式的確不同凡響。辛鳴這個年輕人受到如此這般的鼓勵，不久後就寫出了他的代表作：《發現毛澤東》。

發現“毛澤東熱”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發現毛澤東”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產黨的一群高級領導人在遵義發現了毛澤東的軍事天才；40年代劉少奇和彭真在延安發現了毛澤東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國人民都發現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然後是80年代，鄧小平主持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現在辛鳴要說的不是這些，他的出發點是，在經過了70年的血雨腥風之後，中國人還沒有徹底瞭解毛澤東的價值，還有必要再“發現”。他“發現”的是眼前這一場“毛澤東熱”。

其實發現“毛澤東熱”是用不著什麼學問的——它就在大街上。《紅太陽》錄音帶在各個大城市里銷售，人人都看見了。包裝圖案上寫著“毛澤東頌歌”，正面是天安門，背面是故宮地面的老磚。那上面有《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有《毛主席的光輝》，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陽》，有《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有《毛主席的話兒記在我們的心坎裏》，總共30首，的的確確，都是歌頌毛澤東的，當年唱遍全中國。

中國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這盤帶子的時候，他們說也就能賣個七八萬吧。北京王府井書店訂了2000盒，發貨的那個人給搞錯了，只送來200盒，一個小時就被賣光了，書店急電打來，說再要2000盒。湖南有個個體戶也拿走了500盒，一邊走還



《紅太陽》錄音帶和 CD 一度在中國遍地開花，到處出版。《紅太陽》的旋律，其中屬李玲玉的歌聲最為嘹亮：

敬愛的毛主席，
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說，
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給您唱。

“要不是滿目西裝、牛仔，到處新潮、精品，差點以為時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時代。”上海有家報紙這樣說。《青年報》的編輯覺得此事蹊蹺，就在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找來一群讀者，想問個究竟。編輯問大家，為什麼《紅太陽》那麼熱？大家都說，《紅太陽》喚起了大家的懷舊情緒，還說中年人不僅是懷念毛澤東，更多的是懷念自己的青春歲月。

雖說是“懷舊”，卻和舊的不一樣。出版者在封面上寫了“新節奏聯唱”，這倒不是虛張聲勢。歌還是原來的歌，可是全都被改

一邊說：“紅太陽的故鄉，能賣不掉嗎？”還不到一個星期，七八萬盒就賣光了。看來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澤東的力量，他們還以為“小虎隊”的告別磁帶《再見》會佔領那時候的市場呢，現在看來，還是《紅太陽》厲害。出版社趕緊又製作了 30 萬盒，不夠，50 萬盒，還是不夠，結果是一個月賣了 100 萬盒，開創大陸歌曲磁帶的銷售新紀錄。那個冬天，北京到處迴蕩著

得變了調，旋律明朗，節奏歡快，加上電子音樂。有個叫“鴿子”的人聽了，當即寫道：“好像村裏的牛車跑上了城裏的賽車道。親切倒是親切，難免有點滑稽。”宋強和喬邊兩個人直到很多年以後還提到這件事，說 1990 年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澤東熱”，但他們既沒有提到“發現”了什麼，也沒有提到“滑稽”。只是說，他們想起了 80 年代由劉索拉作詞的一首歌，那裏面有幾句詞，描述了依依不捨、一步一回頭的懷舊心態，就像是 90 年代初瀰漫在中國城市里的那種情緒：

我想最後向你告別，
我想最後轉過頭說再見，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邊時隱時現。

中國當代歷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確是“時隱時現”的，讓人很難說“再見”。它的捲土重來，有著相當確定的時間可以追溯，它大致發生在 1988 年第四季度的某個時期。

鄧的偉力和魅力在於與毛的不同之處

北京的家家戶戶不約而同地翻箱倒櫃，把壓在底層的毛主席像章找出來，少則數十數百，多則成千上萬。這都是 20 年前那場“個人崇拜運動”的產物，而今居然燦爛依舊。大人們一邊對孩子講述當年自己如何省吃儉用，買下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國家又是如何傾全力製造這些東西，把造飛機用的鋁材也拿出來造主席頭像，總共造了 35 億個，弄得毛主席呼籲“還我飛機”。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說他的頭像還是比飛機重要得多。後來他老人家與世長辭，他的頭像也就歸於沈寂。到了 80 年代，

六塊錢一公斤，撮堆兒賣。現在，這些故事和這些像章，就成了“毛澤東熱”的最初徵兆。90年代開始的時候，形形色色的毛澤東頭像走出千家萬戶，重新擺在商店的櫃檯上。

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發現了這個跡象，就去追蹤“懷毛熱”的起源，結果追尋到廣州街頭的一樁車禍。這雜誌說，兩車相撞之後，一輛車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車上的人卻安然無恙，後來發現那是因為司機座中掛著一幅毛澤東像，“於是毛成了趨吉避凶的大菩薩”。這故事明顯具有杜撰性質，不過，那時候大城市里，出租車司機們的確都把毛澤東的頭像懸掛在前擋風玻璃上，來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自從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對毛澤東的評價，毛的功過是非似乎就歸於歷史了。中國人都把眼光投向鄧小平倡導的改革，有如那時候最流行的一句話，“團結一致向前看”。儘管鄧小平一再聲明，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毛主席的貢獻，毛主席的畫像要世代代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還聲稱自己倡導改革開放的靈感主要得益於毛的“實事求是”。但是，毛的靈魂還是漸行漸遠。畢竟，鄧小平的偉力和魅力不在於他與毛的相同之處，而在於他與毛的不同之處。到了80年代中期，鄧在普通中國人心中的威望，達到了他第三次復出以來的頂點，這一點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認。他在1985年被《時代》雜誌選為風雲人物。那時候已經很少有人提到毛澤東。

毛澤東從神到人，再從人到神

只有一個個頭兒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輕人，滿腦子都是毛澤東，他叫權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樓附近一個小小的公寓裏，面對二環路喧囂的噪音，刻意勾畫出毛澤東的偉人形象。

權延赤是一個空軍軍官，父母在40年前跟隨毛澤東在延安幹革命。他說自己“孕於延安”，看來是對那個革命年代情有獨鍾。但是他所關注的不是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而是作為普通人的毛澤東。他的第一本書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是一本很薄的小書，封面單調，裝幀粗糙，但是它的影響超過了後來所有那些描述毛澤東的出版物。按照延赤本人的解釋，世人把毛變成了神，而他要把毛變成人。

拿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當然的。但在那時候，權延赤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說這是對毛的褻瀆。

另外一些人則指出權在書中所描述的情節，多有不實之處。權延赤的書以“第一人稱”寫就，但裏面那個“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毛的貼身侍衛李銀橋，現在李銀橋站出來，說其中一些情節根本就不是他說的，也不是事實。還說他應當擁有此書的版權，權的單獨署名乃是侵權行為。為此李將權告上法庭，這導致兩個合作者對簿公堂。對於這樁民事訴訟，當日人們無論持有怎樣的看法，都沒有把毛澤東當成事件的中心。人們所關注的焦點是訴訟中的利益糾紛，即如當事人權延赤，也沒有在這中間看出什麼關乎宏旨的含義，只是抱怨自己“總寫惹事的文章”，還說“寫政治書寫得太累”。

權延赤一邊抱怨一邊回到他的小屋裏繼續寫作。也就從這時開始，中國的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新華社一位50來歲的記者，



毛澤東的貼身侍衛李銀橋。

楊繼繩，把當日一股新興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濁浪”，說它“就如突然沖開閘門的洪水奔騰而出，一瀉千里，四野橫流，沖垮了精神大壩。權錢交易廣為泛濫，賣官鬻爵常有發生。光明正大的公務變成了私下的買賣，溫情脈脈的友誼變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錢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驅動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這叫做“大多數人被欺負得奄奄一息的‘現代化’”，還把“現代化”三個字打上了引號，說這樣的現代化“來了也白來”。他寫道：“有時我甚至想，與其這樣，不如再貧窮一點，那樣大多數人也不會被壞人氣成這樣。”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念，似乎與徘徊在東歐的“妖霧”和“蒼蠅”無關，問題出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念，是由《紅太陽》的歌聲激勵起來的。一個36歲、戴著黑邊眼鏡的北京人，馬京軍，從這時候開始了他的收集毛澤東像章的歷程，直到8年以後，他已是北京市體委體育運動技術學校校長，家裏的毛澤東塑像，也有了6萬多枚，包括各種金屬、塑料和陶瓷為原料的頭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掛盤，以及一個掛鐘。那時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還有一個人和馬京軍齊名。他叫陳德，家裏收藏著6萬枚像章，還嫌少，曾經為了追尋一枚毛澤東的像章，從北京趕到瀋陽，從瀋陽趕到鞍山，從鞍山又趕回瀋陽。他說那像章是一個新疆的民間藝人在駱駝骨頭上用手工浮雕製成，實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罷休。

北京人把這種人叫做“發燒友”。如果可以這麼說，那麼讓他們“發燒”的是“毛澤東像”而不是毛澤東。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就如同“音響發燒友”感興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質地，而不是音樂本身。不過，“毛澤東熱”還是迅速瀰漫著，那些直接和間接同毛澤東沾過一點邊兒的人，這時候都開始撰寫文章，回憶那些令

人終生難忘的時刻。

書店裏面，寫毛澤東的書都放在最顯眼的地方。魏巍現在筆下的“最可愛的人”，不是志願軍戰士，而是毛澤東，或者說那些“最可愛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澤東。這位作家寫了《地球上的紅飄帶》。郝明麗，一個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東女孩兒，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她在泰山上認識了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就嫁給了他。郭建設，一個一向善於觀察普通

人的攝影者，現在開始細緻入微地尋找毛澤東的靈魂。在他拍攝的照片上，毛澤東的形象總是和芸芸眾生形成對照，異常鮮明，令你感受到世間凡人對於神明的嚮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個相當具體的場面：山村農舍裏，幾個孩子在讀書，頭頂上是毛澤東的半身像。照片說明是：“毛主席在照護著山娃娃。”

研究“毛澤東現象”也成了一個現象。那兩年曠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學埋頭讀書。這個眼睛深陷而顴骨凸出的小個子，是湖南湘鄉人、毛的同鄉。想來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來研究“毛澤東現象”。



毛主席像章。

形似毛澤東和神似毛澤東

在“發現毛澤東”的潮流中，電影導演們到處尋找長相像毛澤東的人。蘇聯人那些歌頌列寧和斯大林的電影給了他們靈感。他們一口氣拍出《巍巍崑崙》、《開國大典》、《毛澤東和他的兒子》、《毛澤東和他的鄉親》、《開天闢地》這些電影。還有一部更輝煌的電影《大決戰》，耗資巨大，規模空前。它所記述的“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個戰役，構成了毛澤東軍事生涯的最輝煌的階段。

電影極盡渲染鋪張。有 200 多個有姓有名的演員，至於那些參加拍攝的無名者，累計有 335 萬人，涉及 14 個省、市、區的 50 多個縣市，此外還有 12 萬海軍、空軍和陸軍的官兵，還有 33 個師團的坦克、火炮、車輛、飛機和艦艇，還有軍事院校和武裝警察。《中流》雜誌的一個記者為此歡呼不已，說這些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轟動效應’，在年青一代中，獲得空前成功”。那時候的電影院的確是毛澤東的天下，半數以上的電影與他有關。一個相貌和毛有幾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偉大”起來，甚至在銀幕下面也被當成“毛澤東”。他在體育場裏提高嗓音，學著毛的步態手勢和聲音，喊了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於是全場都激動起來，掌聲雷動。他到湖南去尋覓領袖風範，長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熱情擁戴，毛的鄉親們迎接他的到來，就像迎接毛澤東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見到李訥，李訥握著他的手久久不放，說那手很像她的父親。他在北京晉見黨的高級領導人，卻被請到中間座位，那位子過去一向是毛澤東的。

但是有一個人對此不以為然。“人家都說我像主席，化妝師說，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妝。”他這樣說。他是北京大興縣留民營村一個農民，叫張佔林，長相的確像毛澤東，喜歡穿中山裝，喜歡

真見到了毛澤東。

華僑們見到特型演員古月仿佛



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遠矚放眼天下的樣子。所以方圓多少裏的人都知道這村裏出了一個“毛澤東”。這個“假毛澤東”在 32 年前見過真毛澤東，當場發現毛的揮手幅度不超過耳朵，端坐如鍾，落落大方。正是這次見面，讓張覺得他與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 1 米 82，體重 110 公斤，我身高也是 1 米 82，體重也是 110 公斤，就是腰圍比主席肥上兩寸。”

但是，無論是古月還是張佔林，都不能代替人們尋找毛澤東的真身的熱情。對於這一點，毛澤東的同鄉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

過去革命的年代裏，中國這塊土地上湧現出無數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聖地”，包括陝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岡山、貴州的遵義、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處一個叫五台的山溝，當然第一位的“聖地”就是湖南長沙韶山沖。60 年代和 70 年代，中國人如果有機會離家遠遊，要去的不是九寨溝，不是黃山，不是張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鄉，不是“百萬人看上海”，不是東北的長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島的天涯海角，而是這些革命聖地。



韶山沖毛澤東故居。

毛澤東帶來多少商機

到了80年代，“革命聖地”被冷落而“旅遊勝地”走紅，現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至少有一個“聖地”重新輝煌起來，那就是韶山沖。一個小個子湖南人，文輝抗，長時間地擔任韶山管理局局長一職，“毛澤東故居”當然也在他的管轄內。此人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按照門票的銷售數量，逐年計算出參觀人數，一絲不苟。結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2500百人來到這裏，到了1991年，就有2850個人了，總計這兩年裏增加的人數，比整個80年代還要多。

大概就是在這時候，住在“毛澤東故居”旁邊的湯老太太花一塊七毛錢買來一袋子綠豆，由此開始了她的事業。她在自家門前煮了一大鍋綠豆稀飯，賣給來參觀的游客，一毛錢一碗，大受歡迎。於是湯老太太一發不可收，把“食粥攤”變成了“毛家菜館”。又過了一年，“毛家菜館”走出韶山走出農村，佔領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有200多家——就像當年的毛澤東從這裏出發走

向城市一樣。“毛家菜系”中，屬豆豉辣椒、紅燒肉、武昌魚和火焙魚最為經典，又以後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魚全都出自毛澤東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長及寸許，洗淨曬乾，以文火焙幹，然後放入竹筒，置於燃燒的蒿草上，煙熏火燎之後，再用油炒。看來湯家老太太是讀過權延赤的書了，因為這些菜幾乎都是那些書裏描述過的。遊人瞻仰毛澤東的故居，然後品嚐綠豆稀飯的清純和“毛家菜”的鮮辣肥膩，滿意而去。

“毛澤東熱”已經席捲全國了。

王震和鄧力群發了話

這一年，離毛的“百年誕辰”還有三年，離他的“十五週年忌日”也還有一年，實在不是什麼關鍵日子。憑空出來這麼一個熱潮，讓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過，有些人在忍氣吞聲多年之後，現在終於揚眉吐氣。權延赤肯定就有這種感覺，因為有兩個非同尋常的人站出來，維護他筆下的毛澤東的凡人形象，用權延赤自己的話說，是“出面講了公道話”。一個是國家副主席王震，他說他讀了權延赤的書後老淚縱橫。另外一個是鄧力群，他認定權延赤的書乃是“根據毛澤東同志周圍工作人員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盡不實的地方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由於利益之爭對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這些讀物，“在‘尋找’和‘發現’毛澤東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可抹殺的歷史作用”。

中國人對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於西方人對上帝的頂禮以及東方人對佛陀的敬畏。後者多少包含著某種信仰與自我淨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時候才格外強烈。它並不全都來自傳統的風尚和習俗，也是源於某種現實的功利主義。

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同毛澤東時代的萬眾一心不一樣，現在每個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繼承那逝去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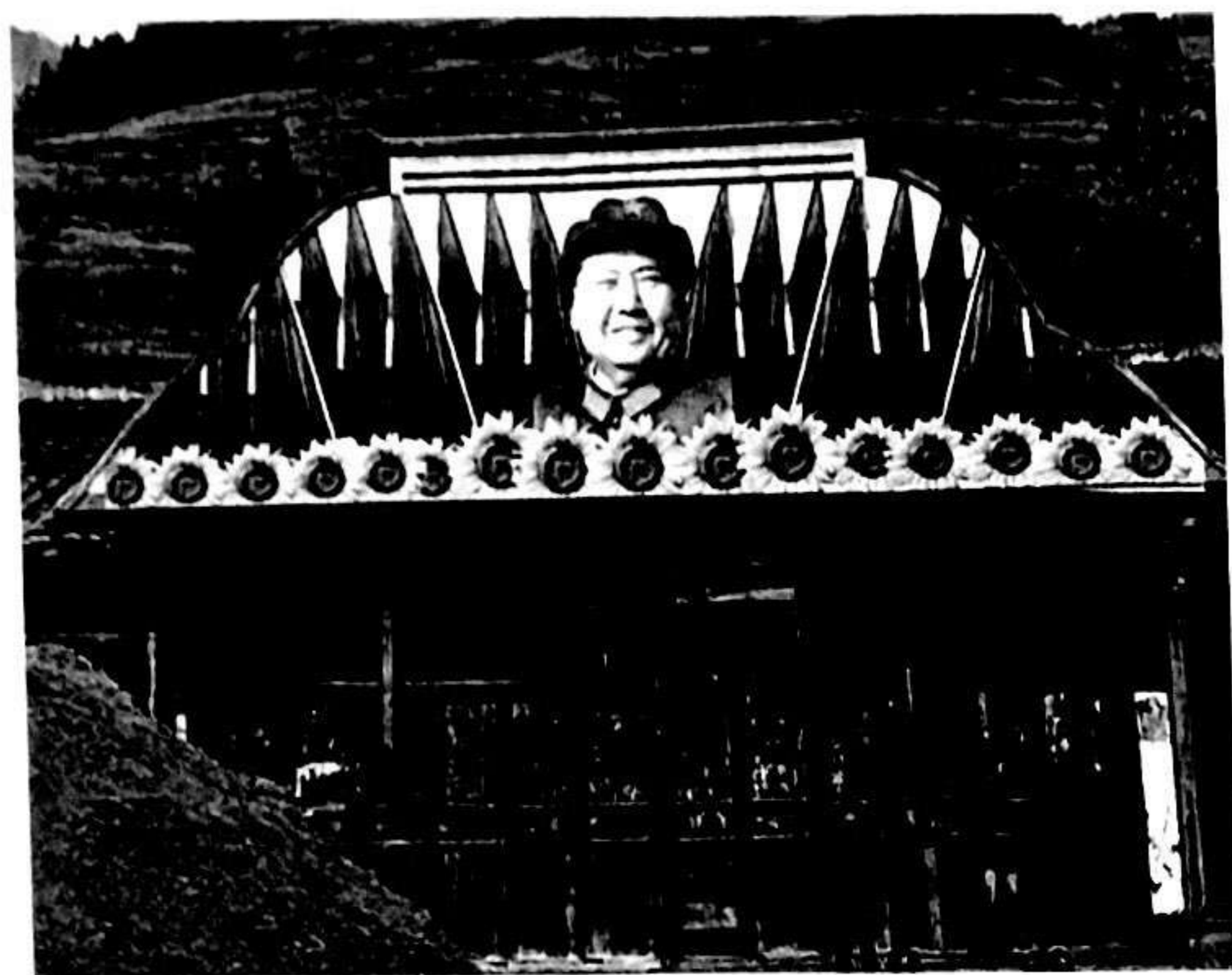
這中間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崔健在《南泥灣》中肆無忌憚地摻雜自己的理解，把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襯衣，外面常常套著一件舊軍裝，偶爾也別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調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個巨大的血紅色的五角星，扯開沙啞的喉嚨，和著搖滾的旋律和電子打擊樂器的節奏，唱出《南泥灣》。歌詞還是那些歌詞，可是人們所熟悉的那種柔美婉約的味道全都變了，變得躁動、跳躍、瘋狂、激情四射。這又哪裏是“南泥灣”了，分明是個“百老匯”。年輕人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卻為之憤怒。這些憤怒者中最憤怒的一個，就是當年南泥灣大生產的領軍人物、後來的國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蹣跚，但這並不妨礙他痛斥那個奇裝異服、怪聲怪調的搖滾歌手。

王震和毛澤東是同時代人，對毛充滿了敬意，而且希望後人都能擁有和自己一樣的思想、價值觀念和感情，即使稍有變通，也只能像權延赤那樣，說說“偉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偉大”。這樣的革命者絕對不能容忍崔健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伴隨著“毛澤東熱”，也發生了一種現象，經過80年代末期經濟的萎靡和政治的動蕩，原來跟著鄧小平走的人現在有不少動搖了。鄧小平本人倒是顯得挺超脫，他在度過了轟轟烈烈的80年代之後就堅決要求退休，並且獲得批准。在他之前，黨的高

級領導人除非犯了嚴重錯誤，大都死在任內，像他這樣不肯接受最高領導的位子、又堅持退休的人，極為罕有，所以讓全中國的官員和百姓都感動了好一陣子。

可是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不論他多麼了不起，離開了權力，離開了勢力，離開了可以表現自己的舞台，就會被人疏遠，被人忘記。像鄧小平和毛澤東，遠離世間滾滾紅塵之後，還能被別人如此這般地說個沒完，實在不多。



四川茶馬古道上某鎮的文革遺跡

毛澤東是清官還是貪官？

繼中國學者茅于軾發表文章嚴辭批判毛澤東之後，又接連有文章出籠要求清算毛的錯誤，有人甚至稱毛是中共腐敗的源頭。與此同時，毛澤東的擁護者們繼續展開反擊。

有人懷念毛澤東的廉潔公道

當下中國，確實有一批人懷念毛澤東和他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會兒，官員清廉、社會公道。

陝西吳起的思先生說：“雖然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有些過錯，但是他是為了窮人打江山，沒個人利益，很廉潔。”

然而，最近網上一篇文章恰恰顛覆了正統看法。有文章說，



北京“烏有之鄉”書店。



成都四川科技館前的毛澤東塑像。

毛澤東是中共腐敗的源頭，三年大饑荒時期，各地為毛興建豪華行宮就是一個例證。

此外，毛澤東著作大量發行，給毛帶來了豐厚稿酬。文章援引中國刊物披露的數字說，1967年毛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元，堪稱當時的中國首富。

文章還說，毛跟許多女人發生不正當關係，晚年篤信道家“房中術”，癡迷于“採陰補陽”來延年益壽。

皇上還需要貪污嗎？

此番描述跟官方所說的一生艱苦樸素、一件睡衣打幾十個補丁的毛澤東，簡直判若兩人。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他還需要貪污嗎？皇上還需要貪污嗎？他只需要腐化就行。他這種腐化程度，別的我不敢說，全國各地為他修的別墅，不知道有多少，在當時都是國內最高標準的建築，有的(他)連住都沒住過，有的可能住過幾天。

章立凡說，當時中國人的工資，一個月只有幾十塊錢，毛的生活大大超過了普通人，說他清廉，有違史實。章立凡認為，懷念毛澤東的人主要是對現實不滿。



歷史學者章立凡。

他說：“但是，回頭也沒出路。你真回到毛時代，讓你去接受那種低工資，日用品、生活必需品、食品都要配給的生活，我看，也沒有一個‘毛粉’願意接受。”

另外一方面，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作家鐵流發出倡議，呼籲當年的右派難友們團結起來，起訴毛澤東。

他說，毛死去幾十年了，可他的“精神”沒死，不少政治野心家和中共黨內的左派，無時無刻不在利用他的陰魂反對和鉗制黨內外的改革派和民主派，試圖扭轉時代前進的車輪。

兩派唇槍舌戰令官方頭疼

毛澤東的捍衛者們進行了猛烈反擊，使“擁毛派”和“批毛派”之間的鬥爭在中共建黨 90 週年前夕進一步升級。“烏有之鄉”網站發起的“公訴”批毛學者茅于軾的運動，已經徵集到兩萬多個簽名。太原等地還舉行了聲討大會。

但是，組織者並不滿意。“烏有之鄉”的文章指出，簽名僅占

全國人口的 0.001%，還不及一場球賽的觀眾，讓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蒙羞，讓黨中央產生誤判。文章號召，深入基層開展活動，逆轉當前的頹勢。

10 名毛澤東生前的警衛也站出來了。他們寫信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習近平，說在中共 18 大召開之前，出現否定黨史、否定黨的領袖的現象，決非偶然。他們請求中央進行查處。

儘管雙方唇槍舌戰、你來我往。但是，中國官方媒體卻鮮有報導，當局也無正式表態。章立凡評論說：“官方對這個事很頭疼。這個是他們自己種的，現在他們自己在吃這個苦果。你們當初不能夠把毛澤東的罪惡說清楚，把歷史給徹底糾正，所以，才有今日之思想的混亂，以及極左思潮的氾濫。”

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功績為主，但也承認他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在中共 90 歲生日到來之前，官方媒體對毛大唱讚歌，試圖用毛的“偉大思想”和“高尚品格”來教育今日之官員。（美國之音張楠）



海南毛像被毀 兩派爭說毛澤東

石像倒地 罵聲湧來

這尊 9.9 米高的毛澤東漢白玉像位於海南省文昌市龍樓鎮南海邊，立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據稱，2011 年 2 月 19 日被該地段的開發商推倒，雕像斷裂成數截。

毛澤東旗幟網的一篇號稱“編者按”的文章“責令：海南省、文昌市、龍樓鎮有關部門，立即對摧毀毛主席像的個人進行處置，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重新立毛主席像。文章還說，海南省委、文昌市及龍樓鎮政府部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旗幟網的文章說，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他領導億萬中國人民和指導全世界革命人民反

海南，是誰搗毀了毛澤東塑像？

對剝削壓迫，帶領幾億農奴站起來做人，是巨大社會解放；毛可謂“功高無賞，勞招怨謗”。

中國有些網絡論壇上出現一邊倒的帖子，譴責開發商“唯利是圖”，歌頌毛的“豐功偉績”。這些跟貼也譴責所謂“極右派”行為，基本口徑是，毛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是中國的“驕傲”。

北京的自由媒體人高瑜。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政府維穩經費巨大、甚至已經高於國防費用，加上目前兩會期間的高度警惕和中央政府責成的地方領導“問責制”，中國互聯網成為維護統治、“消音”多元化的單一陣地。

高瑜說：“現在的帖子不能夠相信，是一邊倒，絕對不代表多元化思想，因為正好是兩會召開，要嚴格管理網絡。哪兒出事兒哪兒的領導要負責。連新華社記者和兩會代表都不許談茉莉花，也不許在網上搜茉莉花。”

高瑜說，目前的網管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無論明談暗語，都不許發表中央認為能鼓動動亂的傾向性語言。

擁毛批毛兩派對壘

但是，從中國網絡博客和論壇的情況看，在評價毛澤東問題

上，中國宣傳當局雖然強力介入，引導輿論，但是並非在網絡言論層次上嚴防死守，禁止批毛。

在中國毛派論壇上，派同伐異，似乎禁止批毛言論，有網民表示，他們非議毛澤東的帖子被刪除。

而在過去似乎由左派毛派和民族主義派主導的中華網論壇上的《石破天驚——毛主席漢白玉偉像被摧毀》一文後面的跟貼中，擁毛批毛兩派對壘。

有人寫道：“是海南省政府，還是國務院的哪位領導能站出來向全國人民解釋一下？和諧的結果就是如此的拜金主義嗎？是否也想把毛澤東的遺體請出天安門廣場？”也有人表示，在毛澤東時代，黃帝、孔子、岳飛的像被搗毀，現在輪到毛澤東了。

有人對摧毀毛澤東像的人喊打喊殺，也有人寫道：“如果是文物，按破壞文物罪定罰，如果破壞的是公共建築，按毀壞公物論處，不要搞得跟文革似的，上網上線置人於死地，那是納粹做法”。還有人說，這不過是“開發商清理地面上的違章建築而已。”

在言論空間比較大的中國論壇上，有人寫道，毛澤東乃中國當代社會一人獨大、一黨專制、殘害異己、鎮壓人民的鼻祖。對他進行膜拜是利用不散陰魂繼續與人民為敵。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沒有人民民主，只有獨裁專政。“人民民主”言論，純粹是為了達到統治人民目的而蠱惑人心的妖言。

還有部分跟貼則是隱晦表達對當今政府的不滿，模糊地呼籲“反對那群精英編造的那些好聽的謊言”；人民應拿起憲法和法律的武器“同我們的敵人作堅決的鬥爭”。

清算毛才能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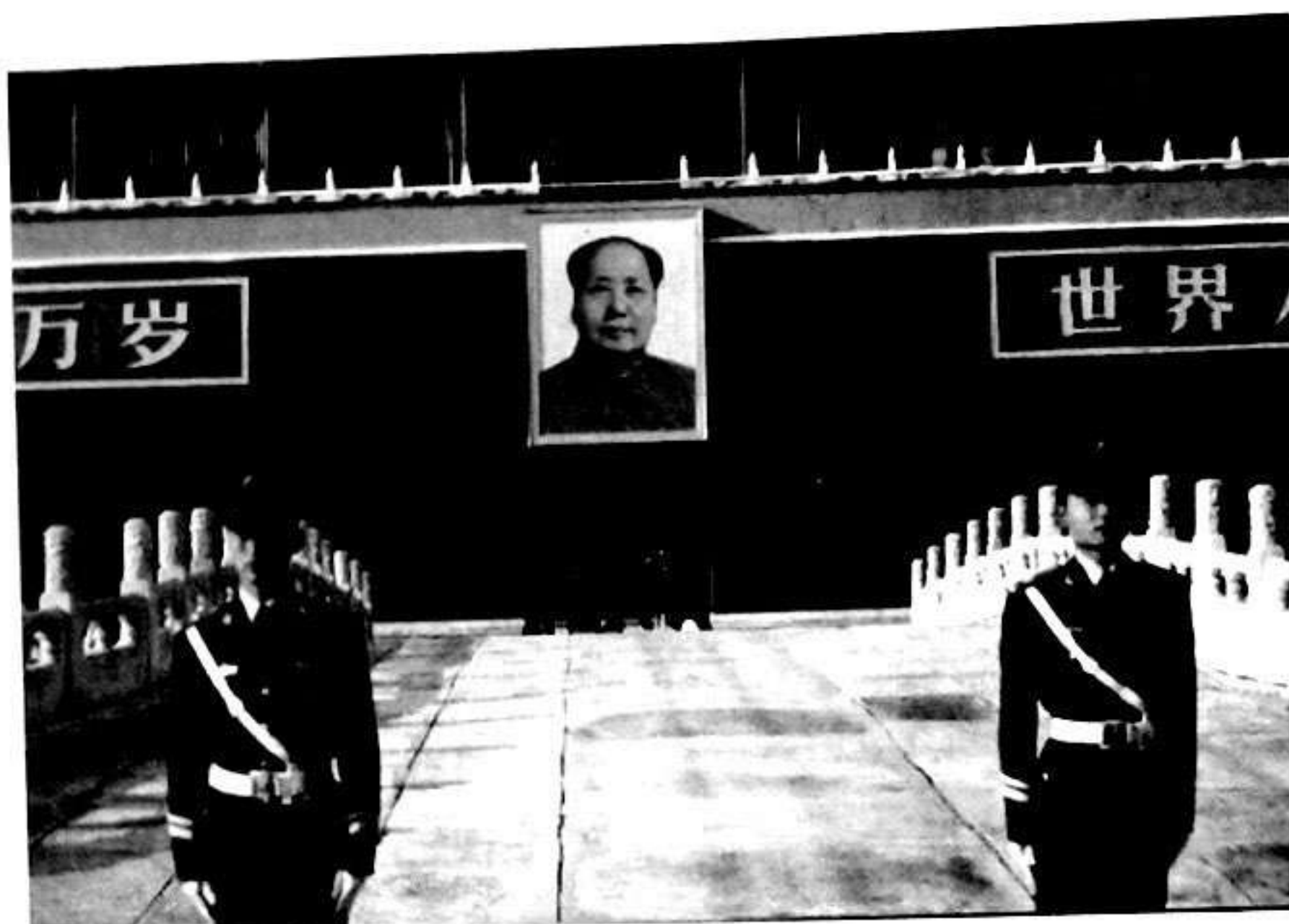
高瑜指出，開發商推倒毛雕像，當然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

幽默地說，就是老毛“妨礙了GDP”，所以“被請走路”。為了開發，很多文物、古跡都被推倒毀滅，何況一尊毛主席的雕像？而且毛像可以推倒再建。

有互聯網評論稱，推倒毛雕像的為“反動派”，稱“與人民結合為一體”的毛主席“非常人”，所以，“反動派”試圖施以極端手段來消除其影響，甚至“在祖國的心臟”樹立“復辟狂”孔老二雕像。

高瑜說，毛澤東通過向人民許諾民主、自由而建立中共政權，不過其兌現情況有目共睹。她說：“毛澤東建立了中共62年的政權，依靠的是武裝鬥爭。而且，他在搞武裝鬥爭的時候也同時利用自由、民主這些理念，許諾廢除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獨裁專制政權。”

高瑜指出，在現今社會，毛澤東已經成為阻礙中國民主進程的標誌；只有徹底清算和批判他，才可能實現中國向民主的過渡。（美國之音雨舟、丁力）



禍國殃民總後台還掛在天安門

毛澤東的遺產

北京異見學者茅于軾發表文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歷數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的罪惡，包括心理陰暗、搞階級鬥爭、害死五千萬人、將國家領至崩潰邊緣等，指這個“禍國殃民總後台”至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中國的滑稽劇還沒有真正謝幕”。文章引起轟動。茅對坦言，發文目的是要將毛“徹底趕下神壇”。

茅于軾的文章刊於2011年4月26日財新網。該網站隸屬官方《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屬下財新傳媒集團，該集團名下有《新世紀》週刊、財新網、《中國改革》雜誌等，總編輯是《財經》雜誌前主編胡舒立，集團顧問包括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琏、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保育鈞以及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徐泓等。

茅于軾接受蘋果日報電話查詢時坦稱，明白如此文字能在

媒體公開出現“確實不容易”，稱“現在評價毛澤東已不是禁區，怎麼評就不應只由官方說了算，總得聽不同看法吧”。他希望當局大度一點，“不要一下子就刪了”。該文甫出即廣被轉貼。

這篇長達5000多字的文章堪稱是一篇討毛檄文，用詞尖刻直白，指毛澤東“終究要完全走下神壇，剝離神像外衣，接受公正評判”；文章歷數中共建政後毛的種種罪惡，包括搞大躍進致三年災荒餓死三千多萬人，為逃脫責任又發動文化大革命、逼死政治對手，更指毛姦淫婦女無數，因他在神壇上無人敢言等。

文章將毛描繪成一個心理陰暗、十惡不赦的變態惡魔，指毛是“四人幫”（毛的遺孀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毛死後被華國鋒及元老派發動宮廷政變拘捕）的頭頭，稱“這個禍國殃民的總後台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在大家每天用的鈔票上印著，中國的滑稽劇，還沒有真正謝幕”。

近年內地輿論對毛評價雖不乏貶言，但如茅文“踩到盡”，而且官媒公然刊出卻相當罕見。有網民跟貼稱“說得太真實了”，“現在就是需要茅老這樣敢言學者”！“他說那些事都歷歷在目。毛的影響至今荼毒我們，今天社會道德淪喪，就是那時荼毒延續”。但也有擁毛者狂罵茅，要他“滾出中國”，“當年沒滅了你算你福氣”！

文章一出，立即被網民廣泛轉貼，僅財新網當天的跟帖評論就有3000多條，叫好聲不絕，但文章很快就被刪除了。以下是茅于軾原文：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

毛澤東原來是一座神，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料的揭露，慢慢地還原為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把

公審「四人幫」



四清，文革，都是圍繞著階級鬥爭展開的。他清除了彭德懷，賀龍，陳毅，劉伯承，陶鑄。又利用林彪鬥倒了劉少奇。到後來對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後連周恩來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幾個親戚，江青，毛遠新，王海榮，和極少數幾個家丁，像張玉鳳等。如果毛澤東不那麼相信階級鬥爭，而是以和為貴，搞團結，他死的時候絕不會那麼孤獨，雖然有三年災荒的責任，他作為開國元勳，還能受到大多數人的尊敬。可見毛澤東是被自己的階級鬥爭毀壞的。林彪出事以後毛澤東多次教訓江青要團結，他只看見江青到處鬥人如何糟糕，但是江青只不過是他的一條狗，叫她咬誰就咬誰。他自己到最後也沒有放棄階級鬥爭。

“其心理的陰暗實在叫人吃驚”

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死人無數，在所不惜。每次搞運動都有人自殺（他殺就不去說了）。特別是文革自殺的人還不是一般的人，大多數是社會知名人士，對社會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有許多還是毛澤東的朋友。這些人自殺毛澤東完全知道，但是他絲

他看成神，對他的任何評論都是大不敬。如果說他也有錯誤，那是萬萬不容許的。在這些人看來，毛澤東永遠是不容分析，不許正視，不可評論的一尊神。他們永遠看不到毛澤東控制不住自己而流口水，連說話都說不清，跨不上汽車而不得不請人把他抬上去，他長期臥床而腿肚子又細又弱。幸虧更多的材料的發表，我們能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得到了許多新的印象。他無非是一個人，雖然他的智力過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個人都會碰到的規律。他不能突破規律，而是被普遍的規律所限制。他根本不是神，對他的一切迷信將會逐步消退。

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這是他對三年災荒責任恐懼的反應。中國餓死三千多萬人，超過中外歷史上和平或戰爭時期餓死人的最高記錄。在和平時期，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可推脫。這是誰的責任。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他毫無道理地反對彭德懷的批評，生怕彭德懷會奪了他的權，不顧已經暴露的左傾禍害，繼續更嚴厲地往左偏離，不許人說真話，搞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面紅旗”。導致大饑荒。為了逃脫這個責任，他發動文化革命，逼死曾經因三年災荒批評過他的劉少奇。他想消滅一切政治上的對手，無限地擴大自己的權力，還打算把自己的權力在他死後交班給自己最可靠的人，江青。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過是一推肉，是叫喊萬歲口號的工具。權力欲望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為此而完全瘋狂了，用最大的代價去追求權力，以至於他的權力本身因此而削弱。

他追求權力的方法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原意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鬥。但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資產或無產根本不相關。他所謂的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他所不喜歡的人，大部分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種無原則的鬥爭最後把他自己也毀了。從五十年代開始他就迷戀於階級鬥爭。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

毫沒有同情心。三年災荒餓死三千多萬人，大部分是幫助他打江山的貧下中農。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感到痛心。和他有肌膚之親的孫維世，上官雲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殺。他毫無憐惜之意。現在揭發發現，毛澤東姦污過不計其數的婦女。原來他在神壇上，他的人性的獸欲方面誰也不敢說。他從神壇上走下來之後，這些事一樁樁被暴露。其冷血性無與倫比。其心理的陰暗實在叫人吃驚。大家都說，毛澤東有超高的智慧，沒人學得了。但是更沒人能學的是他的冷酷無情，沒有起碼的人性。

從現在揭發出來的細節看，毛澤東搞階級鬥爭使得黨內人人自危，人際關係極不正常。一切事務都圍繞一個“權”字。什麼國家的團結，人民的利益，統統都放到腦後。國家的幾個領導人成天想的是一件事對誰有利，特別是對毛澤東的權如何。沒有任何人敢於冒犯毛澤東，一個國家的事完全變成了毛家的私事。當時許多人無法理解的種種事態，現在一件件都擺清楚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怎麼變成了革命的大字報，幾個大學的造反小將怎麼被呼來喝去被利用的，在武漢王力被打，和以後的天安門保衛中央文革的大會的背景，誰是 516 分子，為什麼要整 516，何以要批林批孔批周公，這一切外人根本看不懂的事，其實就是毛澤東消滅政治對手的策略。他心裡很清楚，但又不便說清楚。文革中許多重要的事情請示他，他總是模稜兩可，叫別人去猜。因為他的真正目的是見不得人的，他的心理非常陰暗。一個國家由這樣一個權力無邊，又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領導人指揮，一直走到了經濟和政治雙崩潰的邊緣，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原來許多人都以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奪取資產階級在國家機器中的權力，為無產階級爭利。現在這場騙局被完全戳穿了。

毛澤東的最後幾年裡，雖然身體完全不行了，但是腦子還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國家的領導權交給誰？在他心目中

晚年毛澤東



毛澤東的遺產

只有江青最可靠。所以決定讓江青接班。但是他也明白江青結怨過多，無法獲得大多數人的同意，所以讓華國鋒協助江青。毛澤東一面對華國鋒說：你辦事，我放心。但是還說：有事找江青商量。毛在他死前一年對他死後的國家領導人的安排是：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以後又改為黨主席是毛遠新。總之沒有超出他自己的幾個近親。江青或毛遠新何德何能，憑什麼能擔任國家主席之職？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現完全是一個潑婦，絲毫沒有遠見卓識，自我膨脹，不知天高地厚。粉碎四人幫後對江青的審判把她定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判刑死緩，是極其公平的。毛澤東居然想把國家的政權交給一個反革命分子。他腦子裡唯一想的的就是毛澤東的家天下如何維持。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毫不相干。

“權力欲徹底毀掉了毛澤東”

1971 年林彪出事後全國人民鬆了一口氣，認為林彪為了奪

權誤導偉大領袖搞文化大革命。現在林彪死了這場毫無道理的文化大革命應該停止了。各處地方都在落實政策，解放原來反林彪和反文革的人。當然，因為反林彪而被處死的人已經不可再生。可是毛澤東因為林彪出事而心情極端壓抑，生了一場大病，他的健康再也沒有恢復。一國的領袖其心情和百姓的心情極端相反，面對同一件事百姓興高采烈，領袖悶悶不樂，真是百姓的極大不幸。在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首先整頓了梗塞了的全國鐵路系統，使其能夠正常運作。然後整頓各級政府中的派性，消除互相對立的情緒，並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幹部，抓一部分壞頭頭，從而使政府工作逐漸走上正軌，生產明顯恢復，各項指標轉為上昇，全國人民感到有了鄧小平，形勢在好轉，破碎的國家有可能恢復正常。可是毛澤東想的和百姓的利益無關，只想著自己的權能不能保住，江青能不能接班。鄧小平幾次和江青發生正面衝突，毛澤東決定搞掉鄧小平。這就是1976年毛澤東臨死前的批鄧運動。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毛澤東從一個政治家淪落為處處和人民相對立的人民公敵，就是因為他被權力的迷信所控制，喪失了起碼的理性。

權力欲徹底毀掉了毛澤東，使他完全喪失了正常思維，把國家的事看成了自己一家的事。雖然他知道江青不得人心，說“不出三五年必將腥風血雨”。但是他無法擺脫這個局面。他已經瘋狂了，被階級鬥爭搞瘋狂了。讓江青接班是他僅有的最佳選擇。他之所以欲置周恩來於死地，就是因為他不相信周會臣服江青。他本來的理想是讓周恩來協助江青掌權。但是周恩來無法和江青合作。江青根本不是一個政治家。共產黨在建國時期湧現無數英雄人物竟沒有一個能夠及得上一個潑婦。毛澤東之昏庸和他極高的智力相結合，把中國搞成一個不成為國家的“國家”。在毀壞國家上他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無人能及得上他的百分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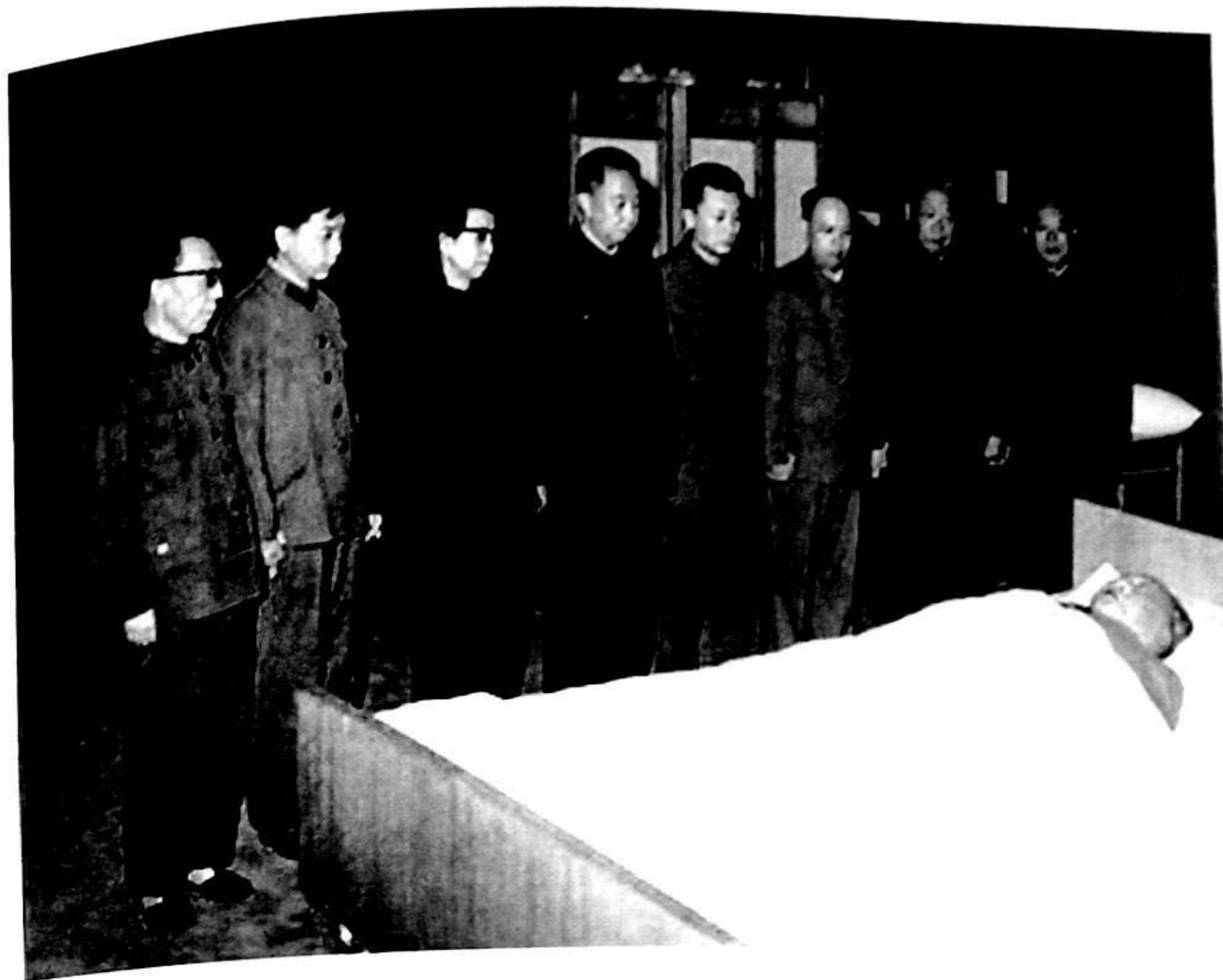
越來越多的資料解密，文革這場鬧劇的來龍去脈越看越清楚了。毛澤東是了不起的，能夠把這麼多的英雄人物一個個鬥倒，消滅。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的目的就是清除異黨，殺人就是目的。而毛澤東的目的不在把人殺掉，而是讓他遭受極大的侮辱和痛苦。首先讓他被孤立，誰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人民的敵人，繼而剝奪他的基本人權，任何一個人都能隨意侮辱他，可以隨便打他，叫他喝痰盂裡的髒水，打傷了不許醫院給他治療。最後讓他自己覺得生不如死，自殺算了。而且自殺的時候還要喊“毛主席萬歲”如果他膽敢有絲毫對毛澤東的不敬，他死後所有的親屬都會遭遇更悲慘的命運。毛澤東整劉少奇就是一個例子。劉少奇快要死了，毛澤東下令搶救，要等黨代會通過決議，把叛徒特務工賊內奸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選擇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當面宣讀給劉少奇聽，然後讓他慢慢在無助的痛苦中死去。毛整死的高幹無一是經過審判（哪怕是走形式）正式處死的，都是讓他們慢慢地在孤立無援的極端隔絕的狀態下，受夠了一切痛苦再死掉。毛澤東極其痛恨周恩來，因為百姓擁護周遠勝於擁護毛。但毛又無法整掉周恩來，因為這個國家內內外外都離不開周恩來。在周活著的最後幾天中，病痛極度地折磨著他。毛澤東乘這個機會翻出了幾十年前寫的批評周恩來的文章，用盡挖苦，諷刺，刻薄的語言，叫人當面念給周恩來聽，以增加周的痛苦。這一過程是需要精心設計的，是耗費精力的。毛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這方面。

他終究要完全走下神台

拿斯大林和毛澤東比，斯大林殺的人比毛澤東殺的多。解

放前井岡山肅反殺了十幾萬人，這筆賬該算在誰的頭上，我說不清。解放後鎮壓反革命殺了七十萬人。這主要是毛澤東的主意。以後在文革時搞清理階級隊伍，三反五反，殺過一大批。具體數目從來沒有公佈，估計不超過二百萬人。除此以外沒有大規模槍斃人。餓死的三千多萬不是直接殺害的；整死的，自殺死的，武鬥死的都不是毛澤東直接殺的。而斯大林實實在在處死了幾百萬人。但是斯大林領導衛國戰爭，抵抗希特勒的軍隊並取得勝利，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反觀毛澤東，除了抗戰頭兩年共產黨的軍隊打過幾次抵抗日本軍隊的仗，從1939年以後就沒有打過一場稍微大一點的仗。共產黨的主要精力放在擴大解放區，培養自己的武裝力量。這時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放著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盤，準備勝利後摘果子。他確實做到了。可是解放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幸福，相反，帶來的是生靈塗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達五千萬之眾。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二戰結束給世界帶來和平。戰敗國德國，日本，都變成了民主文明，繁榮幸福的國家。唯獨中國這個戰勝國卻陷入內部無窮無盡的階級鬥爭，造成人類史無前例的生命損失。

毛給中國帶來的是使人痛苦，然後死去。不但自己用盡辦法叫人痛苦，而且動員全國人民互相鬥，互相製造痛苦。對一般的小人物，也不是簡單地處死，而同樣叫他們經受極大的痛苦才殺掉，像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王佩英，無一不是就在就義前叫他們受盡了罪才把他們殺掉。毛澤東還把人間一切美好的東西加以破壞。中國幾千年積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藝術，全部被否定。可移動的古董，繪畫，雕刻，統統燒掉砸碎。對不能移動的建築物則推倒，把美麗的电影明星剃光頭，讓無知的群眾用一切辦法侮辱她們。把對社會最有用的知識分子一個個打倒，甚至逼他們自



華國鋒和“四人幫”手挽手的照片

殺。把宣揚善的宗教領袖關進監獄，甚至乾脆殺掉。毛澤東的目的在於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個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話，毛澤東的目的是全社會痛苦的極大化。通過文化大革命他的這個目的確實做到了。痛苦的極大化是文化大革命最本質的東西。這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所給予人民的禮物。

毛澤東不但做到了在國內製造痛苦極大化，而且輸出他的理論，讓全世界都要殘酷鬥爭。他鼓勵在東南亞搞武裝革命，製造死亡。在馬來西亞，印度，泰國，菲律賓，緬甸，印尼，尼泊爾，斯里蘭卡，都有武裝叛亂。他死後三十多年的今天遺留問題還有一大堆。印度的毛派有獨立的武裝，擁有兩億貧苦群眾的擁護，但是三十多年來貧困問題絲毫沒有改進。因武裝鬥爭每年死亡上千人。印度的中央政府拿他們沒辦法。搞得最慘的是柬埔寨。毛主席的好學生，波爾布特，遵從毛澤東的教導殺人無數，成為

全世界近代史中殺人比例最高的人類滅絕案。這就是毛澤東功蓋天下的事跡。這一連串事跡也說明一個問題。他的理論非常具有欺騙性，所以會有那麼多的人上當受騙。至今還有人高舉他的牌子做事。究竟他的理論是對是錯？道理很簡單，改善人們的生活要靠發展生產，靠人與人鬥怎麼能變富。所有遵從毛澤東理論的人，也許鬥得很開心（被鬥的人可倒了霉），但是擺脫不了貧困。無一例外。

但是毛澤東又是幼稚的，他絕沒有想到最後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沒有一個真正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在身邊，剩下一批狐群狗黨。最後他信賴的人，只剩下後來被判刑的四人幫。大家吹噓毛的高瞻遠矚，其實毛是鼠目寸光。他發動文化革命的時候怎麼能想到自己會變成孤家寡人。最初和自己一起奮鬥的親密戰友都被整得眾叛親離。毛澤東到死神智都非常清醒，但是是在非常孤獨，失望，沒有前途，沒有同志和朋友的狀態下死去的。他絕沒有想到自己輝煌的一生竟然是這樣一個結局。毛到死也沒有絲毫的自責或後悔。毛死後華國鋒和葉劍英抓捕了四人幫，最高法院審判了四人幫，把他們判了刑。但是四人幫的頭頭，這禍國殃民的總後台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在大家每天用的鈔票上印著。中國的這幕滑稽劇現在還沒有真正謝幕。不過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終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為一個普通人，在剝離一切神象外衣的條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條件下接受公正的評判。

對毛澤東的再認識

我寫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後，沒想到引起烏有之鄉等左派人士的強烈不滿。這的確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損害了他們的感情，我願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衝突。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理性的思考。從冷靜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觀的判斷。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國從來沒有幾年的和平環境。只是改革後我們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國家的實力大大地增強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們千萬不要再次陷入內鬥。

不過我對毛澤東的看法並沒有變。毛澤東要還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評定。我希望烏有之鄉的人士客觀地想一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做出公正的評價。不過如果你們還是堅持原來

的看法，這是你們的權利。我相信，隨著事實真相的逐漸揭露，你們的看法會改變。

我能夠理解左派人士懷念毛澤東的緣由。因為現在這個社會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權勢的不公平，表現得非常明顯。處於底層的百姓處處受到欺侮，而且喊冤無門。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體力行，投身於公益事業，盡微薄之力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解決的方法絕不是回到毛澤東的路線。其實，我也曾經是毛澤東的擁護者。在解放前後，我正在讀大學。聽到毛澤東的許多主張，我都非常贊同。比如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農，要走群眾路線，要團結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國建設成富強康樂的國家。那時候不但像我這樣的大學生贊成毛澤東的思想，連大學教授，在美國留學的博士，沒有不贊成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他們很多人回國參加祖國建設。但是後來都挨了整。）所以全國解放那麼順利，共產黨的政權非常鞏固。可是毛澤東取得政權後，一步步走向反面，接連不斷地搞人與人鬥。後來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標就是當秦始皇，自己的獨霸地位不容挑戰。他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任何一個稍有懷疑的人統統都被整死。中國因為他的錯誤死了大約五千萬之眾。大救星變成了大災星。而且他到死也沒有絲毫自責之心。這就突破了人類道德的底線。對這樣的一個人我們無法原諒他。

一切為了窮人是一種欺騙

毛澤東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張非常吸引人。但是現在看來這些政策，即使主觀上不是欺騙，客觀上的確就是欺騙。他號稱一切是為了窮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窮苦的人。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萬士兵都是參軍的貧下中農，三年災荒而死的大多

數是農村的貧苦人。他整死的老幹部都是為窮人服務的真正的無產階級。他的政策絲毫也沒有改善貧苦人的生活條件，反而是讓他們陷入更悲慘的境地。所謂的一切為了窮人豈不是一種欺騙嗎！倒是改革開放後大家的生活確有明顯的改善（當然差別極大）。不承認這一點就太主觀了。毛澤東的錯誤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財產，富人沒有保障的結果是大



毛澤東的遺產

茅于軾
大家都變成了窮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難道窮人的目的是讓大家都受窮嗎？當然不是。但是毛澤東就是把中國變成了窮人國。世界上有許多窮國，但是沒有哪個窮國像中國那樣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飽肚子，全國沒有一輛私人小汽車。那時候中國成為窮國中的最窮者。而現在中國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大國（不過按人均收入計算，排名還在中間偏後）。

真正幫助貧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權，讓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這要求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護，也就是人權的切實實施。在人身安全和個人財產有保障的條件下，必然有市場經濟的產生。這是能夠高效生產財富的一種制度。但是市場經濟並不能保證分配的公平性，反而產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間的，市場之外的各種慈善公益活動，緩解差距的過於擴大。但是消滅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們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樣吃大鍋飯是效率極低的一種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們的社會非常公平，但是也非

常窮困。最近不得不放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引進私人經濟和市場制度。發達國家的經驗都大同小異，都是市場經濟加民主法治。雖然這個制度也有毛病，但人類還沒有找到別的更好的制度。反對打倒富人，要同樣保護富人和窮人，可能是你們最不願意聽的一句話。但是請好好想一想，你們打算永遠做窮人嗎？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嗎？解決貧富分化的辦法不是消滅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過大，保證窮人也能過一個起碼的生活，而且讓窮人有機會變成富人。當然，這裡所說的富人是靠市場致富，而不是靠貪污腐化，假冒偽劣，走私販毒致富的。

讓我們通過冷靜的思考，尋找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不要為謊言和虛假的宣傳所迷惑，延誤我們向前進。（茅于軾）

只有和毛澤東切割， 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榮

“取消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議案由習近平提出，特別值得重視。習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舉重若輕，一舉掙脫了束縛自己、也束縛黨和全國人民的繩索，這反映了他的執政風格和政治走向。沒有嚴厲的、高調的政治語言，沒有大叫大嚷，平和得像個裝集裝箱的單子，只註明某一種貨物不准進入集裝箱。就這樣，把幾代領導人想辦沒敢辦的事情辦成了。他不貪不色，一身正氣，關鍵時刻會有勇氣、有辦法解決中國的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問題，他可能領導中共走向中興，領導國家走向民主共和。習近平和中共十八大寄託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巨大期望。”

在中國大陸學者辛子陵先生通過電子郵件書面回答《新史



中國學者、傳記文學家辛子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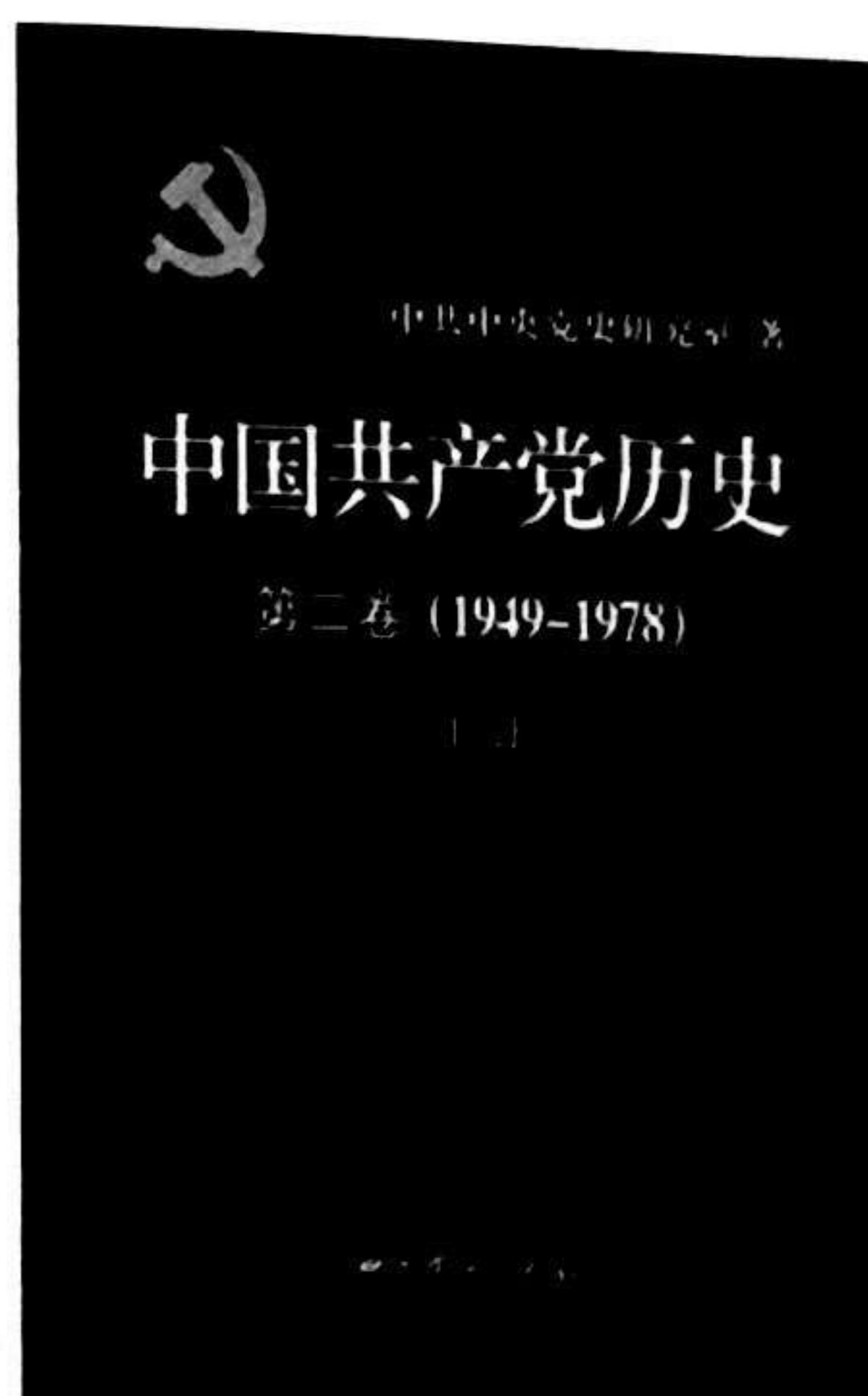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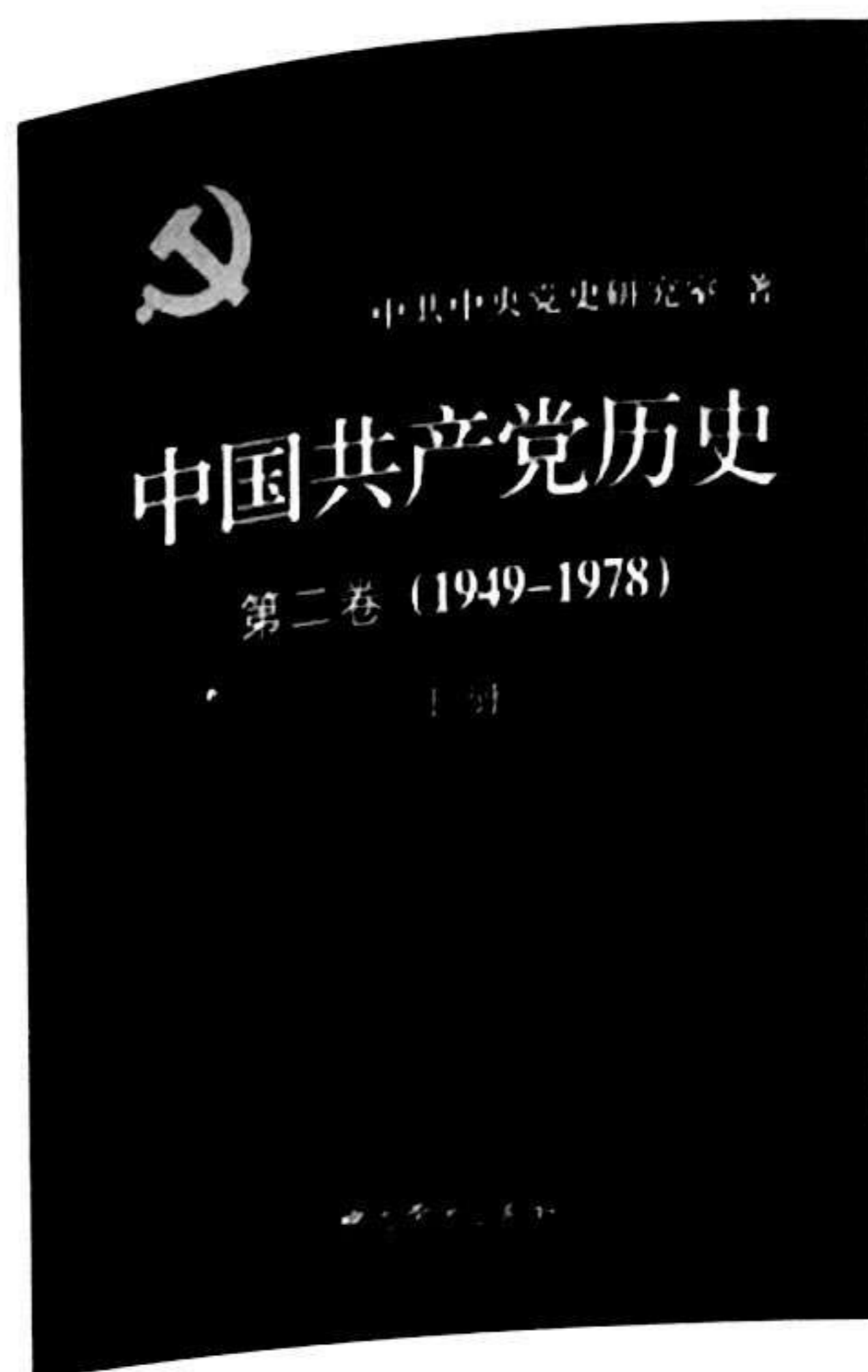
添很多內容”。

辛子陵係中國學者、傳記文學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著有《毛澤東全傳》一～四卷（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林彪正傳》（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等，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我們的話題，從中國官方最近推出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說起。

記》記者提問時，他將這段話標以“精彩摘要”放在最前面，表明他對這一觀點的高度重视。

或許是因為他談到的問題引起很多學者的關切，在《新史記》雜誌尚未刊出這篇專訪、更未上網之前，互聯網上已經流傳“辛子陵接受《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專訪”的初稿。但據辛子陵先生3月30日告訴《新史記》記者：與初稿相比，“最後的稿子增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下）。

黨史二卷未執行鄧小平重新評毛指示

新史記：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國內正準備隆重紀念。其重頭節目是推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初版印行五萬部。但黨史界、史學界、理論界對這部著作爭議很大。您對此事怎麼看？

辛：捧場的似乎不多，表示失望的不少，因為沒有做到實事求是，沒有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沒有執行鄧小平重新評毛的指示，徹底揭蓋子，重新評毛。當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很大的進步，最重要的一點是徹底否定“文革”，承認大躍進中餓死了1000萬人。但這不是突破，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就達到了這個認識水平。

新史記：您提到的鄧小平關於重新評毛的指示是怎麼說的？

辛：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過一次政治局

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外，還有鄧小平、陳雲、彭真、萬里、薄一波、楊尚昆和王瑞林。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若干年後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一生功過，要作出科學、全面評價的講話。鄧小平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的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會議主持者、第十四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建議，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2004年七一前夕，萬里寫信給胡錦濤，敦促中央執行鄧小平指示，執行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議。胡錦濤在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陪同下到萬里寓所拜訪，明確表示說：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

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新史記：那麼這次出版的黨史第二卷，是否體現了鄧小平上述關於重新評毛的意圖？

辛：黨史第二卷出版前後，中央黨史研究室沒有交代與鄧小平講話的關係，沒有交代與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的關係，講話和決議還算數不算數？執行不執行？沒交代。

黨史二卷的先天不足，是沒有突破1981年《歷史決議》的框框，繼續為毛澤東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為尊者諱。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以為把毛的錯誤說輕一點，說少一點，黨的執政的合法性就多了一點，今天紀念建黨90週年面子上就光鮮一點。這個指導思想注定了這個本子在歷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紀念建黨90週年的一件壽袍，是應付門面的東西，過後就被束之高閣了。

中共和毛澤東必須分開說

新史記：您說“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聽起來很新鮮，難道中共和毛澤東能夠分開說嗎？

辛：當然能夠分開，也必須分開。京戲裏面職位最高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帝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主角，不是一號，不是拿錢最多的演員。“三國戲”若以漢獻帝為中心，就沒什麼可演的。蜀國這一支要以劉備為中心，就沒有《群英會》、《草船借箭》、《借



鄧小平指示重新評毛。

東風》、《空城計》以及《六出祁山》、《七擒孟獲》等膾炙人口的劇目。

我們寫黨史有個慣性，必須以毛澤東為主線，必須靠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出彩、出高潮。一旦毛澤東錯了，這個黨史就沒法寫了。怎麼辦呢？有幾招：

一是強詞奪理。有錯不認錯。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說，得說別人右了。廬山會議，不能批毛澤東的“左”，卻要批彭德懷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罪惡，是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毛充滿了崇高的動機，但被壞人利用了；

三是瞞天過海。把群眾拉出來說事。大躍進非說是人民群眾“急於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而毛澤東只是群眾願望的執行者。

四是共同負責。全黨人人有份。不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有黨中央的決議，但讓劉少奇、彭德懷與毛澤東共同分擔“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公平嗎？

今年是建黨 90 週年。黨史二卷編寫者想給黨多唱讚歌，增加喜慶氣氛，但他們搞錯了一件事情，這是給黨過生日，不是給毛澤東做壽。黨和毛澤東是兩個主體。毛澤東錯了，不等於黨錯了。黨是在戰勝了毛澤東的錯誤走向改革開放、走向正確的，戰勝了空想社會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如果講主流、主旋律，應該寫這個。從這裏找出黨的自信和光榮來。例如反對“家天下”的鬥爭，寫出來是何等的驚心動魄，這是毛澤東的恥辱，但卻是共產黨的光榮。你不敢寫，你要掩蓋和迴避，那

就只能瞞和騙了。

揣著指北針找方向

新史記：過去中共黨史講“兩條路線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一個人正確，別人都錯了，都犯了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錯誤。

辛：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建國以後，他主政的建設時期的歷史，八屆中央委員會全黨都對了，就是毛澤東一個人錯了。我講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建國後，劉少奇和毛澤東關於搞一段新民主主義還是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爭論和鬥爭，劉少奇的清醒、堅定和遠見卓識，是很給黨增光添彩的，今天讀起來都令人肅然起敬。1951 年 5 月 7 日他在中南海春耦齋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說：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新民主主義階段將是很長的，大概在 15 年到 20 年之間。

二、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三、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將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之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然後建立和發展重工業。只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積累資金，然後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

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採取

社會主義步驟。實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要觸動私有制。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並對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制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注1）

劉少奇的思想是一貫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中就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

我們今天總結出來的建設國家的主要經驗就是回到新民主主義，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的解釋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還在社會主義這個台階的底層，所以叫初級階段。基本經驗有四條：一、只要不發生戰爭，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所有制共存；三、把資本家請回來，發展市場經濟，憲法和法律保護私有制；四、下大力量改善人民生活，調節分配，解決兩極分化問題。

原以為是，我們經過60年，摔了無數個跟頭，找到了建設國家的法寶，其實早在60年前，劉少奇就告訴全黨了。我們是揣著指北針找方向。如今還要假裝天真騙後代，說找到這些經驗像唐僧取經一樣，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能說毛澤東一個人迷失了方向，全黨就都找不到北了；毛澤東一個人感冒，全黨就都在發燒；毛澤東一個人發昏，全黨就都在犯傻。不能用矮化全黨的寫法去成全毛澤東之高。中共黨內有高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德懷、鄧子恢、張聞天等，就都是高人，把這些高人的事跡寫出來，就是我們黨的主流和本質，就是我們黨閃光的亮點。難道這些不能在“生日集會”

劉少奇在和毛澤東關於是否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爭論中，表現出清醒、堅定和遠見卓識。



上說道說道嗎！

毛是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代表

新史記：照您的說法，毛澤東實際上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辛：是這樣的。毛推行的是一條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他是這條錯誤路線的代表。建設時期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路線的勝利，是對新民主主義路線的繼承和發展。採用股份制的形式保留資本主義企業和重建個人所有制，在分配上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恩格斯晚年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成果。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屬晚期馬克思主義。這樣概括這段歷史就全順了。

1981年討論歷史決議時，那時還是跪著造反，鄧小平不敢給毛澤東作路線錯誤的結論，不上路線錯誤的綱。胡喬木有句名

言：“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犯了錯誤還接著“偉大”！不講路線了，總還有個是非吧？1991年建黨70週年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注2）。用這個代替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這兩種趨向的鬥爭從建國初期就開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正確趨向以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錯誤趨向以毛澤東為代表。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榮。

由於長期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說成是黨的各個時期的天然的正确路線的代表。一切功勞都歸於他，一切錯誤都是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造成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是這種思維邏輯的代表。不從這個框框中跳出來，建國後前30年歷史寫不好。毛澤東惹禍，共產黨擔責，這種關係應該改變。黨史二卷如果改變一下思路，以劉少奇、周恩來為正確趨向的代表，以受迫害的122名八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及追隨他們的群眾為正確趨向的支持者（注3）；以毛澤東為錯誤趨向的代表，以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及受蒙蔽的群眾為支持者，真實地寫出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那就是一部充滿了歷史教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

當然，劉少奇、周恩來以下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經過爭論和鬥爭，沒有戰勝毛澤東，後來又檢討，向毛澤東屈服，執行毛的一套，跟毛一起犯錯誤。但他們每個人又都有抵制和反對毛澤東胡作非為的亮點，撥亂反正就是要把這些亮點發掘出來，沒有反毛的亮點，他們不可能被打倒半打

毛澤東當中共一把手時有集體領導嗎？



毛澤東的遺產

倒，不能把他們寫成沒有靈魂的一直跟著毛澤東犯錯誤的糊塗的一群。用矮化全黨的辦法突出毛澤東之高是不可取的。

有毛那個1，全黨多個0才放大錯誤

新史記：毛澤東在那麼長時間內推行的錯誤路線，黨為何一直糾正不了？

辛：黨史二卷強調黨的集體領導，錯誤大家有份，不追究毛澤東個人的責任。但是，毛澤東當一把手時，有集體領導嗎？他尊重多數的意見嗎？常委議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跟他意見不一致，每次都得遷就他的錯誤意見，不遷就不行。廬山會議他要把彭德懷打成“反黨分子”，周恩來、朱德不同意，他說，他要找紅軍去，拿分裂來要挾。朱總發言為彭說情，說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幾十年，不要就此分手。毛把腳抬過茶几，用手去抓他的布鞋，諷刺朱德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停止了發言。毛是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流氓政治家，一切錯誤的、荒唐的、倒行逆施的意見，

大家都得通過。所以，不能用中央通過的事為他解脫。

毛澤東建國後的主要錯誤是：

一、一個人推翻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形成的實行 15-20 年新民主主義的建國路線，強行停止新民主主義建國進程，1953 年開始了“三大改造”，動搖和消滅私有制。

二、一個人推翻了中共八大務實的經濟建設路線，把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強加於全黨，1958 年強制推行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造成經濟大破壞，餓死 37,558,000 人。

三、一個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1957 年策劃陰謀，先是動員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黨整風，向黨提意見，“言者無罪”，後又以言定罪，將 55 萬愛國知識分子打成“右派”，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四、一個人發起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以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消滅和打擊黨內民主派，改變民主共和國的性質，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五、一個人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國務活動達十年之久，操縱紅衛兵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以私刑將其關押迫害致死；將共和國元帥彭德懷、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關押迫害致死。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注 4）

毛澤東這五條嚴重錯誤，別人是無法替他分擔的。“文革”中的宣傳口徑：錯在全黨，只有領袖是完人，那當然不行；黨史二卷的寫法：錯在全黨，領袖跟著有點錯，這也不行。如果錯誤是 100,000,000（1 億），毛澤東是前面那個“1”，全黨是後面那八個“0”。毫無疑問，每個“0”都加重放大了錯誤，但都是因為有那個“1”，而加重放大的；沒有那個“1”，就沒有全黨的錯誤。

編寫組張啟華講中央要他們寫出“光明面”來，黨的主流一定是好的，光明的。我們都看過《長征》的電視連續劇。《長征》寫的是失敗，寫的是大潰退、大轉移，但是，沒人說這“沒有寫黨的光明面”——這是把博古、李德的錯誤當作歷史背景來寫，主要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跟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最危難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寫建國後這段歷史，要把毛澤東置於博古、李德那樣的地位來寫，你繼續把毛澤東當成正面人物來寫，就畫虎不成，怎麼寫都不真實。他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錯誤餓死了幾千萬人，使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你非要把他寫成領導黨和人民走出困境的偉大領袖，不說假話就辦不成這樣的“大事”。

劉少奇、周恩來才代表主流，代表光明面，代表八大的正確路線。必須站在八大的正確立場上，站在八屆中央委員會多數一邊，站在八屆中央政治局多數一邊，站在八屆政治局常委多數一邊。如果不能擺脫毛澤東的奴僕家臣的立場，就會出現，一旦發現毛澤東錯了，就惶惶如也，找不到黨的光明面了。黑暗的對面就是光明。抵制和反對毛澤東的那個多數，受打擊受迫害的那個多數，就是黨的光明面。劉少奇就是光明面，周恩來就是光明面，彭德懷就是光明面，鄧子恢就是光明面。即如田家英，竹焚不改節，玉碎不改白，堅持不做助紂為虐的事情，也是黨的光明面。這些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為什麼只能以受侮辱、受損害者的身份充當歷史的陪襯，不能成為中共歷史上光明面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他們的事跡搬上舞台和銀幕，我們的電視劇就有了寫不完的共產黨人的正面形象和用不盡的道德資源，不必靠重拍《小兵張嘎》和《地道戰》忽悠觀眾了。

承認餓死一千萬人，是否歷史進步？

新史記：那麼，黨史二卷在哪些方面比過去有進步呢？例如，外電評論，終於承認了餓死 1000 萬人，是不是歷史進步？

辛：關於大躍進中餓死人的事情，是測量《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實事求是程度的一個標尺。該書說大躍進餓死了 1000 萬人，比起毛時代發表社論說是“沒餓死人”，當然是個進步——我說的是 1960 年“十一”國慶節《人民日報》社論，有這樣的文句：“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承認餓死 1000 萬人，就否定了那篇社論。

“餓死 1000 萬人”說法的來歷是 1982 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 年，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除了公佈 1982 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佈了 1953 年和 1964 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佈數字中，1960 年人口總數比 1959 年減少整整 1000 萬人（1959 年 67,207 萬人，1960 年為 66,207 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 年由鄧小平題寫書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369 頁，已經把這個數字在黨史文獻上公佈了，並明確註明是 1960 年一年餓死人的數字。如今拿那一年的數字當作四年的數字，用以偏概全的辦法打馬虎眼，說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比起 1883 年，不僅沒有進步，還退步了。主編說，餓死 1000 萬人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據。毛派領軍人物、前統計局長李成瑞公開發表的文章是，餓死了 2200 萬人（注 5）。前國家統計局長都否定的統計局數據，黨史專著拿出來忽悠人，還有什麼“權威”可言？

大躍進中在四川任職並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和候補中委于克書，1962 年 6 月份到北京參加共青團三中全會。于克書給中央寫過匿名信，反映四川餓死人的嚴重問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通過胡耀邦把廖、于找去，瞭解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據記者採訪廖伯康發表的追憶文章說：



毛澤東的遺產

入座以後，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

楊尚昆有個“摺疊式本子”，是中央餓死人的底帳。

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 400 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 800 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 1000 萬。”

“1000 萬？你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

廖伯康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的註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1000萬。這只是從文件上算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二百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榮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去就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榮經縣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志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個摺疊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注6）

這個“摺疊式本子”就是中央餓死人的底帳。現在就是要追查這個“摺疊式本子”的下落。據主編說，沒讓編寫人員查閱餓死人的歷史檔案，表白編寫人員的苦衷。由此，讀者可以知道，黨史二卷離歷史真相、離真正的實事求是，還有多遠！在此，我忠告某些領導人，餓死人的事情你們沒有歷史欠賬，如果你們把餓死人

希望習近平領導中共走向中興。



的檔案銷毀了，你們的錯誤可就大了，就把自己粘在這個歷史恥辱柱上了。

希望中國走出毛澤東的陰影

新史記：在您看來，在評毛的問題上，黨史二卷並沒有尺寸推進？

辛：比起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確實沒有推進，沒有突破。編著者聲言就是要在這個框框裏寫歷史。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的講話主要精神是要突破這個框框——這不能責難編著者，不執行鄧小平指示，是上頭的責任。

新史記：您認為，中國如何才能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呢？

辛：希望習近平在關鍵時刻會有勇氣有辦法解決中國的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問題，領導中共走向中興，領導國家走向民主共和。習近平和十八大寄託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巨大期望。

薄熙來這位紅色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須要

參與非毛化的進程。老一代革命家對毛的認識已漸趨一致。年輕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澤東影響的迴光返照提高自己，從根本上就錯了。

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論上、在傳統上，若能完成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切割，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撥亂反正。走了這一步，中共就能夠甩掉歷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脫胎換骨地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民主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擔負起新的歷史使命。（《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

注釋：

1,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上卷，香港書作坊 2009 年第 5 版第 22-23 頁。

2,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第 504 頁。

3, 根據 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生開列給江青的打倒和半打倒的八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名單，除劉少奇外是 122 人，他們是：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陳毅、彭德懷、賀龍、李先念、譚震林、李井泉、陶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薄一波、宋任窮、王稼祥、羅瑞卿、劉寧一、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王任重、蕭勁光、粟裕、蕭克、陳少敏、王震、曾山、歐陽欽、王樹聲、王恩茂、鄧華、鄧子恢、譚政、劉曉、李維漢、楊秀峰、張際春、程子華、伍修權、錢瑛、王從吾、馬明芳、李葆華、許光達、林鐵、鄭維山、徐海東、蕭華、胡耀邦、習仲勳、安子文、呂正操、張經武、廖承志、葉飛、楊獻珍、張鼎丞、舒同、潘自立、楊勇、黃火青、

陳漫遠、蘇振華、馮白駒、范文瀾、李堅真、高克林、鍾期光、江華、李志民、楊成武、章漢夫、帥孟奇、劉仁、萬毅、周揚、徐子榮、劉瀾波、奎璧、區夢覺、朱德海、張啟龍、馬文瑞、王世泰、廖漢生、洪學智、章蘊、徐冰、廖魯言、宋時輪、周桓、陳丕顯、趙建民、錢俊瑞、蔣南翔、韓光、李昌、王鶴壽、陳正人、趙毅敏、孔原、張蘇、楊一辰、趙伯平、張愛萍、姚依林、汪鋒、方毅、王尚榮、劉震、張勁夫、李頤伯、廖志高、江渭清、譚啟龍、張仲良、張平化。

4, 日本《讀賣新聞》曾報道，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下令全國 29 省市，計算出一個“正式”統計數字：由 1966 年開始到 1976 年 10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者有 2000 萬人，殃及 1 億人。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葉劍英副主席在講話中公佈了這一數字。見董寶訓、丁龍嘉著《沈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第 1 頁。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 2 版。

5, 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 年 2 月號第 14 頁。

6, 記者採訪廖伯康文章：《我向中央講實話》。接受採訪時廖伯康任四川省政協主席。《文摘週報》，2005 年 12 月 30 日出版。

共產主義理想付諸實踐 就一定天下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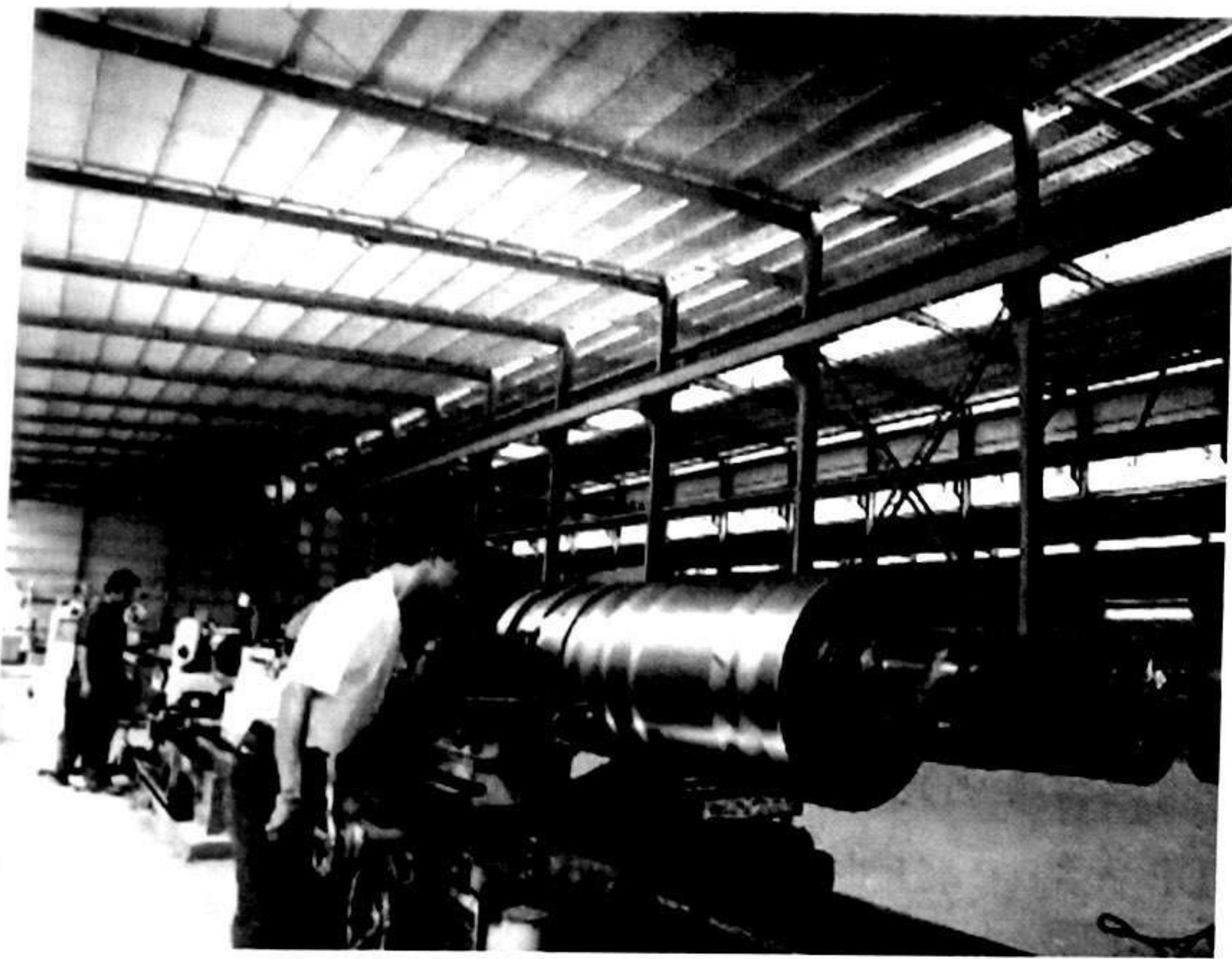
今天是老同志座談會，我們年齡相近，都在七十以上，都是老幹部，老黨員，“老員外”，對國事仍然很關心。京戲裡面經常出現的一個角色是“員外”，所謂“員外”就是定員以外的人員，不在編，但還拿朝廷的俸祿，就是告老還家的官員。我們就都是“老員外”。頭上沒有烏紗帽，不求陞遷了，可以講真話，講心裡話，不需要跟風，不戴假面具講話。現在科技發展了，到處有攝像頭，有監聽設備，我們吃飯的這個地方，可能也有。但我們不怕。我希望我們的一些意見，一些見解，傳到中央去。我們對時政的一些評論，實際上是給中央當“編外參謀”，劉帥晚年就經常說給中央當“編外參謀”。我們出於善意，出於好心，該說的要說，聽不聽在他們，

在當權的領導人。大家希望聽我講講形勢和前途。我就講講我的觀察和理解。分八個問題來講。有些問題可能和大家想的一樣，有些問題可能不同，大家可以補充糾正。

一、我們的經濟形勢很好

說形勢好，主要是我們經濟發展起來了。中國 2010 年 GDP 總量是 397983 億元，約合 6.04 萬億美元。按國際匯率計算的 GDP 已經超過日本名列第二，相當於美國的 39.3%。中國 2010 年人均 GDP 大約在 4283 美元，排名全球第 95 位，2009 年是第 106 位。

這是個宏觀的概念。我們再看一個單項指標：鋼鐵生產。這是個具體的概念。1958 年大躍進時我們想鋼都想瘋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 1957 年鋼產量是 2000 萬噸，中國是 535 萬噸。1958 年他下命令鋼產量翻一番，達到 1070 萬噸。命令 9000 萬人“土法煉鋼”，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不算，還賠了（貼補）40 億人民幣，佔 1958 年財政支出的 1/10，年終發表公報，說勝利完成了 1070 萬噸。實際上包括 400 萬噸無法利用的鐵垃圾，上演了一出勞民傷財的大鬧劇。而真正在鋼鐵產量上實現超英趕美，是在改革開放後的 2006 年，那一年的鋼產量，不僅超過了英國，超過了美國，而且超過了他們兩家的總和。2006 年中國鋼產量 41750 萬噸（四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包括英國的歐盟 25 國鋼產量是 19890 萬噸（一億九千八百九十萬噸），包括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鋼產量 13350 萬噸（一億三千三百五十萬噸）。英國加美國，歐盟加北美，總共產鋼 33240 萬噸（三億三千二百四十萬噸）。中國一國的鋼產量，超過了英美加上



中國現在鋼產量超過歐盟加北美二十八國的總產量。

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 28 個國家。這要在毛時代得樂瘋了，尾巴要翹到天上去。毛澤東那時就想趕超英國，再進一步趕超美國，他老人家那個思想解放的程度，沒敢想過鋼產量超過整個歐洲 25 個國家，更沒想過超過歐洲還加上北美三國。

應該承認，30 年來我們的經濟成就確實很大，很了不起。但這個成績怎麼來的？我們得搞清楚，得保持清醒頭腦。說到這裡，我們和主旋律、和領導人的講話就不一致了。他們說，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是黨的英明領導的結果。我說，不對，這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走了修正主義道路，或者乾脆說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黨的英明領導，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而是放棄了社會主義，放棄了人民公社制度，放棄了計劃經濟，放棄了一大二公，放棄了消滅私有制的國策。鄧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這“放棄”二字上。這個轉軌是非常艱難的，是靠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掌舵，才轉過來的。反對聲音大得很，他說不爭論，硬是壓下去了。但是從策略上考慮，也不要刺激毛派，一開始還舉毛的旗幟，叫做“準確的、完整的掌握毛澤東



毛澤東時代全民大煉鋼鐵最多也就 1070 萬噸。

思想”，逐漸淡化，提出新的理論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在社會性質的認定上，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旗幟不丟，和過去保持一點連續性。

二、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經濟才能發展起來

當需要走出空想社會主義誤區實行新資本主義政策的時候，要像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那樣，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於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資本主義）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打左燈，向右拐”，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越往後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毛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如此怎樣凝聚民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呢？！許多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扭曲成偷偷摸摸的事情。私有制不叫私有制，叫非公有制；資本家不叫資本家，叫社會主義建設者；

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不叫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叫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2003 年年輕創業者陸煜章創辦“上海資本家競爭顧問有限公司”，因為違背了“能做不能說”的潛規則，把“資本家”三個字上了企業名稱，註冊時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駁回。陸煜章不服，向徐匯區人民法院狀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員拿著《辭海》對簿公堂，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家是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與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相悖。”當時，上海的資本家起碼有幾十萬。工商局官員可以和張總、李總在大飯店裡喝酒，沒感到有什麼“相悖”，一扭臉到了莊嚴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認中國有資本家。法院一審判決工商局勝訴。這個惶遽、尷尬的鏡頭是我們整個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個縮影。

在承認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按照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組織社會生產問題上，中央領導人說七分或八分，剩下的二三分要靠下面去理解闡發，靠中宣部、社科院和主流媒體去解說，讓大家接受現實，擁護轉變，在新的理論的基礎上統一思想。令人遺憾的是，中央說七八分，他們只說五六分，總比中央還左一點，還保守一點。中央領導人一些解放思想的話，他們還給過濾一下，給屏蔽掉，不讓群眾知道。他們宣傳正統的馬列，對私有制，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起一個否定、反對的作用。在我們黨的統一領導下面，自己的經濟基礎對抗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上層建築否定自己的經濟基礎，左手跟右手打架，左腳絆著自己的右腳。改革開放 30 年，爭論了 30 年姓資姓社。人民群眾對國家的現狀，對國家的前途，長期形不成統一的認識。群眾越來越分裂，思想越來越混亂。毛派見你理不直氣不壯，就抓住理了，說你復辟了資本主義，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你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GDP 發展到多少，也不是成績，是負數，是罪過。



馬克思和恩格斯。



俄羅斯都不要列寧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領導的，是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這個詞是毛澤東發明的。早在 1941 年，毛澤東就有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的概念。他說：“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完備形態，理所當然地包括更多的資本主義。我們要套用毛澤東的話坦然告訴毛派：“現在我們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蘇式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要區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不要一提資本主義就腰杆子不硬，新資本主義是個富民興邦的好東西，是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脫離蘇聯模式，創立新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主義也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因為兩者的經濟基礎是相同的。把這層窗戶紙捅破，就奪取了宣傳工作的完全的主動權。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毛派就沒什麼好攻的了，有利於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

心明力定，共創美好的未來。

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這樣一種實踐。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說：“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而社會主義的恐懼也迫使資本主義增加平等，東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東方，不久，兩者就要碰頭。”

歷史正在這樣發展。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三、記住恩格斯說的 93 個字

大家都是中高級幹部，在位的時候學了一輩子馬列，對改革開放的事情，腦子裡也有很多疑問。例如我們是不是背離了馬列主義，是不是搞了修正主義，改革開放這一套到底對不對？因此我想提綱挈領地談談馬列主義這個思想體系，那些東西過時了，那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

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得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 1883 年去世。到了 1886 年，恩格斯宣佈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

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 93 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 93 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你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你就更要記牢這 93 個字，因為這 93 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

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一轉變。1890 年 3 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一個“青年派”，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一”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有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

“哈哈大笑中毀滅掉。”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

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幟。

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制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制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編者），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樣，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一定壞事，一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明年十八大，我估計會修改這一條。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一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558000人。

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四、列寧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

下面說說列寧和列寧主義。“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這句話，老同志都耳熟能詳。對於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充滿了崇敬，把蘇聯看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榜樣。蘇聯解體後，歷史檔案公開了，今天我們才知道了十

月革命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場革命。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在德國威廉皇帝的支持下發動的一場政變。1917年3月（俄曆2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爾什維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武裝“奪權”，向立憲會議奪權，是一場武裝政變。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回憶說：“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

列寧到了歐洲，沒有在第二國際那些著名活動家中找到朋友。他與德國皇帝的情報人員建立了關係。列寧走到這一步，是有思想基礎的。他哥哥是個民粹派。民粹派認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從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我引用下面這些材料，不是要貶低列寧的人格。不能把列寧當做一個普通間諜看待。他不是一個小特務，而是一個大策略家。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

列寧真的和魔鬼結盟了。

2007年底，德國《明鏡週刊》第50期，以列寧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檔和十月革命旗幟為刊頭圖，以11頁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該期的標題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aet），封面副題則是《被收買的革命》，並附贈有關的錄像光盤。

200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90週年。過去都以為共產主義革命跟馬克思恩格斯兩位革命導師有關係，現在才知道，還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國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沒有他出錢出槍，擴大革命喉舌《真理報》的發行人，列寧的武裝政變絕無成功的可能。

《明鏡週刊》組織了六位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歷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關係，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製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說，列寧想要顛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則要取得在東線的勝利。解密的檔案證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合作的規模。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 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關係。《明鏡週刊》發掘了歐洲多國的檔案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安全機關檔案，普魯士警察機關的文獻，德國外交部和俄國檔案中的備忘錄，以及瑞士銀行的流水帳單。還有當時駐節俄國的歐洲外交人員留下的日記和筆錄材料。這些密檔和歷史文獻證據確鑿，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列寧與德國政府之間的真實關係。

“列寧間諜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於證據不足未成立。1917年7月4日，曾與列寧一起在國外工作的社會革命黨人班克拉托夫在媒體上指責列寧與德國“達成某種秘密協議”，並宣稱列寧、加米涅夫、科茲洛夫斯基都是“德國派往俄國的間諜”。臨時政府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打擊列寧。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軍准尉伊爾莫列科“自首”後交代的材料。伊爾莫列科宣稱，他是受德軍總參謀部直接指派負責與布爾什維克關係的。伊爾

莫列科還公開指責列寧是一名德國間諜，他曾奉命與列寧進行過接觸。1917年7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於赫爾方特 Helphand 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推出的證人俄軍准尉伊爾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蘭公佈了一系列材料證明伊爾莫列科准尉的證詞沒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嚴謹高效著稱的德國總參謀部是不會找一個隨時可能叛變的准尉來與他這樣的人物聯系的。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1日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並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1914年11月1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3號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戰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反戰宣言，在列寧起草的這篇宣言中提出了“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並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列寧是靠這個重要表態贏得德皇的青睞的，這是他們合作的政治基礎。

在列寧鼓動軍隊反戰，農民要求土地的時候，德國情報機構從各國發回的密電都報告說，列寧正在按計劃進行。布爾什維克奪權、列寧上台以後，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割讓給德方。按照和約的內容，這些土地是永久割讓的。只是後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在一戰後期全線崩潰，德國成為戰敗國，俄國意外地重新收回了這些土地。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

（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餘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週刊》公佈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五、列寧繼承和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

列寧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超一流的陰謀家。他野心極其廣大，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他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利用。馬克思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他進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窮人發動組織起來，奪取政權，打倒和剝奪富人。這件事情歷史上沒人做過，俄國的彼得大帝，法國的拿破侖，德國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強之間爭雄，這在列寧看來是“小兒科”，他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這就是列寧的世界觀和使命觀。瞭解這一點才能瞭解列寧這個“超人”。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繼承列寧的衣鉢，要當世界革命領袖。

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同時發生。列寧於1911年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提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該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

普列漢諾夫說：

“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及鐵路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革命，由紡織業帶頭的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工場轉變為現代大工業，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確立的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必定要引起生產關係和整個上層建築的變革。資本主義是先有經濟基礎，然後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推倒封建統治，建立保護這種經濟基礎的政治制度。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下進行的，先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再運用這個政權去創造經濟基礎。不是經濟基礎有了變革上層建築的要求，是上層建築要找個經濟基礎立足。列寧要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他手裡有什麼呢？沒有新的技術革命的支撐，沒有新的“文明”，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有的僅僅是劫富濟貧的義憤和實現改朝換代的革命暴力，這就注定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有些國家可以奪取政權，可以實現改朝換代，也可以在改朝換代後做出一些輝煌的業績（如蘇聯參加世界民主陣營，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貢獻），但不可能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

根據唯物史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之上的。建造房屋總是從打地基開始，一層一層地往上蓋的，如

果顛倒這個順序，先從屋頂蓋起，一層一層往下蓋，這房子肯定建不成，要塌下來。這就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革命是有條件的，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要有物質基礎的。當十月革命以前，列寧還堅持唯物史觀的時候，對俄國發展前途的指引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

“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經過其它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堅定不移地排斥這類夢囈之談的。……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

把政權拿到手，列寧背棄了自己的正確的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簡化為窮人造反，不要物質基礎，一個社會只要有窮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階級矛盾，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就是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曲解，大合了毛澤東的心意。這和毛澤東的農民造反的理論對上口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挑起階級矛盾可以製造一場革命，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農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不是改變生產方式的社會革命。

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吵翻。兩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抓住《共產黨宣言》不放，普列漢諾夫抓住《〈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不放。當然，普列漢諾夫是正確的，恩格斯生前他見過恩格斯，可以說，他是代表恩格斯對十月革命做出

的。我們今天否定列寧主義，不是因為列寧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馬克，不是個道德品質的標準，是因為他的理論確實錯了。僥幸的勝利是不能成為歷史普遍規律的。

在當時，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闡釋者。他說的和馬克思、恩格斯不一樣了，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個新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確立起來：在亞洲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先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建立起來，再發展生產力，趕超經濟發達的國家。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走的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大躍進中又有“窮過渡”的指導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產力論”等，都是列寧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反映。

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列寧說：能。列寧主義的基礎就是這個“能”字。過去認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現在應該說這是他的主要錯誤。毛澤東學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列寧版的。我們說中國要從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是要從列寧版的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

俄國十月革命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第二國際之外，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出現了兩條。一條是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蘇聯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兩條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一個世紀人類的選擇，當蘇聯版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由於固有的理論闕失以及在傳播中扭曲變形，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造成國家權力異化，專制獨裁，官員腐敗，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徹底失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十月革命的燈塔熄滅，主流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消退之後，原是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支流的歐洲民

主社會主義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走上了歷史的前台。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條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經典文獻，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理想，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市民社會。他們憑藉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和福利保障制度這四大法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接，在西歐和北歐建設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六、馬克思主義碩果僅存的遺產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 2003 年 9 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 1500 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 1:10），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 1000 至 1200 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 1800 至 2000 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達 8000 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²¹

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佔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這裡有一個故事：羅馬尼亞總統伊利埃斯庫 2003 年 8 月訪華時接受《環球》雜誌專訪，談到羅馬尼亞與西歐的差距時講了一個“痛苦的事實”：“在羅馬尼亞當總統不如在德國當失業者，因為一個德國失業者每月的救濟金是 2300 馬克，羅馬尼亞總統每月的工資是 1250 馬克。”德國能給失業工人發放高於羅馬尼亞總統工資的救濟金，是因為，沒有按《共產黨宣言》的辦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為工人階級在失業的情況下也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新的含義和新的道路。

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我們一直有一個自以為是的偏見：說是消滅私有制，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又如何呢？從 1957 年到 1978 年，我國在消滅了私有制以後的二十年間，全民所有制企業由於制度性的經營不善，連年虧損，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 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 1957 年的 582 元下降到 1978 年的 549 元。日本是被我們視為“制度落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剝奪資產階級，保留了私有制。從 1955 年到 1973 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九倍。結果，剩餘價值率從 1955 年的 314% 提高到 1970 年的 443%，是一個勞資雙贏的結局。所以，目前的工人貧困化的問題，不能折騰回去，用消滅私有制的辦法解決，要用政府二次分配和工人持股的辦法解決。

我們這個國家政權，說是代表絕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實際上

情況發生了變化。前些日子，我跟兩報一刊辯論過這個問題。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 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 500 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 5000 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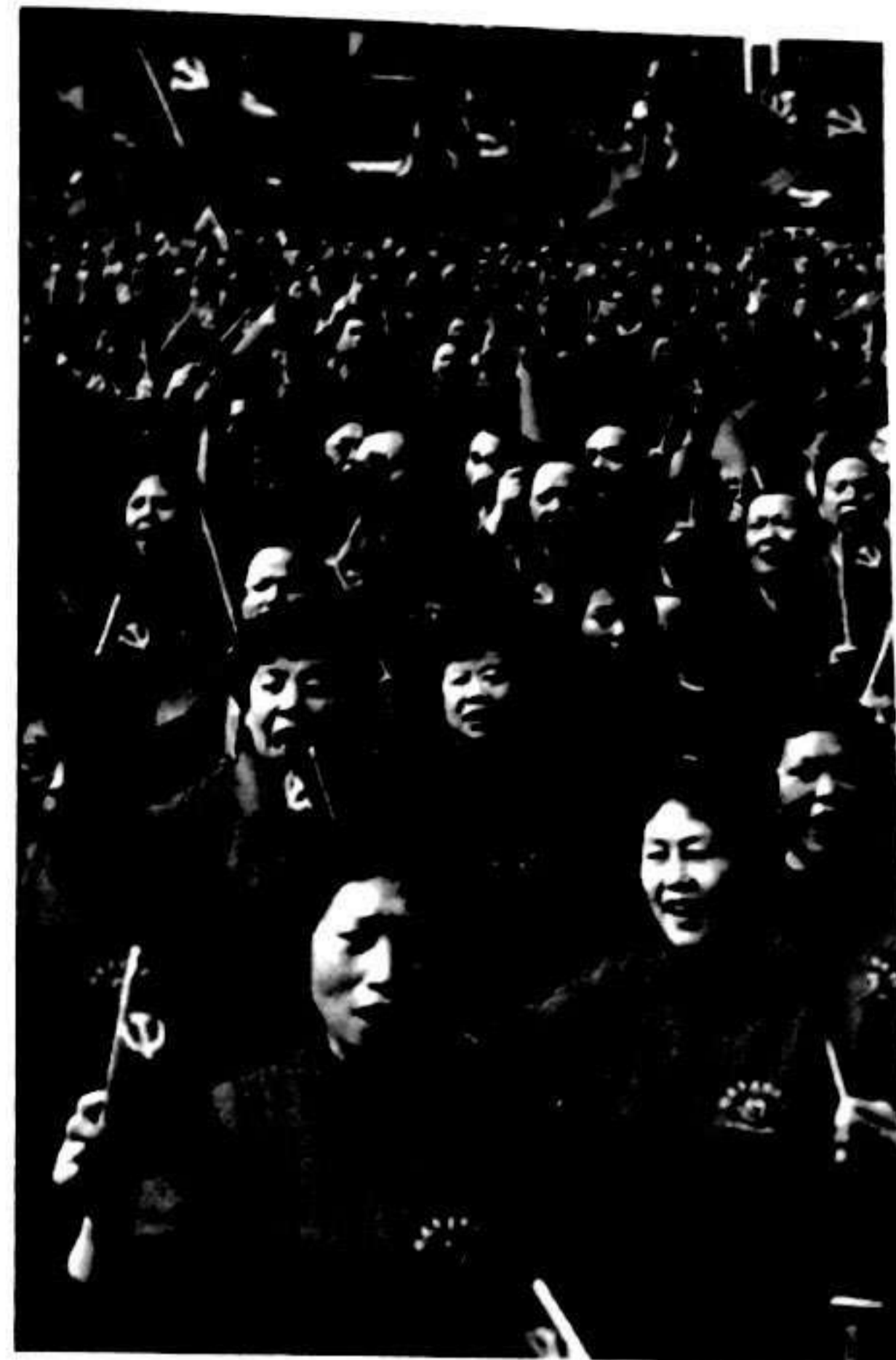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談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

在高幹子弟中出了 2932 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 6.7 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 2.5 億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300 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 萬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 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2000 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 年蔣宋美齡生前以 280 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穀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 1000 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 7000 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 3.5 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

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

共產黨要想保住政權，保持執政地位，就要繼續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要有決心、有勇氣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黨內鬥爭的手段，用和平轉型的手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的問題。



重慶唱紅只是一種借助。

七、“唱讀講傳”會不會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

現在權貴資產階級確實就在共產黨內。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現在搞正是時機。所以，毛澤東的幽靈回來了。我認為這件事情有積極意義。對權貴資產階級是個震撼。我在陽光衛視談政治體制改革，曾提出用高額累進稅的辦法，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他們的問題。稅率是 80%。你貪污受賄和其它非法收入一個億，交出 8000 萬來。給你留 2000 萬，你還是個富翁，免去一切處分。你不接受這個辦法，就等著沒收全部非法財產，戴高帽子游街，進秦城監獄吧。

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活動，簡稱“唱讀講傳”，是否真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會

是薄熙來他們領導。他們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把毛澤東當作鍾馗了。想借毛澤東這面大旗，增加他們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澤東當門神，保護他們的財產。但他們進錯了廟，請錯了神。毛在世時，對劉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們打倒，關起來，如今，毛的徒子徒孫、文革的遺老遺少會擁戴劉、薄等人的兒子接班嗎？這可是世仇。文革這把火一點起來，先燒高幹子弟，因為當年被打入地獄的造反派們知道，是誰斷了他們的前程，把他們打入地獄的。至於把老毛當門神爺用，更是想入非非。老造反派們，“四人幫”的戰友們，現在缺的就是一面合法的能打得出去的旗幟，合法的“紅衛兵”、“戰鬥隊”的組織形式，你把這兩件“法器”發給他們，拿來對付誰就由不得你了。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還是原來的高幹子弟，現在的高幹們。老實講，我們這些“員外”不怕文化大革命。一個單元，幾件電器，你怕什麼呀。你老為國家擔憂，他們認為你怕，老拿這個嚇唬你。你就讓他們試試。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又是薄熙來第一個出來滅火。毛澤東主義共產黨要推舉薄熙來當總書記，說重慶是延安，去年要到重慶開第十一次黨代大會，三十多人打前站，去搞籌備工作，到了重慶，就被薄熙來抓起來了。“唱讀講傳”，是小玩鬧，嘩眾取寵，不要當真，也成不了氣候。

國家的最終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會主義。現在，內外壓力還不夠，當權的人覺得還能維持下去，一旦出現突尼斯、埃及那樣的形勢，就把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打出來了，答應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現在，最關鍵的是火候和時機的選擇，當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寧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幾千億、上萬億的收入。他有這個算計，所以就儘量拖著。但晚了，就是丟江山的問題了，就由不得共產黨了。一旦民眾起來，你執政黨就不再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

的對象了。像突尼斯總統本－阿里，群眾一起來，什麼改革條件都答應了，但群眾不幹了，這時候的條件是叫你走人。所以，我老是提醒當局，寧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八、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班子，剩下不到兩年的任期了。只求平安交班，平安下車，不會有大的作為了。輿論空前收緊也是怕出事，保平安。順著中央的思路，我對錦濤同志有兩點諫言：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有了溫家寶，才有胡溫新政。汶川地震以後，溫家寶深得民心。取消農業稅，遏止國進民退的勢頭，在財政支出上較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的三大亮點。去年8月以來，溫家寶七談政治體制改革，胡錦濤沒有給以支持，這是很大的失著。但千萬不要和權貴集團聯手整溫家寶。最近，一個中宣部副部長，敢說溫家寶是“麻煩製造者”，這是個整人的信號。整溫家寶，作為一把手的胡錦濤，你不是後台也是後台。民眾會把你當做權貴資產階級的代表，逼出一個挺溫反胡的高潮來。現在，金融危機日深，穩定物價，改善民生，必須要有一個能掌控局面的總理，你才能平安著陸。毛澤東晚年整周恩來，黨心民心都離開了他，逼出個“四五運動”來，差一點翻車不得善終。這個教訓要記取。

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關係全面緊張，和美國也嚴重對立，是由於兩韓平安艦糾紛引起的，後來，朝鮮又向韓國延坪島開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無原則偏袒北韓。奧巴馬總統就來了電話，說你們中國是否管得住北韓，如果管不住，你胡錦濤主席就不要來訪問了。我們趕緊表示：管得住，管得住。果然，去年12月中旬，南韓把軍艦開到黃海敏感的海域，朝著延

◎ 六次中朝戰爭的實況 ◎ 朝鮮局勢的內情 ◎ 金日成與金正日的關係

環球人物

金正日
核謎局

羅京一路走好
德國對華人公道何在

11月11日
第11期



金正日想擺脫中國。

顧全大局，不露聲色，沒提抗議，沒把桌子掀翻，保全了我們的面子。回來我們還津津樂道，好像外交上取得了多大勝利似的。搞這些小動作能成大事嗎！真不知道智囊團是怎麼設計的，出這麼個餿點子。美國人至今氣憤難平。那四百多億的友好費就算白花了。

在兩韓問題上，我勸中央別再介入了，越陷越深。最近，看到消息，我們往朝鮮派部隊了。準備在朝鮮發生內亂時，為金氏父子保駕護航。我不知道錦濤同志根據什麼說朝鮮政治上正確。起碼金氏父子有五大錯誤：

第一個大錯誤是金日成殺了以金科奉為首的延安派；

第二個大錯誤是他殺了為他打天下的方虎山和一大批從中國回去的鮮族將領和軍官。朝戰前夕，毛澤東答應金日成的要求，決定從解放軍中抽調朝鮮人及朝鮮族官兵組成的 156、164、166 三個師另兩個朝鮮團，編入朝鮮人民軍。當年先後共為北朝鮮提供兵力約 6.9 萬人，佔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的一半，

坪島方向打了一百多發炮彈，朝鮮說不值得搭理，沒有還擊。這才有今年 1 月胡主席高規格出訪美國。胡主席是帶著 400 多億美元的採購團去的，這個見面禮不薄。在最高級別的國宴上，中國鋼琴家郎朗演奏了《我的祖國》，就是郭蘭英唱的那首《一條大河波浪寬》，那是抗美援朝的經典影片《英雄兒女》主題歌。演奏完了，胡主席和郎朗擁抱，表示嘉許。美國人

成為人民軍的主力。方虎山原來是四野 166 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入朝後，出任人民軍第 6 師師長、第 5 軍團軍團長，是南下作戰的主力部隊。因作戰有功，方虎山兩次被授予一級國旗勳章。1959 年被殺害。

第三個大錯誤 1966 年砸了志願軍烈士陵園，連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了。

第四個大錯誤是 2009 年 8 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訪朝時，金正日表示：“朝鮮之所以退出六方會談，旨在擺脫北京的羈絆而已，並非針對美國。希望直接與美國會談，雙方建立對話關係；一旦美國改變對朝鮮的政策，平壤將隨時調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國對朝鮮施以援手，朝鮮將成為對抗中國的最堅強堡壘。”金正日的副手則說：“我們的核導彈打不到美國，卻可以往西邊打，我們在西邊的國土也需要保護。”西邊就是中國東北地區。

第五個大錯誤是父傳子，家天下，如今已是第三代。馬克思主義那一條寫了搞封建世襲家天下還“一貫正確”。

朝鮮問題到了自己解決的前夜。金正日偏癱，金正雲正在動手殺高級幹部，為自己掌權掃清障礙。一旦發生內亂，韓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統一的機會。中國要出兵幫助金正雲，美國就要出兵幫助李明博，最後演變成為中美之戰。我們一定不要被拉下水，一定要避免在朝鮮第二次跟美國作戰。青年將領激昂慷慨可以理解，為將者必須是鷹派，國家有事不能當縮頭烏龜。但統帥部不能被將領的請纓所左右，決策要冷靜。誰也負不起這個歷史責任。

（辛子陵，原題為《形勢和前途》，2011 年 2 月 10 日）

我也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

茅于軾寫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我也寫一篇，PK 一下吧。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面的命題，因為毛澤東所居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為毛澤東究竟是神還是魔爭論不休。

所以，在討論“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這個話題之前，有必要就“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討論一番。我認為，最要緊的一點，是在討論中一定要講邏輯。

一是不能因人廢言，要避開對歷史人物個人品質的討論，而重點看他提出的思想，堅持的路線，你不能說因為牛頓愛財，萬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說因為居裏夫人是蕩婦，鐳這種元素就

不存在了。而現在一些人要批駁馬克思列寧主義，連一頁書都不願意看，就去說馬克思有私生子，列寧有梅毒，照此邏輯，因為伏爾泰是被包養的二爺，自由就是錯的；盧梭是扔了五個孩子，民主就是錯的；華盛頓家裏養了一堆奴隸，獨立就是錯的。這就是不講邏輯了。

二是要講因果聯繫，而不能單就個別歷史事件得出“後此謬誤”。因為人文社科領域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可能做到單一變量實驗，影響歷史進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就是把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混為一談了，試想，決定因素居然不計其數，你又如何單純從實踐中分析各個因素的權重？最後的結果，一定只能誇大或者縮小某一個因素的影響，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

三是要把握歷史大勢，捨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等諸般歷史細節。很多人抱怨史書不實，這是就王侯將相史來說的，比如說，毛澤東的兒子怎麼死的？說不清楚。蔣介石的兒子的父親是誰？說不清楚。但歷史的大勢是無比清晰的，1911 年辛亥革命了，1949 年國民黨跑了，這些都是掩蓋不了的。而這些實際上比那麼說不清楚的東西重要的多。

以下進入正題。

中國近現代史的三個根本主題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流到中國近現代史，有三個根本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而這三者的催化劑，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初的“庚子賠款”。這個條約要求，中國賠償 11 個國家白銀本息 9.8 億兩，加上地方賠款，中國要掏出 10 億兩

白銀，相當於 12 年財政收入。而中國當時的財政收入，已經是在支付馬關賠款和重整武裝的情況下超負荷運行了。

基本上來說，《辛丑條約》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竭澤而漁、焚林而獵、殺雞取卵。最傻逼的國家有三個：一是俄國，本來與中國接壤，等於抱著一個提款機，隨時可以來拿，根本不用夥同一撥外地人過來搶銀行；二和三是英國、法國，經略中國多年，既得利益是相當清晰的，等於是叫人來砸自己的場子。把中國弄死了，對他們都沒好處。

但在當時的世界大勢下，八國聯軍已經顧不得那麼多了：英德要展開軍備競賽，爭霸歐洲，沒錢不行；法國要報仇雪恨，沒錢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強自居，蓄勢待發，沒錢不行；俄國、奧匈帝國日落西山，矛盾叢生，沒錢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錢想瘋了的主，逼中國簽了一個搶錢條約。只有一個明眼人，那就是美國，已經看透了《辛丑條約》一簽，中國必然爆發革命，大清國必然滅亡，於是把自己份額不多的賠款用來開辦學校，籠絡人心，力爭在革命洗牌後接手最大的一塊蛋糕。未曾想到，這所學校果然在百年後成為中國的主宰，這是後話。

《辛丑條約》一簽，中國的三個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便完全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在個人上，列強向中國索賠 10 億兩白銀，而中國財政已無餘錢，於是所有的賠款都是稅收的增量，而滿清的政治腐敗程度遠甚當下，徵稅效率極低，列強要 10 億兩，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 20—30 億兩，因為中飽私囊是鐵板釘釘的事情，清廷想的辦法是把錢攤到各個省去，讓他們看著辦，這樣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從省到中央這個環節不至於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強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徵稅徵出來的，從英國到美國、法國，莫不如此，庚子賠款的巨稅一徵，官民矛盾必然激化，這種矛盾通過

洪門天地會的發祥地：福建高溪村。



單純的、舊式的改朝換代已經解決不了，因為這不是說某個皇帝好壞的問題，而是說皇帝這玩意兒本身就有問題。

其次是在民族層面上，一方面是滿漢的民族矛盾開始激化，因為多民族國家就好比兩口子過日子，有錢的時候，其樂融融什麼都好說，一旦沒錢了，吵架拌嘴馬上就成了家常便飯，孫中山等革命勢力與洪門天地會這些反清復明勢力迅速合流，喊出“驅逐韃虜”深得民心；另一方面，滿清痛感軍事無能已淪為列強 ATM 取款機，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練兵計劃，準備編練 36 個師（那時候叫“鎮”）的新軍，這支新軍一旦練成，單就陸軍而言，已經追英趕美了。

於是，就牽出了國家現代化的話題。無論是支付賠款還是編練新軍，無不加重滿清政府財政的負擔，滿清的財政崩潰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經指出，一切行政行為歸根到底都是財政行為，財政崩潰也就意味著政府崩潰、政權瓦解。清末新政帶來的不是復興，而是亡國。因為中國最大的矛盾已經暴露出來了：舊式的東方專制主義農業國家，特點在於人口龐大條件下的高產值、高消費、低積累。因為 GDP 構成上以農業為主，農業上

又以口糧為主，經濟剩餘微乎其微，而這點微量的剩餘，在接受西方列強的盤剝之後，是不可能用來支撐現代的軍隊的。

首先要把軍隊裝進籠子裏

這樣，中國歷史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因為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強大的國防軍，沒有強大的國防軍，就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中國就要繼續淪為列強 ATM，中國繼續淪為列強 ATM，中國人民的負擔便會與日俱增。順著這樣的軌跡，中國爆發革命，是時間問題，而最後產生的革命之子，便是這三種共同意志的代表。甚至於，我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只要不解決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這三個問題，革命就會繼續發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愛新覺羅下台，但這是問題的開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國的體制，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權力，中央實行總統制，立法採取代議制，頗有蹣跚學步的感覺。而且，中國這個學生是個很好學的學生，學到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體制，還有南北戰爭。南方革命省與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隨著宋教仁的身死而徹底爆發，南方革命省興師北伐，很快便被北洋軍按倒。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美式體制的雛形，若無二次革命，將走向民主共和。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方還是孫中山的南方，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沒有建立起對軍隊的制約。一般認為，民主要把政府裝進籠子裏，但實際上，第一步是要把軍隊裝進籠子裏。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命題，革命之子必須解決好制約軍隊這個問題。

孫中山對南方軍閥本無約束力，袁世凱稱帝後很快就對北方軍閥也失去了約束，最後，護國軍起，袁世凱亡，中國陷入軍閥

混戰之中。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孫中山送去了列寧主義：用革命黨來約束軍隊，以文制武，以黨制軍。

而要達成這個目標，是必須另起爐灶的。於是，風雲起，山河動，黃埔建軍聲勢雄，國民革命軍誕生了，這是中國上下五千年以來第一支不向個人或家族效忠的軍隊，而是向一個政黨，一個主義宣誓。革命一旦正式地向舊世界宣戰，那就是巴黎能夠戰勝法蘭西，法蘭西能夠戰勝歐羅巴，當蔣介石揮師北伐的時候，國民革命軍有 10 萬人，吳佩孚有 30 萬人，孫傳芳有 20 萬人，但到了戰場上，舊時代軍閥戰爭的英雄們被乳臭未乾的學生軍打得一潰千里。直到 1927 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

孫中山把建黨立軍都外包給中共

這個政變是否反革命，這裏不爭論。關鍵在於，孫中山由於實力不足，又急於建黨立軍，於是把兩項工作都外包給了共產黨：建黨主要依靠中國共產黨，建軍主要依靠蘇聯共產黨。於是，隨著革命的推進，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矛盾遲早要爆發出來：共產黨控制了國民黨的大多數基層組織，但有黨無軍；蔣介石黨內資歷本就不深，有軍無黨。於是，萬般無奈，只能以軍清黨，好不容易往籠子裏面趕的軍隊，又被放了出來。從而，出現了軍事北伐，政治南伐，閻錫山、張學良等舊軍閥紛紛入黨，繞了一圈，重回原點：黃埔系取代北洋系，蔣校長取代袁都統，閻主席取代了閻督軍，張少帥取代了張大帥，青天白日滿地紅取代了紅黃藍白黑五色……別的呢？一切如故。

而在另一邊，被革出革命門的共產黨重新建軍，這時候，主角可以出場了——

毛澤東徹底強化了以黨治軍的政治原則，明確了“黨指揮

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把軍隊裝進籠子，這個歷史任務最終是毛澤東解決的。

蔣介石集團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後，並不是毫無作為，在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上都有所建樹，但有一個問題依然無法解決，那就是籌集資金啟動現代化進程。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依然是一個碩大的ATM。而要解決現代化的問題，核心的一點在於建立一個能夠把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起來的體制。

但是，蔣介石集團的致命缺陷，就在於對國家的控制力不足。從三個維度上看，這種不足都是很明顯的：一是在地域上，只能控制東南個別省份，對軍閥控制區基本不能控制，對少數民族區完全不能控制，即便在東南省份，對廣大山區、紅軍根據地、游擊區、列強租界等，也是完全不能控制；

二是在深度上，隨著“四·一二”清黨，國民黨在縣一級的黨部被摧毀大半，更遑論鄉、村，實際上，國民黨成了一個浮在中國表面上的政黨，而要在一個農業國家調集經濟剩餘推進現代化，對農村的控制是關鍵的關鍵；

三是在廣度上，國民黨雖然模仿蘇共體制，並由中共幫助建黨，但在對國家的控制上，只能控制一部分軍事，即黃埔系的中央軍，一部分政治，即忠於蔣介石的部分官僚，對於胡漢民、汪精衛等派人馬完全不能控制，在經濟上則是基本失控，甚至連宋、孔等親緣家族掌控的名義上的央企都無法控制。此外，還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腐敗食利階級，把有限的經濟剩餘全部消耗在奢侈性消費或者轉移海外上。

雖然在當時的國統區，反對國民黨的聲音基本上只有兩種，一要抗日，二要民主，但歸結起來，這些實際上都必須以現代化為後盾。這時候，另一個事件讓共產黨誤打誤撞地掌握了現代

以黨治軍的政治原則。
三灣改編：毛澤東徹底強化了



化的關鍵：

共產黨在城市發動的暴動全部歸於失敗，武裝進攻城市的計劃也完全被打敗，於是，毛澤東帶著主角光環轉進農村，農村包圍城市，不僅僅是軍事的、革命的策略，也是一場對共產黨進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教育。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而紅軍則是在中國最貧窮的地方紮根，共產黨學會了怎樣從貧窮的農村籌集資金而不激起農民的憤怒，他們居然在江西的根據地裏建起了工廠，這表明，在中國推進現代化，首先的工業化是完全可行的。並且，他們把政權建到了村上，建立了政府對農村的完全控制，這在狹小地域內無足輕重，但一旦取得全國政權還保持著這種對農村的控制力，一個龐大國家，無論多麼貧窮，所能集中的資源總量依然是恐怖的。

前些日子，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工作後，單位那些老大姐要給我介紹對象，靠譜嗎？”這時候，我就跟他講了蔣介石的故事。這些老大姐一般來說，都是想用一段姻緣換兩樁人情，所以，總是給人介紹最剩的，結果可想而知，成事總是很少。蔣介石的思路，就是大姐的思路，總是用一次戰役，弄掉兩派敵人，都把

共產黨的軍隊折磨到陝北半死不活了，還要逼張學良出手，是為“驅虎吞狼”之計。但要“驅虎吞狼”有個必要條件，就是虎有不得不吞狼的理由，要麼是有深仇大恨，要麼有實在的好處，但張學良和共產黨之間，除了張作霖殺過李大釗外，屬於往日無怨近日無仇這種類型，結果，“驅虎吞狼”最後成了“搬石砸腳”，這也是必然的。

游擊戰的威力真諦

然後，就到了盧溝橋的那一槍了。曾經有人也問過我，書讀半本，不懂裝懂，半桶水跑出來裝逼有什麼後果？我就跟他講了日本的故事。

在近代史上，日本屬於裝逼被雷劈的典型。由於被列強欺負多年，日本形成了一種慣性思維，就是認為實力決定一切，槍在手跟我走，搶你糧日你娘，燒你寨幹你妹，可以為所欲為。雖然甲午戰爭後三國干涉還遼已經給他敲了警鐘，但後來，他發現，日俄戰爭打沙俄，一次大戰打德國，十月革命打蘇俄，西方列強不僅沒有說啥，還一致叫好，紛紛表示精神鼓勵。他就覺得是因為自己強大了，就可以想幹嘛幹嘛了。有些人，雖然心地善良，但由於是在過於善良，一直不願意告訴日本真相：西方之所以支持日本，並不是因為他強大，而是因為他不強大。他們不怕日本變強，倒是怕俄國、德國變強。被人當槍使，還使得很有成就感，日本就是這樣被人賣了還數錢數得津津有味的。

但是，等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西方各國都看不下去了，留著中國，就是個永恒的 ATM，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從中撈錢，而現在日本想獨吞，是可忍孰不可忍。等到南京大屠殺一出，全世界基本上都看不下去了——就算看得下去的，也得在選民

面前裝聖女，裝看不下去，而日本還很陶醉：你看，全世界都罵我，他們這是羨慕嫉妒恨、羨慕嫉妒恨。

毛澤東一看日本人來了，很淡定地躲進窯洞裏，花了很久才寫成一本小冊子——《論持久戰》。之所以花那麼久的時間，是因為主角用的是毛筆。

很多人望文生義地說，蔣百里和蔣介石在主角之前提過持久戰，但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本書的給力之處在於，把游擊戰的意義凸顯出來了。毛澤東很清楚，中日戰爭雖然是日本以強凌弱的戰爭，同時在世界上，則是日本以小搏大。軸心國的勝機在於通過先手的進攻，在同盟國反應過來以前佔領大片區域，並把佔領區內的人、地、財、物等資源轉變為正向的戰力，達到以戰養戰，越戰越強的效果。而游擊戰則是直接命中這個要害的。通過在敵佔區的廣泛的軍事動員，使得日本不僅不能把佔領區的資源投入戰爭，甚至於不得不消耗軍力用於後防的“掃蕩”。這樣，佔領區對日本的作用就從正向轉為負向，佔領的土地不僅提供不了戰力，反而轉變為巨大的負擔。所以，游擊戰的威力不在於“擊”，而在於“游”。當然，這是 1941 年之前的情形。到了 1941 年以後，國共兩方的目的都很明確了，那就是坐等美國人、蘇聯人騰出手來踢日本人的屁股。我一直認為，現在有些人煞有介事的爭論國民黨和共產黨誰才是打敗日本的核心力量，這些人應該擔心的是，尼米茲和華西列夫斯基晚上會不會來找你。

我讀到過一本人民大學編的共產主義運動史教科書（主編名叫李景治，在人大國政系地位顯赫，因為和手下張鳴吵架聞名全國），書裏論證二戰後法國、意大利的共產黨向政府繳槍的合理性。論證方法是這樣的：指出法共手裏有多少人槍，意共手裏有多少人槍，並指出政府手裏有多少人槍，大致的比例是 1:

2—1:3; 得出結論,打是肯定打不贏的,不如交了槍到議會裏做官。——我覺得,編書的肯定不知道中國有個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的勝負手不在於軍,而在於黨。戰前的兵力比是1:4,但中共的1都是可以投入運動戰的野戰兵團,而國民黨的4則有一半要消耗在防禦上。原因如同前文所述,中共以黨制軍,黨不依靠正規軍隊,單純依托黨群組織就可以實現對後方的控制,並實現戰爭動員,將物資投入前線戰場。而國民黨則是以軍清黨,造成的結果就是,政黨鬆散無力,政權腐敗無能,特別是面對共產黨對國統區的滲透和發動,離開了完整的政黨體系,單純依靠幾個秘密警察組織,對於城市尚難控制,遑論鄉村。同時,地方利益集團在國民黨政權框架內勢力極大,一地的失守就意味著一地鄉紳利益不保,這些既得利益者便會發動一切政治資源向政權發難,問責之聲不絕於耳。於是,雖然有兵力總量上的優勢,卻只能處處設防。這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個人軍事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國共兩黨基於不同歷史發展道路所形成的政治結果的制約使然。

《董存瑞》:最好的廉政教育電影

國共兩黨的差別,歸結起來,就是共產黨雖然紮根於農村,基層黨員基本都是工農兵,但仍然是一個現代化的政黨組織,用西方化的思維在思考。而國民黨雖然佔據著城市,絕大多數高官都有西方留學背景,但就整體而言,國民黨是在用中國傳統政治的方式進行統治。而中國近代史無非是表明了,東方的傳統政治體制在軍事動員上相對於西方政體是多麼的落後。

另外,西方式的思維還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即使是最底層的人民,無論是貧農還是包身工,無論看起來多麼的低賤,他們

仍然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雖然他們恥於開口羞於開口甚至不敢開口,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思想,更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作為一個人所應該有的利益訴求。國民黨只不過把這些人當做一種完全的物質意義上的存在:需要軍費,就把稅預徵N年;需要兵源,就直接下鄉抓壯丁。至於各級官員,更是覺得,這些人的存在,無非就是為了拉車、洗地、掏糞。但是,共產黨卻明白,只要把這些人當做人,他們能幹出多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你們要糧食,我就給你們糧食;你們要土地,我就給你們土地;然後,當你們這些賤民自己都覺得得到的實在太多了,再也想不出還能再要點什麼的時候,我還告訴你,你不是低三下四的賤民,你還應該得到平等,你本來就是響噹噹的公民;我還告訴你,你不是卑賤粗鄙的賤民,你還應該得到尊嚴,你本來就是頂天立地的勞動者。然後,你問我是誰,我覺得,跟你解釋什麼馬克思主義太複雜了,跟你說什麼共產黨你甚至連什麼是黨都搞不明白,於是,我告訴你,跟著毛主席就對了。我又問了一句,假如蔣介石回來了,你還願意回到過去,做一個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屁民嗎?沒有人願意,這時候,只需要給你一個炸藥包,你就敢把這個世界炸得粉碎。

董存瑞的故事放了一遍又一遍,我覺得,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貪官污吏們都是知道的。他們覺得這是洗腦的結果,但是,我要說,這不是洗腦,這是啟蒙,一個人,究竟要懷著對舊世界舊制度舊官僚多麼巨大的仇恨;統治者,究竟要做多少的罪孽,才能讓一個人,寧可把自己炸得粉碎,只為了抓你墊背?

我認為,和什麼《第一書記》之類的神片比起來,1955年出品的黑白電影《董存瑞》才是最好的廉政教育電影: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利是流了無數共產黨人的鮮血才換來的,如果誰膽敢把它奪走,人民並不介意再流一些共產黨人的鮮血。



中共對捨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宣傳多年。

抓住中蘇關係史就抓住了解答的鑰匙

人性是一種很奇怪的存在。比如說，有八個壯漢把一個弱女子壓在地上，射得滿臉都是。有一個男子提褲子走人之餘，覺得於心不忍，丟下紙巾一張，說了聲：“喂，擦擦吧。”女子從此便感恩戴德，此情綿綿，至今未絕。這張紙巾，就是清華大學。

時光荏苒，該女子後來交了個男友，男友不僅給買了車，每年還給十萬零花錢，以至於此女把這十萬元視為既定收入，用這筆錢按揭買房。結果十年過後，兩人吵了架，男友一怒之下，決定從此之後再也不給零花錢了。但是，女子的按揭已經辦上了，眼看銀行就要來收房，只能忍饑挨餓，砸鍋賣鐵交按揭款，餓得皮包骨頭，從此對此男仇恨汹汹，至今未絕。這個男友，就是蘇聯。

拿走了屬於你的東西，再還給你一點，這就是德；一直給你，不屬於你的東西，再收回一點，這就是恨。無論是國際政治還是日常生活，都需切記，切記。

進入正題。要解讀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1976)，抓住了中蘇關係史，也就抓住了解答的鑰匙。中蘇結盟的背景，首先是出於民族獨立考慮的。當毛澤東宣佈獨立建國的時候，鐵幕已經落下，支配國際政治的，是一種“冷戰思維”，也就是說，非此即彼，非蘇即美，非友即敵。墨西哥前總統有句名言：“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麼遠，離美國卻這麼近”，中國是同樣可憐的，離美國那麼遠，離蘇聯那麼近，倒向美國，必死無疑。

更何況，儘管中國共產黨人一再設法否認，中國革命實際上與蘇聯的援助是緊密聯繫的，從建黨之初的黨費，到解放戰爭的東北野戰軍裝備，蘇援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誰要是再否認這點，小心范漢傑晚上來找你。另外，中共的黨務幹部實際上是熟讀斯大林欽定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長大的，革命勝利後如果親美反蘇，中共內部發生分裂幾乎是必然的。於是，毛澤東的“一邊倒”儘管有十二分的不情願，卻是不得不倒。

“一邊倒”才在一夜進入工業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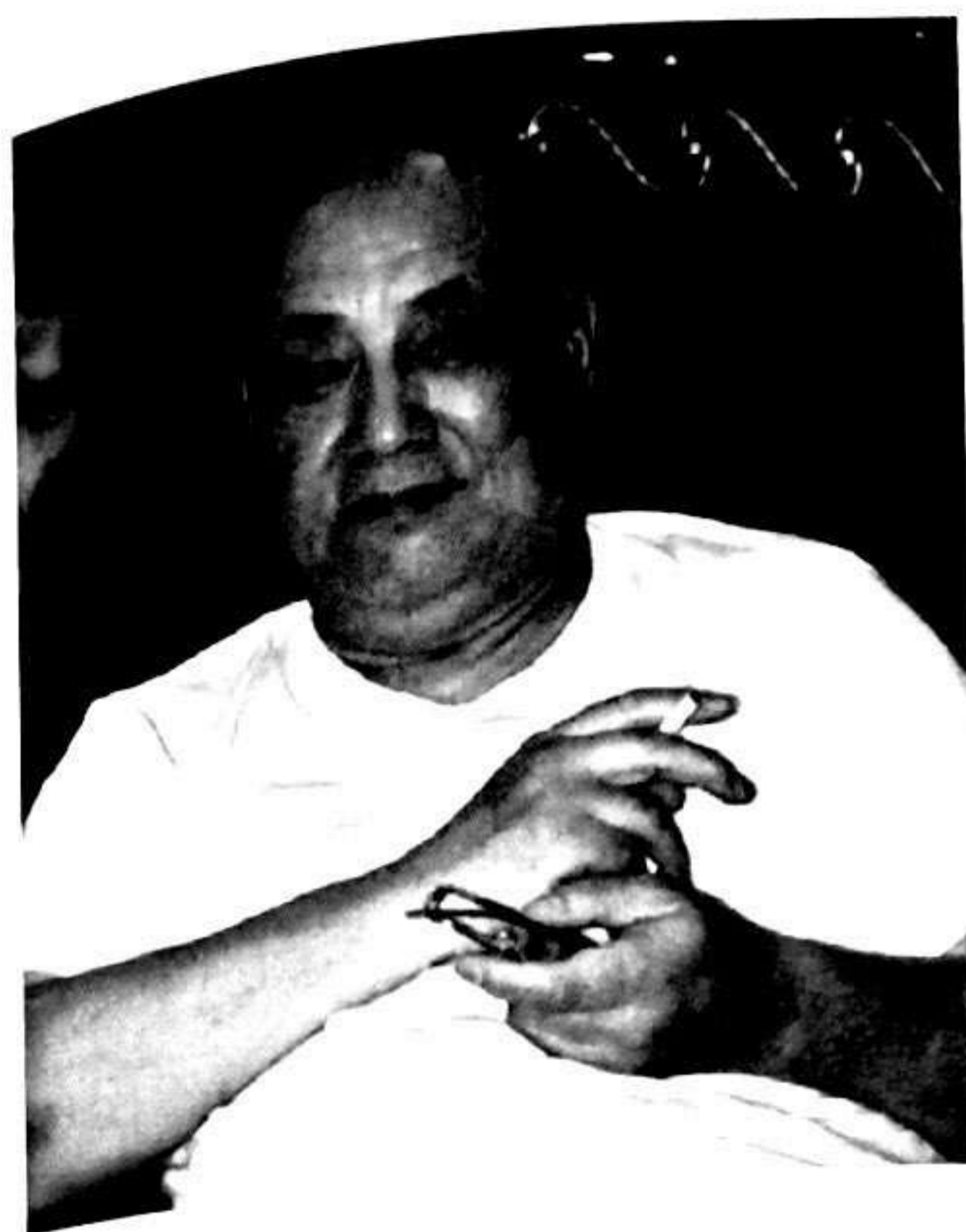
在“一邊倒”的基礎上，朝鮮戰爭就再清楚不過了。中國共產黨人很清楚，長征途中有多少軍閥被紅軍毀掉，紅軍打到哪裏，中央軍就跟到哪裏，中央軍跟到哪裏，就把南京政權的統治帶到哪裏。現在美國兵臨鴨綠江了，朝蘇邊界是那麼短，中朝邊界是那麼長，對於東方陣營而言，美韓帶來的麻煩是必須解決的，否則中朝邊境成為冷戰前線，那麼中國的民族獨立也就難以根本保證，因為蘇聯勢必要在鴨綠江邊屯兵防範——既然你自己承認你搞不定美韓軍，也就說你守不住你的邊境，那麼就只能我替你來守。這樣，中國就有淪為第二個波蘭的危險。第二條出路就是中國咬定這個麻煩自己能夠解決，那麼就出兵朝鮮，左手要

槍要炮，右手撈名撈利，名利雙收，一舉兩得。

萬幸中國打贏了，然後蘇聯便鐵了心地武裝中國，因為當時西方已經結成陣營，北大西洋公約把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工業大國聯合起來，莫斯科深知，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這些貨色，是斷難與美國的這些同盟相提並論的，而就資源而言，蘇聯有資源無人力，中國最豐富的恰恰就是勞動力。一旦蘇聯的物力與中國的人力聯合起來，對於西方世界而言無異於一場噩夢。

一般而言，後發國家工業化的最大瓶頸在於重工業，因為後發國家普遍存在資金緊缺，而重工業的資金周轉很慢，投資回收很長，同時後發國家技術又很落後，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說，發展重工業是劃不來的。但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體系有了完善的重工業，那就意味著這個經濟體有了自我發展的能力。而在“一五計劃”期間，蘇聯白送了 156 個重工業項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把中國拉進了工業國家。而且，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兩大結果，一是在精神上鞏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當中國是民國的時候，這也沒有那也沒有，一旦掛上了共和國的招牌，不出十年，汽車也能造了，飛機也能造了，給人一種中共很給力的感覺；二是在物質上，隨著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中共自己締造的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很快被執政黨賦予特殊的政治意義，原來共產黨一直因為紮根農村，自覺底氣不足，現在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的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了。

但是，蘇聯最大的天真就在於，既然中國有了重工業，有了經濟上的自我發展能力，那麼，為什麼還需要老大哥呢？既然莫斯科一貫的以共產世界的羅馬自居，而那個名叫鐵托的男人已經把貝爾格萊德樹成了共產主義的威登堡，揚起了反旗，那麼，毛澤東並不介意讓自己成為紅色的加爾文。（丁栩翔）



學者何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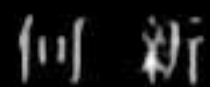
何新發出歌頌毛澤東的最強音

安愈誠

“僅僅因為毛澤東的出現，歷史在 20 世紀一度改道而行。”
“毛澤東雄姿英發，文韜武略，倜儻風流，膽識過人……個人魅力是無窮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在他面前，巨人顯得渺小”，其“業績令當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後世之人難以置信”；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高無上的聖人、教父和領袖”、“超級巨人”“凡軀之神”，甚至，“毛澤東是一個神話”！

以這樣激昂高亢的聲調、竭盡世上一切美好之辭放聲謳歌的歌手，是中國著名學者何新。他在他的博客上發出了一篇題為《重論毛澤東》的文章。

與當前左派人士發出的多是劍拔弩張地聲討反毛派的檄文不同，這篇文章是一篇熱情洋溢的頌詩；與許多人一一歷數毛澤



這篇 5300 餘字的散文詩，也就是這樣的一篇文字。思緒並

何新早就以特立獨行著稱，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他就飽受爭議。如果說起初是因為他作為文史學者，沒有大學學位，卻出版了十幾本

不管怎樣，在當前關於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遺產，左右爭辯激烈之際，何新推出的這篇奇文，非常值得一讀。

何新

1

在人類歷史上，毛澤東是一位曠世絕倫無與類比的人物。
毛澤東喚醒了整個東方人類和新興世界。

毛澤東雄姿英發，文韜武略，倜儻風流，膽識過人。

所有的親歷回憶者都指出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是無窮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包括他的對手如蔣介石、尼克松、赫魯曉夫和基辛格）。在他面前，巨人顯得渺小。

以毛澤東出身之卑微，早年所受教育之狹蹙，社會背景之孤陋，以及所掌握資源之匱乏——而竟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締造出一個雄偉的新生之國，這在最近的歷史 1000 年、黑鐵時代以來 3000 年、青銅時代以來 5000 年，以至智人誕生以來的四百萬年歷史上，毛澤東現象都是絕無僅有，渾然天成。

毛澤東的業績令當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後世之人難以置信！

2

毛澤東是一個神話。

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夠憑藉幾乎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在短短 28 年之間，審時度勢，謀形造勢，縱橫捭闔，橫掃強敵，而締造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中共”），一隻裝備簡陋而能克敵制勝的軍隊（“解放軍”），一個赤貧然而精神強大的新興共和國——毛澤東自身則成為世界上這個人口佔世界 1/4、地域相當於世界大陸面積 1/15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高無上的聖人、教父和領袖。

最近 300 年以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領袖，敢於如毛澤東那樣地蔑視世界殖民主義的西方超強和 20 世紀的美蘇兩霸，蔑視西方的整個工業化世界包括聯合國和全部所謂的“世界新秩序”。

1950 年新中國立國之初，毛澤東力排眾議出軍朝鮮，對抗

聯合國 17 國（美、英、法、韓國以及荷蘭、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土耳其、泰國、南非、希臘、比利時、盧森堡、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的百萬大軍，此戰美國派出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

面對這樣強大的陣勢，只要敢於迎戰，即使戰敗也是英雄。

然而毛澤東在萬里之外 在毛澤東面前，巨人也顯得渺小！遙控戰局，將二戰中克勝日本天皇大軍、威名蓋世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打得丟盔卸甲，棄印而去。

此後面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報復、封鎖和堵截，較量幾十年，最終毛澤東迫使全世界不僅向他低頭，而且為他喝彩，甚至連超強敵酋也不得不對他輸誠俯首（見二戰英軍統帥蒙巴頓將軍關於毛澤東的回憶錄及尼克松回憶錄）！

事實上，1950 年打響的朝鮮戰爭的終局，並不是結束在 1953 年 7 月的板門店，而是結束在 1972 年 2 月北京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邊。

毛澤東蔑視聯合國。但是當 1971 年 10 月中國使團驕傲地帶著毛澤東著作和中國理念回到紐約聯合國大廈的時候，中國人所得到的的是全世界的歡呼和掌聲！

毛澤東現象是歷史絕無僅有而不可思議的神話。

（原作無第 3 節。——編者註）



德國哲人尼采說：戰爭是淨化人類歷史的洗滌劑。

黑格爾說：戰爭推動歷史前進。

真主穆罕默德說：我帶著劍和可蘭經而來。

毛澤東出身一介布衣，早年不過是一個寒儒和卑微書生。

觀其弱冠狀貌，腴腆羞澀如婦人好女。

但是，毛澤東大半生在馬背上度過。

毛澤東身經百戰，卻手不觸槍，其計魁梧奇偉，算無遺策。身在軍旅，手不釋卷。運籌遠謀，鞭撻宇內，臨危制變，席捲千軍。

自1928年秋收起義到1949年的遼瀋、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戰役，毛澤東從帶領數百人的一支落魄殘軍到井岡山寨落草起家，數年之後竟鍛造出一支打不爛、趕不散、意氣如虹的鋼鐵紅軍。

21年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所指揮的游擊戰、反圍剿、運動戰以及最後的大規模殲滅戰，以對壘雙方投入兵力之數量，戰爭之規模，覆蓋地域之廣闊論，均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一切戰爭和經典戰役，包括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歷次戰役。

毛澤東生平取得的戰績足以壓倒凱撒、亞歷山大、薩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侖、庫圖佐夫、威靈頓等全部西方戰史上的一切統帥和名將。

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高聳雲天，出神入化，精妙絕倫。相形之下，西方之那些名將和戰局不過如同小丘而已。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足以狀毛澤東兵法之高妙。其軍略以及政治、軍事及宣傳動員整體配合之運用，其高明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軍事家和戰役組織者。

只要這個世界上仍然有戰爭，毛澤東戰爭學術就當之無愧

地名列人類戰史之首。

毛澤東是一位戰功彪炳，值得後代軍事家景仰和做法研究的戰神。

5

毛澤東智慧而詭譎，是一位玄機難測的偉大政治家。

毛澤東駕馭歷史操縱人類的能力，非學而成，似乎來自天賦。

毛澤東生前鬥倒了他的一切內外強敵。

毛澤東蔑視一切對手，說大人則渺之，所謂戰略上藐視而戰術上重視，又極近辯證。

毛澤東明哲識才，知人善用，攬申商之法術，概馬列之宏教，可謂非凡卓越！

毛澤東始終關注人民之“大多數”。他永遠站在世界上窮苦大眾、“弱勢群體”，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那一邊。

毛澤東使一個東亞病夫的散沙混亂之國，實現大統一，而奠基克成華夏民族復興之初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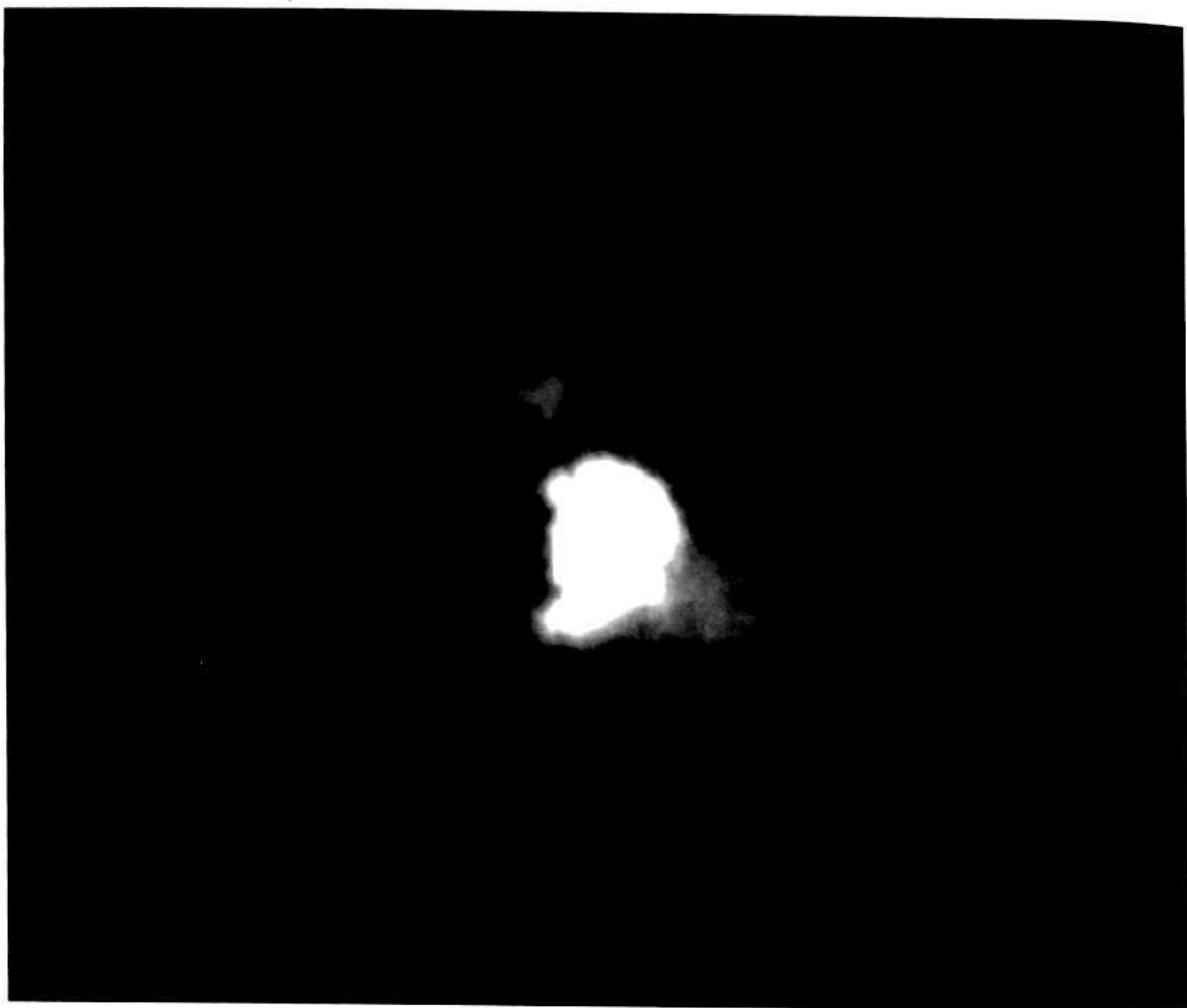
6

毛澤東的個性和人格魅力是無窮的。

他具有超人的藝術天賦、深刻的直覺靈思和極其廣博的人文知識。

在私生活中，毛澤東胸懷寬大，感情豐富，幽默詼諧，仁慈寬厚。

毛澤東知道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萬歲”不過是一句欺人



武漢雲天驚現毛澤東頭像，人們紛紛用手機拍攝。

的空話，“四個偉大”只是阿諛奉承，“我才不信那一套”！

“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毛澤東知道自己只是不得不時常被包裝為鍾馗。

但是，毛澤東嘲笑自己既是虎也是猴。

他知道，總有一天自己也會被打成粉碎——“不過粉碎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在政治鬥爭中，毛澤東鐵面無私冷酷無情。

只要政治鬥爭需要，他就毅然斬斷一切舊日情緣、粉碎任何障礙和形成障礙的人物——不論其是舊日袍澤還是多年戰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

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說：“如果需要冷酷無情，那就冷酷無情！”“既做獅子又做狐狸。為了勝利必須用勢”。

在政治權謀上，毛澤東也是一位馬基雅弗利之術的運用者。



武漢市民爭相仰望雲天上的毛澤東。

7

黑格爾說：婢僕眼中無英雄。但那並非因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為婢僕只是婢僕！

英雄也有錯誤以至罪過。偉人也有弱點以及隱私。

耶穌是肉身之人，偉人也是肉骨凡胎，人性所具有的一切都會有。

但是，偉人之所以是偉人，是因其所創造的偉大功業及業績在。

偉人就是偉人！不會因為有眾多宵小、庸才、妾婢（如張戎一類）、洋奴以及生前敵人的任何蔑罵、詆毀而淪落絲毫！

托爾斯泰論時人對拿破侖的褒貶說：一個道德完美的庸夫只是庸夫，一個遍體鱗傷的英雄仍然是英雄。

英雄功業在，光芒日月長。不知群兒愚，哪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不過如此而已。

歷史從不完美。歷史永遠曲折。

全部歷史所昭示的，就是人類不過是一種永遠會犯錯誤的宇宙低等動物。

天地不仁，聖人以萬物為芻狗。個人會犯錯誤，群體會犯錯誤，民族會犯錯誤。政黨會犯錯誤，國家也會犯錯誤。

歷史不過是無數代人錯誤的疊加而已。

一部人類歷史就是後來者不斷繼續犯錯和試圖改錯，因而經常越改越錯的歷史。

錯誤足以粉碎庸才。但是偉人卻在錯誤中創造了奇跡。

迄今為止，歷史一向黑暗。歷史從不公正，只為勝利者而寫。苦辛多於幸福，罪惡多於光明。什麼自由民主博愛普世價值，都是共濟會宗教借以惑亂他國人心的欺人之談。

幸虧歷史中不定期地會出現偉人，雖如流星一樣短暫而照徹黑暗。但至少在他的時代中，毛澤東把一個分崩離析、遍體鱗傷的華夏民族帶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在瞬間迸發出燦爛耀眼的光芒，而使全民族在那個年代中擺脫卑賤與卑劣，擺脫庸俗。

毛澤東不是任何人強加給中國人的。歷史為中華民族選擇了毛澤東。而這是那個時代這個民族最明智最偉大的選擇。

那個時代，華夏民族因為有毛澤東而充滿自信和自豪！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充滿傳奇戲劇性的世紀。偉人代出，燦若群星，從右翼的丘吉爾、羅斯福、戴高樂，到左翼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

但是，這個世紀是戰爭的世紀、亂離動蕩的世紀、什麼光明與啟蒙，都是欺人的神話。這個世紀也是威斯康辛與古拉格群島的世紀，是殺人如麻，人命賤如草的世紀。

唯一的光明在於，20世紀是被壓迫的第三世界賤民們追隨著毛澤東的中國起而造反的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暴動的世紀，抗爭的世紀，奮鬥的世紀，是華夏民族鏖戰圖強的世紀。

這個世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隨之爆發翻版法蘭西大革命的1917年俄羅斯革命，在60年代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一個震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大革命狂潮。

世紀末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敗，導致九十年代全球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世界轉向新資本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全球化運動。世襲的羅氏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金權家族企圖控制全人類。人類未來所將面臨的不是什麼千禧年的光明，而將是千年黑暗。地球的2/3多餘人口將被轉基因、毒疫苗、艾滋病、其他人工病毒和化學毒食物鏈無聲滅絕，殘餘奴隸將被芯片鎖定。

這一切本來是15世紀地理發現和全球化運動以來資本主義向全球帝國主義演化早已設定的宿命。

僅僅因為毛澤東的出現，歷史在20世紀一度改道而行。

毛澤東是20世紀率領億萬賤民造反的領袖，是率領奴隸粉碎鎖鏈的英雄，毛澤東是政治的角鬥士，是現代的斯巴達克斯。

他用精神和物質的原子彈摧毀了西方偽自由共濟會石匠(Freemasonry)的鐵幕，至少在那個短暫的時代，讓全世界被壓迫的賤民和奴隸們看到了陽光與藍天。

大革命因毛澤東的死亡而終結。

但是，毛澤東所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遺產，包括文化革命的遺產，仍會被後人不斷地思索和研究下去。

當然，正如一切偉人一樣，永遠會有人詆毀和詛咒他。因為

死去的毛澤東，仍然是資產階級心目中一個難以消除的魔咒。

10

毛澤東的一生是悲劇，他的晚期生活更是一部壯烈的悲劇。毛澤東的悲劇在於他過於偉大，偉大得令人難以理解、難以置信。

晚年毛澤東的悲劇還在於，他在 60 年代發現他革命奮鬥所營造成功的大廈——恰恰是他當初的革命初衷所欲摧毀的那個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度的大廈。

於是，毛澤東毅然以耄耋之年再一次發動奮力攻擊，試圖摧毀一切而重頭來過。但是驀然回首，卻發現自己已經是孤家寡人和殘病之軀，而腳下則躺滿了昔日戰友的屍體。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風雷帳下英雄在，鼓角燈前老淚多。這詩句就是毛澤東的晚年自況。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的那些追隨者無一不是猥瑣渺小的卑劣之徒。“我播下龍種，收穫跳蚤”——毛澤東不得不面對和承認失敗。

晚年毛澤東，其實是中國現代版的李爾王(King Lear)。

11

毛澤東知道，這個所謂“社會主義”的制度，根本並非他所理想和試圖營造的那個公平和諧沒有階級的社會——這個社會內部仍存在著極其深刻複雜的階級矛盾、衝突、對抗和鬥爭。

因此，社會革命不會終結，歷史並未終結。

毛澤東曾經預言，如果在未來中國出現右派當權以“自由主

義”為名義的內外資產階級和買辦勢力的聯合專政，那將是多數人民的災難。但是，工人階級和貧苦大眾的反抗運動，就一定會前仆後繼地發生。毛澤東詛咒說：“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

毛澤東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政治遺產。重要的是，他的革命精神和意識形態已經熔鑄進了這個民族的政治文化中！

12

英國史家羅斯在總論拿破侖時指出：

“儘管遭受了慘重的失敗，他在治理國家，煥發人民才智和運用戰爭藝術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絕倫，偉大之極。

他的偉大，不但在於他那些最出色的業績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於他的始創性，以至在完成所有這些業績中投入了雄偉非凡的力量！

——這種力量，使得遍佈他後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紀念碑，雖然飽受狂風暴雨的摧殘，卻還是宏奇壯麗！

屈處於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

人類畢竟不以最高的榮譽授予那些謹小慎微、知難而退、毫無建樹傳於後世的庸碌之輩，而是把它授予胸懷大志、敢作敢為、功勳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萬人同遭大禍之際還主宰著千萬人之心的人。”

毛澤東的偉大當然無可比擬地超過波拿巴－拿破侖！

這個駕馭中國革命一度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社會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 20 世紀歷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捲人口最多的偉大國內戰爭和革命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偉

力，試圖營造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私有制的烏托邦的人；這個打破了雅爾塔三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巍然崛起而起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這個導致20世紀後半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結構發生根本改變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於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億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岩石之後的方形大廈的人；——必將永遠屹立於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附註：

毛澤東去世後，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悼詞說：“對一部分人來說，毛澤東他是希望，對另一部分人來說，他是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下去，以後一直會如此”。

毛生前反對過的南斯拉夫強人鐵托說：“毛澤東是巨人之上的超級巨人”。

美國《毛澤東傳》的作者特里爾說：“事情總是這麼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詆毀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卻對他的讚辭最多。有些領導人說他是人類歷史上上千年才會出現一個的天才。美國《新聞週刊》當天發表的社論標題是《歷史上最後一位巨人》。”沒有任何崇拜者會比他生前的對手和敵人，更知道毛澤東存在的意義和份量。

毛澤東是孤獨的大失敗者

回顧中共九十年歷史，特別是建國以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成的悲劇與浩劫，史實證明，毛澤東絕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大領袖，而是孤獨的大失敗者。

敗績之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實踐與理論失敗了

毛澤東晚年回顧一生，認為只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踐證明，這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完全失敗了。



江青若是反革命，毛澤東豈不成了反革命家屬？

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99-100頁）中提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會使資產階級最後地孤立起來，便於最後地消滅資本主義。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歷史上發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個土裡去。’”

因此，在國際上，毛澤東支持世界革命，反帝、反修、反資、反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鬥走資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是，在1980年代，這場文革被中共中央認定為內戰、浩劫和封建法西斯專政，被永遠開除黨籍的劉少奇又恢復了名譽，被打倒的鄧小平又重新上台，掌握軍權，自封為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毛澤東信任和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沒有按他的指示“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而是：有問題，抓江青，打倒了“四人幫”。鄧小平還判處江青死緩，定為反革命。毛澤東的文革最終徹底失敗了。紀登奎告訴過我，實際上，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欽定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很快就老了許多。他內心清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

毛澤東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把江青培養、鍛煉、提升為接班人。結果，鄧小平的特別法庭判處江青死緩。據說，北京市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小腳偵緝隊，不同意把江青定為“反革命分子”，因為，如此定性，江青的丈夫就是“反革命家屬”。按照文革期間公安六條、十條的決定，居委會將把這位“反屬”驅逐出北京市；如果死了，得把骨灰盒或屍首清出北京。毛澤東的文革，最後把毛澤東也定性為反革命家屬，歸入黑五類之列。2011年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第二卷再次認定“江青反革命集團”，江青丈夫毛澤東的“反屬”帽子就永遠摘不掉。這是諷刺、笑話、冷幽默，也是歷史的真實，更是毛澤東生前預料不到的可恥的大失敗。

敗績之二：要資本主義絕種的空想失敗了

毛澤東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和要使資本主義絕種的政策是錯誤的，違背歷史發展規律，也違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農業合作化的一場

對尼赫魯印度反動派，全力支援犯有反人類罪的柬埔寨波爾布特，因為他搞的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海外版，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在國內不斷發動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的走資派”的老幹部、“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知識份子，開展思想領域的“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的階級鬥爭，企圖使資本主義在國內絕種。這種主觀唯心主義、烏托邦主義、唯意志論的毛澤東思想，給中國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和嚴重的政治後遺症。事實證明，這是極端有害的、無往而不敗的大失敗理論。

毛澤東去世以後，“四人幫”被打倒，中共改革開放的道路，同毛澤東的“使資本主義絕種”的方向恰好背道而馳，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由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道路，在胡趙新政下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又夾著錢包回來了，三資企業在中國大陸發展迅速，吸收國外資金額為世界第一。資本主義不但沒有絕種，私營經濟比重占到半壁河山，中共還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聯盟的 WTO，中國經濟的進出口總額占 GDP 的比重，即外貿依存度達 60% 左右。小生產也沒有絕種，農村 99% 都包產到戶了。

為什麼毛澤東要求的“資本主義絕種”的理想世界，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因為，它違反了歷史發展規律，也違背了馬克思的基本論斷。

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它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今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恩



毛澤東要資本主義絕種，甚至幻想廢除貨幣，諷刺的是百元大鈔上印著毛澤東像。

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9 頁）

毛澤東認定，在使“資本主義絕種”的階級鬥爭中，只要“沒有良心”、“那麼凶哩”、“不仁慈”，就能使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小生產絕種。而世界和中國的歷史實際發展，證明馬克思是正確的，毛澤東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他在建國後要使資本主義絕種的理論和實踐都遭到可恥的失敗，毛澤東輸得很慘、很可憐。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導思想，實質是患上了毛澤東使資本主義絕種理論的傳染病留下了嚴重的政治後遺症，在實踐中犯了廢黜胡趙兩任總書記和“六四”鎮壓的極大錯誤。鄧小平及其接班人繼承了毛澤東的錯誤理論，往錯誤的政治道路上滑下去，也成了大失敗者。

敗績之三：對待農民犯了大錯和大罪，人民公社化餓死 3700 萬人

毛澤東自認為代表農民，對農民問題的見解高明，攻擊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195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尖銳批判梁漱溟要關心農民的思想。毛澤東說：“梁漱溟提出所謂‘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的高論，什麼‘共產黨丟了農民’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所以，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正經的問題，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問題，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說，他比共產黨更能代表農民。難道還不滑稽嗎？出了這麼多的‘農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誰呢？是不是代表農民的呢？我看不像，農民看也不像。他們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是幫地主階級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語的、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是梁漱溟。”“梁漱溟說，我們進了城市，忘掉了農村，農村‘空虛’了，這是挑撥。”“土地改革後，農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有些農民比工人的生活還要好些。”毛澤東還認定，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如果梁先生這類意見也可以稱作‘諫’，我聲明，確是‘拒諫’。飾非則不是。”毛澤東還把不民主、法西斯的帽子反戴到梁漱溟頭上說：“關於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為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點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絕於耳’，‘三月而誅少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我願朋友們，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學孔夫子這一套，則幸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8-113頁）

毛澤東批判黨外的梁漱溟要關心農民的思想，實質上是將矛頭指向黨內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秘書長杜潤生。在1953年10月26日、11月5日，毛澤東兩次批評他們。毛澤東認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

事。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去佔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毛澤東尖銳地批判農村工作部“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於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毛澤東明確指出“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係。斯大林說，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所有制。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對於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互助合作，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17-133頁）在毛澤東的政治壓力下，1956年3月，全國基本上實現初級農業合作化之後，幾個月又實現了不適合國情農情的高級農業合作化。接著，1958年又實現了災難性的人民公社化。這些做法，正是梁漱溟批評的“丟了農民”，毛澤東違背了農民的心願和農業發展的規律，真的把億萬農民打到了“九地之下”。

1958年，毛澤東提倡農村小社變大社，規模一鄉一社。又提出“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認為，一大二公、工農商學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人民公社好

195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

毛澤東宣稱“人民公社好”，但20年後人民公社終於失敗被解散。

講真話的信，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是反對人民公社，向他下戰書，將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的頭子，文革中慘死。在道義上、政治上、歷史上，毛澤東是失敗者，彭德懷是正義的堅持真理的勝利者。

到了1980年代，鄧小平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開放方針，杜潤生重新舉起鄧子恢的“三自一包”旗幟，以包產到戶取代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制度消亡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人民公社好”，卻餓死了上千萬人；而全國糧食產量從1960年的2876.9億斤，增加到1996年的1萬億斤，證明“包產到戶好”。毛澤東曾經非常自信地反問道，到底人民公社是不是會垮台？歷史事實證明，脫離國情民意、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人民公社制度最終垮台了，毛澤東成了鼓吹“人民公社化”的歷史

河北省徐水縣宣佈，1959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兩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徐水縣為了消滅私有制，將農民財產收歸共有，農民說：“除了一雙筷子，一隻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還考慮，讓蘇聯先進入還是中國先進入共產主義。結果共產風、浮誇風、高速過渡風大發作，打著“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旗幟，把中國3700萬農民引向地獄，成了非正常死亡的餓死冤鬼。彭德懷寫了一封

小丘，是一個大失敗者。

敗績之四：“右派分子”被改正了，走資派平反了

1957年，毛澤東先是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歡迎黨外人士和黨員群眾提出批評和意見。當人們真正提出對共產黨的尖銳意見和各種建議以後，毛澤東在《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又指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要開展反右派鬥爭，並錯誤地定右派分子是反動派、反革命派，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明明是陰謀，卻說是“陽謀”。對這些好心為黨整風提意見的公民開展“一場全黨、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中共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1957年6月6日）。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反右派五人領導小組小組長鄧小平直接指揮的反右派鬥爭中，在全國錯劃了大量右派分子。1978年，中共中央文件提供的數字，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552,973人，予以改正的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按此標準，錯誤率為99.998%。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數字高於1978年改正的右派分子數，當年定性為右派及中右分子為3,178,470人，其中黨內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職工右派36,428人，高校大學生20,745人，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中右分子1,437,562人。（《往事微痕》第25期第93頁）即反右派鬥爭受難者高達317萬人！

葉劍英曾經指出，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難者2000萬人，株連1億人。審判“四人幫”起訴書載，受誣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38人，其他中央黨政軍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知名人士382人。中組部統計，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230萬人，占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地方省、

部級幹部中 75% 被立案審查，有 6 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冤假錯案 2 萬件，涉及幹部幾十萬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 966-967 頁）。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兩場浩劫，傷害了眾多的幹部和群眾，挑動了殘酷的內戰。

“四人幫”倒台後，胡耀邦勇敢地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右派分子改正了，走資派平反了。幾十萬個、幾百萬個冤假錯案的平反、改正，證明毛澤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犯了大罪。成千上萬份改正通知書、平反決定，就是毛澤東的罪證。這些血的數字，證明毛澤東是大失敗者。

敗績之五：鄧小平說毛澤東反修“九評”是空話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後，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毛澤東企圖當世界革命的領袖，公開提出要超過馬克思，中國提前進入共產主義。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連續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九篇文章，簡稱為“九評”，批判蘇聯共產黨是修正主義、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和假共產主義，展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論戰。“九評”認定，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領導權後，在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赫魯曉夫對外政策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蘇論戰，導致一些共產黨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延緩了蘇聯、東歐的改革步伐，也使中國走向更為僵化的極左路線，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老子黨作風，堅持獨立自主、民族尊嚴是有道理的，但是，毛澤東由錯誤地反對

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承認過去講了空話。



“蘇修”，發展為認定“中國的赫魯曉夫”就睡在身邊，黨內存在著資產階級和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必須開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樣，就把全黨、全國人民引入一場浩劫。

到了 1989 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鄧小平就對戈說：過去，我們雙方都講了一些空話，把毛澤東精心指導、鄧小平組織起草的“九評”貶為“空話”，說明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全都錯了，毫無價值，實際上，是造成浩劫的錯誤理論。鄧小平說：“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是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任何大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絕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8-19 頁）鄧小平承認：“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

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原則。”（《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頁）當年負責“九評”起草的鄧小平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也是公開承認並指責毛澤東的錯誤與失敗。中共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反修理論的徹底破產和失敗。毛澤東是貨真價實的大失敗者。

敗績之六：國共鬥爭中，軍事勝利了，政治失敗了

毛澤東回顧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就是戰勝了國民黨，把蔣介石趕到台灣等海島上去了，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1949年在軍事上打敗了國民黨。

但是，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蔣經國，總結了“是自己打敗了自己”的教訓，在經濟上實行和平的土地改革，支持私營經濟和中小型企業發展，建立出口加工區和科技園支撐的外向型經濟。在大陸進行文革的七十年代，台灣成為東亞四小龍之一，人均GDP遠遠超過共產黨統治的大陸。在台灣，提高生產力，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方面，國民黨真正做到了共產黨只說不做的“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在由革命黨向民主政治的執政黨轉型方面的“一國兩制”的政治競賽中，國民黨戰勝了共產黨。

2011年，共產黨在紀念90歲老年的生日時，仍然堅持1940年代毛澤東批評國民黨的落後政治體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而1980年代蔣經國和國民黨選擇了開放報禁、黨禁的民主決策，走向民主憲政、保證台灣公眾真正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和民主選舉權利，在建立了法制社會中幸福而有尊嚴地生活。國民黨在政治

上可以下台，又根據選民的選票重新上台掌權，具有重新執政的合法性，不走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台灣走出了靠選票出政權的和平掌權的新路。

因此，在政治上，國共的和平競賽中，國民黨勝利了，在台灣為大中國建立了政治特區，為大陸樹立了光輝的樣板，而仍然陷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陷阱中的共產黨失敗了。毛澤東1940年批評國民黨“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個渺小的孤島，他們懼怕

自己‘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有滅頂之災”（《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15頁），這正好是2011年中國共產黨恐懼的寫照：害怕中東、非洲的茉莉花革命的自由民主火花，燃起中國的燎原大火，因而大力加強暴力維穩。原來自封“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現在黨內的腐敗、蛻化已經高層化、群體化、制度化；黨代表權貴資產階級利益社會兩極分化，黨拋棄了緊密聯繫群眾的作風，一年幾十萬起群體事件標誌著黨群關係的尖銳化對立的社會緊張局面；從反右、文革到六四、維穩，共產黨成了反對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專制政黨。六十年一個甲子，河東變河西，當年的國共兩黨在政治上、道德上互相轉化了。

總之，到了2011年，懼怕自己滅頂之災的不是國民黨，而是



蔣經國臨死前在台灣開放黨禁與報禁，國民黨在政治上勝過了共產黨。

共產黨，在自由民主大海中，在政治上國民黨勝利了、共產黨失敗了的現實，證明毛澤東最終是大失敗者。

敗績之七：成了孤獨的大失敗者

晚年毛澤東在回首往事時，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評價，只做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兩件大事。他死前，欽定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被逼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毛澤東轉眼之間衰老了，他和全體黨員、全國人民心理都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死後不久，他的妻子、文革旗手江青被華國鋒抓捕，幾年後又被鄧小平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之後自縊身亡。

在世人認為最可愛最溫暖的家庭生活中，毛澤東有過豐富的感情，對第一任妻子楊開慧寫出了“淚飛頓作傾盆雨”的哀情。但是，第二任妻子賀子珍，雖然共同度過井岡山和長征的艱苦歲月，革命勝利後卻只能獨居上海，不准與毛見面。江青在文革中不可一世地在政治舞台上盡情扮演毛澤東的戰友和旗手角色，不過她早已不能盡妻子義務，因為，毛澤東與江青早已分居，大床上放滿了線裝本古書。毛澤東的女兒，也不能經常看他。總之，毛澤東沒有常人的天倫之樂，他在家庭生活中是孤獨的失敗者。

毛澤東在生命接近盡頭時，要身邊的小護士孟慶雲讀《恨賦》、《別賦》和《枯樹賦》，沉浸於“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桂河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年種柳，依依江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悲情中，老淚縱橫，心境淒涼，令人憶及南唐後主李煜的《破陣子》詞句：“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在中南海古代宮殿中亡國君主的孤獨悲情定能引起毛澤東的思想

毛澤東的房間有大量線裝書，卻沒有親情的氣息。



毛澤東的遺產

共鳴：“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鏤玉砌，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毛澤東的理想、烏托邦幻想徹底破滅，他的精神世界崩潰，從1970年代初閱讀《笑林廣記》的大字本，到死亡叩門之前反復聆聽《恨賦》、《別賦》、《枯樹賦》，毛澤東這棵孤單無依的枯樹正在頹然倒下。失去親人、戰友、朋友和理想、真情的毛澤東，連個人生活上最後也成了孤獨絕望的大失敗者。在文革政治壓力下，雖然讓幾億人齊呼“敬祝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但是，孤獨的毛澤東只活了83歲，就告別了人間。方毅對毛澤東的最後評價是：暴君；李慎之的分析是：“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同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論相結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時代，使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中國共產黨90年了，該告別毛澤東思想的黑暗時代了，該認清毛澤東是大失敗者，並以毛為鑑。（本文作者姚監復係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毛澤東到底是暴君還是偉人？

這裡評論毛澤東沒有任何政治動機，沒有故意貶低和抹黑共產黨的任何意圖，只不過是一個以現代人的眼光試圖來更加公平客觀的評價一下毛。毛即已死，是與非，對與錯，都會隨著他的死亡而消亡，今天我們討論毛主要目的關鍵是要接受這段歷史教訓，而避免重蹈覆轍，爭取社會的進步而不是後退，中國社會不能再折騰。

首先，毛可能是受封建思想嚴重影響的人，毛自小成長在一個封建意識強烈的家庭。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封建意識影響嚴重。毛可能是類似李自成，洪秀全似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封建社會裡，人生最成功的莫過於當皇上，坐龍椅，睡龍床了。毛內心裡很可能想過過皇帝癮。當初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退守台灣，中

共在新政權建立之初，常理是首都都會繼承舊政權的首都作為政治中心，而毛拋棄了南京，選擇了北京。

其次，毛是個登徒子。本來自古以來英雄難過美人關，英雄愛美也沒有什麼。毛愛讀聊齋，紅樓，金瓶的古書，喜好風流。毛也多次結婚，最後拋棄了賀子珍，迎娶了江青。和毛有過關係的女人到底有多少人至今無法弄清楚。如果說周恩來，鄧小平，胡錦濤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可能沒多少人會懷疑。但如果一個縱欲的人，一個連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了的人會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就和包二奶的官員不腐敗的概率一樣低。

再次，毛為何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從毛的知識結構上來看，毛青少年時期受到的教育最高只有當時的師範中專水平，也就相當於現在的高中畢業。與周恩來，鄧小平等曾經留學海外不同，毛從未有任何接觸到現代文明社會的任何經驗，沒有能力和知識來治理中國。據說毛最喜讀資治通鑑一書，資治通鑑被譽為帝王之書，傳授帝王之術，說白了就是一本教授帝王如何愚民、如何權鬥的書。毛應該說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才，權術鬥爭成了毛後半生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當時的中共高級領導幹部能夠看透毛，能夠對待毛象封建君王一樣畢恭畢敬，言聽計從的話，那也許他們就能明哲保身，不至於被迫害，甚至至慘死的悲劇。劉少奇就沒有看透，以致到最後造反派到劉的辦公室試圖綁走他時，他還手抱憲法試圖以理力爭，不過這一切只是徒勞，他最後被迫害慘死。彭德懷也沒能看透毛，在朝鮮戰爭時，毛同意其子毛岸英去前線戰場，只不過是想讓其去鍍金而已，為以後的接班定基礎，而“太子”意外被炸身亡，彭德懷保護不力，理應死罪，彭最後被殘酷迫害致死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所謂的毛澤東思想”

要想不被迫害就必須要對毛表達絕對的忠誠。當然中共內部仍不乏“有識之士”，周恩來就看透了毛，周在毛的面前表現出鞠躬盡瘁，決無二心的順臣的形象。周曾經單膝下跪給毛講解文件的內容，很多人奇怪，堂堂的一個國家的總理竟然要和牙醫來商談給江青的治療方案，那是因為江以貴為國母，不對江表達尊重就是不對毛忠心。周借此終能明哲保身，始終未被打倒。

林彪也是個聰明人。林的方法也很高明，林採取了迎合毛的手法來討好毛，林給毛帶高帽，並公開頌揚毛主席萬歲。我們知道，萬歲一詞有強烈的封建色彩，是與事實相矛盾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統治者能活過 100 歲，沒有哪個政權能統治能超過幾百年，萬歲體現出統治者的無恥和貪婪，他們當然希望能夠世世代代奴役百姓，但這只不過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願望而已。林還神化了毛，神化毛的好處有兩個，在中國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制專制社會中，上級任命下級，而最上級由誰來任命就成了一個問題，君權神授，君王被稱為天子，即上天和神的化身，神化君王可以賦予統治者以合法的身份。神化毛可以給毛的個人獨裁創造有利的環境。在文革初期，毛還需借造反派、紅衛兵的手來除去政治對手，而發展到文革後期，毛的個人威望和權力無限擴大，發展到僅憑毛的一句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當然毛也投李送桃，指定林為第二號接班人，不過毛也當然心存禍心，只不過想把林當槍使，想打倒誰時就讓林去咬誰。林當然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林最後選擇了出逃。

鄧小平也看透了毛。鄧在重新掌握政權後就立即否定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實行了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政策，事實上終止了毛的個人獨裁對國家造成的巨大的損失和給

是權力鬥爭 + 個人獨裁

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本質和實質不過



人民帶來的災難。今天中國的集體領導人制就是一種對個人對獨裁的制約。

如果到這裡仍有人不信毛是一個受封建思想嚴重影響的暴君式人物，那麼有詞可證。毛在“沁春園?雪”一詞中曾寫道：“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自比歷朝開國元祖，其心其意一目瞭然。

理解了毛澤東其人，就不難理解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現在仍鼓吹毛澤東思想的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借毛的思想來坑蒙拐騙，混吃混喝，還有一類就是借毛澤東思想的這塊大旗，宣揚自己的思想，即所謂的“掛羊頭賣狗肉”。當毛的胖孫子在宣揚用毛澤東思想治軍的時候，全國人民都笑了，因為那屬於前一類，大家都知道不必認真，因為可能是連其本人可能都不知道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涵義。而當有人宣揚用毛澤東思想治國的時候，我們就要保持高度的懷疑和警戒，因為毛澤東思想的真正本質和實質不過是權力鬥爭 + 個人獨裁。（留香）



阿拉法特的歷史告訴我們，人民不能讓一個領袖一直領下去的。

阿拉法特：認識毛澤東的一面鏡子

我們這一代受毛澤東的大騙，因而想看毛澤東的真相，但很難看到，因為在毛澤東死屍上塗脂抹粉的多的是。好在歷史會重複地發生，它重複在不同的時代，也重複在不同的國家。從歷史的鏡子裡可以得知很多的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占領了南斯拉夫，鐵托領導南共抵抗德軍，南斯拉夫 Serb 民族主義者 Chetniks 也有游擊隊抵抗德軍。鐵托的一半時間是在和 Chetniks 鬥，鐵托甚至向德軍建議，幫德軍消滅 Chetniks 的游擊隊，只要德軍不消滅猶太人。當地德軍倒肯，但希特勒不許。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不也是這樣。

看看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領袖阿拉法特的歷史，也會提高認識。本文是談心得，不準備介紹阿拉法特。

為什麼要保護群眾積極性？

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當群眾運動起來後，不管怎麼荒唐，要保護群眾積極性。為什麼要保護呢？我就從來沒有想到過這麼一點：那就是保護群眾積極性就是為了保護領袖的威信。這是看了阿拉法特的歷史才知道的。

1972 年 9 月奧林匹克在德國慕尼黑舉行。巴勒斯坦裡有個黑色九月的組織，在德國慕尼黑的奧林匹克村裡綁架了以色列的運動員，後來還殺了那些運動員。

20 年後，都沒有發現阿拉法特直接參與這個恐怖行動的證明。其實，阿拉法特的偉大英明就在於他早就認識到戰勝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他知道只能尋求和平的道路來解決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而且知道他是唯一能達到這個目的的阿拉伯領袖。阿拉法特能在這條路走下去，才得到了國際的公認，他後來為此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阿拉法特知道綁架以色列的運動員對他的和談沒有好處。

很清楚，阿拉法特對綁架是事先知道的。在他的地位上，他是可以阻止的，他不阻止。阿拉法特的一個親信 Salameh，就表示過他不直接參與黑色九月的組織，但是要控制那個恐怖行動組織。阿拉法特在會上對那個恐怖行動不明說贊成卻暗示同意。這對維持他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的大小 30 多個組織裡的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有好處。用毛澤東的話說，不能給革命群眾潑冷水。毛澤東沒有說出來的下一句話，阿拉法特用行動給毛澤東說出來了：給革命群眾潑了冷水，你就做不了至高無上的領袖了。

阿拉法特知道不可能戰勝以色列，但是他要一直對他的巴勒斯坦人民鼓吹可以戰勝，巴勒斯坦有 31 個組織，只有這個戰

勝以色列的思想可以把那麼多的組織動員和聯合起來。聯合起來後，誰做領袖呢？非他莫屬，他有1968年游擊戰“打勝”以色列的歷史，又有1982年在黎巴嫩勇敢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資歷。

因為有那麼多的組織，只要是有利於他自己的領袖地位，阿拉法特傾向採取大多數的意見，至少口頭上是照大家的意見辦。這和毛澤東一樣，照顧山頭，搞平衡，不講原則。講話一句進一句出，模稜兩可，給自己留餘地，可以翻雲覆雨。

奧運會綁架殺掉所有人質，受到全世界的指責。沒有好處時，阿拉法特跟著反對恐怖行動。巴勒斯坦的恐怖行動都有檔案，保藏在阿爾及利亞。後來阿拉法特竟想給一些歷史學家們看，目的是洗掉他是恐怖行動頭子的惡名。

這不就是毛澤東在文革裡做的那套嗎？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先讓張春橋找紅衛兵，挑動他們搞劉少奇。毛澤東原來也想打倒軍內走資派，原計劃在武漢支持造反派，見反對勢力那麼強烈，他馬上煞車，對反對在軍內造反的邱會作說，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從想整軍隊變為拉攏軍方。毛澤東一向嘲笑別人怕群眾，他那時為什麼不在武漢直接和群眾講話呢？假如他講了，保守派不聽呢？毛澤東怎麼下台階呢？他的威信不打折扣了嗎？毛澤東的威信打不起一點點折扣，只要一個地方公開地當場不聽他的話，最高指示在別地方就更不管用了。

錢，騙和監獄是獨裁者的三大法寶

1994年，阿拉法特勝利回到巴勒斯坦，成立他的政府。他政府裡的人是一批能力有疑問的點頭蟲。

讀阿拉法特的歷史，我們知道了錢實在是第一重要的事，這也是書生們研究毛澤東歷史時忘記的或者不懂得的事。辦什麼

事，一具體下來就是錢。就連文革前毛澤東為了防備劉少奇成立的一個首都工作小組，所要用的錢，周恩來特地向邱會作交待：‘這事不能轉手辦，你自己親自管著，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驚動別人。’毛澤東在江西發動農民鬥土豪劣紳很痛快，可把有錢的和稍有錢的人都嚇跑了，毛澤東的軍隊吃飯成問題了，毛澤東在錢面前得讓步。毛澤東和斯大林心想的是把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拖著，有利於世界革命。誰拿錢來打下去？蘇聯不肯，中國再要拿也拿不出了。停戰是不以毛澤東意志為轉移的，毛澤東在錢面前就得低頭。文革亂了幾年，毛澤東要“促生產”了，就是因為沒有錢，快沒飯吃了。

阿拉法特要養活大批流亡在國外的他的追隨者，要錢。要撫恤為他犧牲的戰士的寡婦們，要錢。阿拉法特的阿拉伯盟友們大大的有錢。另外巴勒斯坦地區由以色列收來的稅，也規定是他的政府的錢。但以色列規定，不能阿拉法特說要支付就支付的，還要一個管財政的人一起簽字後才可以到以色列銀行裡拿錢。這個人是對阿拉法特是第一要緊的人。阿拉法特最窮時，還有一百億美元，毛澤東從來沒有過那麼多的美元。

第二要緊的是管宣傳的。這和毛澤東也一樣，靠的是騙。

第三要緊的是他的警察頭子們。按照條約，巴勒斯坦是不



斯諾（左）對宣傳毛澤東起了巨大作用，毛澤東到晚年也禮遇斯諾。

領袖只英明一時，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阿拉法特在四點上是英明的，那就是(1)巴勒斯坦人民的獨立不能靠阿拉伯盟國們；(2)巴勒斯坦要成立自己的國家；(3)武裝鬥爭喚起了民眾和國際社會；(4)巴勒斯坦只能走和平談判的道路。阿拉法特長期地每天工作 16 小時，一聽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從國外立馬趕來，哪裡危險他就在哪裡出現，不怕死，幾乎不睡覺。頭巾很整齊，皮鞋擦亮。有點像周恩來。

革命勝利，阿拉法特掌權後，迷戀光榮和權力，正因為此，他只能用小人，他也被小人所包圍和利用。結果他沒有替巴勒斯坦人民帶來好處，巴勒斯坦國家到今日還不能成立。

阿拉法特的歷史告訴我們，人民不能讓一個領袖一直領下去的。領袖也要有這個自知之明。毛澤東沒有，阿拉法特也沒有。伊朗的霍梅尼倒是做了二屆後退下來了。(杜好書)

能有軍隊的。阿拉法特有 4 萬個警察，警察與人口的比例是 1 比 60，說是世界最高的。警察的拷打，也是世界上最殘酷之一的。鞭打，吊，香煙燙，冰水浸等等。這些說是對敵人的，其實更多的是對自己人，包括自己的警察，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共性。一次，阿拉法特的警察頭子到美國 CIA 去訪問。CIA 要他們轉告阿拉法特，近期內不要到美國來訪問，因為有人要在美國法院告他。這四個警察頭子回去後不敢告訴阿拉法特。過一個月後，美國直接告訴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氣得把那四個警察頭子全部關進牢裡。阿拉法特把自己的戰友關進牢後，在內部和外部的壓力下被迫放人後，阿拉法特總是說，這是不幸的誤會。毛澤東文革後期，也請老師和軍頭們吃飯，也說過去有誤會。

1948 年和 1967 年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戰爭，都以大敗告終。阿拉法特在約旦建立了游擊隊，過境到巴勒斯坦去騷擾以色列，以色列只能回擊到約旦邊境，阿拉法特的游擊隊逃回到約旦就安全了。1968 年，阿拉法特的游擊隊得知以色列要來掃蕩了。有人根據毛澤東的游擊戰原則，提出敵進我退，但阿拉法特不按毛澤東思想辦，力排眾議，要打一場。在山地裡，面對以色列的飛機坦克抵抗了幾個小時。以色列的原定掃蕩計劃本來就是幾個小時，指揮官見不能達到原定計劃就撤回去了。其實游擊隊死的人數比以色列要多五倍，但阿拉伯人大慶祝勝利，阿拉法特也成了英雄。1968 年 12 月美國《時代》雜誌把阿拉法特登上了封面，也為阿拉法特做領袖鋪了路。看了這歷史，就知道為什麼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們那麼誠懇地促膝談心，為什麼江青在文革時對美國作家那麼殷勤——要出口轉內銷地騙中國人民和自己的幹部。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

基辛格把毛澤東稱為“哲學家之王”

40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派遣亨利·基辛格訪華，以恢復與中國的聯繫（當時這個文明古國與美國之間的高層外交聯繫已經斷絕了20多年）。此後，冷戰結束，蘇聯（對中美兩國都構成威脅，因此促使中美展開合作）解體，而中國實行的經濟改革使這個飽受貧窮困擾、教育水平低下的國家變成了國際舞台上越來越舉足輕重的大國。

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On China)內容引人入勝，見解深刻，但有些地方顯得荒誕不經。這本書不僅談到了他在尼克松訪華事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還努力向世人說明，中國的古代和近代史如何塑造了其外交政策以及對西方的態度。雖然這本書借鑒了喬納森·斯彭斯(Jonathan D. Spence)等歷史學家的開

創性學術研究，但它對中國的描寫主要來自於基辛格對幾代中國領導人直接且詳盡的了解。

這本書精闢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和模式（孤立鎖國與對外開放的循環往復），並解釋了中美在哲學觀上的不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但基辛格說：“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傳教式的。美國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世界各國傳播其價值觀。”

他說，相比之下，中國例外主義則體現在文化上：中國不會試圖改變他人的信仰，也不會聲稱其制度“適用於中國之外的世界”，但往往會“根據其他國家與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的相似性，來將它們劃分為不同等級的附庸國”。

在基辛格對中國歷史的論述背後，是並不難以捉摸的潛台詞。就像他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大外交》一樣，如今這位飽受爭議的人物也試圖借《論中國》這本書來宣揚他作為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時所作出的貢獻。另外，這本書還宣揚了基辛格的權力政治思想，因而該書弱化了中國民眾在毛澤東幾十年統治時期裡所遭受的苦難，並且還對美國近期就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的後果提出了質疑。

基辛格與毛澤東之間更具啟示性的部分對話，已經出現在1999年出版的《基辛格秘錄》(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一書中。這些來自於美國非官方機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資料顯示，在與外國領導人的爭論中，基辛格說過的奉承話比他自己敘述的要多得多。如果你曾經讀過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松與毛澤東：改變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或者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的《纏結之網：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那麼,你大致上就會知道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打交道時的許多幕後策略。

在談到他所見過的中國領導人時,基辛格這位權力政治的忠實擁護者顯得過分樂觀,不切實際。基辛格把他們描繪成鐵石心腸的權力政治的實踐者,而他本人也因其權力政治思想而廣為人知,因此他對中國領導人的推崇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說,這種態度使共產主義中國“在冷戰期間成為地緣政治學上的‘自由國度’”,中國與美國建立戰術夥伴關係,共同遏制同為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

把毛澤東稱為“哲學家之王”

基辛格說,中國這種注重自身利益的務實態度得到了延續。在 911 恐怖襲擊之後,他這樣寫道:“對於美國在整個穆斯林世界投射力量的做法,尤其是對於布什政府所宣揚的野心勃勃的民主革命目標,中國始終作壁上觀,令人難測其意。北京堅持其獨特的做法,也就是在不作出道德判斷的情況下進行調整,積極適應大國結盟和外國政府聯合中出現的新變化。”

而基辛格本人對一些事件和中國政府的看法絕對給人以“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的感覺:“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也對事件的結束方式感到震驚。但與大多數美國人不同的是,我有機會看到鄧小平 15 年來為重塑其國家而進行的艱鉅任務:讓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地方分權和改革,讓狹隘的傳統中國人具有現代觀念和全球視野。這些都是中國常常拒絕接納的東西。我還親眼目睹了鄧小平為改善中美關係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對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基辛格更是顯得滿不在乎,不禁令人心寒。基辛格描寫了他口中的“悲慘”

美關係。

八十四歲的基辛格依然關注中



毛澤東的遺產

場景:“尼克松稱讚毛澤東改變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面貌。對此毛澤東回答說,‘我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我只能改變北京附近的少數幾個地方而已。’”

他寫道:“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不斷革命’的主張,但當中國國家利益需要時,他也會耐下心來長時間地觀察。控制‘矛盾’是他的公開策略,但這個策略同樣服務於儒家思想中有關大同世界的終極目標。”

基辛格承認,有些人認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將矮化毛澤東所取得的成就”。但基辛格卻冷酷地將這種傷害合理化:“有些中國人認為,秦始皇的惡行是必要的罪惡。如果中國保持統一,並且成為 21 世紀的超級大國”,那麼許多中國人可能也會這麼看待毛澤東。

基辛格對毛澤東繼任者們的描述流露出了讚賞和親密之情。他在回憶周恩來時說,他“講起話來像孔聖人那樣自然優雅,極富智慧”。他還說,舉止文雅的周恩來——“因為專注於軟化而不是反對毛澤東的部分做法而受到批評”——面臨著“君主顧問”所面對的典型窘境:在提出反對意見之前,他必須在“改變政

策所帶來的益處與遭到排斥的可能性”之間進行權衡。

國際體系結構發生根本轉變

關於鄧小平，基辛格說他“個子不高，性格剛強，有雙憂鬱的眼睛”。基辛格提醒我們，鄧小平及其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了巨大傷害——他被下放從事體力勞動，他的兒子“受到紅衛兵的折磨，被人從北京大學的樓頂上推了下去”，結果摔壞了脊椎，他們卻不准他到醫院治療。在鄧小平重返政府工作崗位後，他用“秩序、專業和效率”的價值觀取代了文化大革命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純潔性。基辛格認為，鄧小平提出的現代化將“毛澤東時期以農業公社為特徵的貧窮中國”變成了繁榮昌盛的經濟大國。

這本書中還出現了對尼克松的新看法。基辛格間接承認了歷史學家羅伯特·達萊克(Robert Dallek)等批評者的言論：尼克松試圖利用他針對中國和蘇聯的行動來分散人們對於越南戰事失利的關注。基辛格寫道，毛澤東希望“採取措施，讓蘇聯人在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之前有所顧慮”，而尼克松希望“讓美國人的目光遠離越南”，這些便是尼克松訪華的部分原因。

基辛格還寫道，與中國的談判十分隱秘，“險些導致計劃流產”。當時，毛澤東在採訪中向尼克松發出邀請，但對內情毫無所知的美國國務院認為，這個邀請並非真心實意，因此加以拒絕，並稱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擴張主義的”和“相當偏執的”。

近來，中國握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事實，以及日益崛起的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問題（這是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和詹姆斯·金奇 James Kynge 的《中國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

等著作的主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熱烈討論。雖然基辛格對此未曾深入探究，但他表示，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領導下的中國，不再認為自己是西方技術和制度的學徒，那種受制於人的感覺也隨之而去”。他還說，2008年的經濟衰退“嚴重削弱了中國人對於西方經濟實力的崇拜”。

基辛格聲稱，這些新情況已經導致“中國——學生和網絡用戶等直言不諱的年輕一代，甚至很有可能還包括部分政治和軍方領導人——出現了新的輿論潮流。換句話說，國際體系的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基辛格表示，中美合作關係“對世界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他警告稱，要是兩國出現冷戰，那麼“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太平洋兩岸都將陷入發展停滯狀態。而且，在核擴散、環保、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課題要求我們展開國際合作之際，中美冷戰將導致所有地區的內部政治爭端不斷”。應該指出的是，基辛格是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的主席，而與這家公司合作的，是那些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企業。

他寫道：“中美關係不需要也不應該變成零和遊戲。”
(dongxi.net MICHIKO KAKUTANI)



毛澤東 1957 年 2 月 27 日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講話。

毛澤東精心策劃“陽謀”的步驟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這個行為卻衝擊了遠在中國的毛澤東，從此赫魯曉夫像幽靈似地跟著毛澤東，讓他寢食不安，之後所發動的重大政治運動可以說與赫魯曉夫現象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現象的產生是接班人問題沒有解決好，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的發生是因為肅反不徹底而引起的，因為還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因此，要使赫魯曉夫似的人物絕跡就必須深挖隱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策劃了一場大“陽謀”——反右鬥爭。

大張旗鼓宣傳“雙百方針”

1956 年 4 月 28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以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家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所謂“雙百方針”，應該成為中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5 月 2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把“雙百”方針提出來。5 月 26 日，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共兩千人的大會上，做了《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之後經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於 6 月 13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陸定一說：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家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以上宣佈過了。……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必須採取“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無論那朵花怎麼好，也是不會繁榮的。

我們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麼，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

我們所主張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陽謀」大計。

陳其通(右)當年差點壞了毛澤東的

9月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重申了黨的“雙百”方針：

為了繁榮我國的科學和藝術，使它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黨中央提出了“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須兼容並包的。黨對於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

陳其通不懂毛澤東的心

毛澤東如此別有用心地大張旗鼓地宣傳“雙百”方針，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這是由於毛澤東執政以來，發動了不少政治運動，而知識分子總是運動的對象，在每一場的政治運動中不是被整得灰溜溜的就是被打掉精神的脊梁骨。胡風事件就是一次旨在打壓知識分子的“文字獄”，為此不少的年輕有為的知識分子獲罪而入獄，這事件發生在兩年前的1954年，全體中國知識分

子對此還是記憶猶新，心有餘悸，個個成了驚弓之鳥，失魂落魄。還有誰敢“鳴”和“放”？大家都“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只有個別的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在“雙百”方針鼓勵下，寫一些所謂“偏激”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另一些人不明事理而反對“雙百”方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及其同事馬寒

冰、陳亞丁、魯勒四人聯名於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陳其通等人認為：

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戰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裡光彩黯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方向，在一些刊物上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燦爛的這個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漸少起來了。充滿著不滿和失望的諷刺文章多起來了。



毛澤東曾為22歲的王蒙的小說《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辯護”，但王蒙仍然被打成“右派”。

毛澤東暗地下達反右動員令

“鳴”不起來“放”不起來這種狀況，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看到的。他提出“雙百”方針本意在於“引蛇出洞”，但是眾多的知識分子顧慮叢生，三緘其口，不放不鳴，採取消極的態度。再加上不明底細的人的反對，“雙百”方針將有夭折的可能。為了實施“陽謀”，毛澤東只好親自出馬現身說法，使大家相信“雙百”方針是出於真心而不是甚麼“誘餌”，他採取了四個措施。

第一個措施：毛澤東在黨內高層大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1957年1月下旬，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蟥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

機會他們就要動搖……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蟥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

“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

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

“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大談特談國內外，黨內外的階級鬥爭，繪聲繪色地說明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實際上是一篇反右的動員令。蘇聯的階級鬥爭影響到國際共運，影響到中國。既然“螞蟥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那麼該怎麼辦？那就將螞蟥、烏龜、王八們揪出來。這就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他給黨內高層先打個招呼、讓他們有思想準備、免得亂了自己的陣腳。

毛澤東這個講話當時沒有公開，作為黨的機密，一般人無從知道，二十幾年後人們才在《毛選》第五卷中看到。當時人們如果知道這個講話的話，可以斷定不會有人去“鳴”、“放”了。

批陳其通以推行“陽謀”

第二個措施：批評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以上強調階級鬥爭的同時沒有忘記他的“陽謀”。他還極力推行“雙百”方針、掃除妨礙“鳴”、“放”的阻力。他說：“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見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讓它放，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也許這四位同志是好心，衷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批評並明確表示不贊成陳其通等四人的觀點。同時還批評了《人民日報》長時間內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不表態的做法。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鄧拓聽了十分緊張，於是急急忙忙從來稿中找出一篇

批評文章登在3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並請作家茅盾寫文章批評。茅盾在3月1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他們（指陳其通等人——筆者註）的文章缺乏說服力，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其結果不但不能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有效的鬥爭，而且給讀者以‘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原來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給廣大的在‘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鼓舞活躍的知識分子一瓢冷水。……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對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我極端擁護他們這一個主張，而且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文藝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我們要進行這一思想鬥爭時，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條主義的老調，要同時大力反對教條主義；簡單地採取禁止‘放’和‘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的工作方法是讓大家來‘放’來‘鳴’，開展自由討論，從討論中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

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陳其通們的文章。4月4日《人民日報》集中發表了一組讀者來信，批評陳其通等人的文章。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也於4月9日在《文匯報》上以答記者問的形式，批評陳其通等人的錯誤。11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

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不久馬寒冰引咎自殺。

陳其通等人不知底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雖然這些看法按現在的標準來看是左得不能再左了，本應該符合“左王”毛澤東的意才對，沒想到，這一次陳其通等的文章卻阻礙了毛澤東的當時的策略，影響了毛澤東的“陽謀”。毛澤東需要“鳴”，需要“放”，這樣才能引蛇出洞，所以毛澤東必須極力反對陳其通等的觀點，為“鳴”、“放”掃清道路、讓“陽謀”得以順利實施。

毛澤東：王蒙的小說寫得還不夠

第三個措施：為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辯護。王蒙當年22歲、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這部小說。該小說描述了青年幹部同官僚主義的區委書記進行鬥爭的故事。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事，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化身，而黨的幹部則是這種偉大、光榮、正確的具體形象，因此，小說一發表就受到責難和圍攻。毛澤東在各種會議上一邊批陳其通等的文章，一邊大聲疾呼支持王蒙。他說：“最近北京有一個戰役，有幾個解放軍在那裡圍剿王蒙（指的就是當時總政治部以陳其通為首的那四個人，他們站出來對王蒙提出批評）我要替王蒙解個圍。王蒙又不是我的兒女親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寫了一個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有人問我贊不贊成那篇小說，我告訴他，我很不贊成！因為他寫的還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為甚麼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義也可以反嘛！我說過我對這個小說很不贊成，是因為小說寫得還很不夠。他們沒有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現在拜託你們諸位，千萬千萬把我的意見傳達下去……”。

毛澤東還說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們的缺點，不能用李希凡的那樣的批評。他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命令，當了婆婆，寫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我們黨威望高，靠黨的威望，官僚主義就橫行霸道違法亂紀，是不是該加以改正”。

第四個措施：毛澤東親自出馬闡明“雙百”方針的意義。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說：“國內形勢是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是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



傅雷這樣的書生識不破毛澤東的用心，終於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夫婦雙雙自殺。

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所以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今後處理矛盾的公式是團結—批評—團結。而“雙百”方針是正確處理人民矛盾的根本方針。這個講話當時沒有發表，這裡大有文章，不發表是為了以後便於做手腳。在反右期間所發表出來的內容則是面目全非，邏輯混亂，矛盾百出，前言不對後語了。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的講話，不僅內容新鮮而且幽默、風趣、生動，讓人興奮、舒暢、輕鬆、愉快。但是同樣是這個毛澤東在1月底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著重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就可以看出其中隱藏了禍心。

傅雷讚嘆毛“馬克思主義到了化境”

緊接著3月5日，召開全國宣傳會議上進一步貫徹“雙百”方針。在會議期間還召開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會上毛澤東說：“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行政領導、政治領導”。毛澤東認為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將來這種狀況是需要改變的。

接著，毛澤東開始南巡，加緊“陽謀”行動。3月16日離開北京，17日在天津、18日在濟南、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4月初到了杭州。極力推銷所謂的“雙百”方針，真可謂不遺餘力。經過毛澤東一番表演，努力的推銷，他的“雙百”方針還真的讓不少人相信了。翻譯家傅雷在參加全國宣傳會議以後給其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

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滬上文藝界半年來

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抓得緊，彷彿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國省市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2月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也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

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貫通了的人。

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中共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開戰”。他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黨派人士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會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這進一步表明毛澤東對“鳴”、“放”和共產黨整風的態度。

在毛澤東一再鼓動大家鳴放的同時，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提出“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劇烈的偉大的變革中，黨在實現自己目標的鬥爭中必需同時改造自己；而執政黨的地位使許多黨員容易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一部分人還沾染了特權思想。因此決定進行一次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

這樣一套完整的部署算是完成了。先是毛澤東一再鼓吹鳴放，解除人們顧慮，而後提出中共要整風，最後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一套連環計顯得非常完整，合情合理。這時毛澤東從前台退到後台，他就像一個漁夫布了網，放長線，然後等待時機，等待魚兒上鉤，隨時收網。

可憐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此前已經被毛澤東整得靈魂出竅，顧慮重重，疑問甚多，但他們愛國之心不死，正義感未泯，最終還是被毛澤東的“陽謀”所欺，他們還是相信了毛澤東的“誠懇”，參加了“鳴放”，結果被打成“右派”。

吳宓看透“毛公有事於天下書生”

在“反右”前幾乎沒有人看出毛澤東這一套欺世盜名，無恥之極的政治變戲法。這也不能怪罪善良的知識分子，因為誰會想到，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居然會如此言而無信，道德品質會如此低下呢？

在此，應該提到一位偉大的學者，他不像其他知識分子那樣被毛澤東的言論所迷惑，更不像傅雷那樣單純，始終保持著清醒

的頭腦，這個人就是西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吳宓在鳴放座談會前就識破了毛澤東的變戲法。他認為毛澤東上述的做法是一種圈套、一個陷阱。他看到了毛澤東又要加害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他看出毛澤東的“鳴放”的真正目的時，當即把他的忘年交張紫葛請來，對他說：“古人說過又說：言甘而幣厚，其心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之，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剩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毛公有事於天下書生”。這句話毫不含糊，一針見血，道破了毛澤東的“陽謀”。他對張紫葛說參加座談會，最好保持沉默，但不說話可能辦不到，那就歌功頌德。這樣能不能躲過這場劫難，還不一定，要看撒下的網有多大，如果你在網內，即使這樣也逃不過去。

張紫葛教授在座談會上完全按吳宓說的方式去做了。在會上只講好話，不提意見，結果還是被打成“右派”。張紫葛到院黨委書記那裡責問為甚麼把他打成“右派”？院黨委書記反問道：你不是“右派”難道我是“右派”？這就是毛澤東的“反右”運動！（日吉秀松）



美國時代週刊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封面。標題是：紅色中國的毛澤東。紅色的基調和蝗蟲明確體現著意識形態的含義。

毛看歷史大視野和歷史大視野看毛

網友落基山人一直在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不但很有理性，而且文字精煉，有一種特別的高屋建瓴的角度和邏輯。他剛剛在萬維發表的《對反毛派的一個歷史心理分析》就是這樣一篇代表作。

山人說：“從 1840 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不會忘記幾個歷史人物，一個就是慈禧太后，一個是曾國藩與李鴻章，一個是康有為

和梁啟超，還有一個是袁世凱，另外一個是孫中山和蔣介石，最後一個就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中國的近代歷史，如果沒有這些人，你會不知道如何的敘述，無論我們對這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如何，但我們都無法繞過這些歷史人物。這些歷史人物對近代的中國有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他認為，評價毛和其他中國歷史人物，我們必須要在一個大視野中來看。

這是完全正確的。

視野與角度

我跟山人兄的分歧，主要在歷史大視野的角度和邏輯上。山人的視野與角度，是“站在民族與國家的大局和高度上看問題”。從山人所站的這樣的大局和高度上看，慈禧太后，袁世凱，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他們的失誤或錯誤，甚至哪怕可以說很毒辣殘酷的作為，都是因為時代的局限或者大局的需要。從歷史的高度，他們都為國家民族做出了艱難的抉擇並取得了凡人不能向背的成就。山人特別例舉了新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一系列輝煌的成就。當然他也不掩飾毛的失誤或者無奈之舉。例如“毛急於工業化，而毛的工業化又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那樣，採取侵略和搶劫的方式來完成，毛只有靠剝削自己的農民，搜刮農民來進行自己的工業積累。這是毛的悲哀，也是全體中國人的不幸，尤其是中國農民的不幸，但是毛沒有辦法。大躍進就是毛急於工業化，剝削農民的一個例子。”

山人最擲地有聲的是這一句：

“當我們可以批判毛的時候，別忘了一個前提，就是今天你能在這裡，在那裡品頭論足，是因為毛讓你站立起來了，是毛給

了你一個挺立的脊梁。”

我承認，山人確實是站在“民族與國家的大局和高度上看問題”。這個大局和高度，不但升斗小民不可能達到，一般的學者專家，甚至朝廷大臣和核心幕僚都難達到：皇帝的心事基本上只有皇帝自己知道。要御覽皇圖全圖，跟皇上胸懷同一個世界，連張居正都做不到。事實上，毛胸中的大局宏圖，連劉少奇周恩來都經常摸不著邊。當然，象山人這樣可以做一個近似的模擬。

按照這個模擬，列寧斯大林的偉大也是無可否認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傑出也是有史為證的。連波爾布特也可以是一個傑出的英雄：他反抗封建皇朝，反抗美帝，反抗越南的佔領和侵略，等等。朝鮮的金家父子就更不用說了。任何“不懷偏見”的歷史學家，都可以“非常客觀地”例舉出列斯希墨波金等人的成就，對民族與國家的貢獻，以及不得已為之的暴行，加上無可奈何的歷史局限。當然還有俄羅斯德意志意大利柬埔寨朝鮮人民和民族每一個人自己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條件和局限

可是，我懷疑山人會同意我把毛歸到這些“受局限”的歷史人物一類。

撇開這些人物的“心理”不談，因為他們的“心理”大概沒有我這樣的反毛反共份子的心理那樣狼心狗肺全露在外面。我同意山人的這個觀點：看待評價歷史人物，必須要看歷史條件和局限。我還認為，要看清那些歷史條件和局限，要有縱向和橫向的坐標。有了歷史的縱橫坐標，我們應該知道，要張居正開創我們今日的改革大業是荒唐的，而要今天的共產黨人做張居正那樣的改革家，同樣是荒唐的。如果確實張居正在今日中國還是

千呼萬喚都難產難求的人物，只能證明中國現實的歷史性荒唐。

縱向的坐標：慈禧太后跟康熙乾隆比，從她做妃子起就跟著皇上被洋人打得東躲西藏，到後來做太后聽政訓政執政幾十年，大清朝江山社稷是保本了還是蒸蒸日上還是江河日下？

橫向的坐標：慈禧太后時代，世界之外，不但西歐列強把幾乎所有科技新事物的樣品都送進了大清皇宮，日本還在她眼皮底下經過了明治維新發達起來逞凶狂，世界上還出了個根本不要皇帝的美國。在大清的治下，神州從當朝重臣到民間，諸多有識之士一再發聲進諫要求維新，也有刁民一再冒死造反革命，這個確實十分美貌也絕對聰明的母儀天下執掌乾坤的太后，從哪一點上說她代表或者順應了歷史和時代的潮流？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的局限”？要求堂堂華夏文明的最高統治者在19世紀知道地球是圓的，鐵船是可以越洋的，民眾是要吃飯的，抵抗日本是比六十大壽更重要的，超越了歷史的局限嗎？

至於袁世凱也就用不著多說了。當洪憲皇帝，也是“歷史的界限”或者就是受了太子和楊度的騙，或者國人愚昧，偏要擁戴他？他不知道世界進入了現代？不知道電燈電話電報汽車飛機是好東西，新聞自由是壞東西？

至於毛澤東的“歷史局限”，我覺得山人就肯定要得罪毛粉絲了。這個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把人類最先進的思想引進中國並中國化，領導中國人民並指引世界人民奔向人類最美好天堂的導師，也受了歷史的局限，沒有能夠一步到位把中國人民全部送進天堂，那是無論如何邏輯上理論上說不通的。

還原歷史和本相

好在山人不是毛粉絲。我們可以認真探討毛的歷史局限。首

先，是不是當時中國的信息閉塞或者毛的聰悟不夠，象洪秀全那樣只知道三綱五常和什麼名堂也搞不清的“上帝”？他知道不知道孫中山？知道不知道美利堅合眾國？知道不知道袁世凱做皇帝的可笑以及蔣介石要做獨裁者的可惡？知道不知道哪怕一點點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時代的社會真相？知道不知道斯大林的獨裁的恐怖？知道不知道他的家鄉韶山的農民跟他父母兄弟一樣，有生存和求溫飽求平安的權利與要求？知道不知道畝產不可能萬斤？知道不知道如果韶山的村民知道他當年出來鬧革命，就是要把全鄉人都搞成水腫病甚至活活餓死，把山林砍光燒鐵疙瘩，就是為了山人和阿姐這樣的後代能夠今天在世界揚眉吐氣，那些愚昧的村民不用鋤頭把他挖死，也會把他扭送官府？阿姐今天能夠回到韶山，給毛主席敬獻一個大花籃，振振有詞地說，謝謝毛主席把韶山村民父老餓死那麼多，謝謝大家願意生水腫病，讓我今天在美國風光牛氣？將來我跟新宇一定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為了超過或者打敗美國，再把你們韶山的民眾餓死一批，斗死一批，至少要累死一大批，戰場上光榮犧牲一大批，請大家積極報名！

山人說，“中國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歷史的遺忘，打倒了歷史人物，為的是將他們遺忘，然後就可以繼續重複他們的歷史，包括重複他們的錯誤。”

恰恰相反。至少我這樣的反毛反共份子，就是拒絕歷史的遺忘，也絕對不是要去打倒什麼死去了的歷史人物。我們只不過把過去尊為王和神和偉人的歷史人物，來還原歷史和這些人物的本相。絕對不能把他們抹去，絕對不可以重複他們的歷史，哪怕他們確實建造了金字塔。要認真審視中國人民苦難的歷史。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確實有許多是外來強權的入侵欺凌。但是，最多的苦難最慘烈的欺凌，主要還是來自內部的暴君貪官污吏

和自身的愚昧制度的荒唐，包括外來侵略加害，大多是內腐蟲生而引來禿鷲豺狼爭奪搶食。這不是什麼正確的大方向下糾正錯誤的問題，而是選擇真正正確的歷史大方向，拒絕統治者對人民和民族再犯罪的問題。

共產主義的滔天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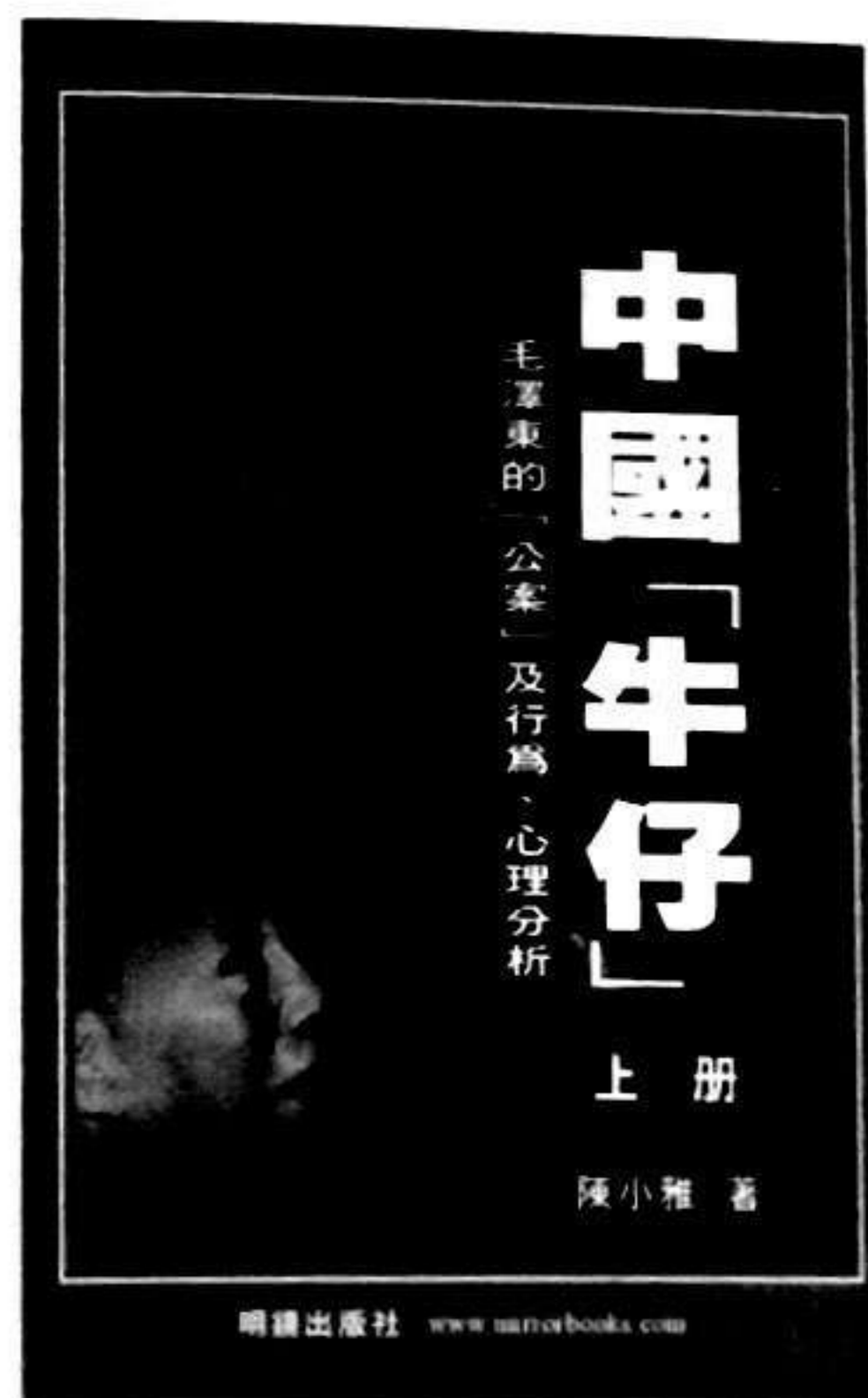
今天，當我們探討這些“歷史的局限”的時候，我們這些“反毛份子”並不是要去挖毛家祖墳，更不是要把導彈衛星甚至長江大橋都去拆掉。沒聽說過因為知道慈禧太后的腐朽清王朝的可惡，有任何人要把滿人連帶滿洲新疆西藏全部扔掉，當然也不是只滿足於剪掉豬尾巴，而是要改造革新神州國度的制度與理念，不能讓中國人仍然生活在另外一個太后皇帝或者一群佞臣的統治之下。也不能指望中國人一直會有一個無法知道怎樣產生的英明領袖保佑大家世代平安幸福。

如果說中國當年選擇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確實是由於歷史的某種局限或天公的作弄，那麼在今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滔天罪惡已經完全暴露，其喪失人性，違背天理和客觀規律，以虛無縹緲的“理想”煽動狂熱，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視生命人權民權為下飯菜，已經是無法掩蓋的事實。在第三帝國和蘇聯的廢墟上，在北朝鮮這樣一個鮮活的醜惡標本的參照之下，中國在選擇什麼樣的未來道路與理念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的局限”要我們堅持高舉毛神像，要死活扛住沒有任何人真正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夠自圓其說的共產主義大旗，要堅持自命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進份子組成的”共產黨的絕對專政統治？（阿姐不牛）

“但無論中國發生什麼，毛澤東都將作為一個‘偉大領袖’被紀念，也包括自秦始皇以來大多數驚天動地的統治者。總之，我想毛澤東壓根兒不必痛苦。”

這似乎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歎，但卻道出了一個事實，毛澤東已經不在乎別人再給他抖落出多少罪名。他已經是一種存在。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可以等同於“神”或者“亞神”。從語言、思維方式到行為模式，他已經成功地附體於每個中國人的身上。

的確，在中國，不論是鄉居農村的耕夫，還是身棲學府的知識分子，大凡四十歲以上的人，對毛澤東都有個說法。不論是作為觀眾、讀者，抑或是作為受益人，還是作為受害者，他們都曾親自領略過他的政治藝術，深受其思想和語言的濡染。再加上以毛澤東為符號的一代人創造的政治現實——作為一個站起來的東方大國——已經成為今人社會生活的基礎……所以，評價毛澤東，不僅很容易與政治的結論形成矛盾，甚至也很容易觸動人們的感情之弦。惟其如此，要做到公正又公允，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其中一個分歧最大的觀點是：



陳小雅著《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

誰需要吸食“毛澤東精神鴉片”？

革命方覺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親。

這是文革時流行的一副對聯。時至今日，雖然大多數人已經把那個時代的親歷比喻為一場“夢”，但這個“夢境”，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是親切而真實的。

2000年2月24日，美國的《紐約書評》曾刊登過一篇 Ian Buruma 的批判毛澤東的文章。這篇文章取題為《Divine Killer》，翻譯成漢語叫作《天殺的……》。其內容可想而知，不僅刻畫出一個殘暴、陰險和毒辣的毛澤東，而且還描述了他的虛偽。但該文的結論卻是出人意外的：

毛澤東是否代表了人民群眾？

在毛澤東時代，在今天大陸，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社會的輿論中，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那裡，毛澤東是人民群眾的“大救星”，是解放者，是民族英雄。但在海外，在國內思想界、理論界、知識界乃至政界的私下言論中，這一信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動搖。在那裡，人們更多地把毛看成是一個“暴君”，一個以億萬人之生命供其私欲的“帝王”。

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學家，依據歐洲歷史進步的三個階梯，曾把君主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概括為“神權—君權—民權”三個時代。這就是說，“君權”並不代表“民權”，君主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敵人”。

但中國古代哲學卻為人們構造了一個“權力之環”：“天子”是代表“上天”來統治社會的，而“上天”的意志，是通過其執政業績的考核來表現的，如果政權腐敗，條理不當，大自然會以“天降災異”來警示“天子”。如果天子仍不覺悟，人民就會“順天應人”，“替天行道”，起來“革其王命”。所以，古代具有“民本”思想的哲學家，又由此演繹出“天道本於民心”的理論——用“天”把“君”和“民”連在一起。這是古代“君民一體”思想的理論來源。

按照這種理論，凡帝王，在其位者，就是代表了民意者，凡人民反對者，自然就不是人民的代表。這就把“神權—君權—民權”納入了一個循環一體的構造，既不否定它們的“同一性”，也不否認它們的“鬥爭”性質。究竟是“同一”還是“鬥爭”？其性質，依隨時隨地的統治狀況而定。這大概也是中國古代滿足於“仁君”的“人治”和“仁政”，而不思“制度革命”的原因所在。

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古代國家是一個皇權國家。其較歐洲社會更龐大的國家機器，是靠

稅收維持的。而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是自耕農。所以，國家的穩定與自耕農的穩定，是利益一致的。但是，受經濟規律的作用，每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就會有地主、豪強和富商大賈一類“中間階層”發育出來。他們或者把農民“籍沒”為奴隸，或者對社會財富巧取豪奪，總之是使原來國家可以得到的利

益，落入了“中間層”的腰包。而民眾則要面對國家和“中間層”的雙重剝削。對於農民來說，自然是剝削的層次越少越好。所以，每當國家因減少收入而打擊“中間層”的時候，它在客觀上也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另外，在國家的象徵——帝王和百姓之間，還隔著具體辦事的官吏階層。他們也經常利用職務之便，與“中間層”勾結，榨取民間財富，斂為私有。因而，每當帝王要重振乾綱，肅清吏治的時候，老百姓也會拍手稱快。在這樣一種“天高皇帝遠”的社會結構中，百姓與帝王的直接矛盾自然較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唯一的一部替“造反者”立傳的文學作品《水滸》，具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傾向之原因。

這種模式同樣也適合運用到解釋毛與民眾的關係。

在1949年以前，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尤其是代表了農民，這恐怕是沒有異議的。

1949年以後，說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這句話已經失去了1949年以前的含義。它本身只意味著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中的某一部分”。



毛澤東維繫著文革造反派的夢想。



《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成敗”這個不著邊際的課題中進行考量。這固然能解釋毛澤東的部分動機，但它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並不能解釋誰代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

誰代表“官僚主義者”階級？

根據約定俗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不關心人民疾苦，靠剝削人民為生的權力階層。在現實中，周恩來、陳雲的經濟思想，不是打擊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而是比較地注意其休養生息的利益；鄧子恢、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們的行為，恰恰不是脫離了人民，而是“遷就”了人民的“私有觀念”和“發家致富”的願望。與其說，他們是蘇式官僚體制在中國的象徵和代表，不如說，他們的思路更接近被視為列寧主義“叛徒”的布哈林的思想。而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已經認錯，但內心並不服氣的毛澤東，倒是更像

那麼，毛澤東究竟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呢？

前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最常用的思路，是把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教訓作為開端，認為毛從那時起，就開始注意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人們還以他批評“反冒進”的言論、批評赫魯曉夫的言論做為佐證，把中國的“反修”運動放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

無視農民痛苦、強行推行集體化、追求“一大二公”的“官僚主義者”斯大林。真正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農民最恨的“四不清”幹部，並非毛式“社教”運動的重點……所以，說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代表了人民大眾，看上去就有點兒牽強了。

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斷言，在毛思想中，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呢？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並非一個孤立的觀念。它和反對“八級工資制”、官僚科層制、城鄉差別、體腦差別等等一系列與西方“工業化”配套的“現代化”設施是一體的。據說，毛澤東也曾與他的“主教”們探討過，實行“計劃經濟”就要消滅商品的問題。列寧的實踐，解決了從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政治權力”問題，但沒有解決“社會道路”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仍然要通過“血淋淋”的、剝奪農民的“原始資本積累”道路，然後才在較高的生產力水平上進入社會主義？這些，都一無例外地仍處在“實驗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實驗，無非是想繞開隔絕著“農村公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間的那個“卡夫丁峽谷”，尋找一條沒有痛苦的進入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一點，毛澤東在被“大躍進”的假象矇騙，勝利衝昏頭腦時，已經表露無遺。而務實的劉、鄧，對這條道路也是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打算走走看，因此並無成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敗，顯然證明了他們的懷疑。所以，他們與毛澤東之爭，的確是路線之爭。在這個問題上，孰是孰非已經有了歷史的定論。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也很難說誰是代表人民群眾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淺固然是人民群眾的特徵，它不會因人們對於毛澤東的迷信和崇拜而有本質的變化；同樣，幻想烏托邦，激情浪漫，狂燥，也是人民群眾的習性，尤其是其中小知識分子的習性。它們也沒有因為毛澤東的去世就從社會中絕跡。所以，事情似乎

是：劉、鄧是在為他們的眼前著想，而毛澤東是為他們當時還沒有看見的“將來”著想。鄧小平主政後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兩極分化”，以及這時社會懷念毛澤東情緒的抬頭，已經證明，在“代表”人民方面，他們似乎是“各有千秋”的。

呼風喚雨毛澤東

在毛澤東的身上，確實有著濃重的“克利斯馬氣質”。這一點，從他的詩詞中也可以反映出來。詩品專家章立凡發現，毛澤東喜用誇張筆法，大規模數量的“人口”，經常被他的筆尖隨意點來，成為呼風喚雨、抒發豪情的油彩。這樣的例子，可見於戰爭年代詩詞中的：“十萬工農下吉安”、“二十萬軍重入贛”、“百萬工農齊踴躍”、“喚起工農千百萬”等著名詩句；定鼎以後，又有“人民五億不團圓”、“六億神州盡舜堯”等名句。章氏認為，這應當是“詩人認為人多好辦事，常以人多自雄於天下”的觀念的反映。而人口失控，“蓋肇端於此種觀念”。

的確，毛澤東喜歡玩弄人，玩弄人口，更喜歡直接面對人民大眾，並有能力直接駕馭這頭“洪水猛獸”。他的“蔑視權威”的氣概，很能迎合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好。1954年批判“學術權威”俞平伯，他就是以維護兩個“小人物”的“權利”為藉口的；1956年，他批判“反冒進”，用的就是“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這個藉口。從廢除“師道尊嚴”、砸爛規章制度，到摧毀等級特權，包括學校停課和免除考試，都在一定社會階層和年齡層中大受歡迎。

中國歷史上凡是當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實學。唐朝最偉大的兩個詩人連舉人也沒考取。

毛澤東將赫魯曉夫斥為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的遺產

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

“害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卻怕教授，這也是怪事。”

毛澤東的這些充滿“牛仔”氣概的講話，使多少當時代青年人心花怒放，躍躍欲試！

在爛熟的西方文明社會中，他也是青年心目中的“傳奇式英雄”。其行為有的還為“後工業社會”理論——反智主義——提供了依據。但在當時的中國，在一個尚有“五億文盲”，經濟、科學、文教都極為落後的社會，這只能倡導“蒙昧主義”。

他反感現代國家“官僚科層制”的煩瑣程序，更反感它們日益脫離群眾的傾向。他自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背著中央政治局常委，背著中央委員會，拋開中共黨的一切合法機構和程序，通過他那既非中央領導成員、甚至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夫人江青，秘密組織“親信集團”開始的。在文革中，他點名批評

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確曾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文化、衛生和商品供應狀況。在把那各級幹部整得五癆七傷之後，他的要求似乎也很淺顯：

“我只要求你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罵人？”“這次一年多的一個大批判運動，可把這些幹部嚇一跳。”

但在這同時，卻把城市生活幾乎變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勵工農兵上大學，嘗試把農民變成科學家和詩人的時候，卻廢除了幾乎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大腦，使其不能實施“價值判斷功能”，並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實行“認識功能”。他在給鄉村小學教師寫信，給知識青年寫信，批評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審訊犯人”的同時，容忍著更大的社會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過土改、鎮反、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的、最大的“人權欠債”運動。

因此，大體可以看出，與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代表“反現代化”思路一致，在文化上的“反智主義”一致，他基本上代表的是這樣一部分人民群眾：

- (1)在政治位勢上，是處於社會底層；
- (2)在智識上，處於中、小知識分子程度；
- (3)在組織狀態上，處於被整合程度較低的社群；
- (4)在年齡上，處於較輕階段的廣大基層社會群眾。

這一部分人群的特點是：

- (1)他們是被封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而絕非“被統治”、“被團結”和“被專政”的階級一分子；
- (2)他們或因對“主人公”地位，對“自由”、“平等”概念抱有

浪漫的期待；

(3)他們或因對“大工業”的現代社會缺乏心理準備；

(4)他們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種際遇與先天因素，處於被壓抑狀態；

(5)在他們眼裡，毛澤東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大救星”；是贈送“奇跡”的“聖誕老人”，是他們的宗教偶像……一句話，毛澤東是他們的“精神鴉片”！

(6)在這種“精神鴉片”的作用下，他們習慣了“依賴”別人的思考，依賴“大鍋飯”的保障，不在意精神是否自由，或者被別人洗腦。

在毛澤東的月亮沉入海底之後，他們迅速地被各種次級的“偶像”俘虜，被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各種准宗教社團吸引與吞納，應是順理成章之事。

在海外，已經有“民運人士”聲稱，當年毛澤東支持的“革命委員會”，就是人民群眾在文革歷史條件下，爭取民主鬥爭的政治成果。其得而復失，完全是因為老“走資派”又重新回到了權力的中心。可見，毛澤東這桿旗幟，已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賦予了新的含義。而在未來的階級衝突中，如果沒有“代用品”出現，他必將再一次被利益失落的人群祭起。

——此言既出，只待驗證。

（作者陳小雅著有《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和《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



毛澤東讚賞的就是華佗這樣自學成才的人。



解放軍退休大校辛子陵(右)與李銳交談。

胡錦濤的部下不聽胡錦濤的話

胡錦濤總書記近來向全黨提出,在新時期要正確認識、區別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及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論述,這是妥善對待市場經濟發展後出現不同利益階層、思想多元化、矛盾複雜化,社會動蕩中求穩定的正確對策。但是,關鍵是落實,真正在領導層和權力部門負責人的思想中落實兌現,真正徹底地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桎梏,不再搞 1957、1959、1966-1976 年的“要資本主義滅種”的化友為敵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要失去自信心、陷於四面樹敵的恐資病、恐敵病中,似乎眼前全是敵人,最後,可能陷入只信任江青的晚年毛澤東的不正常精神狀態。

《人民日報》4 月 28 日的評論是明智的,重新提出“包容”,即使對“異質”的意見,也要捍衛他的發表意見的權利與自由。這

就是胡錦濤、溫家寶反覆強調的公民的表達權,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神聖權利,更是加強社會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符合朱厚澤的寬容、寬厚、寬鬆的方針。

誰在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資本主義民主是不充分的,甚至被批評為虛假的,但是,允許出現反對執政黨和領袖的聲音,可以辦民間報紙和反對黨的報刊,如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允許共產黨在陪都重慶辦《新華日報》,允許出版中間派的《大公報》、《觀察》。社會主義民主既然是比資本主義更民主的民主,馬克思主義既然是自認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那麼為什麼不能更包容一點,民主與自由更多一點呢?盧森堡認為自由、民主,首先就是允許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中蘇兩黨論戰時,毛澤東就敢於全文發表赫魯曉夫的攻擊中共的講話、全文發表蘇共攻擊中共的文件,而我們僅僅發表了《九評》,予以批駁,讓讀者去辨別是非。至於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

說：“雙方都說了一些空話”，那是後話。

為什麼今天中國經濟 GDP 位於世界前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崛起被反覆宣傳時，反而沒有自信心，被臆造的“西化”、“反化”、“自由化”惡夢形象嚇得不能包容，甚至批判朱厚澤的“寬容、寬厚、寬鬆”呢？為什麼人為地製造出那麼緊張的階級鬥爭、敵我鬥爭的你死我活內部鬥爭的假象和誤判呢？在這樣放大的惡夢陰影籠罩下，有些官員的思想不夠正常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化友為敵了，分不清兩類矛盾了。這樣，必然走向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罪與非罪的界限被打破了，人民內部矛盾輕易定為敵我矛盾性質，這是國內革命戰爭的肅反、打 AB 團殺死十多萬自己人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流毒，也是至今並未徹底清理的毛澤東反右、反右傾、文革極左路線的政治癌病毒。

由於自然規律，現在的許多當權的領導人中，是當年文革中的紅衛兵和參與者，他們和我們都深深地中過文革的毒，思想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首先要問一個“誰是我們的敵人”；認定“矛盾是絕對的”、“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因此，宣傳、政法部門更為敏感地習慣於用階級鬥爭的分清敵我的眼光辨別、判斷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極容易視友為敵、化友為敵，打擊大量的中間群眾，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本來可以團結的力量趕到對立面去，甚至幫助製造了採取極端手段報復社會的個體、群體，以致於出現大量的本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件，由於判斷與定性錯誤，處理不當發展成為大規模群體事件，由於處理不當或不夠策略，也可能使一般的氣功等民間組織變為敵對的政治性組織。

辛子陵事件是一個危險先例

因此，正確區別與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加強社會管理的首要問題。最近，解放軍大校辛子陵失去部分自由的事件，是一個這方面的標誌性事件。辛子陵當年按鄧小平等人的授意，為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被誣的冤案大喊大叫，為毛澤東歷史錯誤秉公直書，官方一直認可，從未追究。辛子陵自稱“救黨派”，受到極左派和極右派兩方面的夾擊。他一心為了救黨，卻失去了發表救黨言論的自由。黨的領導人擔心亡黨的危險，辛子陵因此提出“救黨三策”。他在2月10日應邀出席十幾位離退休科技人員的春節午餐，即席講話，後來他發至網上。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反腐敗，建議對內不要批判普世價值，不應批判溫家寶的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對外，不要再搞第二次抗美援朝。這些意見，絕不是“異質”的，也不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西化、分化”。即使退一萬步說，有一點“異質”，按《人民日報》黨報評論提出的辦法，應捍衛他自由發言的權利。而不能採取北京市委紀委張委員的辦法，限制辛子陵的言論自由、參加集會的自由、作報告的自由和遷徙、出行自由，這是違反憲法、違反黨章的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的橫蠻、粗暴的決定。這種做法是違反胡錦濤、黨中央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加強社會管理等重要指示的錯誤決定。

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以“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為名，來剝奪公民自由，實際上重複了文革的鬥爭方式，打擊思想犯，新式軟禁、監視居住懲罰思想者。這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自由，而是為共產黨抹黑。令人擔心，這可能不是最後一次，而是新一輪的剝奪言論自由的辛子陵式事件的開幕式。（姚監復）

各地公訴現場文革味道十足。



左派舞劍，意在鄧公

——“公訴茅、辛”鬧劇的深層動機

辛子陵、茅于軾撰文批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及其對中國造成的災難，是完全符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的。辛、茅的文章都是為了支持和促進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發動和領導的改革開放方針，也是支持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繼續執行和發展“胡趙十年新政”的路線，是為了社會真正穩定、政治真正穩定、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真正穩定。辛、茅文章講話中有些話語可能尖銳一點，舉的具體例子可能有的不太準確，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主要結論的科學性和嚴

密性。因此，辛、茅文章受到廣大老百姓的稱讚，也引起權貴們的憤怒，以及不知歷史真情的憤青式的抗議，甚至要起訴、公訴。這反映出20年來又一次爆發出群眾性的政治熱情，參與政治爭論，這是社會的覺醒與進步，理應歡迎與支持。要相信群眾會自己教育自己，真理會在爭辯中勝出，人民終會認清歷史的真相。

對於當權者，我認為值得警惕和重視的是，有極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極左派，可能借用毛澤東的歷史威望，利用群眾對兩極分化、特權貪腐、權貴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重新啟動文化大革命的反對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的理論，煽動弱勢群體對公平的熱切期望，以擁毛為名，進行反鄧、反江、反胡之實。批辛、茅為突破口，矛頭所向直指鄧大人，證明毛澤東文革之初打倒劉、鄧是正確的，鄧確實是走資派。試看，左派要公訴辛、茅的口號中，已經提出了：“一追到底”，要追出辛、茅的“後台”了！不少極左派的文章，點名批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早已明確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沛公是誰了。

十八大前的一場硬戰

批判、審查辛子陵是第一幕，大批判、網上公訴辛、茅是第二幕，下一幕將對著鄧二代及三、四代開炮了！劍頭指向，意在鄧公，以擁毛為名，否定改革，這是十八大之前的一場硬戰。

當權者“四個堅持”的束縛，對極左派惡攻辛、茅採取容忍、支持態度是必然的，而對辛子陵採取打壓態勢是不聰明的。因為，極左派矛頭實際上是對著當今的當權派，要“打倒修正主義集團”、要“為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徹底平反昭雪”，要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平反，公開號召開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擊矛頭是對著鄧江胡的。捧毛批辛、茅是為了完全否定

改革開放和批鄧。如果當權者支持批壓辛、茅，實際上支持極左派，下一步極左派就是揪出辛、茅的後台，那就是當權者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引火燒身。網上文章不僅僅批鄧，不是已經點了胡錦濤的名，高調謾罵進行人身攻擊了嗎？請記住充滿智慧的中國格言：“玩火者必自焚”。

同樣地，極左派玩火，發起聯名公訴，重新激活了文革大字報、大辯論的激烈鬥爭新形勢。既然你們開始對批毛者辛、茅要公訴“顛覆國家政權罪”，也可能引火燒身。因為辛、茅以及有良心的正直人士也可以同樣地仿效極左派的方式，組織 3700 萬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的子孫們、200 多萬右派、中右分子及其後代、文革中 2000 萬受迫害的受難者及其家屬聯名控訴毛澤東的“反人類罪”，追索賠償。這是正義且合法、合情、合理的。這樣，由極左派挑起的社會大爭論、大控訴將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對立，和諧、穩定將難以維持，直接影響“三個代表”論、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我們相信正在準備紀念中共一大 90 週年、迎接十八大的中央領導絕不希望看到這種由極左派挑起而出現的危險局面。極左派挑起事端，小事正在發展成政治性大事件。但願清醒的領導能冷靜處理，及時遏止極左派的拙劣壓制自由、民主的政治局面惡性發展，及早撤銷限制辛子陵言論等自由的錯誤規定，因為這是違反黨章、憲法的危險先例。要牢記鄧小平 20 年前的教導：“主要是反‘左’”！這是 90 年中共黨史中最最重要的教訓。無數鮮血、生命和良心換來的教訓，絕不應遺忘了，很遺憾地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經常被領導人遺忘。（姚監復）

毛岸英的遺孀劉思齊，現今是楊茂之的妻子劉松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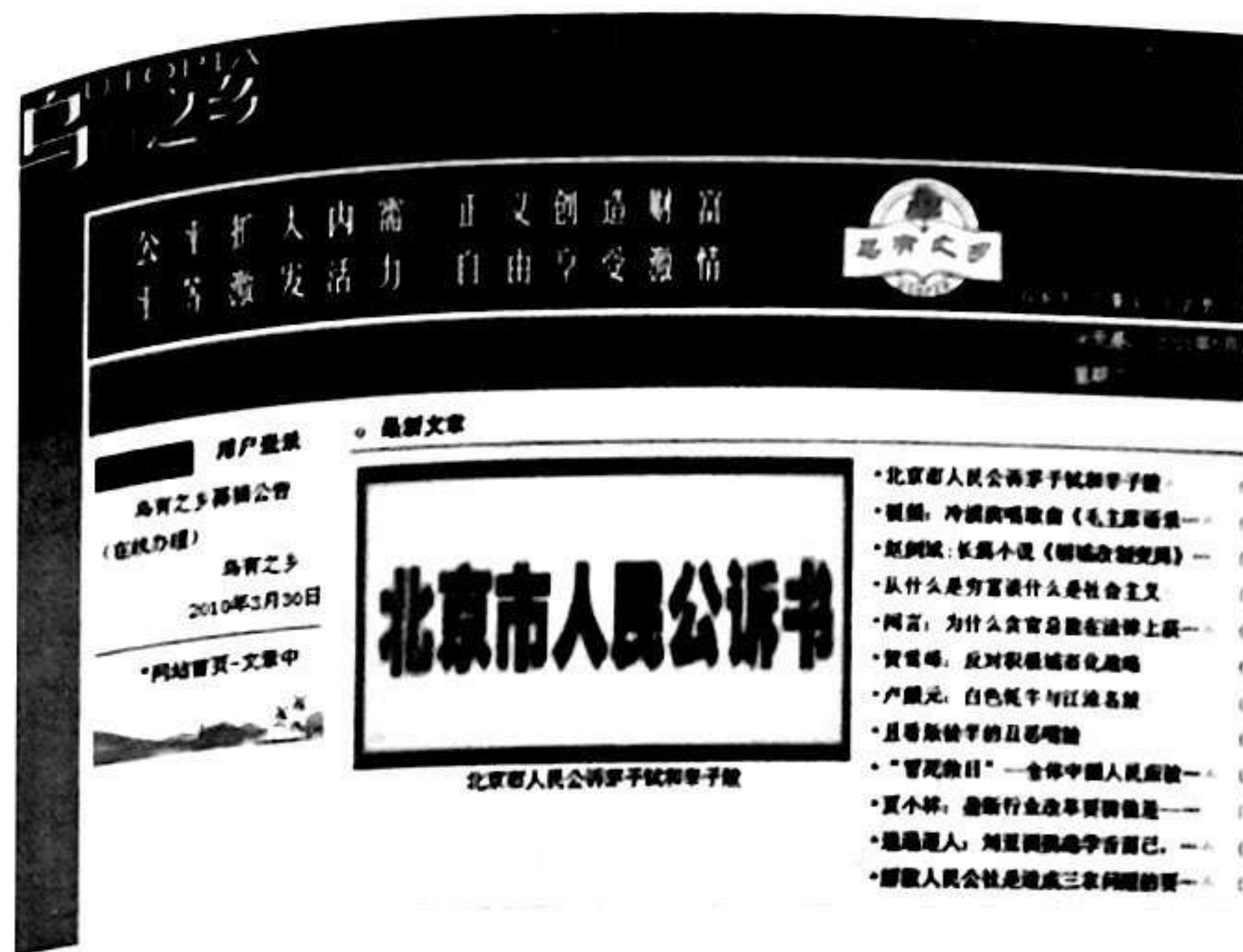


劉思齊究竟是什麼身份？

最近，北京有一幫人組成“人民公訴團”，要起訴兩位公民茅于軾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公訴團的發起人排名第二位，名叫劉思齊，括號內注明：身分是“毛主席長子毛岸英遺孀”。

眾所周知，劉思齊與毛岸英結婚一年，毛岸英在朝鮮亡故，劉思齊是毛岸英的遺孀。

但劉思齊的這種身份止於 1962 年。該年劉思齊改名劉松林，改嫁楊茂之，成了楊太太。至此，劉思齊這個人名及毛岸英遺孀的身分已成歷史。活在世上的的是楊茂之的妻子劉松林。她與楊茂之結婚 49 年，生了四個子女，如今是兒孫滿堂。



“公訴”背後的政治格鬥

2011年春夏之間，北京暗潮湧動，亂象環生。有人認為，這好像又回到了1976年，那時，毛澤東剛去世，人們期盼變革。如今，35年過去，大家還想訴說社會的極端不公，尋求解決辦法。

牽涉高層和社會民衆共同關注的一起風波就是，被茅于軾發出討毛檄文激怒的左派人士，採取所謂法律手段，徵集簽名進行“公訴”。

自己並不真要的旗幟，也不能給人

2011年5月23日中午時分，“代表全國網民”的四人，向北

這裡有個參照例：1943年在延安與毛澤東結婚的江青，就不再是唐納妻子藍蘋，世上已無藍蘋這個人，只有江青。藍蘋已進入歷史，不堪再提。

現在突然冒出了個毛岸英遺孀，不怕令楊家三代尷尬？49年的恩情竟然比不上曾經的一年？只因他是領袖的兒子？

這只是一個倫理問題。還有一個法律問題。

劉思齊在1962年改名劉松林，那末身份證、戶口本、結婚證、黨證、組織檔案等全部都應該是劉松林。換句話說，劉松林才是一個有民事資格的自然人和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劉思齊是誰？怎麼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要找回劉思齊當然可以，改名就成。要做回毛岸英遺孀，恐怕要離婚才行吧。（一中）

附錄：北京市人民公訴團發起人：

1. 馬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2. 劉思齊（毛主席長子毛岸英遺孀）
3. 劉毅然（電視劇《毛岸英》導演）
4. 鄒小提（電視劇《毛岸英》製片人）
5. 韓中（電視劇《毛岸英》中毛澤東主席扮演者）
6. 毛小青（毛主席侄女）
7. 魏欣（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長女）
8. 魏平（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次女）（下

略）

京市公安局遞送了一份《對茅于軾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和“誹謗罪”的舉報狀》。據悉，此舉報狀業已遞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按照這個“北京人民公訴團”的說法，他們會根據網上截止到2011年6月13日晚上20時簽名的人數，於6月15日，匯總北京市人民公訴團成員名單、連同公訴書，遞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抄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

據烏有之鄉網站報導，“在中午午休的情況下，北京市公安局耿金強同志特地出來到接待室，認真聽取了四位同志反映大漢奸茅于軾侮辱毛主席、攻擊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犯罪事實，並向四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謝。耿金強同志說，舉報利用網路的犯罪，可通過網絡舉報，這樣可以更快更好地處理，也不用跑到公安局來。下午4:56，耿金強同志電話回訪告知我們，我們回來後通過網路舉報的材料都收到了。”

這位姓耿的官員已經在現場見了這四位代表，也認真聽取了他們揭露的“大漢奸茅于軾侮辱毛主席、攻擊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犯罪事實”，還強調了此類事“不用跑到公安局來”，卻還要在下午近5點時，不厭其煩地電話回訪，告知“通過網路舉報的材料都收到了。”看來，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實在閒得無事，而是這幾個代表很可能當時沒能說明白茅于軾的漢奸罪行，只有回到烏有之鄉補充罪證，一定要把茅于軾告倒。

雖然看起來這似乎只是一起牽涉部分網民的網絡事件，中共各級宣傳部門都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但是，熟知中共運作的人士指出，去世35年的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符號，成為對現實強烈不滿的民眾心目中拿起來最順手的一面旗幟——之所以最順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局儘管推行的政策與毛澤東十萬八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他們卻總是宣稱奉毛澤東為圭臬。這就給左派人士和相當一部分在改革開放中處境不僅沒有改善、

反而惡化的民眾，扯起這面旗幟作為爭取自己權益的武器，提供了條件。而現今中共的執政集團固然是拉大旗作虎皮，並沒有真正打算遵從這面旗幟，但是這面旗幟真要被別人搶去，對他們來說也非同小可，他們不由得不擔心會出大事。如何應對，便成為極具難度的考試。

最近官方的媒體如《人民日報》，在鼓吹“良性互動中提升政府公信力”，並強調“民眾的訴求日益多元，輿論質疑時有耳聞。各級政府的回應能力，已成為衡量執政水準、檢驗執政理念的重要標竿。”但是，說歸說，做歸做。偏偏又臨近六四，被控制的不止於鮑彤和丁子霖這樣的人士，連毒奶粉受害者的父親趙連海都被禁止帶孩子去天安門廣場。

公訴始於上海一個退休幹部

5月23日發生的這一幕，則可借用烏有之鄉網站的一則消息來作解釋。

這段文字出現在5月26日，點出了：發生在北京公安局的舉報，發端於上海。上海一名據稱名為“陳玉碓”的退休幹部在網上發文，呼籲聯繫網民公訴茅于軾。於是，才有了烏有之鄉網站的一系列行動。

這份《上海舉報團網絡舉報第二號公告》還指出：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上海市公安局很認可我們的舉報，他們認為必須追究“財新網”網站的責任，所以，他們受理後，昨天（5月25日）通過網絡答覆說：“您好！您反映的情況已獲悉，我們按照程序已將您資訊轉至網站所在地公安信安部門進行處理。創建一個良好、健康的網絡環境，每個公民都有責任。信安部門將進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堅決杜絕網絡有害資訊的傳播。

最後，感謝您對我們公安機關的信任和支持。”一個常和我保持聯繫的警官還對我說：“我們絕大多數的公安幹警還是很敬重和熱愛毛主席的。”

這則“公告”還說：向國家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的舉報尚沒有得到進一步答覆，鑒於5月24日我們發現，有個ONOW中文網正在頂風作案，於本月24日發表茅于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毒文，還發表張忠國號召公民支持茅于軾的倡議書。目前我們尚不知ONOW中文網具體所在地，為此，我們上海舉報團再次向公安部網路安全保衛局舉報該網站已觸犯我國憲法和刑法的犯罪事實，必須予以舉報處理。

上海網民以“創建一個良好、健康的網絡環境為理由”，要求“信安部門將進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堅決杜絕網絡有害資訊的傳播。”

看似是公民（網民）在維護自己的權利，無可指責。不過，從這份公告後面的文字就可以明白，情況並非如此。

非毛擁毛之爭的大爆發

公告說：

毛澤東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受各不同政治信仰國家領導人、名流和民眾一致高度評價的偉人，但近十幾年來我國境內（茅于軾、辛子陵、袁騰飛、李銳等人）和叛逃海外的（張戎——國內名張二鴻，1978年四川大學的公派留學生；辛灝年——國內名高爾品，1994年叛逃海外之前是安徽省青聯副主席、省人大常委，官居副廳級的高幹）一小撮漢奸賣國賊為了獲得到霸權帝國和我國敵對勢力的賞錢和維護他們的反動階級利益，竟喪盡良心與泯滅人性地捏造許多虛構的事實，瘋狂惡毒地誹謗中共

和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而黨政高層沒從維護黨與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對這股蓄意推翻中共和顛覆國家紅色政權的敵對勢力的猖狂進攻沒及時予以應有反擊，使中共和國家的威望受到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貶低和侮辱！所以這份自發表達中國民眾絕大多數人的意願（如有不服者，可來一次全民公決！），舉報茅于軾以惡毒誹謗毛澤東的手段，企圖達到醜化中共和國家紅色政權，以此煽動民眾來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徑的舉報狀在網上公佈以來，必然受到海外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紐約時報》報導說：“大陸著名毛派網站‘烏有之鄉’9日由陳玉確為代表的人發表文章稱，寫份全國聯名舉報狀向犯罪嫌疑人茅于軾北京所在地公安局和人民檢察院舉報。左派們對茅于軾的文章反映非常強烈”；《美國之音》在5月24日廣播說：“‘烏有之鄉’針對茅于軾的舉報狀已送交公安局。這份舉報狀說：‘茅于軾最近在財新網發表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文章捏造許多虛構事實，以極其惡毒言語攻擊、醜化中國共產黨和開國領袖毛澤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近日廣播說：“一位來自上海的退休幹部陳玉確於5月初在網上發佈《對茅于軾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誹謗罪的舉報》只是圍剿行動的第一步”；新加坡《聯合早報》25日報導說：“中國左派網站萬人署名公訴茅于軾辛子陵”；《德國之聲》在5月24日廣播說：“近日，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和中共黨史學者因為各自早前發表的批判毛澤東的文章和著作，被中國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提起公訴，毛澤東兒媳參與烏有之鄉公訴茅于軾”。

舉報狀在網上公佈二十多天以來，已有15萬4千多人點擊，跟帖評論3千8百多條，跟帖實名制簽名4060人，網絡簽名達6400多人，已創下建國以來實名連署簽名舉報犯罪嫌疑人人數的最高紀錄，跟帖簽名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政府依法懲辦茅于

軾為止。這是中國廣大民眾以網絡示威方式，充分表達中國絕大多數民眾非常敬重和熱愛開國領袖和中共的締造者毛澤東！“得民心者得天下”——網路充分顯示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黨政高層都會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無數事實已充分證明：“貓論”只會給社會帶來道德墮落、犯罪活動激增，最終導致社會崩潰，人心渙散而徹底分裂！只有走毛主席革命路線，以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教育黨政幹部，才能拯救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振興社會主義新中國！

這次舉報狀公佈後的簽名和發跟帖評論已充分說明，這是發揚大眾民主，民眾自我發動、團結、聯合和提高維護國家政權責任感的最佳方式。

上海舉報團 2011 年 5 月 26 日 17 點公告

據烏有之鄉的消息，此前還有過《上海舉報團網路舉報第一號公告》，稱：

“自 5 月 4 日公佈《對茅于軾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誹謗罪的舉報狀》以來，已激起全國各階層民眾和海外華人華僑極為強烈的反響。全國多數民眾（包括多數黨團員）都能從茅于軾那篇惡毒文章看清茅于軾的邪惡犯罪動機，他就是企圖以惡毒誹謗毛澤東的手段來醜化中共和新中國，以便最終推翻中共和新中國紅色政權，短短二十天來《舉報狀》點擊率已達 15 萬多次，跟帖簽名參與舉報者達 4055 人、網絡簽名達 6400 多人（具體名單近日公佈），簽名參與實名舉報者已達萬人以上，創下實名舉報犯罪的聯名舉報人數全國最高紀錄！目前跟帖簽名仍在繼續，將一直繼續到政府依法嚴懲罪大惡極的罪犯茅于軾才截止簽名。繼 23 日北京五位同志代表萬人簽名舉報者直接到北京公安局和北京人民檢察院遞交舉報狀之後，上海舉報團已於 5

月 24 日晚通過網絡分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和上海市公安局網絡安全處舉報。”

一萬多人網上簽名公訴，是多還是少？

另外，烏有之鄉網站透露：

自從陳玉碓老同志協同上海同志發起公訴茅于軾、辛子陵活動以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愛國網友紛紛自發組織發起公訴茅、辛二賊的活動。截止到 6 月 2 日早 8 點，各地通过网络签名的总人数为 12908 人。而 6 月 1 日早 8 点到 6 月 2 日早 8 点，一天通过网络签名程序共征集有效签名 743 个……

現在，可以釐清的是，一個自稱是“退休幹部”的陳姓人士在烏有之鄉網站發出起訴茅于軾和辛子陵的舉報狀以來，四個星期已經在中國各省市分別成立了“公訴團”。

不過，有人認為，已經過了 20 多天，網上點擊率據說只有有 15 萬多次。按全國網民 4 億 5 千萬計算，在三週多的時間內，平均每天 7000 左右的人次點擊，更何況一個人可以一天點擊上百次！還有，十三四億人口的國家，只有 4000 多人幫腔，連 30 萬分之一都不到！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真理往往會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公訴事件表明，網上的毛派已經不滿足於小打小鬧，他們提出的打擊對象除了茅于軾、辛子陵，還有李銳、袁騰飛、辛灝年、張戎、易中天等等，還有的人乾脆把胡耀邦和他的兒子胡德平一併清算，再就是直指鄧小平和他的“貓論”。總之，他們對於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一概不滿意，還是堅持“只有走毛主席革命路線，以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教育黨政幹部，才能



毛派批胡德平“子承父業”。

拯救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振興社會主義新中國！”在烏有之鄉網站和毛澤東旗幟網站，已經公開點出“10名漢奸”，只是還沒有細說這10名漢奸的姓名。

烏有之鄉網站上發出呼籲，號召全國大學生行動起來聲援北京市人民對漢奸賣國賊茅于軾的公訴。呼籲書指出：

“家國不幸，漢奸橫行。在舉國上下一致聲討漢奸賣國賊茅于軾之日，作為時代先鋒的青年豈能終日苦讀，不思世道之日衰，國民之日苦，環境之日差，生存之日艱？！”

“漢奸賣國賊，不是從來就有的。秦檜、汪精衛、茅于軾、辛子陵等這些人用自己的賤命，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後他們也將自己的大名‘英勇’的寫在了漢奸賣國賊史的‘光榮’一頁上。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秦檜、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的醜惡嘴臉一目了然了。可您是否知曉，在改革開放所謂的空前繁榮之下，漢奸賣國賊們又相機而動了。他們在西方主子的豢養之下，不僅拆除了中華民族道德的最後一條防線，而且處處與人民大眾為敵，時時不忘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其可恥的賣國之行徑已昭然若揭。”

呼籲書強調：

“近期，在老革命家馬賓的帶領下，在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等老師的號召下，以北京市為中心，全國各省市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討賊活動。漢奸民

賊，國人共討之。嚴懲漢奸賣國賊茅于軾！為中華民族存亡而戰鬥！”

老幹部直指“大領導”

5月28日，烏有之鄉網站發出下面文章，頗為耐人尋味：

半月前，黨內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幹部在北京舉行座談，在深入分析當前國內外階級鬥爭新形勢的基礎上，就如何打好“討茅戰役”提出了如下建議：

一，充分認識當前國內外階級敵人特別是西化賣國集團，千方百計拼命搞亂中國以便混水摸魚所反映的階級鬥爭尖銳性，把反對西化賣國集團妄圖在十八大之前乘亂奪權，作為當前特別緊要的“戰役”來打。

二，“大領導”最近在談到改革的阻力時強調兩點，“一是封建殘餘，一是文革遺毒”。茅于軾、辛子陵、秦曉等人的瘋狂言行，顯然與此有內在聯繫。因此，“討茅戰役”實質上是同西化賣國集團生死決戰的突破口，這一仗務必要打勝。

三，要先將茅于軾、秦曉等十大漢奸的賣國罪證公佈于眾，集中力量進行批判、聲討、公訴，使之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四，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往往是由突發事件引起的，我們一定要做好應對這類事件的充分準備。

五，對西化賣國集團的後台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剝奪、欺壓我國的罪行，要聯繫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形勢，進行更集中、系統地揭露、批判和聲討。

六，堅決批判和糾正對西化賣國集團採取姑息、退讓態度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

七，對吳邦國同志提出“五不搞”，陳奎元同志強調要信仰馬



吳邦國提出“五不搞”深得左派讚賞。

克思主義等等，要給予肯定和支援。

八，對重慶模式，應當用更大的力量進行調研總結、宣傳推廣，並在實踐中繼續推動復興社會主義的進程。

九，在對錯誤、反動理論觀點進行更全面、徹底批判的基礎上，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和新的實踐，提出今天形勢條件下的新的理論觀點。

十，把“喚起工農千百萬”，作為我們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務。”

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關注，一是提及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幹部，他們究竟是誰？二是，文中隱晦提及的“大領導”，雖然沒有點名，實際呼之欲出，明眼人一下就看明白，不就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嘛！三是，明確“茅于軾、秦曉等十大漢奸”的提法，也沒有細列；四是，強調“歷史上的重大轉折往往是由突發事件引起的”。

烏有之鄉的發起人范景剛

公訴茅、辛事件開始至今，所謂“公訴方”依托的是網站烏有之鄉。有人曾經這樣猜測：這個網站的發起人范景剛頗善鑽營，這可能是他以政治操作贏得網站點擊率，藉以取得商業利益。

范景剛，原名范二軍，曾經是2000年成立的自由主義組織——“新青年學會”的八大骨幹成員之一。有人披露說，在學會主要成員被捕後，因為害怕自己的偽證與背叛為世人所不容，於是，改名“范景剛”。大概是由於感覺到“右”太危險了、太可怕了，越左越安全，於是他將自己的政治立場也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搖身一變而為極左派的骨幹，創辦了烏有之鄉書社與烏有之鄉，開始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鳴冤叫屈。

有人分析：“他這樣偏激的觀點既可以出大名、賺大錢，又可以回避政治風險，真是絕頂聰明的如意算盤。”

公訴團匯集了些什麼人？

烏有之鄉公開披露的50名北京市公訴人名單中，領頭的是馬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再就是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遺孀劉思齊（劉松林）——其實，劉思齊已經再婚近50年，很難說得上是毛家人了！

還有電視劇《毛岸英》劇組的一些人，以及毛澤東侄女毛小青，再就是已故軍旅作家魏巍的兩個女兒魏欣和魏平，這三位自己在社會上的身份是什麼，一律不詳。接著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和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

大家想像中應該出現的毛澤東兩個女兒李敏和李納並沒有參與其事，而一向以毛澤東嫡傳接班人的毛遠新少將也不在其中。

與烏有之鄉網站走得很近的“官二代”中，有一個叫做周秉德的，此女是周恩來的侄女，對聲討漢奸茅于軾特別賣力氣。可是，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周秉德是周恩來弟弟周恩壽的女兒，而這個周恩壽在抗戰期間做過偽事，令周恩來後來一直不爽。



李希凡(右一)評《紅樓夢》的文章得到毛澤東青睞。

他在文革中多次表白，和這個弟弟早已劃清界限，並且親自批捕周恩壽。這在北京上層已是公開的秘密。周秉德其實應該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深惡痛絕，怎樣會投入到烏有之鄉的懷抱？

最近表示加入“公訴行動”的有李希凡。這個1927年出生的老人，在1954年與藍翎(楊建中)合作，寫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發表在《文史哲》上。後被毛澤東發現，讓江青代表他，找到《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要求將李、藍二人的文章轉載在《人民日報》上。鄧拓只能奉旨行事，於是，李希凡和藍翎一時間成為名滿全國的“小人物”。不過，李希凡後來在批判《海瑞罷官》的問題上得罪了江青，在文化界一度口碑不錯。李希凡最後擔任了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退休後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他一向表示自己痛恨四人幫、痛恨文革，也堅決反對“非毛”或“反毛”。

據烏有之鄉網站介紹，李希凡“得知茅于軾等反毛分子最近再一次用極端惡毒、下流的語言造謠辱罵毛主席這件事後，就毫不猶豫的決定加入北京市人民公訴團”。他說：“我們全家人都在網上簽了名支持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他還說，保衛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人權，是每個新中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

到目前為止，文化界人士中，加入“公訴團”最知名的就是李

平及其人列隊歡送烏有之鄉網友。

重慶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



希凡了。

尋求重慶公安支援

另外，烏有之鄉網站和公訴團近來活動頻繁，尋求公安部門的聲援，尤其是以“唱紅打黑”著稱的重慶公安局的支持。據報導，4月30日，烏有之鄉紅色旅遊團全體成員攜重慶本地熱心網友共計80餘人，在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委員、政治部主任周京平同志的陪同下，參觀了重慶市“打黑除惡”專項成果展。在網友們的歡呼聲中，知名網友“紅色娘子軍”和《誰是最可愛的人》作者魏巍的大女兒魏欣受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同志委託，代表烏有之鄉網站及廣大紅色網友向重慶市公安局贈送了大紅錦旗。周主任代表重慶市公安局莊重地接過了這“承載億萬人民心聲的榮耀”。

報導稱，通過本次參觀，同志們更加認清了極端右翼勢力攻擊重慶模式的險惡用心，讓諸如《南方都市報》等漢奸媒體不實報導的罪行顯露無疑，讓那些以“自由民主、全面客觀、公平公

正”自居的“鬥士”們原形畢露。

這份報導指出，“同志們在思想認識和行動步驟上取得了高度一致，紛紛表示“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原則”，毛派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奮戰，“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辛子陵被指為“共產主義叛徒”

在茅于軾遭受萬炮齊轟的同時，辛子陵也是另一個炮轟的對象。茅于軾成為靶子的文章，是對辛子陵的書的讀後感，左派民衆自然也不能放過這個肇事的源頭。他的這本《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是著名黨內民主派李銳作序，抨擊辛子陵也自然就等於抨擊了李銳等所有黨內民主派。

一位名叫錢昌明的作者，讀了《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之後，寫了一篇怒火萬丈的文章《且看叛徒 XZL 的醜惡嘴臉》，其中“XZL”，就是“辛子陵”三個字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

錢昌明開宗明義：“XZL，何許人也？共產主義叛徒一個。”

為何稱之為“叛徒”？作者解釋說：

XZL 是 15 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估計是個連中學也未畢業的小子，應該說是革命大家庭培養他成長起來的。相信在 195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他也一定舉起手在中國共產黨的黨旗下莊嚴地宣過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可是如今，還是這個 XZL，不僅對培養他的那個時代不感恩，反而公然背棄、詛咒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這不是叛徒是什麼？！

文章批判說：儘管其拋出 70 萬字的《紅太陽的隕落》，似乎

氣壯如牛，迫不及待地充當“反毛”、“非毛”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急先鋒；然而，其背負著沉重的“原罪”十字架——共產主義信仰的歷史，始終使他本能地只能扮演一個直不起腰的“造反者”，只能是“跪著造反”，這是所有叛徒無法避免、由內在虛弱性所形成的一種必然尷尬。

XZL 要反毛澤東，卻又不得不稱他是“偉大的革命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略雄才”，承認“毛澤東有這樣一種超人的稟賦，他的決心能感染別人，使怯者勇，使弱者強，使蔽者明”，並只能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來否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

文章還說，XZL 披著一層“學者”的外衣，其實是一個沒有靈魂，時刻窺測風向，善於鑽營投機政治的“文痞”。因為任何學者，理當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這是每一個文人、學者所應堅守的一道起碼的文德底線。寫書作文至少要言必有據，決不能道聽塗說，更不會無中生有，信口雌黃。《紅太陽的隕落》，其所用重要關鍵史料，既無考證，又無確切出處，使人無可稽核；通篇充斥污蔑、詛咒之詞，許多內容純屬無稽之談，堪稱狂犬吠日，純粹是一種赤裸裸的喪心病狂的攻擊。

茅于軾期待辯論，辛子陵分析對手

在“公訴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不少人都提起了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一句名言：“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誓死保衛你的發言權。”

最近因為“公訴事件”更加引人關注的茅于軾公開表示：“我正等着他們起訴，這樣，毛澤東的功過問題，定能在法庭上辯得更加清楚了。”

另一個被“公訴”的辛子陵則認為，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發起的這場大圍剿，目標不是針對他和茅而是中共，“他們是要逼中央就毛澤東的問題再度表態。”辛說：“前不久，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不再將‘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列入黨的文件，引起左派驚慌，他們要借事件逼宮。”

辛子陵指出，中共奪得江山後，毛澤東搞階級鬥爭，令幾千萬人生靈塗炭，如果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共只會死路一條，“內地 50 歲以下的人，都是在神話和謊言中長大，不明白毛的禍害”。他指，左派脅持了社會一些群體對權貴階層的不滿，用毛做旗號，“他們不明白，一旦回到毛時代，中國只會更加黑暗，中國人民更加遭殃”。

辛子陵還表示，中共放棄毛澤東思想實屬明智，“只有與毛切割，中共才能有出路”。他直指，中共取消毛思想的決議絕非謠言，“你看最近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很多場合講話時，都不再提‘毛澤東思想’，甚至在講到創黨人時，他也只講李大釗、陳獨秀，不提毛澤東，就是證明。”

另外，一批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老人，5 月 31 日發起連署行動，以受害者的身份準備起訴毛澤東踐踏憲法枉法殺人等罪行。

因撰文批評毛澤東被關押勞役 23 年、母親在大饑荒中餓死的四川記者、老右派鐵流公開倡議：全國倖存的五七右派聯名，以被迫害者的身份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訴毛澤東踐踏憲法，破壞黨章，無視生命，枉法殺人的血腥罪惡。

這名 78 歲的老人說，這一行動也是回應毛派極左正在全國各地發起“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活動：“毛派不是在公訴麼？我們就起訴毛澤東，我們都是受害者，大家聯合簽名向最高法院起訴，不管他受不受理。如果他受理了毛派那個公訴茅于軾、辛子

陵，我們就出庭跟他辯論嘛，對簿公堂！到底誰在造謠誰在給國家製造動亂，不解決毛派問題中國不會安定不會過渡，永遠都是鬥來鬥去的。我們公開辯論，文革該不該打倒、毛餓死中國人是不是罪？我們右派活著的還有一兩萬人都會站出來，七八十歲沒什麼怕的，我們就要喊打到毛澤東、罪該萬死、千刀萬剮，該鞭屍該揚灰。”

“毛”“茅”較量：誰有公訴資格？

“烏有之鄉”發起公訴後，在網絡上引起很多中國網民關注，一些學者也加入討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新浪網訪談中，直指茅于軾、辛子陵等人為“漢奸”；但也有眾多中國網民聲援茅于軾和辛子陵。

德國之聲記者吳雨採訪了一些中國文化人，王小山表示：“願意作為所謂公民公訴團被告之一，和茅于軾先生站在一起，因為我對毛澤東觀感和茅先生一致，歡迎起訴。”

律師劉曉原則指出：“毛左”的“公訴”，不符合法律規定，無法啟動司法程序，只能是鬧著玩兒。他建議在網絡上進行“類比法庭審判”。“公訴人”由“毛左代表”擔任，被告人是茅于軾和辛子陵，法官由網民推選投票產生。劉曉原表示，願接受被告人聘請擔任辯護人。他還提議，本案的陪審員由紅二、三代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後人組成。



中國前衛藝術家高統、高強的作品《下跪忏悔的毛》。

德國之聲撥通茅于軾家中的電話，茅夫人趙燕玲表示已經獲悉烏有之鄉公訴一事：“我們沒有接到法律上的通知或消息，都是很多朋友告訴我們的，正好茅老的電腦也壞了，收不到郵件，聽朋友說有人要告茅于軾，告就告吧，那篇文章已經發表了，這些都是事實，大家也可以再公開討論、辯論。而且毛澤東的那些事情也不是什麼秘密，以前是對他的歷史進行封閉，現在有這麼多的關於他的著作，大家都有各自的感想，茅老寫文章也有好多是他自己親身體會到的，象‘三年災荒’、‘文革’等，這些都是事實。毛澤東到底是‘神’還是‘人’？所有很多朋友說，他們要告是一件好事，這些歷史要挑明，是遲早的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勳認為，“公訴團”起訴是很荒唐的一件事：“首先是起訴的人有沒有資格？訴訟主體是否合適？起訴的人絕大多數和毛澤東沒什麼關係……首先這大部分人沒有訴訟主體資格；第二個問題是這樣的訴訟是否站得住腳？”

王建勳還指出：“毛澤東作為一個已經死去的政治人物，對他進行評價是公民應有的權利，或者說這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根本談不上對他的誹謗，政治家及政府沒有這樣的隱私或名譽權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和評論。”

王建勳分析說：“不能忽視的是，為什麼在當代崇拜毛澤東的人還有這麼多？也給公眾一個提醒，雖然‘文革’已經過去30多年，毛澤東死去也已經30多年，但其陰魂一直都沒有散，因為我們沒有對‘文革’進行清理，而且‘文革’時發生的事情也沒有被披露出來，公眾也並不知道真相，並且在過去幾十年對‘文革’的研究都是一個禁區，現在的年輕人除非自覺去瞭解那段歷史，或者通過一些途徑獲得相對可靠的資訊，否則的話就會成為一個完全被蒙蔽的群體。所以這件事應該成為對‘文革’進行研究

或要求公開當時資訊的契機。而不要簡單的把此事看成‘毛左’表達情緒的簡單事件，如果不去瞭解真相的話，還會有人去崇拜毛澤東，去崇拜所謂的紅色時代，時下流行的‘唱紅歌’‘懷念紅色時代’這一切都極其危險。”

“公訴事件”未嘗不是好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認為，這件事未嘗不是件好事。

他說：“法庭就可以提供一個公開的平台，大家對於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對待我們的現代的歷史，有一種法律上的爭辯，那麼大家的相關的證據能夠提出來。我想這個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吧。”

賀衛方說，80年代初，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佈後，馬上就停止了對於文革和毛澤東的任何嚴肅的討論。這些年來，對毛的個人崇拜捲土重來。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這段歷史“兩眼一抹黑”，因此，現在有必要重補歷史課。

他說：“過去的30年，都沒有真正地反思這個問題，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禁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沒有辦法在國內出版，所以，沒有辦法去讓許多年輕的讀者比較全面地瞭解文化大革命。所以，這次為什麼像‘唱紅歌’這樣的一種做法，能夠在許多的地方甚囂塵上。”



易中天說：對茅于軾先生不敬的人“就不是人”。



《炎黃春秋》。

辛子陵的文章常常發表在

《炎黃春秋》成了眼中釘

由蕭克將軍發起、創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一直是左派們的眼中釘，該雜誌的實際負責人杜導正經常受到當局的箝制，連刊物也不得公開發售。一些熱心讀者只能到熟悉的書報攤輕輕詢問：“《炎黃春秋》到了沒有？”攤主悄悄從底下找出。如果過了慣常的日子，肯定是買不到了，北京人都知道這是一本“上頭不喜歡、老百姓愛看”的刊物。

《炎黃春秋》的作者大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幹部或文人，有的地位很高，文章材料翔實、觀點鮮明，毫無“大批判”惡俗之氣。正因為此，遭到毛派的痛恨。

不久前，在左派網站“毛澤東旗幟”上，就有一篇署名“敬林”的長文，申討郭道暉介紹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案〉》情況的文章（本期《新史記》介紹了郭文若干敘述——《新史記》編者注），認為郭文“最大的特點是反毛澤東，其用心之惡，用詞之凶，攻擊之集中，範圍之廣，涉及年代之久（不僅文革，而且涉及建國前和建國後），堪稱近年為批毛、反毛的一個新的高峰，至為罕見。”

這篇大批判文章還針對《炎黃春秋》雜誌，火藥味很足地指出：《炎黃春秋》的反毛狂已積有多年，他們以不間歇地推行非毛化為己任，至今尤烈。他們充分享受著反毛的自由，他們從中一定是找到了某種精神和心理上的快感。……（郭道暉的文章）是他們瘋狂反毛的又一鐵證和自供狀。但是他們妄圖用如此喪心病狂的手段推行非毛化，絕不可能產生別的結果，只能越來越擦亮億萬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熱愛毛澤東的人們的眼睛。有道是物極必反，《炎黃春秋》的諸位先生們終將找到他們應有的下場。

這樣的文字只能讓我們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字報。

《炎黃春秋》理性地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歷史作出回顧，當事人大都有親身經歷，希望後人不要遺忘我們的歷史。如同茅于軾和辛子陵期待的那樣，公開、認真、嚴肅地評論毛澤東的功過，卻被一些人先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怎麼還能有辯論的空間？

左右兩派網上鏖戰硝煙瀰漫

左派和毛派發起公訴時，儘管一時顯得聲勢浩大，讓自由派不免錯愕，但是很快，網絡上的反擊文章也鋪天蓋地。義正詞嚴者，苦口婆心者，嘲罵者，喝叱者……人數或許沒有左派和毛派多，但是文章的篇數卻佔壓倒優勢。

而網上和網下的反差，也讓人深思：儘管公訴茅、辛事件在網絡上異常熱鬧，可是，中年以上的普通民眾大都一無所知，有的人即使被告知這一情況，也表示“沒有興趣”，似乎與他無關。

北京的一些公園裡，在“左派人士”頻頻演講時，普通民眾對於“茅于軾”這三個字都弄不清，更別說參加什麼公訴團了。

但是，在北京的觀察家認為，這些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眾不滿愈為增加，毛派以“捍衛社會公平”為藉口，企圖抓起毛澤東的旗幟來說好話，這是應該認真考慮的嚴肅話題。

在中國的共識網等許多網站上，都出現了一篇署名為“熊飛駿”、題為《如果讓青年毛左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文章，分析這股思潮產生的原因及其悖謬之處說：

因為缺少大政治家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鄧政府沒有及時抓住八十年代初難得的歷史機遇，揭開“毛真相”和告別“毛體制”，導致公權肆虐特權橫行腐敗猖獗，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非法鯨吞獨佔。廣大平民在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的貧困。

當今中國蔓延全社會的腐敗不公本來是“毛澤東建立的特權專制體制”在改革開放時代結出的怪胎，今天的腐敗不公是沿襲毛時代政治路線的結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是不民主的結果！不但不是改革開放的錯，相反還是改革開放不徹底造成的！“只有毅然決然告別‘毛體制’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從根子上一勞永逸地剷除腐敗不公。”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中國因為全盤繼承了毛澤東發明的謊言宣教體制，對外“逢美必反”；對內“王婆賣瓜”；基礎教育立足於“謊言”和“灌輸”，從而極大地誤導扭曲了廣大國民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認識力判斷力，造成了危及國家根本的思維混亂，多數人喪失了基本常識認識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通過歪曲歷史的影視劇把毛澤東神化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英雄，極大地誤導了廣大擁有“英雄情結”的青少年群體的價值取向。

這樣就出現這樣荒謬的結果：本來是繼承“毛體制”結出的惡果，卻被誤認為是拋棄“毛體制”得到的報應；一個被巫師留下

的咒語折騰得神志不清不公不道的龐大群體，卻希望巫師降臨來為他們主持公道，結果造成當今中國災難性腐敗不公的始作俑者，現代特權專制的祖師爺毛澤東，居然被誤認為是反貪反腐的大英雄！“因此在‘特色維穩體制’走到盡頭時，中國出現了一個否定改革開放呼籲回歸毛時代的毛左集團。”

作者警告說：今天的中國再度回到了1976年的困局，毛左集團正在把中國導向一個萬劫不復的十字路口。“多數國民對此卻渾然無覺，這難道是中國的宿命嗎？”

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社會現在的大量不公就是因為繼續了毛的特權專制體制、繼承毛的政治路線、權力不受制約造成了。如果真要解決社會不公，就要根本摒棄毛澤東的思路錢與方針，怎麼能夠反其道而行之呢？

熊飛駿的文章還指出，今天擁毛派有三股勢力：

第一股勢力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權力政客和無良文人。

他們是毛左集團的靈魂和總策劃者。

這批人並非不瞭解“毛真相”，並非不知道復辟“毛體制”會把中國導入萬劫不復的危險深淵。但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出於追逐更大權力和出人頭地的陰暗心理，不惜“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拉虎皮作大旗來贏得不愛思考公眾的注目喝彩，用國家民族的巨大災難來謀求個人的“雞犬升天”。

這號人的代表是北大教授孔慶東。一個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北朝鮮”同時又贏得“北大醉俠”稱號的忽悠大師。

第二股勢力是文革既得利益階層。

這批人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在文革期間屬特權階層，多屬“紅五類”出身，擁有凌駕於多數國民之上作威作福，隨意凌辱弱勢群體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

這批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處理文革“三種人”時多數從命



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恤」恤成為時髦。

運的巔峰跌到了低谷；又因為對文革清算淺嘗輒止使他們的認識無法達到自覺反省懺悔個人罪孽的層面，因而不但不為曾經犯下的諸般反文明暴行反躬自省，相反還對社會對改革開放滿腔仇恨。他們做夢都想回到毛時代，找回昔日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特權。

第三股勢力是青年學生群體。

這是一個最無辜也最需要公正對待的群體。

他們崇毛是被謊言教育毒害的結果，又因畢業後受到諸多不公正待遇滋長的極端情緒所困擾，不自覺成為陰暗政客和無良文人誤導利用的犧牲品。

這批人才是“毛體制”的最大受害群體，是一個應該被同情而不是被憤慨的群體。謊言教育體制相當於給學生“強制灌毒”，他們在校可不是主動自願“吸毒”的，而是被體制“強制灌毒”的犧牲品，主要過錯不在他們而在於謊言體制維護者和操作人。

作者尖銳地說，有誰知道真實的毛澤東與唐國強扮演的角色絲毫也不相干？體制內宣教者有誰告訴 80 後青年學生如下

“毛真相”：

——毛澤東在全國人均存款不足 2.5 元人民幣情況下，個人擁有 1.4 億元巨額存款，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第一首富；

——毛澤東在農民餓死 3700 多萬的大饑荒時期，居然耗費鉅資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就耗資一億多。如果把用於毛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3700 多萬餓殍就可以活下來；“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在全國有 61 座！”

——毛澤東剝奪了全國作家創作的稿費，自己一人卻獨佔巨額稿酬，文革期間全國印刷機構差不多在為他一人服務，瘋狂印刷毛選毛著、紅寶書、毛畫像、毛像章，然後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須購買；

——好大喜功的毛澤東為了謀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國民之慨，超出國力援助亞、非、拉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即使是在餓死幾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本來應該用於中國人救命的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流氓國家。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1960 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 1 萬噸大米，還有 15000 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 1950 年～1964 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 108 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 1960 年～1964 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如果把大饑荒時期的外援用於購買糧食，3700 萬餓死的農民一樣能夠活下來。

作者尤為痛切地指出：

“年輕人崇毛是成年人作的孽！”

毛澤東時代不是天堂

作者別開生面地說：我們來設想一下，假如讓崇毛的青年學生回到毛時代，他們將面臨怎樣的生活狀況？

一、長年饑寒交煎，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整個毛澤東時代餓死人的現象一直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尤其是農民長年吃不飽肚子，依靠今天連豬狗都不吃的野菜雜糧充饑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觀。作者憶苦思甜說，本人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童年時期的主食是稀粥和“雜碎代糧飯”，稻米不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是摻雜的紅苕、芝麻葉、蘿蔔、藍瓜、黃荊樹葉，且只能吃個半飽；米飯和麵粉是過大年和來貴客時才能偶爾享受的奢侈品；有兩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帶殼花生炸油後留下的渣餅為生。“本人生長於長江中游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生活水準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然條件惡劣水旱頻仍的貧困地區了。”

二、文化生活異常單調貧乏。

沒有舞廳、沒有歌廳、更沒有茶室咖啡館。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為“封、資、修毒草”，要看書只能看毛選和毛語錄；年輕人若膽敢看言情、武俠小說，一經發現就會被舉報，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坐牢甚至槍斃。除此之外，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收音機整天叫嚷紅歌毛語錄，不得收聽外台，否則就是坐牢槍斃的大罪；電影戲劇只限於“八個樣板戲”。

三、個人行動自由完全被剝奪。

農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沒日沒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負荷勞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沒有“介紹信”任何城鎮旅店都不敢留你住宿。村官不批准你也領不到糧票，沒糧票你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錢買到吃的東西。城鎮青年的一舉一動則受到街道居委會的嚴密監督管轄，想外出或去別的城鎮沒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介紹信”一樣寸步難行。

四、婚姻戀愛基本不能自主。

個人婚姻多靠組織安排或事先要向組織請示報告，談個自

由戀愛要冒坐牢風險。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組織”尤其熱衷於跟在有“戀愛嫌疑”的男女身後“捉姦”，一旦被“捉姦”不是自殺就是批鬥、坐牢。

五、沒完沒了的造神儀式和無聊冗長的大會小會。

年輕人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層組織會堂，向毛主席畫像請示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決心。晚上一天的勞作結束後還要來到同一地點向毛畫像彙報全天的言行舉止和思想動態，就是生病臥床也不得例外。在難得的勞作間隙，你也不可能呆在家裡休息，得去會堂開會唱紅歌表決心，或是集中學習毛選和毛語錄。

六、可自由支配的閒遐時間完全被剝奪。

廣大農村根本沒有農閒時節。秋收後的農閒時節男性農民得卷上鋪蓋背井離鄉，去遙遠的異鄉改河道修大寨田。城鎮職工雖然有法定的週末和節假日，但這些節假日大多被開會、學毛著和沒完沒了的政治活動所侵佔。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門旅遊更是連想一下的勇氣都沒有的夢想。

七、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害得人人自危互為仇寇。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為毛澤東時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政治迫害摧毀了一切溫情脈脈的親情友情，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為敵，多數人惶惶不可終日，不是擔心被人陷害揭發；就是以攻為守去迫害誣陷他人。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信任蕩然無存，昨天的朋友親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來置你於死地而後快。

八、生活必須品奇缺的程度絕對超過毛迷的想像。

男人衣著只有千篇一律的中山上衣、肥腿褲、解放鞋；女人服裝絕對不能顯示出身體的曲線。不但沒有洗髮精、沐浴液等潔身商品，連香皂也是少數特權階層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洗衣皂

也憑票供應，農家和普通城鎮家庭是絕對不夠用的。打火機是“幹部”的標誌，火柴一樣憑票供應。中小城鎮家庭雖然頭頂上懸掛著電燈，但多數情況下是擺設，能發光的夜晚屈指可數，所以城鎮各家各戶都備有照明用煤油燈。廣大農村的情況更悲慘，不但沒電燈，連煤油燈也點不起，少數農家靠冒著黑煙的柴油燈照明，可9分錢一斤的柴油要靠關係才能買到。

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供應四兩食油，肉食供應只是象徵性的，僥幸憑關係弄到一兩斤豬肉票也很難買到豬肉。……

作者最後問道：生活景觀，僅僅是毛澤東時代諸多難以忍受的社會現狀的很小一部分。那些把毛澤東奉為偉大聖人的年輕毛迷們，你們願意終生“享受”上述“生活待遇”嗎？

不少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讀者認為，作者所描繪的大部分情景基本屬實。雖然其中有一部分應該歸因於當年普遍的貧困，不能完全由毛澤東負責。

或許這樣的文章有助於給那些被一些左派筆桿子的妙筆生花魅惑的年輕人，或者“好了瘡疤忘了疼”，模糊了對40年前往事的記憶的老人，兜頭一瓢涼水，讓他們不致於將毛澤東時代想像成人間天堂。

“公訴”推高了對中國前途辯論的熱度

“公訴事件”讓當局分外感到棘手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公訴不可避免地會讓人們更多地關注90年來的執政歷程和未來的發展路向，不論是支持還是批駁茅于軾、辛子陵，對大政方針都肯定會更熱烈地“說三道四”，而這正是《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告誡黨員和民衆要盡力杜絕的。

一位署名為“吳庸”的作者，寫了題為“辛子陵的遭遇及其迷

途”的長文，分析辛子陵的主張的得失。就認為：辛子陵出於至誠，自稱願作中央“編外參謀”，以實話、真言匡黨之不正。他的《千秋功罪毛澤東》，用充分事實揭露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是“封建社會主義”。他以全新視角揭示“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指明毛澤東實行的是“封建帝王統治術”。他還提出“爭取言論自由兩步走的意見”，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從何入手”的建議，提出“救黨三策”，提出“中共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在《走出兩個誤區》中明確指出：“權貴資本主義與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矛盾，是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這些謀略，無不戳到當局痛處，逐步實行言論自由、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大規模讓利於民，在在都涉及當權者的核心權益。辛子陵與中共北京紀委的對立，是當前政治園地的進步與保守、革命與停滯的對立。”

海外明鏡網刊登了辛子陵在壓力之下奉命所寫的四篇檢查和說明，實則自我聲辯。吳庸分析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追隨中共革命至今仍健在的老黨員不少，他們對自己的黨有眾多不滿，甚至有嚴重不滿。但這些不滿，多為感性認知，較少理性分析。這些老黨員由於長期接受毛的思想禁錮，黨文化對其浸蝕過重，不滿的情緒很難突破現象而瞭解本質，雖然常發牢騷，卻不能進一步認識這些牢騷的根源。在此情況下，辛子陵的眾多演講、文章、專著，由於針對性強，能夠從一般人很難接觸的具體材料中引申出給人以啟發的觀點，使老黨員深感進入一片新鮮領域，理性渴求得到滿足。

但是吳庸尖銳地指出，辛子陵想“救黨”則是徒勞：這個黨早已喪失了執政資格，執政的合法性已不具備。當權者不僅沒有清理舊債（血債）的心理準備，而且繼續仿效毛、鄧的倒行逆施之策，繼續為非作歹。在這種情況下，欲督促執政者痛悔前愆，即

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艱難的。“胡錦濤的謊言加上辛子陵的吹捧，與社會現實對照，恕我直言，哪一點不是在赤裸裸地欺騙？”

作者還說，救黨派的中心目標是將中共改造為民主型社會主義政黨，“既有社會主義架構又有民主機制，豈非得其所哉”？這只是一面之詞，不妨聽聽馬克思主義專家馮蘭端女士的意見。她說：“民主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民主社會主義賴以產生的思想資源較為龐雜，主要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改良主義思潮，正如他們標榜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多元主義’，如：蒲魯東主義、費邊社的改良主義、拉薩爾主義、伯恩施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等等”，“馬克思主義也是它的思想資源之一”。她著重指出：中國要走和平的民主憲政之路，“沒有必要到馬克思那裡去找理論根據”。

對於辛子陵從恩格斯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引用的93個字：“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試圖由此論定，共產主義理論不具備實踐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必須廢棄。但是，吳庸指出，找到該文閱讀，發現緊接著那93個字還有一句話：“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這說明，恩格斯不是否定共產主義理論，不過是強調，資產階級不需要解放，那麼，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

吳庸最後說，既然以辛子陵為代表的救黨派想把中共改造

為社會黨，我願斗膽向他們提出推行民主社會主義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1）中共放棄自命的“領導權”，按政黨法登記註冊，自動交出黨產，如果從政則須與其他政黨按選舉法進行平等、自由競選，中共組織從一切機構中退出；（2）中共交出軍權，實行軍隊國家化，撤銷軍隊的中共組織及其代表（政委、指導員）。撤銷各級政法委，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約。落實公民各項自由、民主權利，放開輿論監督；（3）對官僚壟斷資本實施反壟斷法，加強對其非法收支監管力度，壓縮其非法營業寬度。成立民選的和具有實權的廉潔奉公委員會，專司監督、審查中央機構和省、直轄市、自治區級機構的為首官員廉政奉公情況，觸犯法律者交公安、檢查機構偵訊。“他們能認可嗎？”

“公訴”背後的政治格鬥

烏有之鄉網站原來是不受人重視的相當邊緣化的網站，過去曾經言論出格而被當局關閉過。現在，它的聲勢逐漸增長，居然成了毛澤東派的大本營。而這次，大有通過這次“公訴事件”暴得大名的可能。

不過，在北京的觀察家認為，烏有之鄉依舊成不了氣候。這次，因為茅于軾在財新網公開發出討毛檄文，激怒了左派人士。他們才使出了貌似法律手段、實為輿論戰役的一招，鼓吹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但是，這一事件只是限於網絡世界，北京公安局人士強調“網絡犯罪”、“網絡舉報”，根本沒有涉及舉報狀的具體內容。而且，觀察家還注意到，這一事件沸沸揚揚也有20多天，中共大大小小的宣傳部門不予理睬。所以，僅從公訴本身而言，恐怕不會有多大影響力。

但是，熟知中共運作的有關人士認為，毛澤東畢竟還是中共



重慶市公安局電子屏幕顯示標語「熱烈歡迎烏有之鄉網站各界紅色網友蒞臨我局參觀」。

不會輕易放棄的一面旗幟，黨內高層各派都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使用這面旗幟，所以，此事不可等閒視之。

公訴事件剛剛開場，已經表明了一場擁毛非毛之爭的大爆發。只要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格局沒有完全定下來，各派都會以對待毛澤東的不同態度作意識形態的較量。

在清華大學擔任學生輔導員出身的胡錦濤，2002年秋冬之交剛一接班，就去河北省西柏坡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九年來，人們對他期望殷殷，他的主政成績卻太拿不出手。那麼，在其執政的最後一年，他會不會利用毛澤東的餘蔭，為自己扳回幾分？這也是未知數。

而明年將登基的王儲習近平，會不會順水推舟，因勢利導，利用這一“公訴事件”，揭開關於毛澤東的全民大辯論的序幕，果真把中共帶入徹底擺脫毛澤東的新時期？

一次由網絡舌戰引發的“公訴茅于軾、辛子陵事件”，發動者不可能沒有設想過可能導致的後果，而被“公訴”的茅于軾，在發表他那篇成為衆矢之的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之前，肯定對可能成為“人民公敵”做好了足够的思想準備；即便如此，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界的各階層、各利益集團和價值觀念對立如此尖銳嚴重，彼此關係又如此犬牙交錯，這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推倒了之後，會導致多少連鎖反應，帶來多少難以確定方向和力度的轉折，恐怕是擁毛派和非毛派都不具備足够的想像力的。

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一個重要思想：過去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是社會上刮什麼風，黨內就掀什麼浪；但是在毛澤東看來，不對，應該是黨內刮什麼風，社會上掀什麼浪。從這一角度觀察，烏有之鄉的網民掀起“公訴”之浪時，莫不是昭示黨內什麼人在暗中刮風？

有分析人士對《新史記》記者說，可以斷言，胡錦濤絕不希望在他即將交棒之前看到這樣蘊藏著巨大風險、極其容易升高情緒化反應熱度的交鋒；習近平也並不期待在一個擁毛和反毛十分對立、衆說紛紜、爭執不下因而變數極大的局面下接班——這勢必壓縮他接班之後政策選擇的空間，使他陷於相當被動的境地。但是，這種局面對誰有利呢？是誰希望在這個關頭，對交班者和接班者施加“民意”的強大壓力，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在政治上確定新藍圖、組織上確定新班底之際，鬧起這麼一場風波，從而牽制他們的方向、政策走向呢？（《新史記》特約記者劉桐文）

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

《新史記》編者按：中國大陸的烏有之鄉網站發布的《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其實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呼籲大家加入公訴簽名的聲明，以及公訴團的組成名單；二是公訴書正文；三是附錄茅于軾的言行。第三部分的資料來源並未標出，有的是《公訴書》附錄的，也有烏有之鄉網站另外輯錄的，混在一起，相互重複。我們尊重該網站的編排，略做刪節，一併刊出。

在迎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之際，漢奸分子茅于軾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若干有影響力的媒體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此文是共產黨的叛徒辛子陵所著《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的讀後感），對抗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黨

從口出。

茅于軾愛發表見解，常常『禍



毛澤東的遺產

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大量捏造事實，以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詆毀中國共產黨和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篡改、捏造、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社會上激起強烈的譴責和憤怒。各方面的反應已經表明，這是茅于軾、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製造動亂。

我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出現一股否定黨史、否定黨的領袖、否定人民共和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現象決非偶然，它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國主義勢力要“將中東亂局引向中國”的叫囂，是相互呼應的，其目的是內外配合，為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地位、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輿論，是在煽動社會動亂。

我們是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向往社會主義的北京市人民群眾。看到這種情景我們絕不能無動於衷，我們絕不能坐視不管，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捍衛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崇高形象，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為此，我們向人



毛岸英的遺孀劉松林是公訴團領銜者之一。這是1949年4月她與毛澤東、毛岸英合影。

以各種形式展開積極的鬥爭，揭露茅于軾和辛子陵的罪行，堅決打退這股反動潮流。

歡迎北京市廣大人民群眾加入公訴團。建議外地人民群眾自行發起公訴團，不必參加北京市人民公訴團。

北京市人民群眾加入公訴團方式：請進入簽名頁，填寫本人姓名、性別、年齡、（曾）工作單位及職務或職稱（沒有可以不填）、本人留言、本人聯繫電話等基本信息，有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weizhonghua2011@126.com。時間截至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晚上20:00。此後於2011年6月15日匯總北京市人民公訴團成員名單連同公訴書遞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抄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

民的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起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的請求，希望人大對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視，並責成有關部門進行查處，以平民憤，以慰人心，維護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維護毛澤東主席的榮譽和尊嚴，維護國家安全。

我們同時呼籲全國各地熱愛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向往社會主義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共產黨員積極行動起來，拿起憲法和黨章的武器，

北京市人民公訴團發起人：

- 1.馬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 2.劉思齊（毛主席長子毛岸英遺孀）
- 3.劉毅然（電視劇《毛岸英》導演）
- 4.鄒小提（電視劇《毛岸英》製片人）
- 5.韓中（電視劇《毛岸英》中毛澤東主席扮演者）
- 6.毛小青（毛主席侄女）
- 7.魏欣（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長女）
- 8.魏平（著名作家《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次女）
- 9.蘇鐵山（原國史學會副秘書長）
- 10.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 11.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 12.司馬南（資深主持人）
- 13.張勤德（原中央某機關局長）
- 14.李定凱（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 15.蔣高明（中國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 16.楊思遠（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 17.韓德強（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研究員）
- 18.顧秀林（北京工業大學退休副教授）
- 19.常晉芳（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師）
- 20.李海英（對外經貿大學青年教師）
- 21.袁媛（北京服裝學院青年教師）
- 22.趙芳（首都師範大學在校博士生）
- 23.陳欣（中國農業大學在校本科生）
- 24.張桂芝（網名：紅色娘子軍，中國鐵道科學院離休職工）
- 25.曹占京（原北京市藍島大廈有限責任公司內退工人）

- 26.李小丁(北京市內退工人)
- 27.王學祿(軍轉幹部)
- 28.劉軍(北京電視台退休幹部)
- 29.司馬平邦(獨立學者)
- 30.李志偉(北京法律工作者)
- 31.郭松民(獨立學者)
- 32.王明紅(北京市民,退休職工)
- 33.楊曉陸(獨立學者)
- 34.馬婷娜(自由職業者)
- 35.薛雲(點石金校校長)
- 36.范景剛(烏有之鄉網站站長)
- 37.王英輝(自由撰稿人)
- 38.王禹森(公司職員)
- 39.王志斌(公司職員)
- 40.王左軍(北京市民)
- 41.魯太光(青年學者)
- 42.呂震(退休高工)
- 43.周靖冬(退休幹部)
- 44.鄒逸民(原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國際部總經理)
- 45.張琳娜(自由職業者)
- 46.陳磊(中央某機關公務員)
- 47.曹幸仁(中國工商銀行退休職工)
- 48.許會民(《中國雷鋒報》報社副社長)
- 49.唐彬(北京紅歌會)
- 50.王忱(媒體工作者)
- 51.高海明

附錄：北京市人民公訴書

控告人：北京市人民公訴團(成員名單附後)

被告人一：茅于軾

被告人二：辛子陵(宋科)

北京市人民公訴團認為茅于軾、辛子陵二人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強烈要求檢察機關依法對茅于軾、辛子陵二人提起公訴！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審判茅于軾、辛子陵二人的罪行！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責成司法機關及時將茅于軾、辛子陵二人繩之以法！

2011年4月26日，茅于軾在若干媒體發表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一文，該文超出了任何意義上歷史評論的範疇，是赤裸裸的侮辱誹謗。在該文中茅于軾用極其惡毒、下流的語言編造大量謊言對已故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攻擊和誹謗。其目的是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煽動人們對毛澤東主席及其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仇恨，其動機是邪惡的，其行為已經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是中國各族勞動人民愛戴的人民領袖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是備受世界各被壓迫民族尊重的偉大的革命導師。

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戰勝了國內外敵人，推翻了壓在中華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我們這個近代歷史上備受西方列強侵略、壓迫，備受屈辱的民族從此屹立

於世界東方，開始了和平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新老帝國主義並不甘心失敗，他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繼續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圖謀。是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緊緊依靠中國人民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打敗了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捍衛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尊嚴，保衛了國內的和平與建設，也塑造了新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蔑視一切強權，敢於同一切帝國主義作鬥爭並戰而勝之的堅強的民族意志品質，為世界上被侵略、被壓迫民族樹立了光輝的典範。毛澤東思想也因此成為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銳利的武器。

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下翻身得解放的勞動人民爆發了強烈的建設國家的熱情，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帶領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戰天鬥地，在短短 27 年的時間內取得了最驚人的建設成就。中國從一個石油、水泥、鐵釘、火柴被稱為洋油、洋灰、洋釘、洋火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擁有自己的原子彈、氫彈、火箭、衛星、飛機、輪船、火車、汽車、核潛艇、電子電腦等所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產品，並在某些領域領先世界的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罕有的發展速度！

儘管毛澤東主席在世之時，人民物質生活條件還並不富足，但是，人民生活水準已經顯著提高並逐步改善。那個時代的人民雖然並不富足，但公平、和睦，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人需要為生計鋌而走險，沒有人為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而忍受折磨。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一個積累和發展的過程，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捫心自問，如果沒有毛

澤東時代全中國人民上下一致、艱苦奮鬥、勤儉建國換來的工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基礎，怎麼可能有後世子孫的和平、安寧與富足？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意氣風發，氣壯山河！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功蓋天地！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與日月同輝！

儘管改革開放後的一些政策失誤已經嚴重侵犯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嚴重傷害了勞動人民的感情，但廣大的勞動人民依然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願意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政權，願意同一切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作鬥爭。究其原因，其一，在於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其二，在於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深厚的感情，在於人民對用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新一代共產黨人的高度信任，人民相信毛澤東主席創立的中國共產黨有自我糾錯的能力，即使有短暫的偏離，最終仍然會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道路上。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那一代共產黨人的豐功偉績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正當性和合法性最深厚的政治基礎。

國內外的敵人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的這三十多年中，國內外的敵人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毛澤東主席的惡毒的誣蔑、攻擊和詆毀。他們編造了無數的謊言來誣蔑毛澤東主席，詆毀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其根本的目的就在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復辟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制度；在國際上繼續維護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剝削，恢復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殖民化奴役！茅于軾、辛子陵之流就是這些國內外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的代表人物和急先鋒。

應該說，人民的敵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最終不可避



辛子陵也被稱為“漢奸”，也是這次被“公訴”的對象。

免會走向失敗。

說他們成功，是因為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的這些年中，他們通過對毛澤東主席的否定和誣蔑，麻痹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完成了對人民大眾的搶劫，造成普通民眾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大面積工人下崗、大面積農民貧困、大面積大學生失業、腐敗叢生、大量婦女賣淫！通過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搶劫，他們完成了血腥的財富

積累，現在他們要做的就是徹底推翻共產黨，消滅他們實現資本專政道路上最後一道障礙，把他們搶劫的成果固定下來。國外敵對勢力通過勾結中國國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都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通過不斷妖魔化毛澤東和文革，在政治上已經成功孤立和醜化了中國和中國政府；經濟上某種程度地實現了對中國的經濟殖民化控制；在文化上，他們已經成功地培養了大量的文化漢奸，逐步消磨了新中國建立起來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軍事上也已經實現了對中國的包圍，不斷在中國周邊耀武揚威、製造事端，不斷地支援中國民族分裂勢力，企圖肢解中國。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最終目的依然是維護其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秩序，永久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對中國的殖民化統治。

說他們最終必然要失敗，是因為中國人民已經開始覺醒。人民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國內反動勢力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幹著搶劫人民、出賣國家、復辟剝削制度的勾當，認識到了以美國為

首的帝國主義勢力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幹著侵略、奴役別國人民的罪惡行徑。人民也認識到了這些年人民所遭受到的一切苦難，國家所遭受到的一切困境乃至屈辱都是丟掉了毛澤東思想的結果。現在在中國大地上蓬勃興起的紅色大潮不僅是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懷念，更是廣大勞動人民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強有力的政治宣言！

人民徹底覺醒之日就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徹底滅亡之時！正因為如此，那些企圖顛覆人民民主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反動勢力感到了恐懼，他們要做最後的垂死掙扎。以茅于軾為代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對分子，在這個時候跳出來，再次祭起了通過誣蔑毛澤東主席從而否定共產黨執政合法性這面旗幟，不是孤立的，它有著複雜的國內外政治背景。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 90 周年之際，全國人民翹首期盼黨的十八大回歸毛澤東思想、復興社會主義之時，也是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顛覆、破壞和分裂活動的關鍵時刻，茅于軾炮製《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這樣一篇通篇造謠、極盡誣蔑誹謗之能事的文章來誣蔑毛澤東主席，其否定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瓦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煽動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結合茅于軾和辛子陵一貫的漢奸言論和反人民言論，其通過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其行為無疑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105 條的規定，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理應受到刑法的制裁。

任何人都有發表自己言論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沒有侮辱誹謗別人的自由；任何人都有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自由和堅持自己信仰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沒有侮辱別人信仰的自由，更沒有侮



孔子第73代孫、北大教授孔慶東也是公訴團成員。

辱人民大眾的信仰的自由。對絕大多數國家來說侮辱誹謗一個普通的逝者的行為都是犯罪，更不用說侮辱誹謗人民大眾的信仰，這是文明社會的一條基本的準則。

對當今的廣大勞動人民來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是自己的信仰，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紐帶！毛

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可以評論，也可以批評，但絕不容許侮辱誹謗！

這不僅僅是捍衛毛澤東主席個人名譽的問題，這個問題，對外關乎國家民族安危，關乎是否有足夠的民族凝聚力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挑釁、顛覆和侵略；對內事關是回歸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徹底復辟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邪惡制度的問題，是事關廣大勞動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問題！

人民有決心和信心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社會主義道路！有決心和信心粉碎任何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邪惡制度的政治圖謀！

人民公訴團敦促國家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將茅于軾、辛子陵繩之以法！

附錄：茅于軾其人其言

4月26日，茅于軾在財新網、新浪、搜狐、和訊等網站博客及《國際財經時報》網站發表《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讀〈紅太陽的隕落〉》一文，捏造大量謊言，對毛澤東主席及中國共產黨歷史進行惡毒攻擊。該文被右翼網路媒體重點推薦，在網路上被廣泛傳播，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以下是茅于軾文章的摘錄（略。請見本刊全文登載的茅于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新史記》編者注）

茅于軾簡介

茅于軾，1929年1月14日出生於南京，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橋樑專家，1946年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1950年從機械系畢業，分配在齊齊哈爾鐵路局，任火車司機、技術員、工程師。1985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開始以“經濟學家”自詡。1986年受福特基金會資助赴美國哈佛大學任註冊訪問學者，1993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任天則經濟研究所首任所長，現任理事長、常務理事。2008年，茅于軾帶頭簽署意在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零八憲章》。

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繫的私人免稅基金會。茅于軾攻擊18億耕地紅線，聲稱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中國人吃糧食可以完全依靠國際市場，這顯然不是一般的白癡言論，而

是在孤注一擲地為國外敵對勢力服務。

美國福特基金會成立於 1936 年，但真正發揮作用是在 1953 年改組之後。二戰後，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瞭解蘇聯。通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聯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域研究的機構。在 1953—1966 年十幾年的時段裡，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 34 所著名的研究大學 2 億 7000 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 20 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1966 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係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並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係。

受到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學者有：

茅于軾：1986 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吳敬璉：1983 年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

張維迎：1987 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英國牛津大學進修。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長達 500 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也譯為《誰承擔費用——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

茅于軾打著為民間資本說話的招牌，鼓動國家金融開放、產

茅于軾和他的妻子趙燕玲，他認為妻子是他的幸福第一源泉。



業開放、消滅國企，讓所謂民間資本（其實是外資）進入；茅于軾鼓吹國家應放棄 18 億畝土地紅線，轉而向發達國家進口糧食，鼓動政府主動向帝國主義交出中國的糧食主權，是眾所周知的經濟漢奸、經濟間諜。

茅于軾的主要漢奸言行

1. 攻擊 18 億畝土地紅線，為美國農業巨頭控制中國人的糧食主權張目

亨利·基辛格的名言是“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助美國的農業巨頭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主權，洛克菲勒基金會是綠色革命和轉基因糧食的重要推手。

2008 年，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發佈“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

研究報告，結論為，確保 18 億畝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于軾鼓吹：

“中國石油有 40% 進口（當時）我們不是一樣活得好好的？現在爭奪資源的戰爭已經沒有了，石油是戰略物資，可以進口，糧食是戰略物資，為何不能進口？既然糧食可以進口，我們要 18 億土地的紅線幹什麼？現在房價這麼高，從經濟學理論來說就是供需不足，如果增加了供應量，房價自然就下來了。”

“未見得永遠是耕地最重要。這裡要讓市場起作用，它能夠均勻地平衡各種用地的需要。更糟糕的是由於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完全不必要的 18 億畝紅線的規定，使得所有的合理的土地用途轉換都變得非常困難，要通過一系列的審批。”

“回顧過去，因糧荒而大規模死人的都是計畫造成的。當市場存在的時候從來沒有大規模餓死人。”

“說到利用國際市場保證糧食安全就會有許多議論，認為靠國際市場是危險的，自給自足是安全的。但是無論從經濟學還是從事實來看，上述認識恰好錯了。中國的國內市場就被計畫破壞了，而世界市場要比國內市場可靠得多。當今全球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恰好就是自給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貿易和交換（國內的和國際的）才能保證糧食供給的安全。”

“有市場就不愁買不到糧食，世界糧食供應非常充足，中國人不會因買不起糧而挨餓。”

“即便遇到百年一遇的缺糧，中國所花外匯購買糧食大致也只是需要 100 億美元，中國怎麼會缺錢買糧？”

“又有人說萬一人家糧食禁運怎麼辦。老實說，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糧食吃，中國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茅于軾攻擊 18 億耕地紅線，聲稱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中國人吃糧食可以完全依靠國際市場，這顯然不是一般的白癡言論，而是在孤注一擲地為國外敵對勢力服務。

2. 兩會前期，茅于軾的天則所再次炮製報告攻擊國企

茅于軾及其天則經濟研究所基本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佈類似聳人聽聞的言論，其言論的特點是主張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2011 年 3 月 3 日，正值兩會召開前期，天則經濟研究所再次炮製報告攻擊國有企業，為外資和私營企業進一步瓜分中國市場吶喊。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國國企的作用與績效問題再次遭到學者炮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課題組昨天提出統計稱，如果扣除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國企對外宣稱的龐大利潤實際上是虧損。”

也許是鑒於茅于軾名聲太臭的緣故，這次天則所偷襲國企的行動中不見了茅于軾的蹤影。天則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課題組總負責人是盛洪，執行負責人是趙農。儘管茅于軾也是政協委員，但此報告卻由政協委員、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高明華提交到兩會上。

由於國有企業已經被妖魔化了 20 多年，天則這個攻擊國企的報告得到眾多媒體的支援和傳播，聯合早報網、鳳凰網、新浪網、騰訊網、網易、財新網等媒體紛紛炒作天則所的這個報告。

3. 茅于軾時常發表赤裸裸的漢奸言論

“中印戰爭為了幾萬平方公里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戰，有什麼價值？”

“毛澤東時代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客觀上他當權的



茅于軾對保釣行動頗不以爲然。

30年是使中國落後的30年。他是中國歷史的罪人。”

茅于軾歡迎殖民論：“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當然如果那塊土地上有我們的同胞，這塊土地被別人拿去後這些同胞要做亡國奴，那麼我們有義務保衛國土。如果那是一塊連人都沒有的荒島，爭這塊領土就毫無意義。或者這塊土地上的百姓歸屬別人管理之後，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擴大了，那麼這種領土主權的轉移，不但不必反對，還值得歡迎。”

放棄釣魚島：“釣魚島的爭奪更是一個例子。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中國和日本爭奪得很厲害。在我看來，雙方都不值得為此傷感情。把爭奪釣魚島的力氣用在國內對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豈不更好？幫助沒錢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沒錢上學的孩子能上學，是不是更有價值。也許有人認為，釣魚島雖然現在沒有人，也可能將來附近有石油等資源，為什麼不值得爭奪？但是我感覺大家為釣魚島動感情，並不是出於資源的考慮，還是出於

主權的考慮。如果是為了資源，根本用不著鬥爭，坐下來談判，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討論雙方利益分配，得出雙贏的結果，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競價拍賣，出錢多的一方獲得開採權。所出的錢成為放棄一方的補償。”

茅于軾認為汪精衛是救世主：“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評價汪精衛。文章我沒有看到。對汪精衛，我也沒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於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

茅于軾詛咒憤青們抵制日貨“愚蠢”：“因為我們買日貨，對自己也有好處，沒有好處的事情我們是不會做的。不買了，就沒有好處了。用損害自己的辦法損害別人，何苦呢？”

最近，就在中國即將完成第一艘航母的改建之時，茅于軾無視美國巨額軍費的事實，鼓吹“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領導人。中美合作帶頭均衡裁軍，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不要輕輕放過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稅款去建航空母艦。”

4. 簽署《零八憲章》，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

茅于軾帶頭簽署劉曉波等人起草的《零八憲章》，公開鼓吹

要修改憲法、分權制衡、開放黨禁。連德國學者塞巴斯迪安·卡倫斯都認識到《零八憲章》的巨大陰謀和險惡用心：

“《零八憲章》與普通的人權呼籲有著本質區別，它既不是抗議信，也不是人權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一部全面的政治綱領。如同1977年捷克異議分子撰寫《七七憲章》，呼籲推翻蘇聯政權一樣，劉曉波及其追隨者起草《零八憲章》的實質是要求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解散現有國家體制，而後完全按照西方標準重建政府。該文的要害有三：一是通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放棄中央集權制；二是通過‘分權制衡’全盤西化；三是通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開展新土地運動’推行全面私有化。它不僅是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顛覆。

茅于軾言論摘編

原編者：黎陽，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以下言論，因為來源不同，與上文《茅于軾其人其言》時有重複。為便於閱讀，現將重複者刪去。——《新史記》編者注

1. 賣國賊

“賣國並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這顛倒了幾千年的道理恢復正常”。

“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

“那兒的領土壓根兒就沒人居住，爭奪那兒的領土完整，卻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價，有什麼必要？這些例子尖銳地顯示出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經常有人喊：誓死保衛釣魚島，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衛它。可是那兒連一個居民都沒有。一個人的生命為什麼那麼不值錢，簡單說，就是因為受了政治家的蒙騙。犧牲自己為人民的利益是對的，可是犧牲自己為國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本來國家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間的小摩擦，政治家們把它放大成為國家利益之爭，興師動眾，借題發揮。最後就是拿百姓交的稅款為自己謀名謀利。”

“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寧，絕不會無事生非。即使有個別人喜歡鬧事，也絕不會鬧到國家的規模，花掉那麼多錢，犧牲那麼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麼多糾紛，主要是政治家們的‘功勞’。”

“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絕不是極終真理。兩個國家的愛國主義造成兩國對立，挑起仇恨，最後倒楣的是兩國的百姓。愛人民（中國的和外國的），這才是極終真理。”

“抵制日貨是很愚蠢的辦法”、“不贊成抵制日貨，政治應遠離市場”、“抵制日貨是用損害自己的方法去損害別人，這和身上綁了炸彈去炸敵人，雖然程度上不同，性質是差不多的。”

“中日東海問題應交企業家談判”。

“在敗局已定的條件下，應該說，投降是正確的選擇。”

“投降之後就不可以繼續堅持原來的敵對立場，讓對方有可能按照中立民眾的條件來處理俘虜的生活。如果繼續按照敵對

的關係作鬥爭，對方就不可能給俘虜以和平的對待。敵對鬥爭就會繼續到俘虜營裡，也就沒有什麼和平可言了。”（原注：南京大屠殺呢？）

“在戰爭中犧牲的日本軍隊和百姓都是無辜的，他們對戰爭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的戰死是因為上了戰爭罪犯的當，而且大多數是被迫送死的。我們要紀念戰勝國的陣亡將士，同樣應該紀念戰敗國的陣亡將士。”（原注：讓中國人年年紀念侵華日軍的“陣亡將士”？）

2. 57年反右沒錯，就是要奪共產黨的權，把共產黨趕下台
“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

“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

“我認為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

3. 企圖顛覆國家、瓦解國家

“至於國家的尊嚴，更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事情。所謂國家的尊嚴，其實是政治家的尊嚴。”

“僅僅是為了國家而殺一個人是絕對不允許的。”

“以顛覆國家的罪名給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懷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這個道理連叛國罪都未必能夠成立”、“所謂‘敵對勢力’也是政治家製造出來的名詞。”

“所謂‘國家’和現在大家所理解的國家會有很大的區別。它

往往可以由較小規模的社區來代替”。

“把國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這種顛倒的原因，是幾千年來政治家的故意宣傳。我們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理論再顛倒回來”。

“只要有國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政治家利益，這三個利益的衝突總是難免的。在什麼情況之下問題才能夠得到較好的解決呢？從長遠的目標來看，只有在消滅了國家，當然也沒有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治家時，這個問題才有徹底解決的可能。”

“現在的歐盟 25 國正在走向統一，國界的觀念越來越淡薄”。

4. 妄圖解除中國武裝

“進入 21 世紀以後，國防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了。因為前面講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爭奪資源的戰爭不再需要，也因為國際社會對侵略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制約。任何一個國家用任何藉口侵略別國都不被認可。過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賠償，誰還有興趣做將要被清算的事呢？”

“現代戰爭多半是意識形態之爭。看法的不同將永遠存在下去，何必動刀動槍？所謂國防，越來越成為用武力解決意識形態之爭的掩飾，或者用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的真刀真槍來解決看法的不同。”

“有了石油市場，大家在市場上以價格來競爭，用不著打仗。從來沒有聽說過買賣石油要動刀動槍。所以說，由於世界市場的出現，爭奪資源的戰爭一去不復返了。”

5. 仇視人民，欺壓人民，公然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



有關茅于軾的漫畫。

眾為敵

“這個社會一定是不平等的，住房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不管你什麼社會形態，這是改不了的。”

“社會進步是靠精英的。社會沒有了精英，必然退步。所以，毛澤東時代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

“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

“中國不能搞太多福利”。

“你自己置不起房產，還要政府幫忙，這對嗎？”

“政府是不是還需要幫助窮人買房，我看不合理。全世界你講不出這樣的理由！”

“餐館剩食放窗口，請路人取用”。

“降低學費是讓不窮的人搭了便車。”

“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

“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小額貸款必須高利息”。

6. 妄圖消滅中國農業，摧毀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困擾人類幾千年的糧食問題已經徹底解決。農業本來是最重要的行業，而現在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

“糧食應該部分依靠國際市場，適當進口，即使達到消費量的10~15%也不足慮。現在日本進口糧食就達到60%以上”。

“大家按照市場規則做，一點也不會有供應安全的問題”。

“現在中國不缺糧食，糧食很便宜。缺的是什麼？缺的是住房，大家買不起。為什麼住房貴？是土地的價格貴。為什麼土地的價格貴？缺少土地。為什麼缺土地呢？18億畝紅線給卡住了。”

“國內已經解決了糧食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國外有足夠的糧食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發生饑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於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蠻可以用進口來解決”。

“究竟是保護耕地要緊還是城鎮化要緊？肯定是城鎮化更重要，因為糧食已經不是問題，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積。”

“這個觀點（保護耕地）是片面的，甚至於是害多於利的。不允許侵佔耕地的原因是我國耕地十分稀缺，為了保證糧食生產必須保護耕地，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沒有看到糧食問題已經不再是制約發展的因素，不論在我國，或者在全世界，糧食和其他絕大部分商品一樣，是供過於求的”。

“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制度確實是害多利少，應該及早調整。”

“18億畝紅線的數目完全是拍腦袋出來的，沒有經過任何經得起檢驗的研究，這條紅線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進

程，極不利於加速農民進城和解決三農問題。”“完全沒有必要，17 億畝沒有必要，10 億畝也沒有必要，任何紅線都沒有必要”。

“一塊土地應該用於種糧食，還是蓋廠房，修機場，作停車場，應該按照具體情況而定，絕沒有道理說永遠是種糧食有優先權。可是保護耕地的政策卻把種糧食永遠放在了優先地位，這對城市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障礙。每當佔用耕地就要經過複雜的審批手續，大大地增加了建設成本，延長了工期，尤其值得關心的是用地的審批會造成貪污腐化的機會，當前很大一部分的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關，這些貪污犯犯錯誤固然是因為不能潔身自好，但也與佔用耕地的審批制度有關”。

（記者：“有批評者稱，您有關耕地保護與糧食安全的論斷，是在為境外基金會傳聲、代言，而且您本次調研報告恰恰是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都是胡說八道。我們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們所有的研究，沒有一個是別人授意我們做的，都是我們主動要做的。”

7. 鼓吹損人利己、貪污有理

“貪污五千億不算大事”。

“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 萬億，五千億隻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麼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財富生產才是最大的事。”

“道德能值多少錢？”

“我不贊成犧牲自己造福別人”。

“‘犧牲自己為別人’的極端，就是走向恐怖主義。認為自己的犧牲可以大大地造福於別人，這是愚蠢的想法。”

“君子國裡的每個人都要損己利人，結果造成一大堆矛盾；義務為別人做好事的人卻在鼓勵別人做壞事”。

“社會整體來看損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損人很少而利己極大，此種行為就有利於社會。因為自己也是社會中的一員，此種行為可使社會的總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個人都能找到一種損人極小而利己極大的方法，整個社會將因此而得益。”

“同一件事對他本人而言是損己利人，對別人而言又變成了損人利己。由此可見損己利人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種原則不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制度性原則。”

8. 所謂“法制”是欺騙，所謂“民主”是無政府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幹。我相信不是我錯了，是法律錯了。”

“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憲法都改了幾回了，法律為什麼不能改？我不怕，大風大浪我也經過了，再說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的。”

“我就敢於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9. 買辦資本家和國際壟斷財團豢養的走狗

“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

“我們的經濟改革靠什麼？靠的是西方理論。”

10. 沒有科學，只有陰謀詭計和狂妄自大

(當記者問：“您提到個稅起徵點 8000 元起，這是怎麼得出來的？”)“我隨便說的”。

“文字的經濟學被傳統理論界封鎖得很嚴密，只有用數學稍微有點自由度，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裡漏出來。”

“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個不同。一是走北京飛機場的人行傳送道。大部分人都站著被動地等傳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卻等不及，要在傳送道上往前走。這可以說明我與眾不同。”“再一點跟別人不同的，是在飛機上吃晚餐。我們 3:45 就上了飛機，要飛三個小時。可是起飛不久，四點多鐘乘務員就開飯，把飯分配給了每個人。這時根本不到吃飯的時間。可是大多數人就乖乖地吃起來了。而我等了一個多鐘頭才開始吃飯。這說明我和大多數人不同。”

防止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台！

以唱紅打黑為表現形式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以黑雲壓城的威勢，向首都，向全國各大城市壓過來。北京政治氣氛詭異，有點像 1966 年。又是打出保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欺騙民眾，又是拿有名望的知識份子開刀（1966 年是在報紙上批吳晗和鄧拓，今天是在網路上批茅于軾和辛子陵），又是黨政領導機關和民主黨派的觀望和廣大知識份子的沉默，又是公檢法加上維穩辦的暗中保護。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初起，當彭真出頭保吳晗、鄧拓的時候，書記處和政治局沒人伸一援手，後來，在毛澤東的強大威勢下，彭真孤木不成林，頂不住壓力，將吳晗、鄧拓拋出來，彭真隨著垮了，北京市委和中央書記處也跟著垮了。當

劉少奇退讓，被指定主持會議，揪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時，他也就徹底孤立，只等著自己被揪鬥了。當周恩來連賀龍都不能保護時，他就只能成為毛的工具，代替毛澤東在賀龍專案、在劉少奇專案的結論上簽字了。當林彪以只忠於毛的面目與各帥翻臉的時候，他自己，他的四野，也在被倚重的陶醉中走向了滅亡和瓦解。當發生這一切嚴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事情，朱德領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任憑憲法法律被踐踏，天下大亂，紅衛兵揪鬥文化名人和領導幹部，不開會，不作為了。黨、政、軍領導人，被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大獨裁者毛澤東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了。文革中，我們看到了身居高位的領導人把保自己放在第一位，向文化大革命讓步屈服，但他們並沒有保住自己，全身而退，而都被文革洪流淹沒了。

面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來潮，可悲的是，中共黨內連個彭真都沒有了。難道眾多黨和國家領導人真的不知道茅于軾和辛子陵是真心支持改革開放、他們批毛是對改革派的支持嗎？為什麼縱容烏有之鄉在二十多個省市發起簽名運動，起訴公審兩位在意識形態上撥亂反正，對改革開放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知識份子呢？黨政軍各界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不要幻想利用文革潮流升到更高的位置，真要是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台，你們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

現在，權貴集團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官員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無法遏止，官民矛盾上升為國家的主要矛盾，超過國防費用的維穩經費意味著，大量的武裝與准武裝人員與維權民眾，實際是處在一種特殊的“內戰”中。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向民生傾斜，對緩解官民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個“胡溫新政”一定要堅持下去。但沒有大的戰略性的利益調整，在土地政策上繼續與民爭利，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去年 25 萬起群體性事件證

明，越維穩越不穩，現狀是維持不住的。全國人民希望執政黨和平轉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作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但這會觸動權貴集團的利益。於是，他們的代表人物提出回歸毛時代以解脫危機的思路，並創造了所謂“唱紅打黑”的新文革模式。這不是方式方法的探索，是在政治上“棄鄧歸毛”，是廢掉改革開放這一套，回歸毛澤東時代，回歸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這是飲鴆止渴，只能加速黨和國家的滅亡。希望中央領導核心團結一致，採取有力的政治舉措，防止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防止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台！

毛屍出堂，毛像下牆！

支持改革開放，反對復辟倒退！

支持改善民生的胡溫新政，反對唱紅打黑的文革逆流！

（本文作者龐觀清系退休中共高級幹部）

《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作家杜斌。



謊言搭建的真實“煉獄”

毛澤東描繪的“天堂”，分明就是“煉獄”

被毛澤東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自己的九十大壽。歌頌九十年的豐功偉績、英勇事跡，成為眼下中國官方媒體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北京的攝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黨史是另一番景象。因為他知道，有成萬上億的人已經無法發出聲音，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當年有首“民歌”描繪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杜斌對我說：他們如果在世，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這些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黨描繪的“天堂”，黨帶領他們向天堂走去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毛主席的煉獄》，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壽辰前夕所編著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本圖文並茂的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

杜斌給海內外中英文媒體拍攝過大量照片，他的《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一書，集中了大量真實的鏡頭，描繪了上訪者滿腹冤屈、求告無門的悲慘經歷，讓讀者“百聞不如一見”，贏得海內外廣泛重視。中國政法大學學者蕭瀚說，這本書“彌補了中國歷史的部分遺憾”。

他還出版過《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識流之類藝術手法，但杜斌強調：百分之百都是非虛構。“在台灣出版的《牙刷》，我標為‘後現代小說’，但內容完全是真實的，標為‘小說’，當然是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煩。”

但是，《毛主席的煉獄》這部書，13萬文字和150多幅圖片，只有幾百字是他自己寫的，他也幾乎沒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決定全部用真實的史料：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歲月中毛澤東的黨內批示和公開講話，糧食官員的私人筆記，寄到中南海的民間

上書，內參簡報，親歷者的追憶等等文字，穿插以那個年代的宣傳畫、農民畫、報刊插圖、照片，甚至還有歌曲簡譜、年曆、郵票、香煙盒……

就用這些乍看起來雜亂得無以復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還原中共在慶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裡注定諱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實的“煉獄”。

這本書的編排框架，杜斌決定就用編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順序排列。他要讓那段歲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圖案和旋律來呈現自身。“這比我說多少話都更加雄辯。我把這些資料編在一起，就是讓數千萬被餓死的亡靈說話，聽聽他們對90年黨史會說什麼？”

“野生”新聞人

杜斌出生於1972年，正是中國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饑荒之後的十年。誰曾料，安穩日子過了沒三四年，毛澤東他老人家又把中國推入“文革”的動亂深淵？杜斌在山東鄒城縣一個鎮上長大，那段歲月中，在政治運動中無休無止顛簸的父母都隻字不提大饑荒，官方更是緘口不言，他又早早離開了家，以致對那段慘痛的歲月，一無所知。後來到北京工作後，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問了父母，他們告訴我，爺爺也挨過餓，但我們那裏還算好，沒有餓死人。”

杜斌對《新史記》記者坦承，自己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不過他從小酷愛文學寫作，年輕時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去當兵，三年後復員，待業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鄉一家工廠的保衛科工作。上班比較安閑，精力充沛的他對新聞發生了興趣。

“在這裏學著寫稿，學著拍照片——沒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報刊上人家是拍什麼、怎麼拍，然後自己學了就往外投稿。為什麼後來攝影搞得多？寫稿子很費勁嘛，幾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寫；照片省事嘛，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成了！”



杜斌攝影作品：“見誰都想跪”

時間：2003年4月

地點：北京市朝陽區一家報社門前

上訪者：甘肅省下河清農場吳秀英。

56歲的寡婦吳秀英生來幾乎就是給人練手用的“靶子”。20年的上訪史，是飽受毒打、收容、遣送、拘留、扣押、刑求、罰款和性騷擾的屈辱史。吳的胸、肋骨折斷過若干次後“有些拽不起身子”；她的膝蓋下跪過若干回後“見誰都想跪”。在拍攝此照片前她剛剛在最高法院門前遭打。

說是這樣說，正如一個美國笑話所說的：花了一千美元請專

家來查驗機器的故障。他來後，只畫了一道線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氣：這就值一千美元？專家說，畫線，值1美元；知道往哪兒畫，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知道拍什麼有意義，怎麼拍得好，這可絕對不是像他自謙的那麼輕巧。在別人看來，杜斌的路走得真順，中國當時那麼多著名大報，只有一兩家沒採用過他的照片；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誌等國際著名媒體發表。“台上十秒鐘，台下十年功。”他經歷過多年的顛躓、淬煉，才能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成就一張優秀攝影作品。

杜斌給我講起他如何起步學攝影：他那時沒有積蓄，說動了父親掏出兩三千元存款讓他去去臨沂，買下來一台海鷗相機。沒人教，老是曝光過度、照虛了；投稿也發出來一些，但自己也不滿意。他仔細研究各家媒體拍的照片，下班時將工廠宣傳部訂的各種報紙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送回來。自己也訂了《攝影世界》雜誌，還買過《黑鏡頭》、《普利策獲獎照片選》等書，揣摩大師傑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構圖……後來他又登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的網站，琢磨別人為什麼拍得好，自己為什麼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儉用，對相機和鏡頭不斷昇級換代。

“2004年我跟一個《紐約時報》記者出去工作，他問我：是在哪所學校學的攝影？我通過翻譯告訴他，我沒有受過一天攝影專業教育。這位記者大吃一驚。我補充說，我攝影與你寫文章一樣，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認同我的這個體會。”

杜斌說：我走的，是一條“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畫面裡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場景是傾斜的。有人問我，我說，我眼裏的就是傾斜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感覺。”

中國著名攝影記者盧廣曾評論：“杜斌是個下手更狠的傢伙”，盧廣指著《中國社會導刊》中一幅圖說：“除了杜斌，沒人敢這樣拍”。

杜斌回憶，曾獲得過世界攝影比賽等國際國內很多獎的“獲獎專業戶”盧廣，對他說：你的照片，每一張的構圖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風格學習。“我很驚喜：是嘛！我沒有受過攝影的專業訓練啊。”

杜斌告訴我：“我也參加過攝影比賽，但沒有獲過獎。”

“不對呀，2010年5月，你不是獲過亞洲人權新聞大獎嗎？”

“哦，對，但那不是攝影獎。那組照片《寫出冤情》，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我真沒想到，他們放到17吋那麼大——將雜誌的兩頁連起來。”



杜斌攝影作品：“我是個冤死鬼”

時間：2002年12月2日

地點：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街頭

上訪者：黑龍江省伊春市 44 歲的教師張永印

他哭訴警察霸佔了妻子，打殘了他的雙腿。上訪抗議時，他就穿上自己縫製像鬼穿的白衣，上面寫著他在人間的屈辱。這是杜斌的獲獎照片《寫出冤情》中的一張。



杜斌攝影作品：“太監”蒙冤 30 年

時間：2002 年 2 月 6 日

地點：山東省桓台縣聶橋村

上訪者：農民邢樹貞

他 1972 年被村幹部濫用私刑閹割進行肉體羞辱，上訪 30 年無果。但他仍必須同其他生理正常的男人一樣繳納計劃生育管理費。54 歲的他，蹲在村委會緊鎖的鐵門前欲哭無淚：“憋得直吐血。”這也是杜斌的獲獎照片《寫出冤情》中的一張。

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獲得亞洲人權新聞大獎，說明杜斌攝影闖出名號，不僅僅來自他的眼準手快，更來自他對公平、正義的信念。“我來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對底層民衆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能這跟我喜歡寫詩也有關係吧。”

而他走向全國，走向首都，走向國際，也與此有關：有這種悲憫情懷，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社會生活的瞬間，才能震撼千萬觀眾的心。

杜斌告訴我說，最開頭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個農村家庭，丈夫給人修房子摔下來半身不遂，三個孩子，一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就去拍他們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對他們伸出援手。杜斌知道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艱難，連礦泉水都自己帶。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個圖片故事，給山東一家媒體發表了。

後來北京一個電視攝製組來山東拍攝一個被人販子拐賣給麻風病人的七歲小女孩，但他們聽不懂當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處了一段，攝製組的人瞭解了這個山東小夥子的本事，也瞭解了他的熱誠，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攝像師，兩次三番地鼓動他到北京闖天下：“《北京青年報》正在招聘攝影記者，你來應聘嘛！”

杜斌也越來越感到，確實，郟城縣的舞台太小了，山東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 1999 年，杜斌已經是在山東發表圖片故事最多的人，縣委宣傳部讓這個自學成才的青年去給通訊員講課。他在那裡偶然發現了一張彩色的《北京青年報》，留下印象。這次聽攝像師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試我的人開頭告訴我說，我們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戶口；我當然沒有，就把我的作品

給他看，他看了就說，你下星期就來上班吧。我當晚趕回山東，買了份《北京青年報》，在火車上打開一看，居然把我的一個圖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個版！面試我的人居然都沒給我提一個字……”

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年輕的杜斌，先後在《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民政部下屬《中國社會導刊》等媒體工作，為這些媒體，也為國內外其它大量媒體拍下聚焦弱勢群體的新聞照片。



杜斌攝影作品：183 次託生為人

時間：2002 年 4 月

地點：北京村

上訪者：孫傳明，81 歲

因兒子在 1983 年“嚴打”中被處決，認為兒子被冤殺的孫傳

明 20 年來京上訪 183 次，先後被北京一個信訪辦強制收容 152 次。滯留北京時間最久、上訪村資歷最老的他說，“官司打不贏，北京就是我的娘胎。”

不可避免捲進風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風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報》工作時，2002 年 8 月，與蘆蕩合寫過一篇報道《“山東棲霞 57 名村官集體辭職事件”真相》。他們深入當地十幾個村莊，走訪了幾十位當事人，盡其所能地客觀報道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會主任、村支書、上級鎮黨委張書記、棲霞市委王副書記等各方面的陳述和看法，指出：

雖然 57 名村官上訪一事不能稱為辭職，雖然 57 名的數字有些水分，雖然出現聯名事情的 45 個村子和全市 945 個行政村比起來顯得有些微小，雖然棲霞市領導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很多人因此斷了上訪的念頭，但是有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落實，比如印章的使用問題。雖然國家出台了相關的法律，但是在棲霞的部分村中卻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按規定，黨支部、村委會的印章應該由黨支書與村主任之外的第三人進行保管，但是如果書記與主任出現矛盾時，印章的使用權實際上就落在了保管人的手裏。還有村主任連帳目都看不了，還談什麼財務公開？甚至有些村的村民大會制度沒有落實，有的村甚至幾年也難得開一個村民會。我們還瞭解到，村裏的家族式管理也十分嚴重，甚至有的一家幾兄弟全是村裏的主要幹部，這樣村委的決定實際上成了自己家裏的決定。

在當時，這是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人民日報》報道過，在海外也有影響，《紐約時報》2001 年 5 月就曾報道過。

調到《工人日報》後，杜斌持續關注山東棲霞這 57 位被選出來卻無法幹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場風波，就起於杜斌要報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孫學德所經歷的不公遭遇。孫學德在 2000 年被人帶走，失蹤了幾個月，2001 年 12 月，在一次秘密審判中被以闖入政府辦公室和盜用公款的罪名判刑 8 年。

杜斌這篇稿件的細節，這裏就不提了，簡而言之就是：村委會主任被選出來當家作主，村支書不甘心“大權旁落”，于是百般刁難、迫害村委會主任。

“我揭露的當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報道，從山東派人來北京阻止稿件問世。他們找我，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撤稿；他們就找全國總工會——全總是《工人日報》的頂頭上司嘛，他們從上面來壓，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聽見報社總編輯對我們編輯主任吳琰說：“那個村官涉及經濟犯罪，被抓起來了，馬上要判刑，你們那篇報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絕望了。他沒想到，過了兩個月，編輯主任吳琰問他：你那篇稿子給誰發了？杜斌說，誰也沒給。吳琰說：我還想登。

杜斌告訴我：“這會兒總編輯出差了，就瞅了這個空兒。我打電話給孫學德的哥哥，向他們通報：稿件可能起死回生，還建議，要是刊出了，來人從北京買 500 份報紙帶回去——我怕當地政府扣住這期報紙。”孫學德的哥哥馬上趕到了北京。

回憶起當時的場面，杜斌沉浸在緊張而興奮之中：他和編輯主任眼看著當夜值班的副總編輯大筆一揮簽了這個版，才放心來：過了最後一關！第二天的報紙，登出來洋洋灑灑大半個版。

“出了個插曲：本來交了錢要印刷廠加印 500 份，好讓山東來人帶回去，結果印刷廠忘了！他們很不好意思。想辦法補救，告訴我們說：從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百份、再印 400 份黑白的，不要你們的錢。我們當然高興啦，一小時後就取到了這五百份

報紙。我交代：拿回山東後，給市裡每個領導送一份，全市每個村委會主任一份，你們村每家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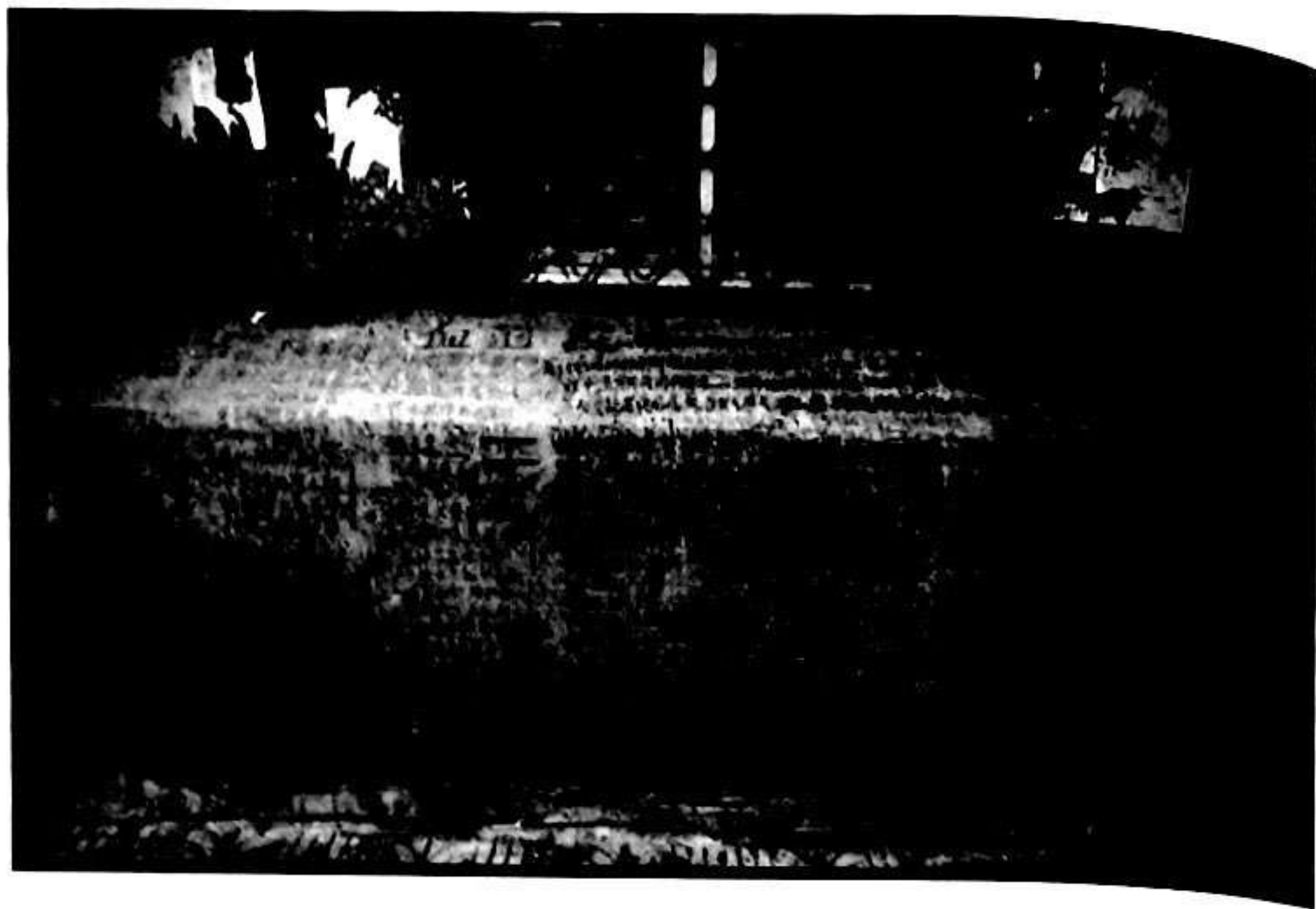
杜斌自己，用紅筆將這篇稿件圈起來，給當地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公安局長，一人郵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省市縣領導人是怎樣勃然大怒！“報社總編輯也很惱火，他發了話要不要刊出，卻還是將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視他的權威嘛。我在武漢出差，部門主任打電話來說，你千萬不要回來。山東來了三個人，一定要見你。”見他當然不會給他什麼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堅信，這篇稿件，寫得真實，發得正義。

《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報》刊登的許多圖片，印象很深，跟編輯主任吳琰一起吃飯時，還說起你們某某報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拍攝的。杜斌認識這位記者之後就問他：你們還需要攝影師嗎？“他很高興，因為他的老闆正要他們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後來約時間讓我去見了他們老闆，我就給他們幹活了。”

《紐約時報》開始一段時間刊登他的照片時，沒有署名，是為了不給杜斌惹麻煩。但是後來該報駐京辦事處換了另外一批記者，他們沒有經驗，一不留神將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說，“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後我也就不在乎了。”



杜斌攝影作品：一個人的冤牆

時間：2004年1月

地點：北京最高法院信訪辦

上訪者：無名、無年齡

來自地區：四川省南充市

自己是個幸存者

杜斌終於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牆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聽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蘇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餘，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蒐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

識，但是對這麼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麼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製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幹什麼？與此同時，農民在幹什麼？“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祕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杜斌畢竟是

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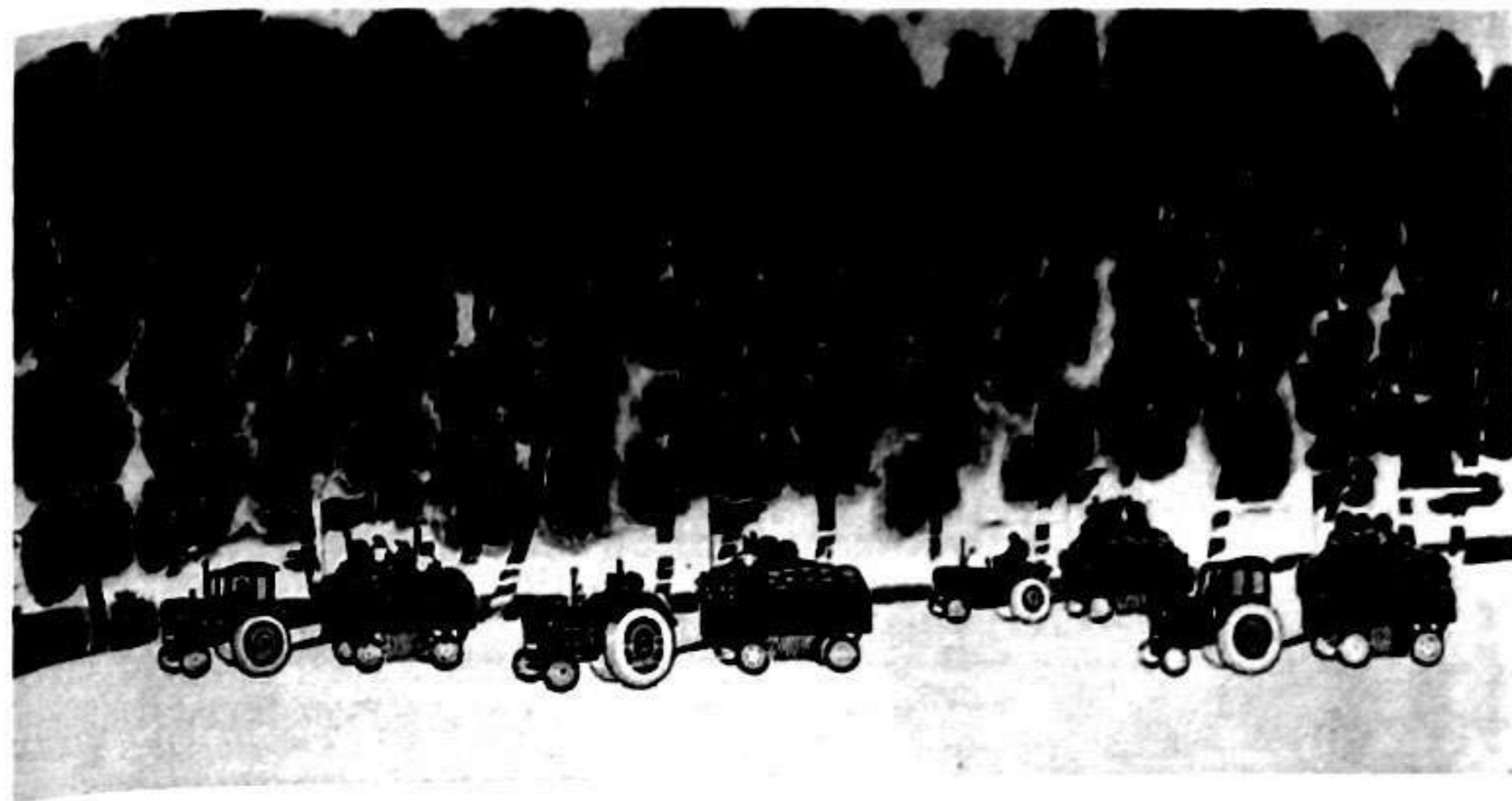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湧起極大的義憤：怎麼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麼正義凜然地愚弄世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衆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反映大躍進年代的農民畫《打井》。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為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美好理想、急於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在饑餓席捲全國的年代，《送糧路上》透露出農民饑餓的原因——糧食被超量徵收。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為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為了向《新史記》記者證明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地，當李富春彙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

……”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決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用拼貼凸顯謊言與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難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齡人和下一輩人，竟然跟過去的自己一樣，仍處在“大惑”當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這樣的浩劫慘劇果真在神州大地發生過。

杜斌產生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強烈衝動。

怎麼還原？他想出一個用當年的各種真實資料來拼貼的主意。

一個世紀之前的1912年，畢加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緻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2011年，這位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攝影師杜斌，編出了一本拼貼式的圖書。

他對《新史記》記者說：沒有什麼比《獻禮》《載著我們上天堂》《夜戰》《送糧路上》這些大躍進畫作更虛假的了，但是，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東西更真實地展現那個時代了！

用真實的史料來編輯，其實不比自己創作容易。文字資料相對來說還容易找，要找到恰當的圖像資料就費事得多。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潘家園舊貨市場上淘寶。

他舉出書中選用的《大豆過江》這幅漫畫為例。這幅作品，是江蘇邳縣農民朱會然和漫畫家華君武合作的，當時被視作藝術

家“與工農兵結合”的典範。後來在“文革”中首先被毛澤東拋出來的“三家村”主將鄧拓配詩寫道：“葉作風帆英作船，長江飛渡若雲烟。出自豆類成大器，家在東吳試驗田。”假不假？假；真不真？真！

杜斌覺得《大豆過江》這張畫很能反映問題，但是網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圖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後來在潘家園偶然發現了1958年第21期《漫畫》雜誌，正刊有這幅彩色漫畫。他如獲至寶，但又不敢聲張，怕驚動了賣家，奇貨可居，漫天要價。“我買下來了，就這一本，60元——這算真便宜了！”



農民、畫家和高官三者聯手、“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大豆過江》。

為找到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為題材的宣傳畫，杜斌不知去潘家園翻揀過多少次。終於發現有個攤主有兩張1961年的年曆，上面的宣傳畫正是“三面紅旗”。一張下面的年曆因為破損而被裁掉了，150元錢；另一張則是完整的、帶有年曆。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這個“三面紅旗”，半張就半張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對呀，帶1961年年曆，不是更有歷史價值嘛！還是得買完整的。舊貨市場周末才營業，他熬到下一個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又去了，問攤主那張年曆是否還沒賣出？“他要了我200元。給他錢之後，我告訴他，我要用這個做我的書的封面。攤主告訴我，這張畫，他是15年前收進來的。我說，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給我的啊！”

但後來因為書的開本設計有變化，並沒有用這幅圖片作封面，而是另選了一張《時代》週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畫。



1961年的年曆
上配上“三面紅旗”
彩圖。

杜斌共從舊貨市場淘來200多幅畫。“靳尚誼的《祖國頌》，我花了600元——畫家自己的畫冊中沒有收入這張畫，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來吧；1957年的漫畫《貓頭鷹》，60元買下的……”但他說不清總共到底花了多少錢。他只記得，僅僅花在對這些資料進行高精度掃描上的費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說，一個世紀之前畢卡索的拼貼創作從此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這本拼貼書，則正相反，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此書中將五花八門的資料碎片集中擺放後，非現實的重組和敘述手法，否定和反諷的意味，產生了奇特的對比效果。杜斌一一列舉說：毛澤東那些美妙的高調與神州遍地餓殍的對比；宣傳機器全速開動的巨大聲浪與底層民衆不忍卒聞的呻吟的對比；各級官員對上“逢君之惡”，對下殘民以逞的對比；文人們外表豪氣干雲閉眼唱頌歌與內心極大恐懼的對比……他強調：這種編年體例，就是要讓讀者一目瞭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澤東在幹甚麼，黨中央在幹甚麼，省裡的市裡的村裡的幹部在幹甚麼，農民在幹甚麼……

到時候了，“中共該對數千萬寂滅的亡靈悔罪了”——杜斌說。（《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





嚴家祺。(嚴家祺提供)

文革是“紅色恐怖”時代

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於 1976 年落幕。在過去的 35 年間，社會曾經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批判反思，然而，隨著集體記憶的模糊，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形象也逐漸淡化，甚至興起“平反文革”的呼聲。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在接受《明鏡月刊》專訪時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的過程，雖然中國如今出現的讚譽文革言論，某程度上是社會多元的表現，但文革一套無法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嚴家祺 1989 年“六四”後被中共列為“知識分子的頭號通緝犯”，與妻子高舉流亡海外，曾任總部設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現居美國，與高舉合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另著《首腦論》、《霸權論》、《普遍進化論》（明鏡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

1981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儘管官方對文化大革命有了定論，社會也普遍進行了反思，但 1989 年後，反思聲音一度中斷，其後，文化大革命逐漸以另一種面貌在社會中出現。

2007 年，薄熙來入主重慶，相繼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唱、讀、講、傳”等舉措。雖然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獲得許多掌聲，卻也招來不少非議，尤其是“唱紅打黑”一項，被批評是“鞏固集權”、“搞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不過薄熙來斥責此為無稽之談。

重慶之外，以“烏有之鄉”為首的左派網站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指人們能自由辯論、集會，令社會呈現多元觀點，文化大革命也打破各種階級的界線、遏止了官員的腐敗，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民主試驗”。

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確立個人獨裁的過程，與



文革中民衆觀看大字報。

民主毫無關係。“毛澤東利用民眾反對共產黨各級官員‘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情緒，摧毀文化大革命前的共產黨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嚴家祺對《明鏡月刊》說明，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雖然也為專制政治，但屬於多頭專制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三頭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形式與個人專制獨裁仍有不同。“1949年後，中共名義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羅馬共和國晚期有‘元老院’、‘任期制度’，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元老劉少奇、周恩來、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權力，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形成的政體，在形式上與古代羅馬也有相似之處。嚴家祺解釋，古代羅馬共和國轉變為羅馬帝國時，經歷了兩次“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的過程。羅馬共和國的“前三頭”為：凱撒、龐培、克拉蘇。公元前53年，克拉蘇在戰爭中死亡，凱撒進一步消滅龐培，建立了個人獨裁，但沒過多久，凱撒身亡；公元前43年，羅馬的“後三頭”出現：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接著，一人獨裁的歷史重演，公元前36年開始，屋大維相繼

除掉雷必達與安東尼，確立屋大維的個人獨裁，羅馬帝國建立。

而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將“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後不久，毛澤東去世，中國再度出現“三頭政治”的局面。由嚴家祺夫人高舉所著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出版），便講述了80年代中國這段“後三頭政治”的歷史。嚴家祺對《明鏡》解釋“後三頭政治”權力並不是平衡分配的，鄧小平處主導地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前後，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下台，鄧小平建立起個人專權，中國在1949年後經過這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的過程，造成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文革”是“紅色恐怖”時代

2010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曾專闢“對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一章，指這場革命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本來意義上的文化革命，而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嚴重扭曲教育思想，產生的危害包括中國知識分子隊伍建設出現了長期空白、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等。

然而，“烏有之鄉”等左派網站卻極力為文化大革命翻案，認為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能任意貼大字報、辦小報、進行思想辯論，還可自發地成立組織，大家充分享有言論與集會自由。

嚴家祺感嘆，今天的人看45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看45年前的清朝慈禧太后時的政治一樣，“年輕一代沒有實際感覺，以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是民主。”

嚴家祺以實際例子說明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不具言論、集會自由等民主特質。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引起莫洛托夫等人反對，赫魯曉夫把莫

洛托夫等人打成“反黨集團”，獨攬大權。然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將赫魯曉夫趕下台，蘇聯的政治鬥爭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鐘。嚴家祺對《明鏡月刊》表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開始懷疑中央委員會裡多數人不擁護他，懷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有一天也將奪取自己的權力，因此目標在文化大革命時打倒共產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堅持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1968年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九大換屆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嚴家祺解釋，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有71%的人被定位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份子、反黨份子，雖然“被打倒的人”如果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仍舊有資格投票反對毛澤東，像譚震林曾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但譚震林就不被允許參加中央全會，最終只有40名中央委員被許可出席這次全會。如果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讓全部中央委員都前來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並按黨章規定在會上發表意見，那可以肯定，毛澤東、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將占少數。因此毛澤東決定增補擁護自己的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人為中央委員，同時，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解放軍各大軍區負責人等有74人，占全體到會人員總數133人的57%以上。會議在“分組會”上，就批判“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批判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堵住他們的嘴。這次會議決定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當時只有陳少敏一人始終沒有表態，投票時趴在桌子上也不舉手。就這樣，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摧毀了集體領導，將劉少奇打倒，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削弱，使得三頭政治變成毛澤東的一人獨裁。

嚴家祺對《明鏡月刊》表示，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說

文革中群眾批鬥劉少奇。



明，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全國紅衛兵運動、沒有全國的紅海洋、沒有全國對“紅太陽”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無法在中央全會上剝奪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委員的發言權，他們肯定不認為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有71%的人會不完全贊同毛澤東。他發動群眾、利用“個人崇拜”和紅衛兵運動的方式癱瘓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體制。

“到了九大，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體制正式建立起來，無論是林彪還是周恩來，都不可能和毛澤東持不同意見。在毛澤東把陳伯達趕下台後，林彪想到要輪到他了，非常害怕，最後造成了‘913’事件。”嚴家祺說。

因此，嚴家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紅色恐怖”時代，完全與“民主”無關，“儘管可以出版各種小報，實際上是在高度控制下進行的，”任何編印攻擊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的小報、出版物的人都立即逮捕，從“聯動”、伊林·滌西、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到寫《出身論》的遇羅克，都被投入監獄。而雖然有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造反組織”，可任意集會，但都是在全國對“紅太

陽”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中進行的。在文革中，即使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任何全國性組織一經成立，立即取締。“紅色恐怖”不僅隨意把“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拉去批鬥，而且千百萬戶被隨意抄家。在1968到1970年間，各地都聲稱“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各派組織，從“文鬥”發展到大規模的“武鬥”。

包容比民主還重要

《明報》報導，廣東汕頭創辦文革博物館的前常務副市長彭啟安指出，年輕人在未經歷和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對文化大革命出現糊塗的認識，如今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在中國尚未消除，“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思維方式仍延續至今。

儘管嚴家祺認為文化大革命時的個人獨裁，在中國已經沒有產生的條件，但文化大革命的土壤確實仍舊存在。“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走到今天，經濟社會狀況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嚴家祺對《明鏡月刊》解釋，毛澤東時期共產黨的幹部有些特權，但與今天相比，非常有限，可是現在的幹部都已不是“特權”的問題，而是“普遍的權錢交易”、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官員貪污腐敗空前，在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老百姓也感覺到社會的不公正與分配不均，並且對腐敗憤怒。

嚴家祺指出，與“文革”時代相比，“向錢看”是中國的一大進步。羅馬帝國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是“地中海文明”時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進入“大西洋文明”時代。這都是對外貿易發展和“向錢看”的時代。嚴家祺研究古代羅馬史和文藝復興史，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專制政治下，財富帶來腐敗。羅馬帝國和文藝復興時代，既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也是政治黑暗和空前腐敗的時代。今日中國進入了“太平洋時代”，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而在沒有民主和法治的情況下，財富帶來腐敗，巨大財富帶來巨大腐敗。消除腐敗的關鍵是，必須把政治權力與獲取財富分開，民主政治就是限制政治權力的政治。現在不是古代和中世紀，那時代腐敗可以持續幾個世紀，在全球化的今天，嚴重的腐敗是無法持續的。

在沒有民主、法治的情況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最習慣、最能夠接受，也最容易做起來的方式，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嚴家祺對《明鏡月刊》舉例，薄熙來在重慶提倡“唱紅”後，老百姓很容易就唱起紅歌，“紅歌”中許多是老歌，老一代許多人喜歡唱老歌。許多人唱“紅歌”也是表達對當前腐敗的憤恨。但用群眾運動方式去反腐敗，只會走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上去。中國仍然有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

如今，在社會對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逐漸淡忘之際，“烏有之鄉”等左派言論讚揚文化大革命，使得文化大革命似乎被美化了。嚴家祺認為，從全國來說，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被美化，它仍舊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間接造成了後來的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不只是一般人民的災難，共產黨大部分高幹、中央委員也受了很多難，使得共產黨內有‘反對個人獨裁、廢除終身制’的共識，因此改革開放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果，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反作用。”

雖然官方對文化大革命已定調，但並未如同禁止《零八憲



“紅衛兵”狂熱地向毛澤東表示效忠。

章》言論般，也禁止“烏有之鄉”等網站的言論。嚴家祺對《明鏡月刊》指出，共產黨向來不太禁止左派言論，雖然中國確實有必要進行“非毛化”，但如今毛澤東沒有科學地、全面地被評價，毛澤東的像還掛在天安門，因此無法禁止打著毛澤東旗號的言論，不過，引用毛澤東的言論也是表達社會不滿的一種方式。

嚴家祺進一步解釋，反對派分為右翼反對派與左翼反對派兩種，雖然“烏有之鄉”還沒成為真正的左翼反對派，但已經有挑戰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意圖在內，他們不贊成今天的兩極分化、懷念毛澤東時期的平等與公有制，雖然社會不可能恢復到毛時代的樣子，但如果“烏有之鄉”繼續發展下去，部分人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的左翼反對派。

因此，嚴家祺也不認為“烏有之鄉”等網站的言論只帶來負面效果。“儘管我不認同他們，但他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言論，而烏有之鄉的言論能在中國共產黨內傳播，也不是壞事，對於攪動胡錦濤所造成的‘一潭死水政治’有好處，共產黨內存在各種派系，是中國社會未來必然走向多元化的起點。”

嚴家祺對《明鏡》解釋，社會擁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意見，政治多元化了，中國才可能進步。包容比民主還重要，互相包容，民主才能成長起來。當然，毛澤東的某些言論，好像表面上起到了作用，但實際上完全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中國唯一的出路還是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明鏡記者柯宇倩）

中國社會左轉，兩者首當其衝

由於中共十八大人事初步已定，許多觀察家都分析中國社會未來風向可能向左轉。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雖然是左派代表性人物，但未來左派的核心性人物卻是新貴習近平。與前任胡不同，胡經常是在小心翼翼的走左右政治平衡的鋼絲，通常忽左忽右，令人琢磨不定。這一點習卻不同，習著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且在2010年12月6日到8日，親自到重慶用腳為薄熙來投了一張贊同票。習已經清楚無誤地為自己標上了左派的標幟性符號。很多觀察家都認為，此種做法不是大智，便是大愚，這無異於在遊戲即將開始之前，習即已經把自己的底牌向眾人揭曉。如果是大智，那便表明習已經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如果是大愚，過早的暴露身份，此舉會提前把

嘲笑時往往會惱羞成怒，不惜大打出手。文革時，知識分子中了毛的引蛇出洞的誘餌和圈套，吃一墊，長一智，那今天在國內各位有識之士今後還是多小心為妙。（留香）

右派全部的火力和彈藥都會吸引過來，未來將會遭受重重阻力。

中國社會左轉將會有兩個主要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便是整肅官吏。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國家富裕富強的同時，由於政治體系改革和法制體系改革的延後，中國社會官員的貪污腐敗和道德敗壞嚴重，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社會的公平正義被嚴重扭曲，官民對立變得日益嚴重，社會基礎變得脆弱不安。從習到重慶支持薄的打黑行動上來看，習已經表現出對薄從打黑到打擊腐敗的肯定，未來中國社會按重慶的打黑模式擴大可能性會變得越來越大，中國的官員們可能將會迎來一個政治上充滿寒意的嚴冬。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重慶模式到底有沒有遵循現有的法律法規，如果法律缺乏制約性，左派的打擊很可能無法無天，乘機打擊政治異己，最終將矛頭對準改革派。由於中國經濟的增長都來源於右派的努力和拉動，左派一直在扮演拖後腿的角色，大規模打擊和清算右派，等於把拉中國社會經濟前進的黃牛都殺了，那這個車要靠誰來拉，所以說這有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停滯不前的問題。

中國社會左轉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必然是整肅知識分子。雖然左派的封網，網評，五毛，或是唱紅能夠蒙蔽和愚昧一小批民眾，但很難阻斷有識知識分子對世界觀的正確認識，很難歪曲對民主，自由和人權追求和向往，而這一切必然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背，所以為了維護所謂的統治，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必然也是中國社會左轉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期當局抓緊嚴厲打擊政治異議人士和批評人士看出個苗頭來，其實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從來都未停止過，那是因為統治者信奉著，天下英才如不被我所用，必被我所滅的荒唐邏輯，有時候統治者想法和手段並不見得會比普通民眾高明多少，所以當他們被知識分子指責和



男女老少爭相唱紅歌。

神州大地真神奇，大唱紅歌治百病

毛澤東的遺產

再不唱紅歌，都要成原始人了。

中國 21 世紀最宏偉的景觀是什麼？有人說是北京奧運，有人說是航母下水，有人說是北斗導航系統投入運營。其實都不是。這些都是老外的發明，真正屬於國人自己的壯舉，非紅歌莫屬。

到目前為止，僅重慶一市大規模的紅歌傳唱活動已累計有 15 萬多場，被要求參與的民眾超過 9000 萬人次。

在中宣部的英明領導下，唱紅歌的運動風起雲湧，波瀾壯闊，席捲中國大地。神州再現紅海洋，又見舉國上下萬眾引吭高

歌，男女老少爭相唱紅的熱烈場面。人們驚奇地發現，紅歌在我國已從最簡單的政治運動，發展成為全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動。它不再僅限於政治和娛樂的一種形式，而是在我國社會的多個領域中都發揮著神奇的功能、激勵著人們向上爬的一種精神支柱。

最新的一項生理學研究成果表明，唱紅歌增進食欲，既美食又美心，效果驚人。河南師範大學在為學生提供物質食糧的同時，輔之以精神食糧。該校在餐廳搭起了舞台，搞起了“紅歌進食堂，唱響你我他”的活動，用餐的大學生一邊吃飯一邊聽歌，既填飽了肚皮也淨化了靈魂。師大後勤集團黨總支書記彭富旗同志激動地說：“紅歌具有獨特的教化育人功能，唱紅歌是對青年學子進行黨的知識和黨性教育的一次嶄新嘗試，高校應成為宣傳紅歌的主要陣地。”一邊唱紅歌一邊吃午飯，把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我國的一項首創，也是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一項重大發展。當然，對於要節食減肥的 MM 們來說，唱哪首紅歌更合適，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創新。

唱紅歌的另一生理學奇效，就是幫人們消除疲勞，保持旺盛的精力建設特色社會主義。武漢的灑水車工人，以往灑水時自己聽黃歌，卻給路人播放“祝你生日快樂”。唱紅歌後，灑水車一改十幾年的曲風，聽紅歌，播紅歌。每當紅歌一播出，灑水工人夜間的疲勞頓時消失，而路邊的百姓一聽灑水車播出的紅歌都本能地躲閃，既提高了工人的幹勁和灑水的效率，也減少了對百姓的衝擊。當地城管部門對此的解釋是，“播放紅歌，除弘揚主旋律之外，也是想借這經典的紅歌曲調滿足市民所需，也讓灑水車司機興奮起來，消除夜間作業疲勞。”

人聽了紅歌會精神振奮、鬥志昂揚，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誰能想到，紅歌對改進農作物品種，開發新產品，也有神奇的效果

呢。說起來您還真不能不信：中新網信陽4月28日電，紅紅的茶水、紅紅的歌聲、紅紅的條幅，多國外商及海外僑胞、港澳台同胞光臨信陽，品紅茶、游紅城、唱紅歌。“紅”字成為信陽國際茶葉文化節的主角，品“信陽紅”茶成為眾多客商的首選。“信陽紅”是唱紅歌以來開發的紅茶新品種。它具有獨特的風味，它改寫了長江以北不產紅茶的歷史，實現了兩千多年信陽從生產綠茶到紅茶的重大突破。許多客商深受信陽的“紅色精神”感染和鼓舞，游紅城成為一些賓朋的選擇。

紅歌的特異功能體現在多種農作物的生長過程中，桑果就是其中一例。“摘桑果唱紅歌去桑園裡找尋純真年代”，5月8日，“2011 蕭山桑果節”熱鬧開場，很多市民來到田間地頭，男女老少齊上陣，摘桑果，唱紅歌，共享天倫之樂。果園主、紅歌歌手李芳菲滿懷信心地介紹說：“這些桑果完全沒有農藥，是純粹的‘綠色有機食品’，無論是生吃還是做成桑果粥，桑果汁，都非常美味而且安全。”

唱紅歌“一本萬利，包賺不賠”

唱紅歌不但具有巨大的政治效益和科學功能，在經濟上也是一本萬利，包賺不賠。唱紅歌可以賺錢、盈利，這是經濟學家們不爭的事實。5月10日，我國著名投資菜鳥、知名網友“韭菜姑娘”和資深投資人“花榮”交流股市投資之道。這場老少投資者的對話就以唱紅歌開始。“花榮”讚揚“韭菜姑娘”是一位紅歌唱得好、股也炒得精的美女。“韭菜姑娘”自謙唱紅歌的功夫遠不如“花榮”，並誇獎“花榮”唱歌紅的功夫非常了得。對於那些並非股市大鱷的一般小民來說，唱紅歌的經濟效益也十分不菲。例如，山東的德州最近舉辦“唱支歌兒給黨聽”網絡紅歌大賽，獲勝者

唱紅歌激起了納稅人繳稅的新高潮。



將得到三萬元的獎勵。這開創了國際共運史的一個新篇章。一百多年前人們唱紅歌慷慨赴死，六十多年前人們唱紅歌英勇就義，三十幾年前人們唱紅歌入黨做官，如今唱紅歌賺得鉢滿盆滿。這就是解放思想，這就是摸石頭過河，這就是三個代表，這就是科學發展觀。

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各項開銷驚人，稅收永遠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唱紅歌可以增加政府稅收，這是從老佛爺、袁大頭一直到周恩來都未曾想到的一個功用。山東歷城地稅局近日在柳子劇院主辦“稅企和諧唱紅歌”邀請賽，把建黨紀念活動與稅收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劇場內紅歌此起彼伏，劇場外該局業務骨幹就人們普遍關心的個人所得稅、房產交易相關稅費以及車船稅等政策，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發放資料1000多份，激起了納稅人繳稅的新高潮。

紅人唱紅歌可以更紅，富人唱紅歌可以更富，國家唱紅歌可以更有錢，那麼壞蛋唱紅歌會更壞嗎？不會。我可以堅定地告訴你：壞蛋唱紅歌反而會變好人。例如，山西某罪犯李祥來自紅色家庭，參加過唐山地震救援，擔任過中建七局某公司經理，還光

榮地入選“山西省 2003 年英雄人物譜”，卻在榮譽巔峰因貪污判刑入獄。監獄裡他通過重讀紅色書籍，唱紅歌，不僅積極反思，還主動現身說法，參加監獄“面向黨旗軍徽懺悔”活動。最讓人拍案叫絕的，還是延安監獄“紅色文化進監獄”啟動千人同唱紅歌活動，上千名服刑人員和幹警們一起高唱紅歌。當一名陝北歌手走到服刑人員中間深情演唱“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時，有的犯人低下頭抹著眼淚。這不是作秀，而是在延安監獄“紅色文化進監獄”啟動儀式上的真實場景。“美好的事物展現在我們面前，能激發出溫暖、昂揚、向上的力量，”監獄的一名心理分析師解釋道。預計不久的將來，我國的刑法將有所修改，對於唱紅歌的囚犯可以適當減刑。對於紅歌冠軍，可以當場釋放出獄。

唱紅歌最最讓人驚嘆的一個功能，就是可以治好精神病。四川省資陽市精神病醫院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歌詠比賽，病人通過唱紅歌來表達熱愛祖國之情。各病區醫護人員積極教唱紅歌，通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收到了滿意的效果。這次唱紅歌比賽，請來文藝界的專家出任評委，評出一、二、三等獎。據醫院負責人介紹，該院開展豐富多彩的工娛療法，例如唱紅歌，對恢復病人功能，重返社會起到了重要作用。唱紅歌是調節情緒的有效手段，是一種康復訓練。我國對現代醫學的發展又做出了一項偉大貢獻。這是我國精神病科研的一項重大成果，它填補了人類的一項空白。世界為之震驚！

這麼看來，要是還不會唱紅歌，真要成原始人了。

綜上所述，在我國唱紅歌已經從“如何唱歌”擴展到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種地，如何搞科研，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國家、如何治病的一項多學科的大學問，一個空前的社會工程，一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社會實踐。德國人 70 年前做過的那些事，後來他們無論如何再也做不出來了。而我國 40 年前做過的

摘桑果，
唱紅歌，
男女老少齊上陣。



那些事情，如今居然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再做一遍。大家說說，劉主席、鄧公、彭總、習仲勛、薄一波若地下有知，是會捶胸頓足，痛哭流涕呢，還是會興高采烈、眉飛色舞？假如文藝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地下有知，會不會大喊其冤呢？

想一想，那些譜寫經典紅歌的人們，經歷過 40 年前的那場浩劫，他們難道不會為譜寫那些經典紅歌遺憾嗎？40 年前的年輕教師、年輕技術員曾被紅衛兵打得鼻青臉腫，鬥得死去活來，僥幸撿回一條命。如今紅袍一穿，他們又唱起紅衛兵曾唱過的那些聖歌，在紅海洋裡載歌載舞。是這個世界太骯髒呢，還是這些老東西太健忘、太愛財、太不要臉呢？

但無論如何，這是人類最後一次紅歌了。我們今天又一次見證了歷史，一段人類社會不可多得的歷史，一段回光返照的歷史，一段行將就木的歷史。30 年後，今天那些紅歌道具、服裝、乃至照片、錄音、錄像都將成為寶貴的歷史文物，人們將用和今天完全不同的評語來述說今天發生的這件可謂千古奇觀的怪事。（解濱）

李希光



吹捧唱紅回報豐厚的李希光陰溝翻船

“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

曾經因為主張“網絡實名制”而聞名一時的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近日再次成為遭到“圍觀”的熱點人物。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據《南都週刊》報道，不久之前，李希光被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作為特殊人才“柔性引進”，據知情人士透露，李本人“可以不來學校，但其論文要署上西政的名”。作為交換條件，李希光馬上就在重慶渝北區拿到了一套

240 平方米左右的花園洋房，“房子相當於三層樓，下面一層是車庫”。李希光只需按每平方米 1600 元的成本價，一次性付清，而附近的商品房價，則至少在每平方米 7000 元左右。

對此，有評論回顧說，李希光成名主要是因為他的兩個觀點：一個是“網絡實名制”，另一個則是批評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1996 年，李希光與其他學者合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曾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廣泛質疑。為此，時評人安替就曾撰文批評說，“李希光的英文論文，都是主張信息自由流通的，但是，他的中文論文卻在極力主張信息控制。這就好比是，兩個觀點截然不同的人互相反駁一樣”。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不過，李希光近期最為引人注目的觀點還是他對重慶“唱紅打黑”不遺餘力地高度讚揚，他評價“唱紅”是“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好的效果。

李希光認為，首先，“通過唱紅打黑，用一種創新的方式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其次，是贏得了國際發言權，樹立了新品牌；因此可以說，唱紅打黑，特別是重慶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財富”等等。對此，東方網上學者王曉漁的文章點評說，遺憾的是，李希光本人卻並未貫徹重慶唱紅所提倡的那種大公無私和艱苦樸素的精神，相反，倒是有以吹捧重慶唱紅換取個人豐厚回報，搞變相“有償新聞”之嫌。或許是深知自己“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在《南都週刊》記者隨後追蹤採訪李希光時，他才又突然想起了“艱苦樸素”的精神，以自己身在美國，“電話很費錢”為理由，便匆匆掛斷了電話，此後也不再回覆記者的短信。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客觀地講，李希光被西南政法大學“引進”之後，也對該校作出過不小的“貢獻”。比如，去年校慶慶典期間，“重慶經驗與亞洲模式國際研討會”在西政舉行，多位嘉賓均對校方與李希光對他們的邀請表示感謝。《南方都市報》

上學者熊丙奇的文章說，去年12月，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西默·托平到訪重慶期間，不僅被聘為西政的客座教授，還與重慶市委主要領導人親切會面。其實，托平的這次重慶之行，正是由李希光一手促成的，對此，李本人並不否認。隨後，他還專門在《瞭望》新聞週刊上發表文章《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詳細回顧和介紹了這段經歷。

招來一場國際官司讓人恥笑

不過，這位依靠迎合重慶主要領導人的政治需要，為重慶唱紅推波助瀾，自己也是如魚得水收穫頗豐的李希光教授，不久之後，卻因為用微博轉發了一條未經證實的假消息，而招來了一場國際官司。儘管被對方罵了個狗血噴頭，卻因為自知理虧嚇得沒敢吭聲，一位剛剛還在重慶風光無限的“大人物”，轉眼間就這樣在小陰溝裡翻了船。原來，李希光教授5月16號轉發微博稱：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因為收受中國內地作家張一一60萬美元的“翻譯定金”，導致諾貝爾文學獎面臨110年來最大的信任危機，其權威性和公正性均遭遇空前的挑戰和質疑云云。

另據報道，在此之前，青年作家張一一曾於4月29號在其微博中宣稱，自己曾經以邀清馬悅然將其三部作品翻譯成瑞典文字為名，一次性支付“翻譯定金”60萬美元，並承諾為其作品獲獎對其他的諾獎評委進行公關。有資料顯示，湖南作家張一一是繼韓寒和郭敬明之後，第三位經常出現在國內新聞頭條的80後著名作家，以善於自我炒作和惡搞而著稱。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這條微博內容，當時並未在國內引起太多關注。而張一一隨後更是在網上發佈聲明稱，“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搞臭諾貝爾文學獎，給中國作家報仇！不要以為諾獎評委們都是什麼

好鳥……”由此可見，其蓄意編造假新聞，惡搞諾獎評委的動機不打自招。

這條經李希光之手轉發，並因其知名度而傳播甚廣的假消息，最終卻大大激怒了德高望重的諾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先生，為此，他接連給中國有關方面發出了三封公開信。在寫給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的公開信中，馬先生說，最讓我驚訝的是，這位清華大學的李希光教授，竟然會在其微博上傳達小騙子張一一非常可笑的謠言。有這樣的新聞學教授，怪不得中國願意賺5毛錢的小騙子們，會多如牛毛呢。這種卑鄙的行為，無疑會讓原來很有聲望的清華大學為天下所恥笑。

儘管李希光對此回應稱，他是轉載自國內某大官方網站上的這條“新聞”。但馬悅然的夫人卻仍然表示，即使李本人不是謠言的源頭，也是有責任的。“李希光是新聞學院的教授，像這樣的假新聞竟然沒有去核實出處就轉載，並四處散發”。這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而馬悅然在寫給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的公開信中說，尊敬的顧校長，當我得知李希光教授是在利用官方的中國廣播網，來傳達小騙子張一一的謠言之後，我便決定從今天起，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典的大使館絕交。我的這個決定對中國官方來說，當然算不了什麼，可是對我個人卻有著重大的意義。清華大學原來還是中國最有名望的大學之一，但像李希光教授這樣的學者被任命為貴校的教授兼副院長這一事實，可能會影響西方學者對中國大學的看法。

綜上所述，有網友點評說，李希光先生好不容易守候的“光

方濱興



方濱興，不要墮落為艾希曼

GFW 之父，國家工程院院士，北郵校長方濱興在武漢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時被不知名同學賜予扔雞蛋和臭鞋的待遇，不管那位同學是不是武大的學生，作為武大學子的我，還是為在母校發生的“壯舉”（請允許我用這個十分主觀的詞彙）感到十分驕傲與自豪，也敦請那些在網絡上貼出獎賞的網友們兌現自己的承諾。

當然，據我所知，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為方校長打抱不平，認為方不過是一個技術人員，只是忠實的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而已，針對他個人採取這種行動未免過於苛刻，其實這種論調並不僅僅被拿來為方校長辯護，對於最近某些事件中的城管也好法

彩亮相”，卻眨眼之間就成了自毀名譽的道德敗筆，就算他以後不再擔任什麼“長”，只當一個純粹的教授，他的這個道德污點也是難以洗清的。由此可見，那些在中國大學裡行政領導和學術研究一肩挑的人士，儘管在國內可以如魚得水，趾高氣揚，但是，在挑那些西方名人的“毛病”時，還得悠著點。其實，李先生和作家張一一這次的運籌帷幄，百分之百是“中國特色”，以為偌大的世界就是中國情形的簡單放大呢。

還有網友說，這個李希光教授，無恥得也太猴急些了吧。這再一次印證了“人不要臉，天下無敵”的真理。（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周西）

官也好，也總有人以“身不由己”為這些人開脫。

這種觀點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畢竟作為一個惡的制度的體制中人，如果不去按照體制的要求作惡，那就意味著永遠都沒有出頭之日，永遠只能在體制邊緣徘徊，甚至說不定哪天就會因堅持原則而被體制排除出去。他們的確有“身不由己”的原因。但問題是，因為這些所謂的“身不由己”的原因，一個有良知的個人就應該服從於惡的制度，進而助紂為虐麼？

我忽然想起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艾希曼這個納粹黨的高級官員，曾經是猶太大屠殺中“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可以說手上沾滿了千萬猶太人的鮮血，但他本人並不是一個喪心病狂者，在履行他劊子手職責時，他的心中曾經也有過那麼幾分鐘的彷徨，但最後，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在“責任心”的驅使下，他還是將無數的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繼而送進了毒氣室。面對這樣一個“只是忠於自己責任”的犯人，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決？當然歷史已經給出了判決，最嚴厲的判決——絞刑。同樣一個例子發生在柏林牆被推倒後，一位曾經的東德士兵被指控槍殺一名企圖翻越柏林牆的無辜平民，當那位士兵以“這是長官的命令”為自己辯護時，法官說出了一段至今都值得我們深思的話——“你雖然被命令向平民開槍，但沒有被命令必須殺死他，你當時完全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義務。”的確，在良知面前，每個人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義務。

回到我們的主題，現在看來那些“身不由己”者並非真的“身不由己”，體制是罪惡的，但這不能成為你作惡的藉口。方校長的確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也許在他的心裡也曾有過對這種行為的懷疑，但只要你做了，就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領導們沒有讓人拿著槍指著你的腦袋逼著你去開發 GFW，作為一個高級工程師，即使不接這項工程，你也完全可以在體制內或者體制外生活

得很好，但你在強權和良知面前還是選擇了強權，拋棄了良知，所以這不是一句“身不由己”就能開脫的。同樣，那些為體制內作惡者開脫的人，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他們並非真的無從選擇，比如已經被視為全民公敵的城管之流，難道這個惡的體制有逼著他們去行使非法的暴力麼？難道是這個體制拿著槍頂著他們的腦門去逼迫著他們作惡的麼？難道他們的生活境況已經到了不當城管就活不下去的地步麼？

其實身在一個專制的國度，每個人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總會有那麼幾次被迫在良知和為體制充當打手之間做出選擇，堅守良知很難，屈服於強權和誘惑卻很容易。但良知和正義並不是虛無的，也許說不定哪天你就要接受“審判”了，這個“審判”可能是某時某地的法庭，也可能是飛鞋雞蛋，最不濟，在多年以後的歷史書裡，在民間耳口相傳的段子中，都有可能聽到你的名字，套用一種宗教式的話語——最終我們都將被審判。

說這些，當然不只是為了譴責那些體制內的作惡者，更是希望這個國家的國民能夠有所思考。一國的制度從來都不是和該國人民的民族性脫鉤的，如果這個國家還充滿了各種甘於為專制充當打手來謀取私利的人，如果這個國家到處都是“艾希曼”，那麼就別指望著它的制度會向好的方向轉變，“不作惡”不管何時都必須是一個社會的底線，在這個參與公眾事務風險和成本都相當大的國度，我們沒辦法要求每個人都能為公眾利益挺身而出，但我也希望每個人都能守住作為一個“人”的底線，改變自己，或者說別讓專制改變你，固然不代表就能改變這個國家，但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國家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

不要讓自己墮落為艾希曼，這就是我的結語。（杜次郎）

蒯大富百年校慶回清華



胡錦濤經常畢恭畢敬向蒯大富請示

2011年4月24日，因為參加文革被判17年重刑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再次成為百年校慶中清華校園的“風雲人物”——當年他是因為參加文革而被判刑的唯一的清華人。

高調返校激起熱潮

他不是人民大會堂慶祝大會受邀請的重要校友，他專為參加百年校慶，23日晚坐火車從深圳抵達北京。

24日，五萬清華校友返校慶祝。上午9點剛過，蒯大富一進入清華園，就受到很多老校友的迎接，立刻就形成了熱潮。很多人圍上他，請他簽名。蒯大富頗為高調，來者不拒。一路簽，一路說：“我的字寫得不好。”求者甚眾，蒯大富簽得手都抬不起來了。近年，他曾經三次患腦血栓，連續中風，但是都恢復了，一位友人只好充當他的臨時秘書，代他簽字，此為一熱。

蒯大富出獄之後，幾經周折遇到清華學長北京市海淀區委書記王繼平，王邀請他到北京創業，房、車、註冊資金、項目全都準備好，海淀區打算讓蒯大富建設中國通信器材一條街。萬事俱備，只差公司註冊。他帶著妻女來北京之後，就折在這“一差”上，原因是王光美給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打了一個電話。陳希同就下令不能給蒯大富註冊公司。1993年申奧之後蒯大富還被陳希同下令請出了北京。妻子羅曉波帶著幼女兒留在北京，生活工作經常受到騷擾，有傳公司經理被陳希同親自召見，問他：“你是要公司還是要羅曉波？”蹉跎三年之後，全家團聚在深圳，蒯大富與人合辦“深圳特寶聲影音燈光技術有限公司”他給自己化名“戴明”，人稱“戴總”。

此次返校，他攜帶了中英文名片，上邊有手機號碼和郵箱地址，說明他很願意與舊雨新知建立聯繫。英文“Kuai Da Fu, Graduate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1968”，把名字也斷開，顯示他“倔、犟、艮”（羅曉波語）的個性。清華園裡到處都有人向蒯大富索要名片，他也送得樂此不疲，此為二熱。

三熱就是合影留念。睹物思人，熱鬧非凡。在著名的清華“二校門”前，蒯大富和幾位老校友一定要合個影。“文革”之初，1966年8月25日下午6點，機械系二年級的學生賀鵬飛（賀龍之子），指揮清華紅衛兵先用鐵鎬刨，後讓眾人推，推倒了這座清華學堂1911年成立時的主校門。自動控制系四年級學生劉濤（劉

少奇之女)也參與指揮。後來又命令學校“黑幫”、“牛鬼蛇神”清理廢墟,背扛手抬,場面十分暴虐。

賀、劉大破 蒯司令大立

賀鵬飛、劉濤發動的“革命”行動,名曰“破四舊”,名符其實。

二校門是座古典優雅,中西合璧的建築,青磚白柱,三拱結構,是火燒圓明園殘留的康熙皇帝行宮清華園的大宮門,門楣上書刻有清末大學士、軍機大臣、中堂那桐的手跡“清華園”三個大字。1909年,清廷將此地撥做游美肄業館,由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留美預備學校。1911年初,隨著圍牆的合攏,學校開學,更名“清華學堂”,大宮門就成為學堂正門。1933年,校園擴建,圍牆外移,有了新的大門(今日的西校門)。此後,這座最早的校門就被稱為“二校門”,成為清華大學最著名的標幟性建築,顯示著清華園獨有的歷史和文化的神韻。能對這座舉世無雙的古建築下手,還真得具有“捨得一身剮”的心腸和勇氣。

賀鵬飛本應1963年入大學,因高考分數低落了榜。64年再考,分數還是不夠,但是進了清華機械系。機械系是清華入學分數線最低的系,頗受歧視,在教師和學生的心理上竟然被“排出”清華,貶稱“機械學院”。這位元帥之子,文革一開始,就和劉濤一批高幹子弟,最先給校黨委貼大字報,成立“清華大學紅衛兵”,站在工作組一邊,和質疑工作組的蒯大富一派辯論,屢辨屢敗。造了二校門的反,才算在清華園裡真正揚眉吐氣。

蒯大富是農村考入清華工程化學系三年級的高材生,66年9月24日成立了“井岡山兵團”,人稱蒯司令。兵團第一仗,是和賀鵬飛搶奪廣播室,結果被打出了來。兵團在校園內突出的建樹,是由蒯司令拍板,在被賀鵬飛拆掉的二校門遺址上,修一座



蒯大富給年輕人簽名。

巨型的毛澤東身著軍裝的全身塑像,這是全國第一座毛澤東戶外塑像。1967年“5.1”之前,蒯大富寫了一個紙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次公共活動中交給葉群,請林彪為底座題字。塑像於1967年5月1日落成,像高八米一(不算底座)。是日,蒯大富登上天安門,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林彪的題字於2日在全國所有報紙發表,“四個偉大”的版權,從此屬於林彪。蒯大富開創了各大專院校、各大機關、全國各地大修特修毛塑像之先河。2008年10月重慶醫科大學新校區豎起創紀錄的37.4米毛澤東塑像,仍舊是步蒯司令之後塵。

1987年8月,在國內外清華校友的強烈要求下,清華園內全國第一座毛澤東塑像被拆除,開始重建二校門。1991年,建校八十週年前夕,二校門復建落成,比真跡略許高大。復建費來自清華5000多位校友和21個校友會組織的捐款,共計人民幣8萬5483.35元。至今依然被排在全球高校最美麗的校門之前茅。

照片記錄不下的文化大革命

蒯大富此次返校，還帶了三本相冊，這已經成為他的行為規範，走到哪裡，最喜歡請人看相冊。

一本是“文革”風雲歲月的歷史存留，有五大領袖登上天安門的合影，多幀接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接見的照片。大字報和造反行動的照片。。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餘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上打著“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標語，高呼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次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又組織井岡山兵團幹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壯舉”——“智擒王光美”。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了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並揪來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陪鬥。1967年6月，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兵團充當“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的主要角色，圍困中南海，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

公開材料講，“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接見蒯大富，聽取了彙報，並佈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任務。”

1966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出了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22日蒯大富班級接到通知，王光美要來參加同學們的討論，大家做了精心準備，結果來的只是一個秘書組的成員。同學們認為受了欺騙。到工作組質問，無人回答，又坐了5個鐘頭“冷板凳”。次日蒯大富等十人，給工作組貼了大字報，要求同駐校的工作組負責人進行公開辯論。24日王光美接招，先是賀鵬飛領人圍攻蒯大富，當晚7點半王光美後台坐鎮，指揮了清

期間的照片前留影。

蒯大富在清華大學校史館文革



華第一場大辯論，蒯大富發言，同學歡呼鼓掌，賀鵬飛發言，同學跺腳。辯論後王光美說：“蒯大富簡直是頂級打著紅旗反紅旗，一定要把他的氣焰打下去。”27日工作組第二次組織大辯論後，提出“反蔣必反蒯”。最精彩的在清華園曾被蒯大富稱作“胖老頭”的副總理薄一波，7月3日陣前自報家門，再來清華和蒯大富進行第二次公開辯論。隨後清華園裡對蒯大富進行萬人圍剿，他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學生，開除團籍，進行關押。7月18日，清華批蒯剎車。20日劉少奇來清華看大字報，蒯大富當天也獲得自由。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組撤銷。清華由文革臨時籌委會賀鵬飛領導。

29日下午，賀鵬飛在清華園裡廣播讓蒯大富到靜齋（校臨時革委會辦公處）。蒯大富到後，和賀鵬飛等一起坐大轎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在三樓會議廳李雪峰宣佈撤銷工作組。史料記載，6月28日毛澤東就點了蒯大富的名，讓他參加此後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

周恩來單獨見蒯大富六個小時

7月30日晚，賀鵬飛廣播通知蒯大富晚飯後到靜齋。賀讓他到甲所等著有人找他談話。甲所是破四舊之後，清華唯一還有沙發的場所。蒯大富坐在沙發上等了一個晚上，一直等得睡著了，被賀鵬飛搖醒，看見走進來的是周恩來，只帶著一個秘書，此時已是31日凌晨二點。談話中賀鵬飛兩次進來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蒯大富說話。”都被周恩來嚴詞拒絕。第二次周恩來少見地生氣地說：“我今天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話，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再進來了，不要再敲門了。”

周說他是受主席和黨中央委託請蒯大富談清華6月1日至7月31日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一直談到5點。周恩來說是有會，其實要趕去向毛澤東彙報。約蒯大富自己找三個人，晚上到人大會堂再談一次。晚上周恩來帶著省委書記譚啟龍、江渭清又聽蒯大富等彙報三個小時。

第二天8月1日，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劉少奇為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會議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8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黨的接班人的地位被取締。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已經完成了政治和組織的準備。

毛澤東和蒯大富

1968年3月25日，七個大學的紅衛兵拿著器械包圍北大要武鬥，還湧進校園搶奪廣播室。身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聶元梓強拉主任謝富治去北大平息事態，七校學生離開。少部

分學生仍舊留在北大，29日，北大校內發生了大武鬥。北京市高校的武鬥開始，高潮在清華。5月30日，清華進入“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7月27日北京市3萬工人包圍清華，要進駐。對立面“四一四”打標語歡迎，井岡山抗拒，5名工人被打死，特重傷20多人，較重傷100多人，皮肉傷數百人。

幾個小時之後，28日凌晨二點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

召見北京市五大學生領袖，“天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地派”譚厚蘭、王大賓。只有蒯大富沒有到。毛澤東先問：“蒯大富怎麼沒有來？是出不來了，還是不願意來？”謝富治進讒言：“恐怕是不肯來。”當場有人糾正：“沒有找到他。”

毛告訴四大領袖：“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毛澤東問：“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原來毛澤東是要解決大學武鬥。幾天前，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在臨近清華西門外設了臨時指揮部。27日當天，毛澤東在中南海聽取彙報後，蹲在地上，俯視清華平面圖，用手劃著，向謝靜宜、遲群佈置工人從南門、西門、東門分三路開進清華。

414交出武器，拆除工事。團派和工人發生衝突，蒯大富冒大雨翻牆去市委，下午5點見到吳德，吳德就是不告訴是毛主席



毛澤東利用蒯大富來打擊
劉少奇和王光美

在指揮，一直讓蒯大富等著。晚7點蒯大富才等來遲群、謝靜宜和工人代表，開始談判。等待的兩個小時，清華已經開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也開入清華。午夜談判結束，蒯大富開始撤退井岡山兵團，在漆黑的夜幕之中，全部撤出校園，各奔東西。清晨五點半，蒯大富還給毛主席拍電報求救。

毛澤東邊問各校情況，邊說他自己解決武鬥的想法，馳騁縱橫談了很多。林彪言簡意賅，為毛澤東作了一下總結：“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的四個方案：第一，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鬥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澤東反覆表示態對在座學生領袖的支持。他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保護你們的，包括蒯大富罵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岡山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想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

他不斷講到蒯大富，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

蒯大富下放後“表現不錯嘛！”

對於蒯大富井岡山兵團打死人，毛澤東說：“井岡山他們這個做法不好。我說這個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50個，就是如果不考慮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實際損失最小、最小。”

毛澤東召見進行了三個多小時，黃作珍報告：“蒯大富來了。”毛澤東起身到門口。聶元梓和韓愛晶都詳細記述了當時情景：蒯大富一下就撲到主席懷裡，頭靠著主席胸口，嚎啕大哭，邊

哭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今天早上楊、余、傅黑後台……”毛主席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是我派去的。”蒯大富說，“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鬥，都是不帶槍……，這次為什麼抓我們的人？”毛澤東對著謝富治，溫玉成問道：“是不是抓人了？誰讓你們抓人？統統都放了！”蒯大富噁噁地哭。毛澤東流著眼淚，江青也哭了。

毛澤東對蒯大富竟然如此厚愛有加。聶元梓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出質疑：“但我始終困惑的是，為什麼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說一聲呢？他不僅是清華學生組織的頭頭，他還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我還是副主任呢，為什麼就不告訴我們呢？”

毛澤東對蒯大富又重複了林彪為他總結的制止武鬥的四個方案，其實毛澤東早就選擇好了“鬥批走”的方案，毛澤東親手發動了持續二年零一個月的紅衛兵運動，他要親手結束了，上山下鄉運動馬上就要開始，

1968年12月26日，蒯大富離開清華，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報到。

1969年4月毛澤東說：“蒯大富下放以後，表現不錯嘛！”

1970年4月份，蒯大富已經是北京市人大代表。10月17日青銅峽鋁廠通知他去北京參加四屆人大。在北京機場下了飛機，卻被接到清華審查“5.16”。遲群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這樣做。1973年10月蒯大富從清華審查之中又被下放到北京東風化工廠勞動五年。

中共中央中發【1976】4號文件傳達毛澤東1975年10月——1976年1月的最高指示，其中有：“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時，曾親口問過蒯大富：你能不能當清華校長？”蒯大富連連說“不能”。此次才是被毛徹底拋棄。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又被帶回清華，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佈逮捕。1982年10月被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起訴。庭審之前，專案組要求他法庭上不准提毛澤東、周恩來，蒯大富不同意，因為他當時非常害怕，以為要被槍斃。後來專案組只好和他談條件，達成“問什麼，答什麼。”的協議，換來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

專案組不讓蒯大富談的，也都是官方修史從來不做記錄的。最喜愛照片的蒯大富，也不可能把這樣的歷史場景用照片保存下來，只能埋藏在記憶深處。

蒯大富“滅了”鳳凰衛視

另一本相冊是蒯大富出國旅遊的照片，去過新馬泰，最近剛從台灣回來，有人驚奇地問：“允許你出國？”他理直氣壯地反問：“為什麼不讓出國？出國是很正常的呀。”2004年，他領到了護照。

第三本是他近年和一些名人的合影，有聶元梓、韓愛晶、毛澤東最後一個貼身護士孟錦雲、吳桂賢、清華眾多校友和領導。他告訴一位朋友，他近年見到一位清華退下來的校領導，沒想到這位校長說：“你是清華的驕傲。”

與蒯大富合影的影視明星也不少，最顯眼的是鳳凰衛視，上至台長劉長樂，下至俊男靚女主持人應有盡有，都想給蒯大富做節目，但是都被蒯大富謝絕，拒絕鳳凰衛視採訪的中國人極少，



文革時的蒯大富



如今的蒯大富

只有兩個人，其一是蒯大富，因此有朋友戲說：“蒯大富把鳳凰衛視‘滅了’。”其二就是張玉鳳。

與蒯大富合影的名人中，竟然還有諾貝爾和平獎的新科得主劉曉波，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系獄已經二年半。這張合影算得上是蒯大富的名人合影之最。

“走資派還在跑”

參觀清華大學校史館，是百年校慶的重點活動之一，由“清華幫”九大政治局委員之一的吳邦國題字的校史館前，排著長長的隊伍。蒯大富入館之後，特別選擇“文化大革命”時期留影。他戴著毛像手錶，戒指上也刻著毛像。當場有人問他：“你對這段歷史是否後悔？”他回答：“不後悔。”再問：“你現在怎麼看打倒走資派？”他玩笑似地回答：“現在是走資派還在跑。”

中午，蒯大富到職工食堂買了一碗“蛋炒飯”，有人問他的生活狀況，他說，每月有2000元低保收入，也有醫保，都是去年才

解決的。限於身體狀況他已經不再經營公司了。他自己還有兩棟房租收入，合起來，每月收入有一萬元以上。

蒯大富與羅曉波已經勞燕分飛。女兒蒯曉瓊，取音“窮”，紀念生她時的環境，在中國廣播大學讀編導系，今年畢業。

旁人口中的蒯大富

國慶三十五週年，鄧小平要閱兵，蒯大富、韓愛晶、魏京生一批重刑犯，一起被發配到青海塘格木勞改農場。蒯大富對魏京生說：“不要看我們兩個人都在坐監獄，我們有本質的不同，你是因為反對共產黨坐監獄，我是因為擁護共產黨做監獄。”魏京生怎麼回答，不知下文。

幾年前，有人曾在聶元梓家裡遇到過蒯大富，這位 1936 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聲色俱厲地問：“蒯大富，你說，是不是我制止了你武鬥？”蒯大富低垂著頭，一言不發，臉色不好看，在老太太的逼問之下，十分不情願地點了點頭。當年鄧小平一定要把聶元梓作為“文革”五大學生領袖審判，是有原因的。除了鄧樸方摔殘一直誤解聶元梓，在老鄧眼裡，作為“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的附庸，這幾個學生娃娃的份量還是不夠的。果然 45 年來，聶元梓和蒯大富們的所思所為畢竟不一樣。

借參加百年校慶的機會，蒯大富要參加清華大學文革紅衛兵領導人一個內部座談會，各派都參加。老校友約會，絡繹不絕，日程排得爆滿。

蒯大富在北京還是左派座談會熱烈歡迎的人物。之前，左派期待的是毛遠新，因為毛遠新來京過於疲勞，嗓子腫得不能講話，未能赴約，迎接者大失所望。蒯大富到來，使得北京的紅色情懷得到激發，全場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有人問過蒯大富：“你認識不認識胡錦濤？”他直言不諱地回答：“認識，清華時他就是個宣傳隊的隊長，經常畢恭畢敬向我請示問題。”

據說蒯大富說過的一句最狂妄的話，“十年看共產黨，百年看蒯大富。”

現在中國，蒯大富還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蒯司令？（柳江）

後 記

本書內容主要來源於明鏡網(mirrorbooks.com)、外參新聞網(waicannews.com)、《新史記》、《明鏡月刊》、《外參》和《大事件》，也引用了一些媒體資料，對所引用的資料儘可能都註明其出處和來源，但個別文章在網上幾經轉載，難以辨清其原創來源。如有錯漏，特表歉意，並懇請來函說明，本書再版時補正。

《新史記》編輯部

2011年8月

毛澤東影響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

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有著深刻的分歧

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是如何形成的？

毛澤東是清官還是貪官？

海南毛像被毀，兩派爭說毛澤東

禍國殃民總後台還掛在天安門

對毛澤東的再認識

只有和毛澤東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榮

共產主義理想付諸實踐就一定天下大亂

北大才子PK茅于軾：我也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

何新發出歌頌毛澤東的最強音

毛澤東是孤獨的大失敗者

毛澤東到底是暴君還是偉人？

阿拉法特：認識毛澤東的一面鏡子

基辛格把毛澤東稱為“哲學家之王”

毛澤東精心策劃“陽謀”的步驟

毛看歷史大視野和歷史大視野看毛

誰需要吸食“毛澤東精神鴉片”？

胡錦濤的部下不聽胡錦濤的話

左派舞劍，意在鄧公

劉思齊究竟是什麼身份？

“公訴”背後的政治格鬥

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

防止毛澤東式的野心家上臺！

毛澤東描繪的“天堂”，分明就是“煉獄”

中國社會左轉，兩者首當其衝

吹捧唱紅回報豐厚的李希光陰溝翻船

方濱興，不要墮落為艾希曼

胡錦濤經常畢恭畢敬向蒯大富請示

ISBN 978-1-936895-04-5



9 781936 895045

定價：HK\$109